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时间社会学

Sociology of Time

约翰·哈萨德　编

朱红文 李　捷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Sociology of Time
时间社会学

- 《时间社会学》
- 《全球复杂性》
- 《社会时间的频谱》
- 《时间与社会理论》
- 《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
-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 《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
-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 《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
- 《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

ISBN 978-7-303-09621-3

9 787303 096213 >

定价：28.00元

时　空　社　会　学　译　丛

景天魁 朱红文 主　编

时间社会学

Sociology of Time

约翰·哈萨德　编

朱红文 李　捷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社会学／（英）约翰·哈萨德编；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
(时空社会学译丛)
ISBN 978-7-303-09621-3

Ⅰ．时… Ⅱ．①约…②朱…③李… Ⅲ．时间哲学－研究 Ⅳ．B0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02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2226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 mm × 210 mm
印　　张：9.5
字　　数：288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策划编辑：李雪洁　　责任编辑：李音祚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John Hassard 199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copy or transmis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No paragraph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save with written permission 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98, or under the terms of any licence permitting limi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33-4 Alfred place, London WC1E 7DP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s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liabl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ivil claims for damages.

First published 1990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RG21 2XS and London
Companies and representativ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ypeset by Footnote Graphies,
Warminster, Wiltshiire

Printed in Hong Kong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The Sociology of time
1. Tim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 Hassard, John
306
ISBN 0-333-44092-7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Sociology of Time, 1st edition by John Hassar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总 序

用一整套丛书来介绍“时空社会学”，无论是对广大读者还是对社会学、社会理论等专业领域的学者来说，都似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其学术和社会意义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的确，尽管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涉及时代（时期）、区域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社会学的主题，甚至把“时空社会学”看作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一种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这在中外社会学界和社会理论领域还是需要加以论证的。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把时间看作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近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社会科学家只有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才能建构合理的社会思想，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研究的社会“秩序问题”。

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和批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局限性时更以嘲讽的口吻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概念。他认为，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时空被看作一种自然的常态、一种外生变量，而并非连续性的社会创造。然而，事实上，“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种严重的理论和方法论缺失，有理论本身和社会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牛顿经典时空观和康德虚空的时空范畴在社会思想中的后遗症，但是，与此同时，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主义理论模式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固有的弊端。古典社会学尽管有着近代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作为现实的基础，并从生物

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中引入了“进化”“节奏”“规律”和“发展”等概念，但是，由于物理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笛卡儿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社会看作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醉心于揭示“社会实体”中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恰恰忘记了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时空的复杂性。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动力学机制及其内在规定性的形成和展现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学机制表现为三个主要的社会因素或过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地点”和“场所”的局限而实现更广泛的联合。时空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它们成为人类社会组织中互不相关的方面，恰恰相反，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社会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联合就是时空重组的过程。时空的分离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机制来讲至关重要，同时，制度的脱域化和反思性又使在更大的时空尺度内筹划和管理现代社会广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和可能。

或许就是出于理论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在时空问题上形成了越来越明显和强烈的兴趣。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的都市研究，都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福柯甚至预言社会理论的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时间问题上，早在 1937 年，著名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就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动力学研究中时间变量的意义，以及社会时间范畴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法国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出版专著《社会时间的频谱》，分析了时间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即使深受帕森斯功能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述传统的社会学意义时，也曾指出模糊和忽视社会的时间历史向度对社会科学的不利影响。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家吉登斯和鲍曼等，更进一步建立起时间和空间范畴在社会场域中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时空的变化和重组是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量。

“时空社会学译丛”首批著作包括《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社会学》《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与社会理论》《时间：现代与后现代

经验》《劳动的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以及《全球复杂性》10本，着重介绍时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时空社会学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

本译丛的出版，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时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用时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实际。

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现代性迅速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重塑了我国社会的时空结构，而从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又可以更好地解读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必须立足于把握中国的时空特性。

空间性问题，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首先要关注的问题。“空间”首先是指地理空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拉大的社会效应。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主要指社会空间，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何一个成绩除以13亿，就变得很小很小了；任何一个问题乘以13亿，就变得很大很大了。这就是规模作用。目前发生于我国社会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和事件，都有着这种空间因素和空间效应，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例如，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流动于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此大规模的流动，历史上不曾有过。体现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于其间的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极具社会学意义。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都是目前我国社会研究中要关注的空间维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特点，就是许多应该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事情，被压缩和重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太空育种，从古老的手工制作到现代的纳米技术，从荒凉的村寨到繁华的都市，都集中存在于同一个过程中。那些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被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如传统和现代、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此外，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特定的历史机遇，抓

住了机遇，我们就能赢得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对社会过程和社会事件中的时间因素的把握，以及整个理论和文化结构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和重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时间和空间虽然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维度，但是，它们又整合在同一个社会过程之中。比如，城乡协调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学一直关注的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如此等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多种多样的时空重组和时空变换。

还应该指出的是，时空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宏观社会过程和社会制度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场所、先后、次序等，就是很有趣味的空间和时间问题，其中往往包含着复杂的权利关系和社会文化意义。

可以肯定，时空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文化重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景天魁　朱红文

2008 年 11 月 29 日

前 言

本书的缘起

本书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斯顿（Aston）大学、卡迪夫（Cardiff）大学和基尔（Keele）大学所从事的一系列关于时间社会学的研究。近几年来，我与时间社会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ocial Study of Time，简写为ASSET）的同事，特别是阿斯顿大学的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卡迪夫大学的保罗·布莱顿（Paul Blyton）和诺丁翰大学的肯·斯塔基（Ken Starkey），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一起探究时间概念与许多当代社会学问题的关系。这些社会学问题，包括休闲方式、

工作计划、决策、组织结构和经济计划等等。①

不过，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研究者——缺少一部收录该领域权威文献的正式辑录。虽然这个领域中有过几本专题

---

① 这一计划的成果发表在许多会议论文、博士论文、期刊论文和著作之中（参见，例如，Clark, P., Hantrais, L., Linhart, D. and Starkey, K. (1984) *The Porous Day and Temps Chois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annual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Blyton, P. (1985) *Changes in Working Tim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London: Croom Helm; Blyton, P. (1978) '*The Working Time Debate in Western Europe*', *Industrial Relations*, 26, pp. 201－217; Clark, P. A. (1982)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f Time and Structure for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Aston; Clark, P. A. (1989) '*Chronological Code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in Hassard, J. and Pym, D.,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assard, J. (1985) '*Multiple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n Analysis of Work Behaviour in the Fire Servic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ston; Hassard, J. (1988a) '*Time and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Dragon: *the SCOS Journal*, 6, pp. 31－51; Hassard, J. (1988b) *Time: A Neglected Symbol in the Labour Process Deb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Annual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Hassard, J. (1989) '*Toward a Qualitative Paradigm for Working Tim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19, pp. 93－104; Hassard, J. and Hutchinson, R. (1990) '*Time and Organization*', Dragon: *the SCOS Journal* (forthcoming); Starkey, K. (1985) '*Time and the Labour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annual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Starkey, K. (1986) 'Time and Professional Work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ston; Blyton, P., Hassard, J., Hill, S., and Starkey, K. (1989) *Time, Work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性论著，[①] 也有过几本会议录，[②] 却一直没有一本书对（该领域的）重要文献按照一系列不同的视角和范式加以分类整理。更为遗憾的是，许多在时间社会学领域中更具影响力的作品仅存于一些现在已经绝版的专业杂志和学术著述之中。

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缺憾，我编了现在这部文献辑录，目的就是为初涉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种指导，让他们了解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概念、主题和问题。

本书的安排

除了一个绪论和回顾以外，本书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前面几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涉及哲学和概念的问题，而后面几个部分（第三、四、五部分）则涉及具体的研究课题。读者将从有关时间的基本哲学假定的讨论（第一、二章），到有关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的种种理论（第三～六章），再到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从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时间研究中产生的（第七～十四章）。读者将发现本书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这一个学科的贡献，还包括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著作——例如，社会哲学、社会史、工业经济学，特别是人类学。我希望这种多样性能拓宽本书的范围，丰富本书的内容。

---

① 参见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drecht: D. Reidel;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Jaques, E. (1982)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Heinemann; Young, M. (1988)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② 例如，Fraser, J. T. and Lawrence, N. (eds.) (1976)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Fraser, J. T., Lawrence, N. and Park, D. (eds.) (1978) *The Study of Time*, Vol. 3,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Frankenberg, R. (ed.) (1989) *Time and Health*, London: Routledge.

内容概述

第一部分：时间的概念

在第一部分“时间的概念”中，我们将为时间社会学确立一些概念基础。具体地说，我们在这一部分中安排了两篇摘录，分别节选自社会哲学中的两项标志性研究——埃利奥特·贾克斯（Elliott Jaques）的《时间的形态》（1982）和乔治斯·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的《社会时间的频谱》（1964）。这两部著作提出了时间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假定。

节选自贾克斯的著作（1982）的摘录，“时间之谜”，涉及基本的哲学问题，诸如：“时间流动吗?”“存在时间之矢吗？它向一个方向运动吗?”“未来不同于过去吗?”[①] 贾克斯认为，“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一种成熟的哲学理解至今未能形成……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包含在上述诸问题中的混乱至今未能消除，而且关于时间本质的成熟的哲学理解也一直没有形成”。[②] 贾克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两个重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涉及“原子世界中运动的性质”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结构、流动和生成”的种种问题，而第二个主题——对我们来说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希腊的两个时间概念 Chronos 和 Kairos 在分析上的区别——也就是“有开端、中间过程和结尾的事件的时间”（Chronos）和“有目的的生活的时间”（Kairos）之间的区别。Chronos 的科学的和逻辑的时间——与“时钟时间”的观念相联系，而 Kairos 的人的周期性循环的时间——与“存在的时间”观念相联系，它们的这些区别将在我们后面将要介绍的许多更直接属于社会学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在第二章“时间的问题”中，乔治斯·古尔维奇也提出了一些有社会学意义的哲学问题。古尔维奇在皮亚杰（Piaget）、伯格森（Bergson）和巴什拉（Bachelard）等人的著作的基础上，分析、思考了一系列为社

① Jaques, E. (1982)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Heinemann, p. 11.

② Jaques, E. (1982)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Heinemann, p. 9.

会科学家所用的时间定义（虽然他最初的目的是要发展他自己的时间定义，即时间是“以非连续性的相继而持续存在以及异质性的时刻连续中展开变化的集中和发散的运动”。[①] 古尔维奇通过把这些定义与时间社会学争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多样的时间”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形成了上述分析。在这里，鉴于对“时间在不同学科中的多样化表现”这一问题的考虑，他讨论了当代物理学中的时间问题，而且还特别提及了爱因斯坦的工作。这一分析为他那著名的“多样的社会时间”类型学铺平了道路，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对此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社会—时间

第二部分中的四章为社会时间的意义和结构提供多样性的阐释。这里的各个章节风格各异，从个人发言（第三章），到专题论文（第四章），到一种类型学（第五章），再到一套操作性的假设（第六章）。

第3章是雷德哈卡马·马克吉（Radhakamal Mukerjee）的一篇题为“时间、技术和社会”的发言稿。马克吉通过对“天文时间”与“社会中的时间”之间的区别的一般性讨论，引入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天文时间”的特征是统一性和同质性，而“社会中的时间”的特征是非连续性和多样性。马克吉的这一章预示了本书后面将要涉及的许多主题——尤其是他对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比较，他对于不同计时方式的看法（他在此引用了人类学中的许多例子），以及他对工业主义和由机器系统技术所造成的影响的评论。

我们在第四章中呈现给读者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关于社会时间的“理论”。这是一项公认的经典研究，其作者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他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迪尔凯姆主义。首先，他们以充分的理由指出，天文时间只是几种时间概念中的一种；其次，对社会协作的需要是各种与时间有关的社会制度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与迪尔凯姆一样，他们认为社会时间根据群体所共有的信念和

---

①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drecht: D. Reidel, p. 18.

制度而从质上区别开来,[①] 这个论点所依据的主要是人类学的假定。最重要的是，他们力图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时间不是连续的，它不时地被关键性的、有意义的参照点打断。因此，他们认为，所有的历法体系都是从社会需求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又因为这种需求而永存——它们产生于社会的分化，也是社会互动领域不断扩展的结果。[②]

社会时间的多样性体系的论题从古尔维奇的形态类型学中发展出来（第五章）。古尔维奇也受到了迪尔凯姆学派，尤其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著作的影响，他发展了后者的“时间与总体性社会现象之间的辩证法”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探索社会时间的各种不同的“深度层次”。[③] 对于古尔维奇来说，一种清晰的时间分类体系是必要的，因为“为了研究体现在不同层次上的社会时间的不同表征，我们必须努力形成一种更具体的社会时间概念”。[④] 在第五章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努力的成果——著名的社会时间类型学的八分法，即持久的时间、欺骗性的时间、不规则的时间、轮回的（或者循环的）时间、迟滞的时间、交替的时间、超前的时间和爆发性的时间。

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和安德鲁·韦加特（Andrew Weigart）对“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的讨论（第六章），进一步完善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里，刘易斯和韦加特试图发展一种时间社会学的“范式”。他们描述了社会时间的某些限定性特征之后，又进一步讨论了“生平和互动结构”与“制度和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时间类型学——一种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相对应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的结构建立在嵌入、分层和同步化这三个概念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这三个概念就是社会时间的核心。刘易斯和韦

---

①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15.

②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15.

③ 参见 Mauss, M. (1966)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④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drecht: D. Reidel, p. 30.

加特成功地整合了这三个重要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形式理论。当刘易斯和韦加特对包含在他们的讨论之中的一些关键性命题和推论进行演绎和联系的时候，这种理论的潜力就得到了证明，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一系列具体的研究假设找到了相应的范式。

第三部分：资本主义

在第三部分，我们开始探索社会科学中的时间研究的具体论题。我们最初所关注的，是与时间和**资本主义**相关联的问题，并且探究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第一个是关于资本主义时间意识形成的历史研究（第七章），第二个是关于资本主义工作时间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侧重经济学的研究。

在第七章中，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对时间意识在从14世纪到19世纪后期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种说明，正是这段时间见证了封建主义的灭亡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思里夫特认为，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一种建立在计算理性基础上的新型时间逐渐扩散的过程”。[①] 他认为，这一时期见证了这种新的时间观念的变革，从一种备受争议的特别事物，到后来逐渐沉积到“实践意识的缝隙”之中——也就是说，它完全成为了资本主义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章的结论部分，思里夫特还分析了这种新的时间意识在形成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扩散——以表明地方的特殊性和这一过程发展的不均衡性。

第八章的重点变成了一种关于工作时间的社会经济学分析，特别对围绕着“资本主义与工作—时间思想史”而展开的争论进行了讨论。在这里，克里斯·尼兰德（Chris Nyland）解释了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雇员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长度不断缩减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重商主义者、古典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边际主义者都不遗余力地解释标准时间应该发生变化的原因。尼兰德概括了他们对这一争论的主要贡献，然后把他们的各种理论都置于一种历史

① Thrift, N. (1980) '*Owners' time and Our Time: 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1300—188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 57.

背景中去考察。他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还存在着许多以人类内在局限性而非工资为基础的现象，并据此提出了现在仍然主导着整个争论的边际主义偏好论会遭到挑战的原因。[①] 尼兰德形成了这样一种立场，他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人类局限性的观点一直都主导着整个工作—时间问题，这一贡献的精髓从来没有被驳倒，而只是被简单地从讨论中剔除了。因此，尼兰德认为，整个当代的争论都是建立在许多并没有得到证明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导致了这场讨论越来越没有结果。[②]

第四部分：工作和组织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工作与组织。在这一部分，我们研究时间与组织经验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工作满意度（第九章），角色分割（第十章），以及长时间的监禁（第十一章）。

第九章是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所作的著名研究——“香蕉时间：工作满意度与非正式互动”——的部分摘录。在这一研究中，罗伊采用了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来记录一个由工厂操作工人构成的工作小组内部的互动。这些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无非就是在超长的劳动日（每周6天）内完成简单的重复性操作，所以，罗伊所关注的问题是这种小群体是如何对付“单调猛兽”的。罗伊分析了这组工人如何通过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以事件为基础的计时系统——一种以“桃子时间”、“香蕉时间”、“窗户时间”、“取货时间”、“腌鱼时间”和“可乐时间”的日复一日的循环为基础的计时体系——而“避免疯掉”。而这一分析已经成为一系列与之相似的关于工作中的质性计时的人类学研究的典范。[③]

---

① Nyland, C.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p. 513.

② Nyland, C.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p. 513.

③ 参见 Ditton, J. (1979) 'Baking Time', *Sociological Review*, 27; Cavendish, R. (1982) *Women on the Lin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ssard, J. (1985) '*Multiple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n Analysis of Work Behaviour in the Fire Servic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ston, Chapter 4.

在泽鲁巴维尔（Zerubavel）的“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这一章（第十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个人与角色，尤其是关于私我与公我之间的区分的讨论。泽鲁巴维尔认为，现代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虽然泽鲁巴维尔指出，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的概念不同于工作与闲暇的概念，但是，他也感觉到，我们只有在工作领域中才能最好地把握私我从公我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性。在泽鲁巴维尔看来，“个人对其角色的部分参与往往可以从时间上加以规定”，而从这一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将个人区分为“个人和承担特定职业角色的在职者”的“官僚式分割”的时间方面。他概述了大多数职业责任是怎样用“每天几小时”或“每周几天”（更不用提全职与兼职之间的一般的区分）来规定的，甚至假期——人们在每年的这段时间里不必积极地介入到他们的职业角色之中——也是被从时间方面规定的。文章的最后是一个详细的个案研究，概述了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专业承诺产生影响的时间的力量。

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又回到了社会人类学，但这一章是对一种基本上属于非工作的组织——监狱——中的时间经验的思考。在第十一章，柯恩（Cohen）和泰罗（Taylor）讨论了长期服刑的人所面临的特殊时间问题——这些人用时间来接受惩罚，是在“服刑”。柯恩和泰罗注意到，对于这些犯人来说，时间就像罚款一样被法院拿走了。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成了一种外部的控制，而不是一种私人的资源——“它是要被用来服刑的，而不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与第九章中罗伊所说的工厂工人一样，柯恩和泰罗描述了长期服刑者通过形成标记时间的方法——“区别和划分时间”的方法来延续生命。他们概述了由长期服刑的人创造的各种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主观时钟”，以保护自己避免陷入对“迷雾重重的深渊”的恐惧之中。①

第五部分：文化与视角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文化与时间观”，人类学又一次扮演了重要

---

① Cohen, S. and Taylor, L. (1972) Psychological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Imprison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的角色。的确，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导论中所要看到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之中，人类学对时间研究的贡献可能是最多的。所以，本书最后这一部分是对不同类型时间观的深入洞悉，这些时间观分别存在于三个非常不同的民族中——现代美国人（第十二章），特罗布里恩德岛岛民（第十三章），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第十四章）。

第五部分是从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和罗斯·科塞（Rose Coser）的文章“时间观与社会结构”的摘录开始的（第十二章）。科塞夫妇介绍了社会计时的一般领域，然后通过概述那些标志性的人类学研究（例如，弗罗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lm）和欧文·霍洛韦尔（Irving Hallowell）的研究）中的概念，进一步深入。不过，这些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为分析西方社会的文化时间取向（cultural time orientations），尤其是为分析美国的时间观铺平道路。的确，这一章的核心内容就是试图形成一种关于“美国文化中的主流和偏离主流的时间观”的类型学。这一类型学说明了四种主要的社会视角——个人主义的和积极的，集体主义的和积极的，集体主义的和消极的，以及个人主义的和消极的——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些社会观是如何与四种不同的时间观联系起来的。这四种时间观分别是（Ⅰ）顺应主流的；（Ⅱa）个人主义的/集体的/未来；（Ⅱb）未来的（乌托邦的）；（Ⅲ）千禧年主义的；以及（Ⅳ）享乐主义的。科塞夫妇依据上述分析认为，个人或团体采取这些取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偶然的……时间观是决定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在第十三章，我们将更直接地关注人类学的方法，这一章是讨论文化和时间观的两篇经典作品中的第一个——这两篇都阐述了那些远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线性时钟时间模式的计时模式。第一个是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作的关于“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太阴历和季节性历法”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说明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在初民的计时方式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为什么这种计时方式会受到关于天文活动的神话和传说的影响。举例说，在讨论太阳的

① Coser, L. and Coser, R. (1963) 'Time Perspectiv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 W. Gouldner and H. P. Goutdner (eds), *Modern Soc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p. 647.

作用时，马林诺夫斯基注意到，“魔咒的风格与把太阳用于计时的实际应用——也就是一天中各段时间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①]。正是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出现了“一系列表达用以描述凌晨、清晨日出前、日出、太阳的光线呈水平线、微微翘起、在头上、倾斜、往下沉、完全落下去的时间”。[②] 不过，马林诺夫斯基解释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时间计算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月亮而不是太阳或星星；虽然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制造或者消除月光的巫术，没有任何形式的关于月亮的仪式”。与对太阳的信念相对照，土著人几乎没有关于月亏或月盈的神话——某些月份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的经济事务完全是经验的。的确，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月亮在部落生活中的巨大意义，土著人对它的兴趣，完全是直接的、非象征性的”。[③]马林诺夫斯基详细解释了月光对于一个人工照明极端原始的国家里的时间计算的重要性。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有关时间计算的另一个经典人类学说明的摘录——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阿尔及利亚农民对时间的态度”的分析。[④] 布迪厄说明了为什么（与西方人的时间取向相对照）对于卡比尔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试图把握未来更加陌生……因为他直接附属于直接感知的现在”。[⑤] 布迪厄说，卡比尔的农民一般不能想象一种遥远的未来。有必要把卡比尔人的时间态度看做是对时间流逝的一种“顺从”——也就是说，“在气候的危险、自然的反复无常以及神

---

① Malinowski. B. (1926－1927) 'Lunar and Seasonal Calendar in the Trobriand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6－57, p. 205.

② Malinowski. B. (1926－1927) 'Lunar and Seasonal Calendar in the Trobriand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6－57, p. 205.

③ Malinowski. B. (1926－1927) 'Lunar and Seasonal Calendar in the Trobriand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6－57, p. 206.

④ 见本书第十四章。

⑤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55.

的决定面前采取简单的放弃”。[①] 布迪厄对这种“顺从”的态度提供了一种详尽的分析，说明这是与对“自然的节奏”的顺从的态度不可分割的。[②] 布迪厄在他的观察中捕捉到了这一种观念：“虽然自然有其无常和严酷，卡比尔农民依然对它怀有深刻的休戚相关和依赖的感情，……使卡比尔农民形成了一种顺从和对时间流逝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会想控制时间，消耗和节省时间……所有的生活行动都不受时间表的限制”。[③] 布迪厄描述了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之中，“匆忙的举动被视作缺乏礼貌”。在那里，“使用某人自己的时间的……一整套艺术得以形成”。这是一种不关心时间表，免受钟表（有时被称作“魔鬼的磨房”）的苛政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农民“从容不迫地劳作，今天完不成的工作就留到明天”。[④]

---

①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55.

②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57.

③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57.

④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58.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迪厄，曾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国巴黎）主任。

史坦利·柯恩，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以色列）犯罪学教授。

刘易斯·科塞，纽约州立大学（美国斯托尼·布鲁克）著名社会学教授。

罗斯·科塞，纽约州立大学（美国斯托尼·布鲁克）著名社会学教授。

乔治斯·古尔维奇，曾任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教授。

埃利奥特·贾克斯，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J. 大卫·刘易斯，现任美国圣母大学社会学教授。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曾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

罗伯特·默顿，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雷德哈卡马·马克吉，曾任印度勒克瑙大学社会学教授。

克里斯·尼兰德，现任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经济学讲师。

罗纳德·罗伊，曾任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皮蒂里姆·索罗金，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

劳里·泰罗，现任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奈杰尔·思里夫特，现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教授。

安德鲁·J. 韦加特，现任美国圣母大学社会学教授。

埃维阿特·泽鲁巴维尔，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

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

约翰·哈萨德

在现代社会学分析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尽管迪尔凯姆早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作出了表率，但是，几乎很少有研究者追随他继续研究社会中的时间问题。因为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把时间看做是他们研究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主题，因此，对各种现代时间概念与我们所创造的工业社会的各种形态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比较详细的说明。

的确，社会学几乎可以被说成是与“时间无涉的”。因为它的重点一直被放在发展各种**静态的**视角上——诸如结构—功能主义或者系统理论——所以时间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忽视了。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一直是“同时性的而不是纵向性的”；也就是说，它强调结构的持久性特征，而不是变迁和变革的各种动力。[①] 主流研究范式更适合于“时间中的片段”的研究，而且尤其是那些将结论建立在简单的统计相关的基础之上的研究。简而言之，时间要么不被看做是一个说明性变量，要么只是在随后的证明中才被引入。

在这一篇导论中，我试图对这样一种状况做某些修正。许多作者注意到，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着理论上和分析上的贫乏，而我却试图举例说明这样一种情况，对于研究时间的社会学学者来说，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许多可以利用的框架和视角。我将回顾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对社会时间研究）的贡献，进而证明在社会时间研究中已经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传统。具体来说，我将找出许多与社会学分析相关的扩散的时间意象，并举例说明这些意象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对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的一种更加细致的理解。简要地说，这一回顾将涉及：（1）对时间社会学而言意

---

① Clark, P. A. (1982)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f Time and Structure for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Aston.

义重大的贡献，(2) 社会学中主要的时间意象，以及 (3) 指导社会学进行时间研究的框架的构成要素。我相信，通过阅读这篇导论，读者就会熟悉那些贯穿于时间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存在于计时活动中的质的和量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循环的和线性的，以及基于时钟的和基于事件的不同形式之间在分析上存在的差别。

对时间社会学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贡献

与其他学科相比，在形成关于时间的知识体系上，社会学的步伐一直比较慢。[①] 的确，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学文献中仍然缺少对时间的关注。虽然一种时间社会学的某些基础，在 20 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里就已经奠定了，却没有几位作者接受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提出的挑战；也就是说，详细阐述社会时间概念的结构和意义。[②] 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社会学这一学科所强调的是秩序、稳定和状态等问题，而忽视了冲突、变迁和过程的问题。

虽然有人会认为这种立场必须予以纠正，而稍后我也将简述一些与之相关的努力，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简单地概述关于社会时间的一系列视角。这些视角是与这一领域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尤其与埃米尔·迪尔凯姆，皮蒂里姆·索罗金，乔治斯·古尔维奇（Georges Gurwitch）以及威尔伯特·摩尔（Welbert Moore）的著作联系在一起。

埃米尔·迪尔凯姆：质性—时间

真正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时间的源头，可以在埃米尔·迪尔凯姆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找到。在一般所谓的“法国传统”中，迪尔凯姆[③]，

---

① 见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② 见 Gurvitch，本书第五章；Lewis and Weigart，本书第六章。

③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休伯特[①]，休伯特和莫斯[②]，以及莫斯[③]的著述都通过一种“质性—时间”的概念（即，一种对时间的理解，但它并不被那些把时间看做是被测定的持续时间段的那些作者所接受），而强调社会生活的节奏性。举例来说，休伯特把时间界定为一种象征结构，这种结构通过时间的节奏来再现社会的组织。在关于社会时间和宗教的分析中，迪尔凯姆也涉及了这一主题。[④] 我们看到，迪尔凯姆[⑤]强调时间是一种集体现象——把它看做是集体意识的产物。[⑥] 在迪尔凯姆看来，某一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共享一种共同的时间意识；时间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想范畴，一种社会产物。在迪尔凯姆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社会节奏概念的一种宏观层次的说明。集体—时间是时间进程的总和，而各种时间进程相互连接从而形成某一给定社会的文化节奏。迪尔凯姆指出：“[因为] 集体生活的节奏支配和包含着由集体生活所导致的所有基本生活形式的各式各样的节奏；因此，得到表达的时间也就支配和包含了所有具体的持续过程”。[⑦] 在迪尔凯姆看来，时间起源于社会生活，成为集体表征的主题。时间被碎片化为许许多多时间性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被“组成一种总的文化

---

① Hubert, H. (1905) 'Etude Sommaire de la Representation du Temps dans la Religion et la Magie', *Annuair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Studies*, pp. 1—39.

② Hubert, H. and Mauss, M. (1909) *Me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Alcan.

③ Mauss, M. (1966)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④ 见 Isambert, F. A. (1979) 'Henri Hubert et la Sociologie du Temps', *Revue Francais de Sociologie*, 20, pp. 183—204.

⑤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⑥ Pronovost, G. (1986) 'Time in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7, pp. 5—18.

⑦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p. 69.

节奏，这种节奏赋予时间以意义”。[①]

皮蒂里姆·索罗金：文化、节奏和意义

在美国社会学界，皮蒂里姆·索罗金的工作，尤其是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协力完成的工作，[②] 包含着某些有关社会时间研究的最早、也最具煽动性的洞见。索罗金和默顿[③]，像法国学派一样，除了强调文化节奏的内在性以外，还强调社会时间的质性特征。不过，在这里，他们不仅吸收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而且更明显地借鉴了诸如科德林顿[④]、霍德森[⑤]、尼尔森[⑥]、贝斯特[⑦]以及克罗伯[⑧]等人类学家的著作。这样一种综合性使得他们无论在微观层次还是在宏观层次都能确定质的主题。虽然在微观的层面，他们强调时间的不连续性、相对性和特殊性（“社会时间在质上是相互区别的”），[⑨] 但是，他们也和迪尔凯姆一样，指出“时间的单位通常是由集体生活的节奏所决定的”。的确，索罗金和默顿在这个点上走得更远。虽然埃文斯-普里查德[⑩]在关于努尔人的研究中举例说明了特定的活动如何赋予社会时间以意义，但是索罗金和默顿采取了一种更具有知识社会学特征的立场。他们认为意义总是把某一事件与其时间性的背景联系在一起，而对特定时期的认识往往取决

---

① Pronovost, G. (1986) ‘Time in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7, pp. 5—18.

② 见 Sorokin and Merton，本书第四章。

③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p. 615—629.

④ Codrington, R. H. (1891) *The Melanesians*, Oxford.

⑤ Hodson, T. C. (1908) *The Meitheis*, London.

⑥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und.

⑦ Best, E. (1922) *The Moari Division of Labour*, *Dominion Museum Monograph*, No. 4.

⑧ Kroeber, A. L. (1923),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⑨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15.

⑩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于被归属于这些时期的意义的大小。他们指出，质性—时间的概念不仅对原始社会是重要的，对于现代工业国家也同样重要。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证明："社会时间是质的，而不完全是量的……这些性质来自于由群体所共有的信念和习惯……它们服务于呈现它们在其中被发现的各种社会的韵律、跃动和节拍"。[①] 索罗金和默顿由此展现出社会—时间与天文—时间在分析上的重要区别——前者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为参照点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变化和运动"所做的一种表达。[②]

不过，索罗金在别的地方[③]也注意到——用实践的术语来说——为何在社会—时间和天文—时间之间还存在一种重要的相关性；因为在一个由钟表所驱动的社会中，行动并不总是被给予适应周遭环境的时间跨度。于是，行动反而被机械地强加上了时钟时间单位。就大多数人类活动而言，时钟时间成为强加性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被各种活动（例如，劳动、睡觉、做爱、吃饭）的机械的时间安排所困扰。索罗金探索了这种时间性的某些结构特征，诸如，同步性与秩序、节奏与阶段，以及周期与节拍，[④] 并且强调诸如两段节奏（例如，经济中繁荣与衰退的循环，或者历史中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运动）甚至三段节奏（例如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普遍性。

乔治斯·古尔维奇：多样的时间—层次

我们将在第五章中看到，乔治斯·古尔维奇[⑤]在描述社会时间的异质性的工作中的一次影响最为深远的尝试。在一篇复杂深奥的（虽然有时显得不容易理解）论文中，古尔维奇对八种"时间"进行了类型学的

---

①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23.

②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18.

③ Sorokin, P. A.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④ 亦见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Lewis and Weigart, 本书第六章。

⑤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drecht: D. Reidel.

分析，进而指出现代阶级社会在时间上的复杂性（即持久的，欺骗性的，不规则的，轮回的（或循环的），迟滞的，交替的，超前的，爆发性的）。他说明了相互冲突的时间的混合是如何展现文化特征的，各种团体又是如何围绕着“适当”的时间选择进行持续竞争的。同迪尔凯姆一样，古尔维奇区分了作为各群体和社会之特征的“微观社会时间”与作为诸如体制和制度之特征的“宏观社会时间”。他不断提及社会时间的多重性，尤其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发现时间标度和时间层次的多样性。古尔维奇指出，通过在社会层面上分析时间，我们能够揭示时间标度方式的双重特点——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那种以等级化的方式排列和统一起来的时间；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那种更富有弹性的时间”。[①]因此，与索罗金和默顿一样，古尔维奇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时间从分析方法上来说是不同于时钟时间的，因为前者“往往不能测量，尤其不能量化”。[②]

威尔伯特·摩尔：时钟时间与功能主义

尽管威尔伯特·摩尔和古尔维奇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表了各自的论文，但是前者的功能主义分析和后者的分析在风格上大相径庭。摩尔并不是抽象地谈论时间问题，因为他所谈论的一般是或只是时钟时间。在摩尔看来，时钟时间对人类而言，是一种难得的资源，也是人们借以组织自己生活的方式。就其作为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而言，摩尔认为，三个要素构成了社会时间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三个要素就是同步化、次序和速度。“同步化”是指同时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次序”涉及这样一个事实：特定的行动往往要求一种具体的排序；而“速度”是指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周期内，事件发生频率的重要性。这里，摩尔与社会人类学家不同，后者强调社会时间的主观特性，而摩尔则把重点放在其客观的性质和特征上。摩尔认为，社会时间既可能是自变量，也可能是因变量。作为自变量，它代表特定社会过程在其中出现的情境：例如，社会时间能够被用来测量社会过程在不同社会系统中进展和扩散的速度。而就后

①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p. 391.

②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p. 19.

者而言，社会时间往往成为一种策略。时间的策略涉及对时间的有目的的操控，目的就在于获得或者显示诸如权力或忠诚之类的因素。

社会理论中的时间意象

在迪尔凯姆、索罗金、古尔维奇和摩尔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与时间社会学研究相关的概念。具体来说，我们发现了使我们能够对社会情境的时间性进行详细分析和说明的概念——例如，质的时间与量的时间；客观的时间与主观的时间；多样的时间层次。从这些作者那里，我们了解到，尽管时间在西方社会学中被描绘成一种实在的稀缺资源，但它也作为社会意义的媒介而发挥作用。虽然存在仅仅靠量的标准来说明社会时间的诱惑，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些作者意识到“各种时间”的社会建构性，进而了解到许多计时活动（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是质的过程。

了解了这些由社会学领域中的作者提供的最初的主题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对它们进行逻辑排序了。同样，我们也可以为时间社会学建立一些分析维度。这些分析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概念的多极性和二分法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为我们建构一种社会时间分析的研究框架提供重要的基础。

相互竞争的时间意象的合理化

在定义时间的性质时，社会学家一般会采用以下两种路径中的一种：即（1）描述“社会—时间”与“时钟—时间”这两个概念的差别，[①] 或者（2）对时间分类的隐喻（例如，程序性的、机械的、线性的、循环的、辩证的）进行译解。[②] 在这一节中，我将尝试通过对他们

---

① 参见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p. 615－629;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② 参见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Mauss, M. (1966)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的基本主题进行一般化的讨论来说明这两种路径。

社会—时间和时钟—时间

虽然许多社会学家的著述提及时间时总是伴随着诸多关于时钟的意象，但对于另外的很多人来说，社会—时间与时钟—时间是不对等的。在他们看来，社会—时间涉及社会过程，它所涉及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主体间性的概念化，而不是对社会事件的机械的结构化。

许多学科中的作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哲学中，这种观点往往和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①]联系在一起。在伯格森看来，牛顿物理学的同质性时间，并不是真实呈现给人的时间。许多经验性很强的著作则用事实证明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学家菲利普·罗克（Philip Rock）说明了如何通过印第安人的守夜习俗中的“聚集时间”、“歌唱时间”、“间歇”和“进餐时间”来理解这一习俗的意义。社会学家罗纳德·罗伊（Ronald Roy）也以相似的方式说明了在美国的一个机器车间里的工作经验是如何建立在“桃子时间”、“香蕉时间”、“取货时间”、“腌鱼时间”和“可乐时间”的日复一日的循环的基础上的。在这两个例子中，任何“时间”和时钟—时间都没有直接关系。

社会时间与时钟时间几乎完全分离开来，这种情形也出现在神话意识的研究中。[②] 在神话思想中，巫术之类种种神秘力量往往否定我们上面提到的时间因果关系。例如，卡西尔（Cassirer）[③] 引用过这样一个例子，被箭所伤的武士把药膏涂到箭头上，以为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疼痛。在这里，时钟时间被逆转了，为了改变事件的进程，现在被拉回到过去。卡西尔提出，在原始人的象征体系中，时间间隔是不可预期的，反而被看成是同质连续，其原因就在于那时的人们尚不知道时钟的客观性。

埃文斯-普里查德[④]和利奇（Leach）[⑤] 也同样注意到了类似的情况。

---

① Bergson, H. (1910) *Time and Free Will*, New York: Harper & Raw.

② 参见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③ Cassirer, E. (1944) *An Essay on Man*, New York: Bantam Books.

④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 Leach, E. R. (1961)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London: Athlone Press.

他们在著作中举例说明了以下问题：在原始文化中，社会活动如何构成了主要的计时标记。埃文斯-普里查德描述了努尔人的时间概念是如何既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生态环境，又反映了这种社会体制内的相互关系的。同样，努尔人也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循环性的生态变化基础上的计时体系。举例来说，（他们）在 Kur 这个月建羊圈，而根本原因就是“某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定是在 Kur 这个月前后”。[①] 同样，人们会在 Dwart 这个月里废弃羊圈，回到村子，而这样做的逻辑就是“既然人们要离开，那么此时必然是在 Dwart 月前后”。[②]

在关于缅甸北部克钦人（the Kachin）的研究中，利奇注意到，在他们的多样的时间观念当中，并不存在永恒的客观性。当然，克钦人的语言中并没有和我们西方人的“时间”概念相对应的词。然而，他们用几个术语来表示时间的不同方面；例如，他们把时钟—时间叫做 ahkying，他们把“一段很长的时间”或“一段很短的时间”分别称作 na 和 tawng；他们用 na 指春天的时间，而把“某人一生的时间”称作 asak。

索罗金也以类似的方式指出，尽管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有某种类似于周（week）的时间形式，只是它们可能包含三天到十六天或更多的天数。此外，他还注意到，在许多社会中，像周这样的时间划分往往反映了社会区分，要么就建立在某些关涉社会权宜的特殊标准的基础上。时间划分一般以市场活动的周期为基础。例如，卡西人（the Khasis）以 8 天为一周，这是建立在他们的贸易制度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每 8 天举办一次集市。市场制度的作用的确是太大了，以至于每周的各天都是根据主要的集市所在地来命名的。

最后，布迪厄[③]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the Kabyle）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一种社会—时间制度是如何被创建起来的这一问题。这种社会—时间制度不只是与时钟—时间不同，而且实际上与时钟—时间为敌。卡比尔人在生活中不关心时钟—时间的流逝；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匆忙举动会受到鄙视，根本没有准时会面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吃饭时

---

①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0.

②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p. 100.

③ 见本书第十四章。

间。他们把时钟称作“魔鬼的磨房”。

虽然人类学中的这些例子表明时钟—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但我们也能证明，在西方社会中，许多曾经需要通过社会—时间来理解的活动（也就是说，一些社会现象要通过其他社会现象来表现），现在也与时钟的指令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①] 当代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并不被依据进程或结果来评价，而是依据一定数量的量化时间单位（几小时、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分配来评价。伴随着工业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人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变成了一种旨在避免时间浪费的无休止的努力。[②] 可见的时间浪费的确是工作场所的最大罪恶。计划与执行的分离使得任何思考或者明显的懈怠都被认为是懒惰。（即使有许多公司，尤其是那些实行适时生产管理系统的公司，形式上鼓励工人分析——尤其是质量分析——或者是酌情停止工作的自制力。）[③] 在这篇绪论中，我们只能引述一些可以很明显地体现这种趋势的例子，进一步的分析[④]将表明：经过工业主义这段历史，时钟是如何在深层次上制约我们工作中的种种活动的。

时间隐喻

尽管时间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作者把时钟—时间与社会—时间之间的区别作为他们分析的出发点，但是其他人则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对比了作为这两种孪生时间概念之基础的隐喻和元理论。在隐喻分析中，一些作者普遍对比了两种主要的时间意象——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这里，前者代表一种工业的、客观的以及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形式（时钟—时间），而后者则是指一种更具有人类学特征的、经验的和具有时

---

① 参见 Sorokin, P. A.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② 参见 Taylor, F. W. (1911)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③ 参见 Schonberger, R. (1982)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New York: Free Press.

④ 参见 Thrift，本书第七章；Nyland，本书第八章。

代性意义（epochal）的时间（社会—时间）。通过进一步的概念区分，将量的时间与质的时间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理想类型平行并置。

循环时间

讨论时间的循环（或轮回）形式的社会学家，要么是关注古老的或原始的时间取向，要么就是在讨论现时代的事件时，关注当代社会活动是如何以节奏性的模式发生的。

就前者而言，伊利亚德[①]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关于过去的文明中时间概念的重要洞见。他特别注意到，被他称作“古老的人”（主要是之前基督教时期的人）的时间概念为什么是轮回的。在古老的人看来，事件是以一种随时都可以重现的节奏呈现的；古老的人的时间感是在他与季节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的时间视野是由“永恒轮回的神话”所界定的。伊利亚德提出，当基督徒为了以一种直接的、线性的进步去获得拯救和赎罪而放弃有限的世界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暴露于历史进程所固有的危险之中。自此，人类就试图把握历史，给历史一个结论——例如，马克思和黑格尔就力图这样做。现代人在多种*信仰*中寻求庇护，以便把一个看似无始无终的过程合理化。

尽管研究时间的作者其主流论题逐渐从轮回的时间观念变成了线性时间观念，但是，德格拉齐（de Grazia）[②] 指出，不应该认为轮回的时间概念已经灭绝。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轮仍然是一个比线更好的时间象征。在许多社会中，主流的时间意象是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事物都存在、死亡和再生”[③]。这里，时间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生物的而不是机械的；广泛且可变的而不是精细的和同质的。是上帝对事物进行安排，而不是时钟。

德格拉齐声明自己与那些片面支持现代社会—时间的线性理论的人

---

① Eliade, M. (1959) *Cosmos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②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③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p. 467.

不同。他认为，许多社会—时间（或“本能的”时间）是由自然的周期性运动和循环性流动决定的。他强调“自然的”社会时间，即，与人们对生活所怀有的更深层次的感情产生共鸣的时间。他指出，这就是人们所“经历”的真实时间，与时钟无关；这就是社会—时间——只有靠生活自身中的社会的和生物的种种倾向才能标记的时间。

泽鲁巴维尔[①]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他也注意到关于周期性循环的社会学解释是如何借助自然（尤其是物质自然）隐喻的。泽鲁巴维尔注意到，我们的许多时间—设计（time-patterning）建立在自然（主要是科学）类比的基础上——例如，根据物理科学，用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来类比，或者根据生命科学，用与睡眠、饥饿、排卵，或者体温相关的各种周期性规律来类比。泽鲁巴维尔认为，社会学中的这种表述方式最早出现于迪尔凯姆、莫斯和休伯特对“集体生活的自然节奏”的研究，并且被索罗金关于“社会文化的节奏和周期性”的分析所强化。泽鲁巴维尔就此指出，自这些早期研究以来，社会学家已经识别出一系列影响社会生活的节奏性结构的“社会周期”。例如，有研究者已经发现如何可能识别出微观社会层次上各种活动的“均匀的循环速率”；尤其是在那些结构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比如那些非正式关系的领域。通常，这些社会周期不仅仅是经验性的设计，更是规范性的规定。正如泽鲁巴维尔所注意到的，诸如“礼尚往来”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即使朋友之间的访问、打电话以及书信往来的时间间隔（迪尔凯姆把它看做是社会关系的“道德密度”的一个指标），也不是那么随意的，而是由某些有规则的、在社会意义上“适当的”节奏所决定的。

不过，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大不相同的观点，即，社会结构的总体趋势是现代组织和技术革新的产物，越来越取代了自然的影响。自然和生物的节奏所影响的，只是与有社会节奏的领域越来越不相干的领域了。在现代社会，强加于我们生活的那种节奏是多么的普遍而深入，它使各种活动的时间间隔变成了数学意义上的规则的间隔。索罗金[②]已经说明，支配社会生

---

① Zerubavel, E.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② Sorokin, P. A.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活的节奏越来越变成那种完全是约定性的，因而是与自然相分离的东西。因为时间单位越来越变成人为的，所以，节奏也变成了人为的。泽鲁巴维尔[①]举例说明了医院中医疗服务的管理在时间上是如何组织的。尽管这种组织具有很强的生物基础，但是，出于管理上的方便，操作管理的原则要求以连续的时间段的形式实现医疗服务的时间的“全天覆盖”。的确，管理的时间一般地说就是那些首先与自然时间分离开来的时间。

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日渐被按照“机械的”时间结构化：也就是说，成为一种人为的形式，完全独立于作为有机体的人的冲动和需要的周期性节奏。我们越来越使自己摆脱由自然所规定的有机周期的种种形式，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机械周期的表现形式。这种机械周期主要是由钟表和日历规定的，并且逐渐主宰了我们的社会事务。我们不断为社会的节奏创造非自然的基础。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些机械的形式不仅独立于自然的节奏，事实上有时还与自然的节奏相冲突。

线性时间

那么，线性的、机械的时间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基础何在？首先，我们可以说，虽然伊利亚德指出永恒轮回的观念支配着前基督教时期的时间概念，但是，在现代社会，犹太—基督教信仰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倡这样一种时间意象，即，时间作为教徒通过赎罪摆脱世俗的罪恶，最终在天国获得永恒救赎的一条试炼之路。[②] 一般认为，在《忏悔录》[③] 的第二卷中，圣·奥古斯丁打破了罗马时间的“周期循环”。奥古斯丁反对希罗多德以及那种认为人类事件具有周期性的观念，他拒斥“虚假的循

---

① Zerubavel, E. (1979b) 'Private-Time and Public-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58, pp. 38—58. 本书第十章。

② Filipcova, B. and Filipee, J. (1986) 'Society and Concepts of Tim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7, pp. 19—32.

③ Saint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trans. by R. S. Pine-Coff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环”，强调人类历史的直线发展。[①] 尽管耶稣纪元纪年体系在18世纪才被确定下来，但是历史的起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这一论题意味着，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不可逆的观念取代了永恒轮回的思想。终极进步的特征导致了一种新的线性时间概念，以及一种确定的历史开端的意识。

不过，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的讨论中看到，在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线性意象是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时间意象相结合的：也就是把时间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的时间意象。[②] 通过技术和制造创新，时间概念已经与工业进步的观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联结着加速增长与积累这一关键的等式中，人类的价值是依据时间来衡量的。可以通过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时间来获得剩余价值而并不是要求工人生产与其工资价值相当的商品。[③] 这里，重点在于其形式和稀缺性。这种意象来自牛顿和笛卡儿：时间是真实、统一和无所不在的；它是一种数学现象；可以把它设计成横坐标。

的确，正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种线性时间观的霸权得以巩固。在工业时代，进步是关键。在这个时代里，过去是不可重复的，现在是短暂的，而未来则是无限的和可开发的。时间是同质的：它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和无限可分的；它与运动和发展意义上的变革有关；它是定量的。在现代神学中，线性时间以对永恒的承诺为结论，但是在世俗的、现世的工业主义活动中，时间单位是有限的。时间是一种资源，有一种被过多的活动消费掉的可能性；当潜在的需求增加的时候，时间的稀缺性会受到强化。

此外，在发达社会中，时间稀缺性似乎使事件变得更加集中和彼此隔离。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被给予具体的“时间”。时间不仅被作为一种次序来经验，而且被看做是一种限制性的条件。正如摩尔所指出的，

---

①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② 见 Thrift，本书第七章；亦见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1867).

时间成为“安排行为的方法，固定那些特别适合于环境的行动的方式”。[①] 正因为线性的时间观是与特定的价值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时间就被看做是一种有限的商品——其稀缺性增加了它的价值。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②] 注意到，我们的主流时间观是与三个特别的隐喻联结着的——时间是金钱；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以及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时间和金钱越来越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时间是一种手段，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占有金钱，同样，金钱也可以被用来购买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会增值，同时，现在投资时间，旨在将来赚取金钱。[③]

因此，处于这种商品化过程的中心的是时钟的意象。芒福德（Munford）曾经强调“工业时代的关键引擎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④]举例来说，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组织展现出高度的功能专门化，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同步化的快速发展。以生产为基础的大型公司要求对各个组成部分（角色和职位）和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划分。这种功能的专门化需要广泛的时间—空间的协调，无论是各组织层次内部还是在它们之间。因为高层次的协调要求高层次的计划，这就需要有精细复杂的时间表，以便获得令人满意的预见性。精细计划的基础变成了复杂测量的基础，有效率的组织等同于对生产力进行明细的时间评估。[⑤] 因为机器成为劳动的焦点，所以时间表就成了计划的核心特征。在工业主义盛行的时代，时钟是协调和控制的工具。[⑥] 时间段取代了任务成为生产过程的单元。

与大多数过去的和发展中的经济中那种任务取向的经验相对照，我

---

①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p. 7.

②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③ Graham, R. J. (1981) '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pp. 335—342.

④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p. 14.

⑤ 见 Nyland，本书第八章。

⑥ 见 Trift，本书第七章。

们可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工人们受制于规定严格的时间表，他们的酬劳也是按照时间单位来支付的。时钟的普及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们交换的是时间而不是技能；出卖的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可以挣、可以花或者可以节省的商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工业主义的体制之下，工人在封建制度下所遭受的异化进一步扩大，此时工人被迫按钟点出卖他的劳动。①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中的一场重大变革，线性时间概念被“商品化”了：也就是说，时间被看做是生产中的一个因素。时间具有一种能够被转译成经济术语的价值：“它成为一种媒介，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可以借助这一媒介获得以往无法想象的发展速度”。② 时间就是经济财富创造的一种重要象征。它不再像在“永恒轮回的神话”中那样，是神圣的和可再生的。在工业资本主义之中，时间代表着一种经济目标，是一种生产的象征。时钟成为劳动的新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它们对活动进行量化，并把活动转变为货币价值。③ 当时间被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时，其使用者就必须显露出好的管理方法；时间是稀缺的，必须被理性地使用。④

时间与社会分析：一种研究框架

我们已经描述了一些基本的社会时间观，还探讨了一些时间隐喻和时间意象，现在提供一种研究的类型学，前面所介绍的许多概念依据这种类型学就可以联系在一起了。具体来说，我们主要思考质和量的问

---

① 见 Gioscia, V. (1974) *Time Forms*, New York: Gordon & Breach.

② Nowotny, H. (1976)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 330.

③ Nowotny, H. (1976)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④ Julkunnen, R. A. (1977) 'A Contribu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Social Time and the Economics of Time', *Acta Sociologica*, 20, pp. 5－24.

题，意义和测量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形成一种时间社会学的研究方案的关系。这里，我们引用马克斯·海因里希（Max Heirich）的著作，他把社会时间作为分析社会变革的一个中介性概念来使用。与海因里希一样，我们认为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时间概念的主要使用方式有四种，而每一种方式对说明社会的变革和过程来说都有直接的含义。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在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来使用时间：（1）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种*社会要素*（*a social factor*）；（2）社会理论中诸要素之间的一种*因果联系*（*a causal link*）；（3）这些要素的一种*量化测量*（*a quantitative measure*）；（4）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的一种*质的测度*（*a qualitative measure*）。

适合于社会时间的一种研究框架

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因素

上文中的分析表明，时间主要以两种方式影响社会互动——（1）作为一种资源，以及（2）作为一种社会意义。作为一种资源，时间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分析变量，其总量是确定的：一旦用了，就不能重新得到。我们已经注意到，当时间变成有价值的东西时，它就获得了一种商品的意象，[①] 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时间被看做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商品。这些意象由以下这一事实不断地再生产，即，在工业主义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发现时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用途。从传统意义上看，工业主义代表着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时间被感知为确定的时间间隔——它能和各种各样的需要互换，因此具有更大的价值。

不过，当我们把时间看做一种社会因素时，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我们也必须记得，时间具有社会意义。[②] 时间是一种媒介，复杂的意义结构借此得以产生——通过这种媒介，我们协调和再生产着日常事务。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时间的态度是动态的，特殊的时机往往

---

①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Nowotny, H. (1976)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② 见 Lewis and Weigart，本书第六章；Sorokin and Merton，本书第四章。

要求特殊的意义。举例来说，在巴黎，1968 年的 5 月份已经获得了这个月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义。这一时间标示着对早先的一系列过程的特定回应。到今天为止，它影响着无论是作家还是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①]

总的说来，作为一种社会因素，时间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具体的事实，或者一种意义的媒介。在活动的管理中，它可以被用作一种事实资源。而且它还支配着整合日常行动的强有力的文化规范。

时间作为一种因果联系

在社会分析中，时间还可以被描述成某一模型中诸变量之间的一种因果联系。虽然时间就其自身来说不足以建立起因果关系，但是，它对于既有的假定关系来说，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能够起到提供重要证明的作用。[②] 在社会理论中，这通常是通过参照空间—时间关系而达到的，实际上就是把时间看做一种背景（即，不是把时间看做一种时间对时间的关系，或者把时间看做一种次序）。

在把时间看做背景的这一思想中，空间和时间形成了一种背景幕，正是因为它，事件的意义才得以呈现。例如，正是由于特定历史时代（如文艺复兴、维多利亚时代，或第三帝国）的典型关系（背景），事件（人物）才可能得到解释。在这里，时间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它表现了一系列在时间方面受到局限的结构模式。把时间作为一种周期（质的或量的）来使用，这使得我们能够依据其与更大的结构模式的关系来对事件进行评价，而不是把事件看做独立于背景的东西。

对于其他更抽象的关系来说，作为背景的时间也可以被作为一种标准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问：特定的时间会在不同的结构模式的条件下出现吗？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时间既可能对行动的结构进行分割，也可能把这些行动的结构结合起来而组成一种更大的结构。简而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详细阐明相关关系的构成方式的可能性（例如，只要 Y 出现的时候，X 就会出现吗？X 中的变化与 Y 中的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吗？）

---

①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②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p. 386—397.

时间作为一种量的测量

社会时间的另一个重要的用途是在测量社会关系中的量的变化时表现出来的。这一般包括：为时间次序选择一种衡量尺度，然后参照这个尺度的不同点上其他变量的情况来描述变化。在这里，衡量尺度的结构和维度对关于变化的评估来说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某一事件在其中发生的时间周期的长度，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事件的结构性结果。因此，结构短期丧失，诸如，在惊慌的状态中，可能会破坏系统的均衡状态，形式上相似的更长时间的破坏则可能摧毁作为一种调节系统的更大的结构。

衡量尺度的类型对我们所提出的种种假设也会有影响。选择相等的量的单位（比如，秒、分、时），我们可以把时间当作一种间隔的范围来使用。不过，对于特定的目的来说，这种衡量尺度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变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出现，比如在连续的间隔中重复出现，或者在不连续的间隔中重复出现，在某一特定周期内的变化的具体程度会有完全不同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结果。[①] 而且，时间间隔的长度也会影响变化的类型，而这些变化的类型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分析。

另外，在确定所涉及的每一个个案的适当的时间间隔时，质的单位（例如，历史时代，增长或发展的阶段，或者主观构想的时间单位）的使用也会导致更大的灵活性。这里的问题是，作为分析社会—时间和社会变迁之核心的比较方法，就显得不那么精确了。从根本上说，这种方法是把时间转换成一种顺序量表。我们只可能按照年代顺序，或者依据某些外在的标准（例如，与 Y 是 Z 相比，X 更是 Z），来排列这些个案。

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把质的单位（如阶段）再细分为量的单位，然后依据持续的时间来描述这些量的单位而重新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精确性。这样，不仅持续的时间在概念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而且，通过使用作为一种测量单位的客观的、量的时间单位，我们也可以依据

---

①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p. 386－397.

比率、速度和强度来谈论社会变迁。这样，我们就能够注意到，比率和持续时间的意义，以及由某一给定的社会变迁所创造的强度，相对于被观察的社会体制来说是变化的。总之，即使是客观测量的时间，也只有在其与所涉及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总体方式的关系中，才能获得意义。

作为一种质的测度的时间

最后，在讨论作为一种质的测度的时间时，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事实：严格地说，不应该把社会变迁与社会过程混淆起来，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区别。社会过程可能是一种稳定背景中的各个均衡阶段，而社会变迁则意味着在最终结果中出现了一种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某一个变迁过程的累积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在性质上不同的制度关系和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结构。[①] 例如，历史事实表明了这种变迁可能产生多种结果的原因。镇压、墨守成规、适应或者革命不都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的结果吗？每一种状态，从镇压到革命，都代表着强度不断增加的一种质的改变。[②]

当我们认识到某一社会变迁过程可能会产生多种结果时，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说明所出现的特殊的累积结果。在这里，当说明持续时间长度、顺序、比率和强度的相互影响时，时间就变得重要了。[③] 问题也就产生了，具体地说，问题涉及在原来的结构中环境持续的时间，所出现的变迁过程的次序，以及重要变革因素影响的比率。正如海因里希所指出的，“作为因果联系的时间和作为量的测量的时间，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以预见（或描述）某一变化过程的特殊的质的结果”。[④]

所以，如果把概念合理地结合起来，就可以预见在某一给定的变量中变迁的速度，弄明白一场跨度更大的变迁过程的酝酿过程所需要的时

---

① Allen, V. (1975) *Social Analysis*, London: Longmans.

②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p. 386—397.

③ 见 Lewis and Weigart，本书第六章。

④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 390.

间间隔。与结构渗透的不同层次相联系的最小和最大的比率也应该预先弄清楚。相对于所涉及的系统组织的层次来说，结构变迁所需要的时间间隔也是变化的。[①] 例如，如果说系统中各种设施方面的变化会需要最小的时间间隔来完成，那么，价值体系中的变革——价值体系可能会被反映在所有其他的层次上——所花的时间则可能要长得多（即，不考虑变化开始出现的那个层次）。[②]

结语

在这篇导论中，我尝试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首先，概述可用为研究时间的社会学家所用的概念和视角；其次，说明怎样才能运用这些概念和视角来阐释时间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通过介绍埃米尔·迪尔凯姆、皮蒂里姆·索罗金、乔治斯·古尔维奇和威尔伯特·摩尔等人的著作，我试图说明，为什么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视角和分析层次阐释社会时间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时间往往被描述为功能结构与主观过程的互补（除去其他因素），质性测度（内容）与量化测量（商品）的统一，以及用来对各式各样的自然的、科学的和文化的隐喻（例如，进步与相对性、直线与循环、旋律与节奏）进行编码的媒介。而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说明，怎样才能使这些不同的意象、视角或隐喻不成为不调和的因素，而是相互切合、相互作用，进而对时间与社会真正作出有意义的说明。

---

①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p. 386－397.

② 见 Rocher, G. (1974) Talcott Parson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London: Nelson.

目 录

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 …… 约翰·哈萨德 1

第一篇 时间的概念

第一章 时间之谜 …… 埃利奥特·贾克斯 3

过去、现在和未来 …… 4

关于哲学困境的思考 …… 8

原子世界中的运动 …… 11

时间、流动和生成 …… 14

Chronos 和 Kairos …… 16

第二章 时间的问题 …… 乔治斯·古尔维奇 20

让·皮亚杰的定义 …… 21

多样的时间可能吗? …… 22

伯格森与时间问题 …… 23

当代物理学中的时间问题 …… 25

不同的科学中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 …… 26

第二篇 社会—时间

第三章 时间、技术和社会 …… 雷德哈卡马·马克吉 33

第四章 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

…… 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 41

第五章　社会时间的多样性…… 乔治斯·古尔维奇 54
社会时间 …… 54
社会时间的多样性 …… 56

第六章　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
…… J. 大卫·刘易斯和安德鲁·J. 韦加特 64
社会时间的生平的和互动的结构 …… 68
社会时间的制度的和文化的结构 …… 72
走向一种适应于时间社会学的范式 …… 82
这一理论对研究的影响 …… 89
结　论 …… 92

第三篇　资本主义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奈杰尔·思里夫特 95
引　言 …… 95
第一阶段：在永恒之海中的计时岛屿，1330—1550 年…… 96
第二阶段：四旬期(Lent)的胜利，1550—1750 年 …… 101
第三阶段：囚禁，1750—1880 年 …… 105
结　论 …… 125

第八章　资本主义与"工作—时间"思想史
…… 克里斯·尼兰德 128
重商主义与工作—时间 …… 129
古典经济学与工作—时间 …… 130
庸俗的反革命 …… 133
工厂运动 …… 133
马克思的工作—时间理论 …… 137
工作—时间的强化 …… 137
马克思的观点的命运 …… 140
杰文斯(Jevonsian)革命 …… 142
巨大的羞辱 …… 143

经济危机及其理论 …… 145
技术决定论 …… 146
现在你明白了。现在你没有明白。 …… 147
边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149

第四篇 工作与组织

第九章 时间与职业满意 …… 罗纳德·罗伊 153
工作小组 …… 155
工 作 …… 156
工作中的游戏 …… 156
工作小组的非正式社会活动:时间与主题 …… 157
时 间 …… 158
主 题 …… 160
黑色星期五:工作小组瓦解 …… 162

第十章 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
…… 埃维巴特·泽鲁巴维尔 166
专业承诺的官僚化 …… 167

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 史坦利·柯恩和劳利·泰罗 176
现在与未来 …… 176
标记时间(Marking time) …… 178
工作与打发时间 …… 183

第五篇 文化与视角

第十二章 时间观与社会结构
…… 刘易斯·科塞和罗斯·科塞 189
偏离主流的时间观类型 …… 194
结 论 …… 201

第十三章　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计时方式
……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202

第十四章　卡比尔人的时间观 …… 皮埃尔·布迪厄 216

参考文献 …… 232

译后记 …… 254

第一篇

时间的概念

第一章　时间之谜[①]

埃利奥特·贾克斯

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自文明思想的开端，它就一直折磨着诗人和哲学家。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之中。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真正生活在相同的时间里。生活在同一时刻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个人的时间观，他自己与过去和未来的现实的联系。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这种视角和联系的内容，以及这种视角和联系的范围，正如他们的外貌，他们的指印，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欲望，以及他们的真实的存在一样，都是各不相同的。

任意两个人，他们的思想、欲望、记忆、抱负的内容，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相互区别。这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的确，个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追求独特性，采取不同的行动或以完全新的方式行动，以独特的方式思维，具有某种特殊的癖好，这是自由的本质，是个人自由的本质，是个体的正常状态，也是社会的本质，以及对生活的追求的精髓。

但是，不同的人，正如我提到的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内，或者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生活，这一点却可能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然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通过认识人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些不同时间尺度，就可以解决许多有关时间的秘密，时间自身就可以被理解了。

不过，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仅有通常在钟表中以及自然科学中所使

---

① 选自 Elliott Jaques,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Heinemann, 1982.

用的一般的时间概念是不够的。甚至是相对论的时间——这种时间与空间的三维相结合（不只是被附加到其中），构成了现代四维动态世界观，也就是物理学的世界观——就其自身来说，也不会满足生活科学的需要。因为相对论的时间仍然是旧的时钟时间，在物理事件中，被用来记录某一时刻上的距离位置。它并不是活生生的人的时间。

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它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

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因此，我们的研究以理解时间的形态、时间的本质、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为首要目的。因此，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

过去、现在和未来

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又由T. S. 艾略特（T. S. Eliot）、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普鲁斯特（Proust）、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乔伊斯（Joyce）、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经验。

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的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

> 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起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

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

> 哦，那么，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作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①

但是，圣·奥古斯丁并不满足于没有明显答案的问题。他那常青的思想，他那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现代性，他那领先于他的时代和他的环境的心理洞察力，跨越了之后的历史时代，完全超越了人类理智的发展状态以及人类对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理解，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他似乎正在解决斯芬克斯之谜，认识到时间过去、时间现在和时间未来并不只是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而是作为心灵的本质，以记忆、感受以及期待或愿望相互作用的形态而存在，这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生活的目的。在下面这一整段引文中（与他对于时间的难以捉摸的特性的生动描述相比，这一段文字很少被人引述），他概述了时间的心理意义，而且是以现代术语来写就的：

> 根据我们所说的，非常清楚，无论是未来还是过去都是不存在的，而且……说存在三种时间，也就是说，过去的事物的存在，现在的事物的存在，以及未来的事物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对的。一些不同的时间确实存在于心灵之中，但是我看不到它们还存在别的什么地方。过去的事物的存在是记忆；现在的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的体会；而未来的事物的存在是期待。如果我们以这些术语来说的话，我可以看到三种时间，而且我承认它们的确存在。②

---

① Saint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trans. by R. S. Pine-Coff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 261.

② Saint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p. 269.

后来，圣·奥古斯丁又回到了他的心理分析：

> 只可能是这样：心灵，调控着这一过程，发挥三种功能，期待、关注和记忆的功能。未来，心灵所期待的，穿越现在，达到它所关注的，进入到过去，它所惦念的。①

对时间现在、时间未来和时间过去可能共同存在和关联在一起的这种认识，在 T. S. 艾略特那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他这里，奥古斯丁的影响一直闪耀着，在《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

> 时间现在与时间过去
> 两者可能都存在于时间未来；
> 而时间未来又包含于时间过去。
> ……
> 时间过去与时间未来
> 可能和已经
> 指向一端，这始终都是现在。
> ……
> 而终点和开端总存在
> 开端之前和终点之后。
> 所有这一切永远是现在。②

这里，艾略特同圣·奥古斯丁一样，对时间的直接性，对融合在人类经验中的活生生的过程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当下性（the all-at-onceness）表现出同样的感情，就好像时间正在发生，就好像某人的感情正在涌现，某人正在实现种种抱负，满足种种愿望，就好像某人受到伤害，在恋爱，在追求，在创造，在劳作，在表演，在成就某种东西，

---

① Saint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p. 277.

② Eliot, T. S. (1944) '*Burnt Norton*', *in Four Quartets*, London: Faber & Faber, p. 7.

开始感受到挫折或失败的苦痛——所有这些经验都属于生活本身，都需要动员某人现实的和当前的心理存在之流并在未来努力加以实现。

普鲁斯特通过对过去的事件的一点一滴的追忆而达到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创造出特有的方式，过去的事件借助这种方式而保留了鲜活的面貌，并且通过戏剧中每一个演员的心灵而进入到现在之中。每个人生动的过去和愿望展开，融汇到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之网。

在威廉·福克纳的小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人的心灵中共存的思想，也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琼·波伊莱昂（Jean Pouilion）认为福克纳对年表的分解表明：

> 现在被浸没在过去之中，存在于现在的就是曾经存在于过去的。既然这样，就不能把过去仅仅看作是逝去的东西的招魂，看作是对现在的一种不变的压力，看作是曾经存在的东西对现在存在的东西的压力……过去不是一种时间上的过去，不是现在不再存在而只能被记忆的东西。它是存在于这里和现在的某物，是这个的严格意义上的现在。放到时间中来说，过去曾经存在，所以，它才是过去，但是，正因为它存在，它就是现在（强调为原文所有）。①

在福克纳这里，读者会感受到无序的冲击，过去和现在会倒退，又彼此相互交融，一切似乎都是同时存在的，这样，现在的事件就好像有着被注定的未来，这使得小说主人公所难以摆脱的灾难和不幸更加生动和辛酸。任何事情似乎都注定是不幸的——未来维系于不断积累的一直发挥作用的过去。

打破与这种宿命的过去的联系，就要求打破一种静止的时间。因此，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文章中提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时，特别强调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昆廷（Quentin）打碎他的手表的象征意义。引用福克纳所说，“只要时间是由小轮子来核对的，那么，它就是死的；惟有时钟停止了，时间

---

① Poullion, G. (1966) 'Time and Destiny in Faulkner', reprinted in R. Penn Warren (ed.), *Faulkn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p. 68.

才回到生活之中”；萨特补充道：“因此，昆廷打碎他的手表的姿势……使我们能够接近一种没有时钟的时间”。①

作为无生命的时间的时钟时间，与作为人的或有生命的时间的连贯在一起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关键的区分。没有清楚地认识时间的这两个方面的区别，以及没有清楚地把时间的这两个方面作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东西——不只是作为互不相关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来阐明、对待和确定，我相信，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们对时间的深入理解。另一种阐述这种区别的方式是把时间作为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融合）和把时间作为某一线（时钟的钟盘）上的一系列年代学纪年点的区分。陈述这个问题的后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在关于时间的某些哲学思考中是常见的，我将对此作简单而初步的探讨。

关于哲学困境的思考

关于时间的性质的思考，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时间不可避免地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同时成为探索统一世界图景的核心——这种图景能够同时适应科学、艺术和文化、宗教信念、严格的沉思和反思，以及日常生活的普通常识的需要。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个世界的性质的思想，千百年来潮涨潮落，源远流长，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思想的巨大宝藏，对于浸淫在专业学问和知识之中的职业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而对于仅仅是感兴趣的外行来说，涉足这样一个领域，更显得大而无当。

不过，讨论时间的形态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只是为了达到洞察人类活动和努力的一般框架这样一个有限的目标——如果不尽可能努力了解和吸收从哲学家的关怀中产生的智慧，那也可能同样是不明智的。哲学家的那种智慧使学生们经常遭遇无数陌生，彼此冲突而又具有无穷魅力的概念。我这里准备做的是挑选一些主题，作为我想探寻的论点的背

① Sartre, J. P. (1966)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in R. Penn Warren (ed.), *Faulkn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p. 88.

景。在这些主题中，必要的出发点一定是以下两种观点之间的论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存在于虚空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所构成的，是非连续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连续的，它是一个流的世界，一个由非实体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一个由诸力量场的不断变化着的形态所构成的世界。

这里，我们要探求的论点，可以说在西方思想中有着渊远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存在（Being）如其所是的思想，德默克里特（Democritus）和留基伯（Leucippus）关于永恒的原子和它们所占有的空间的思想，以及柏拉图（Plato）关于永恒形式的思想。这种思想与表述和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所留下的几个残篇中的观点形成对照，赫拉克里特的观点阐述了流动的不确定性。

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人类对变化和稳定的深层次的情感就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巴门尼德看来，有物存在；存在（being）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一切都是确定的。对于赫拉克里特来说，一切都是流动的、变化的、转化着的，永远不会静止，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becoming）自身的实在。在巴门尼德的世界中，存在（being）永远不会导致生成（becoming），而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在赫拉克里特的世界中，生成永远不会产生存在，而物质实体不会比----使用他自己的隐喻——跳动着的火焰更真实。

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与那种实体观相伴随的确定性产生安全可靠的感情，而对持续和流动的不确定性则抱有忧虑，似乎它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难以把握。特别是，留基伯和德默克里特把巴门尼德的永恒的存在，区分为一堆具有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原子，在他们看来，这些原子都存在于空间中，如同它们所由以产生的一般实体一样是不可毁灭的。他们的这一思想给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知识上的出发点。而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给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柏拉图的观点是，规律的结构是在理想的几何图形中得到表达的，后者是绝对静止和无时间的。

的确，当我们使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静止的状态以进行计算和测量的时候，伟大的成功就实现了。概念——对物质的东西（也就是，最自然的事物）的绝对稳定性的抽象、想象，成为科学和数学抽象的必

要的基础：这反映在欧几里德公理和定理体系的美和完备性上，反映在特定的引力和比重的发现中，甚至也反映在这样一些技巧之中，比如，在一根棒子上刻下一道道凹痕来记录时间，或者在一本日历的固定区间来记录时间。

与成为科学发展的根本基础的不变的空间方位相比，时间的问题，流动的问题，是非常难以把握的。虽然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哲学、宗教，甚至是实践上的意义，但是，它不像物质客体那样能够进行直接的操纵和研究。从那时起，所有科学发展的问题都被确立起来：对物质客体，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测量；而对时间，则做不到，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明显难以逾越的难题：它不可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量和分类：它的本质是它根本就不会保持静止。

使得时间变得如此难以把握和限制的时间流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时间变得难以描述。实际上，用词来描述时间就是让词发挥它们通常的作用——词使物保持静止。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它们似乎可以把事物固定下来，但是，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正如黑格尔（Hegel）所说的，“词谋杀时间”。事实上，在词与物和词与时间之间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区别，但是，从一开始就没怎么被认识到的是，对于留基伯和德默克里特以及他们的哲学追随者来说，世界是由不变的确定性构成的，这在情感上很好接受，赋予世界以这种特点的原子的不变的坚实性，带来了空间的问题，以往人们认为独立，彼此之间形成确定界限的物存在于空间之中。物是足够容易来区别的，也足够容易来假设原子的存在，但是，空间的性质所带来的困难却要大得多，而且一直就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与“什么是时间?”相比，“什么是空间?”并不是一个更容易的问题，而是同样令人感到困惑，令人感觉神秘。

不过，原子的模型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抽象。它使得我们对物存在于何处以及物有多大这方面的知识有一种确定性的感觉，因此，也容许我们在研究和经济贸易中形成表面上不含糊的计算。同时，它也容许我们足以确定地知道物是什么，物的边界在哪里，从而使得我们在研究和经济贸易中容易分析物的某些性质及其与其他物的关系。

原子世界中的运动

不过，时间似乎并没有大量出现在这些探索中。对于逐渐形成的关于静止状态的科学来说，时间起初是不必要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时间不同于天文和航海所需要的一般的时间。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记日期和计算一天之内的时间很重要，但是，这样一些活动的形成，是通过伽利略（Galileo）关于速度和加速度的研究而戏剧性地引入的，这种引入却又带来了烦恼——而这些研究在西方也只有在14世纪发现了钟摆和时钟跳动的机制才可能进行的。现在我们很难认识到在那个时候把握这些概念是多么的困难。它意味着给运动的客体的确定性附加了对运动速率的感觉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这种运动速率进行测量的思想。而且，这不仅涉及速度，也包括不能直接观察和难以把握的运动速度增加或减少的比率。讨论加速度让人左右为难，例如，我们不能把对象停下来而对加速度做第一手的观察。

即使这样，我们也会注意到，针对这些目的来解释的时间是昆廷手表的时间。它是属于跳动机制的时间；也就是说，时间是通过停止运动（stopping motion），或者，实质上是由一种齿轮在每一秒的停顿时间来测算的。正是这种适合于计时的间歇停顿的时钟时间，成为伽利略关于物体惯性的阐述所引发的科学革命和牛顿力学革命的组成部分。

这种停顿的时钟（stopped-clock）的时间概念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有点奇怪，它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把时间看作是静态的东西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与原子世界观相伴随的时间：一种使它自身根据物体在某一给定的时间段或时间间隔中，从空间中的一点向另一点的明显的运动来定义的时间。也许一种更好的说法是，它是一种机械的时间，而不是静态的时间，是把动力学带到一种机械世界的时间。

人们可能一直期望，随着相对论的出现，这种机械时间会被一种流动时间所取代。不过，奇怪的是，这种期望并没有实现。时间作为第四个维度被加进来，实际上，它只是被附加到由物体组成的三维的原子世界。时间作为第四个维度与三种笛卡儿空间坐标系的同构可交换性仍然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和相继的问题，即使在光速条件下被解决了——在

一定程度上——接踵而至的是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时间自身的死亡。

狭义相对论的世界观，导致一种奇怪的四维块宇宙（four-dimensional block universe），在这一宇宙中，所有的时间永远都以一种死的和不变的时间而出现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一切都是固定的，一切都处在它自己的场所之中。每一个人都像是站在一列火车中，或站在自动扶梯或电梯上的旅行者，完全按照其特定角色安排，依照特定的路径运动——他只是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执著而积极的参与者，看着生活在五光十色的背景下从自己身边流过，一切都是不变的，被安排好的，被预先决定的，无意义的，与人无关的，无生命的。

惠特罗（Whitrow）这样描述这种块宇宙：

> 关于对时间的理解，爱因斯坦做出了自17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贡献，但是，……即使是他，后来也十分警惕这一概念……并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把物理实在看作一种四维的存在，而不是三维存在的一种进化。换句话说，时间的流逝，应该被看作仅仅是我们的意识的一个特征，而我们的意识是没有客观的物理意义的。这一深奥微妙的假设使时间的概念完全服从于空间的概念（强调为原文所有）。①

他还写道：

> 在块宇宙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适用于物理事件，因此，它们既不会出现也不会停止存在——它们只是它们自己。②

而且格鲁鲍姆（Grunbaum）也持同样的观点：

---

① Whitrow, G. J. (1975) *The Nature of Time*, New York: Wiley, p. 134.

② Whitrow, G. J. (1975) *The Nature of Time*, New York: Wiley, p. 134.

在时间问题的思考中，我们最终所关心的，**如果有的话**，就是**“生成”**的自然地位问题。我们早先对时间的两个方向之间的区分，同样不能证明一种对事件的**“瞬间的”**三重划分的存在，也就是划分为：如其过去所是，已经“经历其存在的”事件，现在实际存在的事件，以及那些还会**“出现的”**事件。而关于世界的相对论的图景并不创造存在，而只是简单地存在着，因此容许我们“偶遇”它们，并且通过我们“进入”它们的绝对的未来而创造“它们发生的常态”。有些作者**错误地**相信这一观点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已经由 H. 韦尔（H. weyl）以下面这种多少带有隐喻的方式加以表达：“客观世界就只是它自己的样子，并不会发生。惟有经由我们意识的凝视，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才会作为一种飞逝的图象而有了生命。沿着由我的身体所组成的生命［世界］的线路徐徐行进？”（强调为原文所有）①

也许正是因为相对论使用了关于较早和较晚的这种静态的空间化的时间——这种观点排除了生成过程——明科斯基（Minkowski）对狭义相对论的一个具体结果所怀有的热切希望和期待才没有流传下来。他声称，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将成为未来世世代代的普遍的观点：

我希望我呈现给你们的种种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点，都是在实验物理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们的力量也正是在那里。自此以后，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就其自身而言，注定慢慢变成纯粹的影子，而惟有两者的一种统一才具有一种独立的实在。②

---

① Grunbaum, A. (1964) 'Carnap's Views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in P. Schli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dolph Carnap*, La Salle, Ⅲ: Open Court, pp. 658－659.

② Minkowski, E. (1908) Address delivered at 80th Assembly of German Natural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Cologne, 21 September 1908, in A. Einstein et al.,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trans by W. Perrett and G. B. Jeffrey, with notes by A. Sommerfiel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23), p. 1.

明科斯基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概念包含着一种复杂的概念群，不能简单地把时间概念添加到空间概念之上，或者把它与空间概念混合起来。的确，爱因斯坦对这个论题的陈述更带有问题意识，他指出：

> 因为这一理论（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表明存在电磁现象，这些现象就其真正的本质来说，是与任何有重量的物质相分离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存在于由电磁“场”所构成的虚空中的波……这样，就出现了两类概念要素，一方面，是它们之间有一定距离的带有力量的物质的点，而另一方面是持续的场。它代表了物理学中的一种居间的状态，这里，不存在实体的统一的基础。这种状态——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远没有被淘汰。①

结果，不仅时间的性质成问题，空间的性质以及物和场的性质也是如此。当构成概念联合的两方是如此模糊的时候，那种把时间和空间简单地拼凑起来以实现概念联合的想法都必然是会令人失望的。

时间、流动和生成

这样就可能出现不同的时间概念以及不同的空间概念，这些概念是由思想家、作家、诗人和科学家在探索他们所生存的世界时，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而加以使用的。概念化的多样性也许就是问题的核心。的确，也许我们与实在的整个关系，如爱因斯坦所指出来的，处在一种不令人满意的居间状态。或许，它就是如此？或许它并不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概念框架的多样性对于任何合适的关于现象的精神建构来说都是本质性的？让我们对后面这种可能性来做一番讨论。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原始经验，涉及一种未加区分的时—空多样性。

---

① 转引自 Schlipp, P. (ed.) (1970)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 Scientist*, La Salle, Ⅲ: Open Court, pp. 25, 27.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行动和变化所构成并在精神上加以建构的世界中，只要我们不试图阐明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去谈论它，正如圣·奥古斯丁所抱怨的——我们就不会遭遇太多麻烦。一旦我们真的去讨论，不管是用诗的语言，或者用小说中故事生成的方式，或者用物理学中的精确的数学语言，抑或是用哲学的分析的或命题的语言，麻烦就开始了。

许多说法都存在一种选择：一致和统一的空间；由在无限的空间中运动的物或原子构成的世界；由像流云般不断变换的力场所构成的世界；由似乎并不流动的较早和较后所组成的时钟时间；流动时间，在其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真的好像由一个流向另一个。乍看之下，存在似乎与原子的时钟时间的世界紧密相连，而生成则与那种力场的流动时间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样一种结论似乎太过简单，言之过早，太过条理化了。在概念上把生成与在原子的较早—较后的世界中的存在串在一起，与把存在与由场和流所构成的世界中的生成串起来一样地容易。

还有一些东西，更为可笑。对于我选择的材料而言，还可以有另一种区分，而且这种区分需要特别注意。这就是把未来、现在、过去所组成的流动时间与生活、与心理过程，以及与“主观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把由较早和较后所组成的时钟时间与物理的或“客观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这两类时间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也是科学哲学家目前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举例来说，格鲁鲍姆在与赖欣巴赫（Reichenbach）的争论中，引用了伯格曼（Bergmann）的观点，大意是“‘现在’是体验‘以前’的时间方式”，并且进一步论证说：

> 伯格曼在这里证明了一种非决定论的宇宙不能界定一种客观的（非心理的）瞬间现在，而这一观点在下面的意义上得到引申，进而证明他的这样一个论点，即，“现在”这个概念包含着意识所特有的性质：“时间的流动”或“现在”的瞬间惟有在**有意识**的（sentient）有机体以自我中心的视角的这一语境中才有意义，正如赖欣巴赫所说的，它与完全无生命的个别的记录性工具和它们所记录的环境的自然事件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关于宇宙

> 的任何状态，我们能够说的东西，作点修正的话，也适合用来表达某一给定的无生命的记录器的任何状态。此外，“现在”的意义依赖于由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汉斯·德里什（Hans Driesch）所谓的正确的观察所揭示的意识所特有的性质的存在，那就是，**大脑描记线**（brain traces）的相继与意识状态的相继之间的一种简单的同形，并没有说明诸如音乐感知的这种心理现象的时间特征。因为同形的假设描绘的只是意识状态的相继，而不是对于**相继的那种即时性的意识**（the instantaneous awareness of succession）。但是，后面这种意识是“现在”的意义的一种本质性的因素：时间的流动存在于对时间的秩序以及对构成被记忆（被记录）或被遗忘的事件场景组成成分多样性两者的即时性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每一个方面自身发生的瞬间构成为一个**显著因素**。①

我想，今后有机会还应该详细讨论赖欣巴赫在他的《时间的方向》这本书里所提出来的论点，当然，也包括其他人的观点。但是，就当下来说，如果只是建立我们要进行的工作的真正的复杂性来说，我们走得已经够远了。我们不仅要探讨物理学的概念化过程和客观世界中的空间与时间，存在与生成，点与场，过去、现在和未来，较早与较后等不同的概念，而且也必须对存在适合于精神世界而不是物理世界的不同的时间概念的可能性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种概念来自于我们的主观经验的表达，而不是我们的客观经验，来自于我们对内在心理世界的体验而不是外部的物质世界。我希望对这些复杂的关系作出一些说明。

Chronos 和 Kairos

最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关于时间的视角，对这一视角的讨论将完善我们这里关于时间的介绍。它体现在用于指涉时间的两个不同的希腊术语上：chronos 和 kairos。简单地说，这两个术语的区别在于，一个是

---

① Grunbaum, A. (1964) 'Carnap's Views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in P. Schli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dolph Carnap*, La Salle, III.: Open Court, pp. 661—663.

年代学意义上的连续的时间，是可以由时钟或精密记时器来量度的——chronos；而另一个属于周期性的时间，是由带有开端、中间和结尾的事件的时间，是与意向和目的有关的生活的时间——kairos。

克默德教授在他的文集《终点的意识》[①] 中，对这两种不同的意义作了许多区分。他追溯了在某一社会中的某一给定时期的主导时间观念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当年代学意义上的序列观念——chronos——盛行的时候，对社会的见解往往更加科学，更加具有逻辑性，认为世界总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运动，这种见解浸染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戏剧和小说中年代排列的方式上。与此相对照，当更带有属人的特点的循环性时间意识——kairos——盛行的时候，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则总是充斥着宗教的和神圣的目的，充斥着天启、灾难、神意的显现、拯救以及新的开端。

克默德的观点因为一场关于在圣经中区分使用 chronos 和 kairos 的意义的争论而得到强化。这场争论延续了大约 40 年，集中于马什（Marsh）[②]、罗宾逊（Robinson）[③] 和卡尔曼（Cullmann）[④] 基于《新约》的词汇分析而提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这两个术语表达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时间观念，这两个术语的区别是一个相当具有神学意义的问题。而詹姆斯·巴（James Barr）[⑤] 等人则拒斥这种论点，而试图证明 chronos 和 kairos 在圣经中的用法经常是可以互换的。

如果不去评价词汇争论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优点，不走进这场关于神学含义的争辩中去，我们就能够注意到一种十分有趣、十分重要的意义匹配关系，一种意义属于 chronos，而另一种则属于 kairos，不管希腊语圣经的用法是怎样的，这两种含义是它们在希腊语中的一般的意义。根据严格的词典解释，chronos 有着那种简单的时间意义，就是指

---

① Kermode, F. (1967) *The Sense of an En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Marsh, J. (1952) *The Fullness of Time*, London: Nisbet & Co.

③ Robbinson, J. A. T. (1950) *In the End, God...* London: James Clark.

④ Cullman, O. (1964) *Christ and Time, trans. by Floyd V. Fils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⑤ Barr, J. (1969) *Biblical Words for Time*, London: SCM Press, 2nd edn.

时间的长度或停顿：它是那种出现在“测量仪”或记时器中的时间；是那种能够在钟表上数的时间，也就是把它变成一条线上许多不连续但相继出现的点。而 kairos 则不是通过测量得到的时间，而是人的活动的时间，是人的活动的时机：它是那种以“kairos pros anthropon braxu metron Oxiei”——时间和时机不等人——的方式出现的时间，是以希腊的神 kairos 的名字出现的。Kairos，是宙斯最小的儿子，是时机之神(God of Opportunity)。Kairos 连着它最近的堂兄 kainos，而 kainos 表示新、新鲜、最新发明的或新颖的；kainos 又与 kinein 相连，再就是 kinesis。简单说来，与这个 kairos 术语家族相关的是运动的时间，是变化，是新的东西的涌现，以及积极的创新。

马什把这种区别说成是“年表时间”与“现实的时间”之间的。“现实时间”的意义是：

> 对各种时间的认识和区别主要不是依据它们在某一时间顺序中的位置，而更是看它们的内容……依据机会和实现的时间。①

这一主题得到罗宾逊的详细阐述，他这样描述 Kairos：

> 在与人的活动的关系中考虑的时间，考虑的是结果以及结果的实现。而 Chronos 是从这样一种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时间，不管事情发生还是不发生，这种时间都会滴答作响，是客观的，与人无关：它是由记时器而不是由目的来计量的，是随时都发生的，而不是有重要不重要之分。②

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种区分极为相似，这后一种区分的一方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的心理时间，人的经验就存在其中，而另一方是属于物理学家的由较早和较后所构成的客观的时间。我将进一步说明，当我们只把我们的心理和社会现象界定为种

---

① Marsh, J. (1952) *The Fullness of Time*, London: Nisbet & Co, p. 44.

② Robbinson, J. A. T. (1950) *In the End, God...* London: James Clark, p. 27.

种事件，界定为种种经历，而且意识到这些事件和经历在时间中，在有意向性和延续性的时间中，或者在 kairos 的时间中的形态时，一种不同的视角就会出现。当然，我们也要记住，经历及其情节是在空间—时间中出现的。注意以下这一点也同样重要，chronos 经拉丁文而被传承进入到所有以罗马文为基础的语言中，而 kairos 却不知何故不动了，只留在古典希腊语之中。这种语言上的停顿，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时间的焦虑体验，它使人的意向和目的成为强烈焦点，并因此使人们徘徊于成功与失败、灾难与新生之间，以及生存与死亡之间，相形之下，对从情感上没有负担的年表却感到安心得多。

第二章　时间的问题[①]

乔治斯·古尔维奇

要详细说明我们所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把它界定为**以非连续性的相继而持续存在，以及在各种异质性时刻的连续中展开变化的集中和发散的运动**就足够了。这一界定把时间放到关于时间的单纯的哲学理论之外。社会学家不能参与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家一直兴致盎然地在做着的证明时间的永恒性或者否定其永恒性的论战。事实上，普罗丁（Plotine）、圣·奥古斯丁、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的“活的永恒性”理论，把人的生活还原为神圣的时间，似乎只是提出那种在永恒中消解现实时间的普遍扩散的公式。我们关于时间的描述性定义，也避免对本体时间或“时间意识”的首要地位问题采取某种立场。以前存在一种悠久的传统，把时间看作与“时间意识”相同的东西，又把“时间意识”等同于个体意识。即使是那些给关于“时间意识”的解释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哲学家，像伯格森和胡塞尔所做的那样，把“时间意识”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他们也一直没有能够脱离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意识的直接材料》（*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一书中，伯格森谈到“作为惟有深层自我才能领会的质的持久”（即使是被理解为一种被淹没的自我），以及为什么胡塞尔把时间的问题归约为“时间意识内在化的现象学”的那种问题。

不过，在《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和《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éatrice*）之中，伯格森依据“质的持久的深度”在程度上的差别来解释整个世界过程，对于他来说，这种质的持久代表着有效

---

① 选自 Georges Gurvitch,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trecht: Reidel, 1964.

的时间，在时间问题上，他采取的是一种明显属于现实主义的立场。也许清楚地确认意识内在于存在，开头总是会走向结尾，就会使哲学家不再在关于时间的主观和客观解释之间踌躇。就我来说，我倾向于认为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是错误的，过时的。但是，这与本研究并不直接相关。

我所持的上面关于时间的定义，试图回避哲学的问题，也绕过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见解，根据他的看法，时间就是对运动的一种测量（这就预设所有的时间都能被归约为测量，因为测量可以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这样，就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时间）。它也绕过圣·奥古斯丁的想法（“如果没有人问我的话，我知道时间是什么”），这种观念有许多当代的支持者。在他们看来，时间就是直接经验到的连续的持续过程。后面这一解释消除了所有现实的运动，或者更正确地说，所有在时间的相继，也包括所有的非持续性；它也否定测量或把握时间的任何可能性。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保留了这样一个思想：时间是运动（更确切地说，是运动的多样性），而从他的对手那里，我得到了这样一种思想：时间包含着一种质的因素，它不总是可以测量，甚至也不总是可以计量的。

让·皮亚杰的定义

这里所提出的定义与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 *Le development de la motion de temps chez l'enfant*（《儿童时间运动感的形成》）（1946年）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相差不大。因为他的定义影响过我，所以，简单地说说我们有哪些不同会是有益的。皮亚杰……只说到“集中”，然而我还坚持运动的“发散”。皮亚杰把集中解释为一种时间排序，而我则坚信“集中”首先只是简单的对应（correspondence），然后也许还有运动的同时存在（同时性），但不是并行，因为存在多种相继的方式。在把直觉地把握的时间和操作性的时间对立起来以后，皮亚杰首先考虑的仅仅是与“已经实现的努力和感受到的变化”相关的；其次，才考虑它作为通常完全是被建构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质性的，或者相反是可度量的和量化的，因为它与一种“总是可逆的相继”关联着。但是，我相信，皮亚杰没有充分考虑相继与延续、持续与非持续、完全不同的时刻与一致性之间的那种辩证法。他限制了对时间的直接把握，并且很快就从“直觉的不可逆性”转向时间的“操作可逆性”，因此，大段时间运

动过程中的中间状态就被隐去了。正是这些原因，他没有能够适当地把握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这源自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他自己对他的定义的解释……时间被建立在一种基础性的理性主义哲学之上。我已经努力使我的定义摆脱这种倾向性，以及其他哲学的影响。

多样的时间可能吗？

也许，即使同意把时间定义为以非连续性的相继而持续存在以及在异质性的时刻连续中展开变化的运动的一种集中和发散，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定义足以适合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吗？这一定义会避免对现实—时间和时间概念两者的破坏吗？如果存在多样的时间表现形式，如果这些形式不会被整合到彼此之中而相互冲突，那么，这个世界又怎样继续存在？为什么要把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纳入到同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为每一种不同的形式发明另外的术语？思想家能不那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他们都正确地坚持时间的统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是在计量中来理解这种统一，康德在先验形式中来理解，而黑格尔则在时间与精神的关系中来寻求，面对同一时间却总是出现一与多的冲突。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它的学术氛围如此有利于人们意识到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过去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社会时间的不同表现形式彼此明显对抗。由于通信技术的惊人的发展，我们现在转眼间就穿行于时间的不同形式和尺度之间，而时间形式和尺度的多样性是目前不同民族、各种类型的社会和群体的特征。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现在都揭示出所谓时间的统一原本是一种妄想。这是伯格森的时间哲学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之间惊人的交汇所产生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暂时离开主题，来分析一下伯格森的时间哲学与今天的科学方法论。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时间的多种表现形式及其统一的可能性问题。如果时间是运动的集中或发散，那么，人们就能够根据上面所提到的种种集中和发散的方式，逻辑地辨识出时间的许多表现形式。

原则上，n＋1种时间能够存在；这是一种事实的现实性的问题，以及经不同科学的操作的概念化来建构事实的问题。所有这些时间，尽管有着深刻的区别，但是，都拥有着作为运动之集中或背离的相同的外部

特征，因此都进入到一般的时间范畴。

正如已经注意到的，不试图把多样的时间表现形式统一到一个等级化的体系之中，那么，我们的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或者世界上的方位……就不可能。这种统一是预先给予我们的，但是，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为把握时间所作出的奋斗。我们不知道，而且也将永远不会知道，时间的多样性形式的统一自身是否存在。我们唯有作出努力，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在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之中，也只有作出努力才能获得时间尺度的一种相对的统一。在我们的心理生活、社会生活中，在我们的属于科学之内以及科学之外的有关时间的知识中，在社会科学中，也同样在自然科学之中，我们都或多或少成功地忙于这样的问题。

伯格森与时间问题

为了阐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将暂停一会儿，先来详细地分析一下伯格森的时间理论。伯格森使得两种时间的对立流行起来。这两种时间中的第一种是异质的延续（heterogenous duration），它是不可逆的，“在生成之中的”（se faisant），具有质的时间的特征，属于他所说的“紧张”，尤其是属于无意识的记忆，属于“élan vital”，属于创造的自由。第二种时间是同质的相继（homogenous succession），是可逆的，已成事实的时间（“tout fait”），属于“物质世界”；它是一种建立在空间化基础之上的量的时间。虽然在《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和《创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éatrice*）之中，他发现了“延续的不同密度”（Matière et mémoire），[①] 虽然他断言“不存在唯一的节奏”，“每个人都能构想不同的节奏，或慢或快，度量意识紧张或放松的程度，以及据此固定这些节奏在存在的序列中各自的位置”（Matière et mémoire），[②] 以及最后，虽然他把物质、生物学的生命、心理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都

① Bergson, H. (1919) *Matter and Mem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 273.

② Bergson, H. (1919) *Matter and Mem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 231.

放在质性时间的不同程度之中，但是，他没有成功地得出一种时间多样性的理论，尽管它似乎可以从他自己的分析中显现出来。

这种意想不到的僵局的出现，有许多原因：首先，伯格森不正确地把质性时间与他的去空间化联系在一起。他自己曾经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发现过“具体的空间”，这种空间是质性的，并因此不同于量的空间。从这一点似乎就可以得出，“紧张”和“伸展”既可能是量的也可能是质的。不过，他继续按照延续密度的不同程度，去空间化的状态来领会，因此，过度简化了他自己曾经预见到的种种问题。

第二，伯格森是他的连续主义（continuism）的受害者。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质性时间的异质延续似乎包含着不连续的环节，但是，伯格森永远不会把它们看作是现实的。在伯格森所说的延续中，既没有什么开始，也没有什么结束。延续的密集程度也被包含在这样一种过程的持续之中，延续的阶段之间既不相互分离也不相互对抗。缺乏现实的非持续性，这就妨碍对多样性的时间的认识。正是在这里，一直隐匿在伯格森思想中的一元论威胁显现出来了，首先是心理学的一元论，然后是活力论的和精神主义的一元论，最后是神秘主义的——神论的一元论。在他的最后的著作——《道德和宗教的两种渊源》（*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之中，伯格森注意到他试图用单一的运动来统一在质的延续中展开的所有实在的困局。这样，尽管他起先是要颠覆永恒的王座而确立人的时间的地位，他又不得不作出一种新的尝试，用“生存的永恒”来调解，而这让我们想起普罗丁和奥古斯丁。

第三，伯格森固执己见，在他的著作中，有时把现在看作时间的一个方面（《意识的直接材料》），有时把过去看作是时间中决定性的方面（《物质与记忆》），有时又说未来决定了时间的面貌（在《创造进化论》中谈到世间的未来，而在《道德和宗教的两种渊源》中又说到其他世间的未来）。这些观点阻碍了他研究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可能的多种结合以及不同的意义。现在，这些方面中的每一个都能支配其他方面，或者被投射到其他方面中。未来可以成为现在，甚至是过去，过去可以被投射到未来，现在可以成为过去，而过去也可以成为现在。这种重要的变化造成了时间的多样化，而伯格森却没有看到。这是因为，不管他总是使用的任何东西，用来发展以前所接受的一般哲学主题的质性的延续，

与时间分析没有什么关系。

最后，伯格森拒绝承认，科学的“构造”，作为这些科学在操作上的参照系，包括它们的概念化的时间，能被建立在已经体验和把握到的质性的时间表现形式的基础之上。不同科学的种种不同的时间，在他看起来，总是与质性的延续以及完全空间化的东西相对抗。因此，当伯格森拒绝承认科学所建构的种种时间自身就承载着质性时间的胚芽的时候，他就砍断了时间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在批评非连续主义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与包含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中的时间的多元性（plurality）之间的桥梁。此外，很有趣的是，不论加斯滕·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这位科学方法学家还是让·皮亚杰这位心理学家，都表达了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惊愕，即，伯格森从不相信他能够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学习某些有关时间的东西。在以下这个问题上，伯格森受到了打击，这就是时间和空间是怎样在多样的空间—时间和爱因斯坦的时间—空间中被弄到一起的。为什么伯格森在为时间多样性的理论准备了基础之后，他自己却没有向前进一步，真正形成这一理论，真实的原因概括地说，就是他不具备辩证的心灵结构。没有什么比时间问题更需要那种辩证的方法了。

事实上，所有的时间特征，都只能辩证地来理解：“非持续的持续”与“持续的非持续”，相继中的延续与延续中的相继，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时被计划到彼此之中，有时彼此支配，有时还被彼此还原，“量的—质的”与“质的—量的”（量自身以广度和强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同质性的异质，稳定—变革与变化着的稳定性。巴什拉很好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以此作为他的一本书的标题，《时间的辩证法》（*La dialectique de la durée*）（1936 年）。如果把辩证的超经验主义的方法（互补性、互蕴涵、模糊性、视角的分化与互易）应用到伯格森的发展之中，我们就能直接认识到时间的多样性。不过，伯格森的努力仍然是我们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代物理学中的时间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解决时间多样性的问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爱因斯坦证明，在物理学中，有着各种

各样的参照系，也存在多种时间，运动的速度是与选择这些参照系之一的观察者的观察点相对的。那就是说，除了别的方面以外，宏观物理学的时间并不对应于微观物理学的时间，力学的时间不是热力学的时间，天文学的时间也不是物理学的时间。但是，因为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关系着时间-空间和空间—时间的结构（二者都是被量化的和持续性的），所以，时间与空间之间过于狭窄的联系，不容许爱因斯坦揭示它不仅是被应用于不同时间的测量的差别的问题，而且也是在这些时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质的区别以及不同的关系的问题。

现在量子力学的注意力转到这一点上。除了别的方面以外，量子力学揭示电子的非持续的放射在某一无法进行量化测量的时间内得以产生，时间与能量之间的联系被那些连其节奏都无法测量和把握的种种时间间隔所切断。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理论家就说“物理学中存在着许多种时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这种状况在巴什拉的 *La dialectique de la durée*（《时间的辩证法》）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阐述：“如果到现在物理学家的时间看起来还像是唯一的、绝对的，那是因为物理学家首先被置于一种特别的实验的境界。**时间的多元主义是与相对主义一同出现的。对于相对主义而言，存在多种时间，它无疑是和这些多样的时间相对应的**……但是，多样的时间并不保持绝对的延续。延续是相对的。不过，在相对主义的种种学说中，延续的观念仍然把连续当作是一种显著的特征。在量子力学中，不再如此。在种种学说的同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种质的变化是［根据］某一位置中的一种变化……来解释的。我们都能看到，在这里，持续是……一种非常贫乏的假设……这样，我们也就能够假设，量子力学需要那种非持续的延续概念，这种延续不具有……由持续的轨道所产生的连锁反应（d'enchanements illustrées）这种特性”（强调为原文所有）。[①]

不同的科学中时间的多样的表现形式

但是，如果时间的多样性把它自己强加于自然科学，那么，我们怎

① Bachelard, Gaston (1936) *La dialectique de la durée*. pp. 90－91. 本书参考文献遗漏了该书版本信息。此处页码可能是指英文版页码。—— 译注。

么能在社会科学中对它采取例外的态度呢？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中，时间的冲突尖锐得多，也更令人震惊。现在，我们必须回答在别的地方简要陈述过的第三个问题："社会时间和多样的社会时间"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时间的特殊性是什么？我们承认只属于各种运动着的集体的现实社会时间，或者只属于作为社会学中的操作性的参考框架来建构的时间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或者，在根据情况而能被体验、觉察、表现、符号化和概念化的时间中，以及在有时能被量化的时间中，这种特殊性和多样性同样得到承认？

无生命的自然的时间、物理学时间、天文时间、有生命的自然的时间、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的时间、各个物种和有机体的时间、人体的时间、心理的时间以及包括在心理时间之内的集体心理时间、彼此精神上的心理时间、个人的心理时间，以及带有思想上的情绪化或自发性色彩的心理时间等等，它们的意义都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区分的种种实在领域存在于非常不同的时间之中，因为它们运动的发散和集中与它们的特殊性相关。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现在、未来和过去之间，持续与非持续之间，延续与相继之间，质的与量的之间等等，都是有区别的。**在物理学的实在**（physical reality）之中，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别总是被消除。*在星体的实在*（*reality of stars*）中，过去和未来掩盖了现在。在生物学的时间（biological-time）中，时间是不可逆，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对抗，同时，非持续性和质性的东西在提高。在人体的时间（time of the human body）中包含着心理和社会时间的踪迹，与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其他时间相比，在这一实在领域之中，时间更带有非持续的和质的特点。这里，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的突然变化有时是明显的。在心理的时间（psychic-time）中，总是充满着各种意义，现在因为打破了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而得到突出，等等，因此，在不同的科学开始建构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其中得到安置的具体操作性时间框架之前很久，与不同实在领域的直接联系就把时间的多样性强加于我们。在由不同的科学所做的适合于它们的研究的时间构架中，实在的这些最初的趋势就得到了显露和概念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能够作出如下判断：

（1）宏观—物理学—时间与微观—物理学—时间并不对应，第一种

时间与概率和大量的数字计算联系在一起，与量化的相继有着切近的联系，而第二是电子辐射的时间，它的相对的持续，如果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假设的话，那么，就只是假设性的。

（2）热力学的时间与力学的时间并不对应，与宏观—物理学的时间也不对应。关于热现象的强度的这一时间，提出了热现象的衰减问题，与过去相比，更突出未来和现在，同时表明自己与力学时间相比更是质性的。

（3）天文学的时间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由物理学所建构的时间。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假设性的时间，与接近无限的光距相关联。在这里，现在被忘却了，仅有过去和未来。

（4）化学的时间不同于天文学的时间，也不同于物理学的时间。现在被投射到过去和未来之中，强调从非持续到持续以及从持续到非持续的过程。

（5）在地理学的地层时间中，正如迈克尔·苏里（Michael Souri）在他的书 *Le temps*（《时间》）[①] 中所陈述的，过去和持续得到强调，但是，并没有因为量而把质给完全牺牲掉。它像天文学的时间一样，也是一种高度假设性的时间。

（6）生物学的时间（在这里，又能区分植物学时间和动物学时间）明显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前述时间。这里，它是一个累积性时间的跳跃进程问题，是由种种非持续所打断的时间，是生命的时间，在这里，不可逆性和未来宣布它们存在的权利，同时，在这里，质性的东西开始居支配地位。M. 勒孔特·德诺伊（M. Lecomte de Nouy）在他的书 *Le temps et la vie*（《时间与生命》）（1936）中，对这一生物学的时间的特殊性做了深入的说明。不过，他没有区分由植物和动物生命所构成的现实时间与由作为一门科学的生物学所建构的时间之间的区别。他也还没有准备好去关注生物学的时间与人的身体的生理学时间之间，以及作为现实的时间与由生理学和人类学所建构的时间之间的区别。

（7）在这一时间之中，因为他涉及人的身体，不仅生物学的方面得

① Souri，Michael（1938），*Le temps*. pp. 15－20. 本书参考文献遗漏该书版本信息。——译注。

到了考虑，而且还涉及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方面。这是属于人的身体变化的时间，以及人的年龄的时间。现在，正如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了不起的研究“Les Techniques du corps”（身体的技巧）[①] 中所已经表明的那样，人体的某些运动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呼吸、走路、“保持直立的举止”的技巧，生殖的技巧，吃饭、划船的技巧，甚至睡觉的技巧，等等，也都如此。人的生命周期也深深地被社会实在所渗透。他的“年龄”是由社会界定的，而且根据全球种种社会的类型而发生变化。人的和社会的意义，渗透到体质人类学所建构的时间之中，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断裂关系。年龄上的不同，个体在寿命上的变化，也包括在这些因素中的突然变化的可能性，都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种非持续性中出现的。

① 重印于 Mauss, M. (1966)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2nd ed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p. 365－386.

第二篇

社会——时间

第三章　时间、技术和社会[①]

雷德哈卡马·马克吉

人的行为和价值受社会的限制。人扮演由社会为他选定的角色，以及从社会为他创造的小的生存环境中得到他有限的价值归属。无论是他相对稳定的地位还是处在变化之中的状态，都是动态社会过程中的种种事件，他只是属于这一动态过程，处于吝啬的自然和无法改变的命运为他选择的有限领域中的一个有活力的伙伴。这一动态过程既包含社会的连续性，也包含社会变迁，而且还与时间的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们可以看出，生活和社会中的时间，是与闪闪发光的星空中的时间非常不同的东西。天文时间是统一的、同质的，以某一不变的速度永不停歇地流动，是一个属于数学家的神话。存在于人的世界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和客观的时间，首先是与他对生活过程的节奏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而生活过程是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展开的；其次，也与他对集体活动的节奏的体验有关，他自己的活动是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与集体保持同步的。

生命世界中存在着一个法则，即，在合适的温度界限之内，温度每增加 10℃，有机体中的物理—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就会以一个近似的常数（通常是 2 到 3 倍）增速。这就是著名的范托夫公式（Van't Hoff's formula），它构成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新陈代谢速度普遍变化的基础。新陈代谢的速度调节着生物学的时间，因而生物学的时间随着年龄而发生变化。对于老人来说，时间似乎过得快，因为太阳时的数据（the solar time envelope）相对来说是不变的，而生理时间，就相应的速度的比

---

① 选自 R. Mukerjee (1943), 'Time, Technics and socie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7, pp. 255—266.

例来说，更快一些。根据勒孔特·杜诺伊（1936），举例来说，40岁的父母和一个10岁的孩子，孩子的一年所代表的生理时间从量上说与父母的三年是一样的。

人对于他自身内在的活动，诸如心跳，呼吸，月经周期，饥饿、休息和睡眠的循环，以及自然现象周期性循环等的节奏的体验，进入到时间意识之中。人感到饥饿，想休息和睡觉，这都表现出规则性的间隔，因此，主要的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反复体验并定期得到满足，给时间的行程留下了线索。与对延续过程的精神建构相比，有规则的习惯的形成更加重要。每个人的总在重复的习惯，如寻找食物、劳动、休息和睡觉的习惯，编织在意识的自动的活动形式之中，意识的这种种形式不仅表达了人的时间感，而且也对他的内在的和外在的适应提供帮助。生物学上的时间表现在人的与身体上的功能相关的最稳定和最一般的习惯上。

心理学家也已经了解精神生活上成长的节奏以及青春期和衰老的危机。生理--身体的状态或者身心是否成熟，以及时间的内容丰富和有趣还是单调和乏味，都会影响个体在时间估计上的差别。在生活世界中，一个图像消退了，另一个图像出现了，对前后相继的秩序中出现的事件的感知，以及把相继出现的图像组织成一个整体的能力，都会衡量心理上的时间。一种强烈感受到的情绪或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会缩短作为一种精神构造物的延续时间；“属于一种辉煌人生的有丰富内容的一个小时，顶得上平平常常的一年。”威廉·詹姆斯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

> 一般地说，充满着变化和有趣经历的时间过起来感觉短，但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却长。另一方面，一段没有什么经历的时间过起来感觉长，而回顾起来却显得短。①

实验室的试验表明，当有着较强的需求压力，伴随着紧张以及有时出现的情绪上的激动的时候，时间间隔被看做是比没有这些东西的时期要短。大家都知道，人在睡眠中和在舞台上会丧失时间感，而同时会做

①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first published 1890), p. 624.

白日梦或运用他的想象。对个人而言，在性活动的兴奋、审美的愉悦或神秘的体验中，或者在使用毒品的过程中，时间会失去准确性。时间感被认为依赖于基本的细胞代谢。奎宁使时间间隔看起来比实际的间隔长，而甲状腺素会缩短时间间隔。酒精会延长时间间隔。咖啡因会缩短它。这些是实验室的发现，对时间的估计明显依赖于个体代谢的速度。时间意识不仅因为紧张或倦怠的状态而不同，也因为智力、学习能力和是否具有远见上的差别，年轻与年老的差别，以及个人在社会空间上的边界不同而发生变化。据发现，个人之间在对直接或延期的需求和行动的后果的估计方面，在是否重视未来的问题上，以及在时间的准确性和计算能力方面，都相互有区别……因此，我们可以谈个人的时间（personal-time）。

然而，社会—时间不同。有反复出现的社会事件和活动的节奏，强加在个人对生物和心理延续的独特经验之上，这种节奏决定着社会之中的时间计算。个体适应社会的基础不可能是个人的不可靠的时间经验，而必须是对所有的个人来说都是不变的和共同的时间，只有在这种时间的基础之上，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合作才是可能的。

即使人的生理需要和满足也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马林诺夫斯基观察到：

> 人不只是依赖于饥饿和饱足这种生理的节奏；他的消化的过程是由他所属的部族、民族或阶级来赋予时间和训练的。[①]

早期的人对时间的计算，其根源在于被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的季节性过程。狩猎民族，其活动是断断续续的，几乎不能形成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那种样子的历法。牧羊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师和天文学家；人们普遍认为牧羊人已经根据他们所控制的羊群和羊的生命进程来计算时间。季节性地迁到遥远的牧场去，对于他们的集体的存在和福利来说是很必要的。不过，在农业的阶段，人的时间表才是第一次被系统地制定

① Malinowski, B. (1939)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in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p. 11.

好的；它是由农业实践的常规所决定的，起先是集体地规定的，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易改变的强有力的社会习惯。在文明的形成阶段，正是这种农业常规活动拯救了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使他们免于贫穷和饥饿。的确，随着农业人的出现，第一次要求有规则地劳动、娱乐、休息、游戏和睡觉的习惯。这也许是对人的成长作出贡献的真正最重要的阶段。

而农业的常规又是由自然的活动的节奏和周期，由因为阳光、湿度和降雨的分布不同而出现的农业季节更替以及土壤恢复和植物生长的生态周期所支配的。不是动物的发情期或者比如牧羊人中小孩出生的时间，而是树叶的萌芽和凋谢，谷物和水果的成熟，降雪和下雨，成为农耕民族计算时间的手段。

城市工业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节奏远为不同。在工业社会中，职业的规则，日复一日，与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所支配的，而机器体系的节奏并不遵循生活的节拍。劳动被按区域大量而精细地分布在空间和时间之中，这是工业主义的特征。劳动的这种分布要求根据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来对活动进行一种小心翼翼的协调，而且会把机器时间（mechanical time）的越来越细的限制强加给人们，而机器时间是以分分秒秒来计算，也是以分秒来区分的，与生命活动的正常的节奏没有什么关系。与预定时间的哪怕最小的延迟或偏差，也会使运输和技术体系失常，会导致全面的误会，甚至事故和灾难。另一方面，人们的休息和劳动，闲暇和社会交往，不是由人作为有机体的冲动和需要的节律，而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进由机器时间的节奏来支配的。

以非常高的速度在工业化的社区发挥作用并且非常准时的运输体系，形成工业主义的中枢。它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把顾客和货物从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带到城镇、工厂和公司，全世界的交通速度都在不断提高。列车的时间安排支配着工业运转的速度以及现代城市—工业生活中的大多数社会交往的间隔。事实上，带有预定时间安排的列车和蒸汽机的引入，是农村社区在精确性和准时这方面的教育的第一步[①]。

习惯的这种变化，对于城市中个人的生存，像对机械化的城市—工

① 见本书第七章。

业社会的效率一样，非常重要。仍然不适应城市环境速度的农村居住者，现在就是一个不适应环境的人了。这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社区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在社区中，某一单个的个人的过失都可能使城市整个机械化的体系处于失常的状态。所以，现代工业社会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和规章来检查不正常和不准时的个人，在农村环境中定型的行为方式，现在对社会的福利来说成为一种威胁。

流动和速度能够无限地提高吗？不同的工业社会表现出不同的流动速度。流动是一个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仍然不完善的过程。它至今还处在进步之中。对流动的进步进行适当的测量表明流动的速度在继续加速。巨大规模的人口非间断性地或混乱地以很快的速度运动；但是，在一个分化非常大的社会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运动相互适应，彼此和谐。准时、可计算、精确，是复杂和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迫切需要的，它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到一种刻意精确和不混乱的常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种机械的常规中，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出现的快的运行速度，就以时间为基础不知不觉中进入到彼此和谐的状态。这就使得人的交往成为短暂的、碎片化的以及非个人的，甚至是可以根据时间来测量的。

农民有他的定期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很少有什么固定性。在亚洲东南部的雨季，农民从早到晚在地里苦干。突然，大雨来临或者几个星期的干旱，就改变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的时间表。在工业社会，没有工人被期望一天超六小时或八小时地劳动，如果他的确在劳动，那么，他会得到加班费。他也不会在周末以及星期天上班。不仅劳动的时间，吃饭、娱乐甚至休息的时间也都是由城市时间表的严格要求所准确地确定的。钟表和日历调节、计算和定量地评价一种高度机械化文明的大多数有组织的活动。结果是，一方面，必须作出调节以适应机器体系的严格性的人的生活和功能的速度在提高；而另一方面，金钱的价值观念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生态性的，即，非个人的，匿名的，以及在不断进行计算的事情。

因为流动和速度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态的、经济的和个人的关系——而家庭以及其他初级群体、经济组织和国家都存在于这样一些关系之中——因此，现在还不容易看出在什么范围内流动的规范将得到修

改以适应人的本质的需要，或者，在什么程度上人的社会习惯、群体关系的形式以及个人的行为会得到改变以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机械的节奏能够不受惩罚地取代生命和成长的节律吗？速度能够无限地加快而不伤害人、人的交往、关系和价值观念吗？

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把人力劳动者绑捆在飞速转动的工厂轮子上，把他投到过快的速度中，会使他的体能以及精神上的耐力和警惕性都变得无法承受，这样一种趋势正导致恶性的折磨、意外事故和职业上的死亡率增加。不过，照管机器的人的劳动速度到底应该减少多少，超出合理的细心和控制范围的危险而难以控制的机器是否应该撤销，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完全不清楚。在工业生产中，有意义的是劳动的精密的划分和专门化以及机器的系列化……机器体系不同部分彼此之间的相对速度因此就得到协调。一个组成部分中速度的降低，可能就会影响所有其他部分的速度，以及降低总的生产率，而这可能会意味着在一种巨大的由机械的力量组成的生产体系中不利的经济状况的到来。

另一方面，涉及千百万工人的健康、快乐和创造性的问题，不应该由一种狭隘的技术主义来决定。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①] 就已经强调在技术中由机器来做曾经由人手来完成的苦活这种趋势。把这一法则应用到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生产中这一点目前并不明确和清楚。但是，机器技术中的重复性劳动降低工人的智力水平已经被心理学的调查研究所证明。关于被迫从事无需技能和非创造性劳动的产业工人的个案研究表明，智能低下者通常欢迎重复性的生产任务，但是，有才智的工人特别感到不满意、受挫折，他们也被控制在才能低下者的情感和知识水平上（Elliott and Merrill，1938）。无疑，许多生产部门和生活领域中的机器和速度，都已经超出了人的能力以及人要去适应的社会习惯，而这增加了神经紧张、不稳定以及社会混乱的影响范围。降低机器体系和工业组织的速度，以及把机器与人的因素协调起来，是现代技术迫切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技术已经成为到处是贫民窟和贫民，生活速度极快，犯罪行为无奇不有的蜂窝式城市发展中的主要因素；它是一种对人、公用事业、制度和伦

① Chase，S.（1939）*Men and Machine*，New York：Free Press.

理进行生态学的重新分布的新技术。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技术时代，社会科学应该对机器和技术的社会影响给予更充分的考虑，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目前在工具的变革与社会习惯和制度上的变革之间所存在的滞后，而且能够使新的发明和创造指向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将超越仅仅强调机器和技术功效的那种价值。

这样，可以看到，机器体系的缩小，生活的流动和速度的降低，以及受电网和汽车运输的扩展，动力的多样性，轻金属和贵金属的使用，以及诸如电报、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这样的现代工具的使用的刺激而出现的大城市分解成许许多多的农业—工业居住区，是与一种新层次的人类价值相一致的。这种新的价值按照生活的健康、快乐和安详来重新定义工业和技术的功效。

过度的流动和过快的速度说明巨大的机器体系的不可靠以及过于庞大；一个过大的城市也超出了使小规模社区生活能够激发的那些微妙而深入的快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忠诚继续存在所必要的尺度。同减慢机器体系中的速度一样必要的是以社会的一致性和工业的效率两者为基础调节一个城镇或城市的大小。未来的城市，如果要发挥它的社会效能，保证公民集体参与城市的功能和活动，那就不允许超出某一特定的人口密度以及某一特定的规模。

机器体系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着巨大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重要性。在农业社会中，劳动是间断性的，很少紧紧张张的，速度也慢，但是，对每一个农村的居住者来说，也有一些任务，一些劳动，吸引他的注意，激发他的能量。在农闲的季节，地里的劳动周期性地减少了，这时候，农民就从事副业，也就是家庭手工业，做一些家庭手工活，忙于结婚和家庭访问，或者过集体性的节日，比赛，表演，以及参加一些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当然，周期性的大雨和干旱，使农业的常规脱轨，引起广泛的事业和饥荒。但是，农民不仅建设经济的水利设施以及形成适当的农业技巧，而且也形成适应性的社会习惯，以抵抗饥荒和失业这样的大灾难。

不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机器体系应该为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负责。据估计，在美国，仅仅是在 1920－1931 年期间，因为技术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在制造业中，就有超过 300 万的雇佣劳动者被转移。尽管生产的物质总量在快速增长，但是，1928 年受雇的工人人数比 1920 年少 841000 人。

与经济上的损失相比，更重要的是伴随失业而来的社会的去道德化、不确定性和绝望的情绪。许多工人也沦落到流浪的境地，走向犯罪。严酷的情况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美国，在经济萧条期间，千百万儿童，在整个国家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他们中有许多是女孩。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个体为了最低的保障而劳动的权利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一种高度复杂和机械化的社会的进化，使得它不可能依赖关于消遣和事业的传统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再能够提供生计和保障。

不同的工业社会，正按照它们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在重塑它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以确保劳动和收入的一致性。的确，有些社会已经缩减了在自由民主传统中伴随流动和竞争的自由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自由，以确保一种最低程度的保障和生活标准。无论就它对个人速度和精神的调整所提出的要求，还是就它对维持一种技术上有效而且持续的生产之流的集体过程所提的要求来说，机器体系已经证明是太铁面无私了，引起个人深深的不安和社会组织的瓦解，而这些会抵消其了不起的工具上的收获。

补救的方法就在于那些可以恢复机械化产业领域中人的生活和成长节奏的新发明，就在于对产业和人口重新进行本地化以及重新调整农村—城市就业方向的某一新的技术，就在于经济组织的改革，只有这样，对于劳动群众来说，生活标准才会得到保证，也才能保持合理的稳定。技术的结果是过度的流动和速度，付出的代价是个人的健康和宁静，以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安全。同时，也只有技术才能治疗目前在人的习惯、关系和价值等领域中存在的不适应，技术引领着新的社会和文化。但是，只有当社会学对技术与人的本质产生更恰当的理解，发现新的社会控制和调节的手段，来对付人的那些与技术的时代快速适应的必要性不相称和不适应的方面，技术才能真正发挥这样的作用。

与机器系统相比，人格的灵活和适应性要小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更多地期待技术上的变革，以减少物质领域中人的进步与他的人格和伦理关系上的进步之间不可避免的滞后。由少数人所控制和操纵的科学和技术，已经证明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瓦解是毫不在意的。由一种关于发明的社会学所指导的有计划的科学和技术，会使发明和创造的活动致力于发现人的价值，致力于文化进化的持续性，基础是更好地把握物质环境，以及更多的、更健康的由社会指导的闲暇。

第四章　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①]

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

没有时间的范畴，运动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力学中，时间被看作是独立的变量，是决定一个粒子位置的三个坐标的一个连续函数。在社会的变化中，时间同样是一个必要的变量。在社会现象的运动或变化的研究中，天文时间的或日历时间的概念是否充分，这就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问题了。在社会动力学的体系中，由年、月、周、天所构成的时期，是唯一，或者甚至是最容易使用的时间量度标准吗？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基础上，即，任何不同于天文学时间的时间体制，或者与天文学的时间完全不相关的历法，都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可能，也没有用。他们一直采用一种时间，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可以比较的，这种时间是量的，不具有任何质的方面，是持续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脱漏。此研究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在社会动力学的领域，坚持一种单一的时间观的做法，有几个根本性的缺点。

牛顿把时间说成是均衡的、无限可分的以及持续的，这样一种说法构成关于时间客观性的最明确的主张。在天文学的领域内，现代相对论学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牛顿时间（Newtonian time）的偶然性。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像布拉德雷（Bradley）、贝克莱（Berkeley）和康德（Kant）这样一些哲学家，以及更近一些的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格亚（Guyau）、詹姆斯（James）和伯格森（Bergson）等，都一直批评这种概念的普遍应用的可能性。在社会学的领域，除了属于迪尔凯姆学

---

① 选自 Sorokin, P. and Merton, R.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1937, pp. 615—629.

派的某些成员之外，一直很少有人注意这一根本的范畴。

只要简单思考一下，天文时间不是唯一的时间概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哲学中，存在所谓“本体论的时间”（ontological-time）。我们任意选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芝诺（Zeno）来看，两人都设想一种时间，它是非物质的，完全是主观的。对于康德来说，时间是所有被感知到的现象的那种形式的、先验的条件。贝克莱和布拉德雷都认为时间是一种纯粹的现象，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詹姆斯把一种“客观的”时间概念看作是一种有用的虚构。伯格森认为“想象的同质的时间是一个语言、小说的圣像”。①

在心理学领域，时间的概念也完全不同于天文时间。时间在这里不是被构想成“以一种不变的速度流动，不受物体运动的快或慢的影响”，② 而是被看做一定受出现在被观察的具体时期内的具体事件的数量和重要性的影响。正如詹姆斯所指出的：

> 一般地说，充满着变化和有趣体验的时间过起来要短，但是，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却长。另一方面，没什么体验的一段时间过起来显长，而回顾起来却显短。③

因此，在实际的感知中，我们远不能体验到那种被理想地设想着的始终如一地流动着的时间（aequabiliter fluit）。心理学领域中的试验已经发现在个人对持续时间的估计与天文学时间流逝的实际时间之间存在着差别。④ 在个人的体验中，时间完全不是“无限可分的”，尽管芝诺的阿基里司与乌龟的悖论留传至今。许许多多的试验已经表明，个人不能辨别少于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差异。⑤

---

①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first published 1890), p. 274.

② Maxwell, J. C. (1978) *Matter and Motion*, New York: Harper, p. 28.

③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p. 624.

④ Sturt, M. (1925) *Psychology of Time*, London: Kegan Paul.

⑤ Sturt, M. (1925) *Psychology of Time*.

在心理学中，“心理年龄”概念的引入，是在这一领域中天文编年表在方法论上的不恰当性的明证。经验研究表明，根据编年表显示的年龄与心理年龄之间不存在不变的关系，因此，对与“年龄”相关的人的行为的许多心理学描述就需要一种不同于通常所使用的时间参考框架。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批评在社会领域甚至更说明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同样认识到，天文时间或时钟时间并不总是适用。例如，马歇尔（Marshall）在他的关于经济平衡的著名的分析中，就意识到天文时间的不适当性。[①] 他认为，经济平衡依赖于市场在期间得以扩大的“长的”和“短的”时期。正如奥佩（Opie）所说的：

> 当他（马歇尔）区分长的和短的时期时，他没有使用时钟时间作为他的标准，而是使用“有效性的时间”，依据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供给的力量被给予较大的关注，而时间是长或短，是依据它影响在供给的方面某些被选定的力量中稳定性的可调整性。供给力量的可调整性越大，所讨论的时间周期越长，**这与时钟时间无关**（强调是新加的）。[②]

经济时间（economic time）的概念，由沃格林（Voegelin）明确地挑选出来并加以论述，[③] 而斯特雷勒（Streller）却不加以分析就使用了这一概念，[④] 但是，在博姆-巴沃克（Bohm-Bawerk）、杰文斯（Jevons）、埃弗茨（Effertz）、威克塞尔（Wicksell）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许多分析中，也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这些不同的时间概念，尤其是因为爱因斯坦对同时性概念的分析而引起的天文学领域自身的革命性变革，说明了在本质上有效的时间标准。

---

① Marshall, R. (1925)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② Opie, R. (1931) Marshall's Time 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61, pp. 18—19.

③ Voegelin, E. (1924) 'Die Zeit in der Wirtschaft', *Archiv fur Sozialwissenshaft und Sozialpolitik*, 53.

① Streller, R. (1926) *Statik und Dynamik in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okonomie*, Leipzig.

如果寻找使我们能够确定社会事件出现的具体时间点的有效范围，那么，很明显，即使今天，所有这些确定性的东西与天文学的或者甚至是日历那样的框架毫无关系。布里奇曼（Bridgman）已经对这一类的事实做了概括，他说："当事件的性质变化时，我们用来指定某一事件发生在某一时间的方法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时间会以不同的外观出现。"① 社会时间就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作为参照点来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在我们的日常活动的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这种表示时间点的手段。"世界大战后不久"，"音乐会结束后我去看你"，"胡佛总统进入办公室的时候"，都与社会的，而不是天文学的参照系相关，目的是指明具体的时间点——"当什么时候"。此外，这种种参照所表达的远不是形式上相同的天文学的或日历上的参照点，("1918—1919"，"11"，"1929 年 3 月")，因为它们常常在事件与时间的参照系之间建立起一种附加的意义关系。举例来说，胡佛总统进入办公室的那一选择，作为一种时间的标示，比如说，在那一个时间点上，2000 邮政局长被其他人所取代，这告诉我们的远不是这样一个陈述，即，这样一种人事替换出现在 1929 年的 3 月。换句话说，日历上的参照，只有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才是有意义的。有关这一点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我们以类似的方式，通过诸如"长达一个学期"，"一整个劳动日"，"大斋期"这样一些参照来标明时间的延续。这些术语说的都是一般都能理解的时间期限，而根本没有提到天文学的现象，因为这些社会性的时间间隔都是独立地变化的。这样一些说法，如果不是在初民中流行的用来标明一段时间的某一很普通的手段的遗存的话，那么，至少也发挥了同样的功能。

为了标示时间的延续，初民使用了其他的手段，这些手段来源于他们的日常事务，与计时活动没有什么关系：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煮米饭"通常意味着半个小时，"油炸一只蝗虫"意味着一会儿。克罗斯河（Cross River）土著人说："那个男人在玉米还没有完全烤熟的时间内就死了"——即，小于大约 15 分钟；"能炒好一把蔬菜的时间"。②

---

① Bridgman, P. (1932) 'The Concept of Time', *Scientific Monthly*, 35, p. 97.

②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und. p. 42.

时间的表达，无论是关于持续时间还是时间标记，都是关于社会的活动或者集体的成就。那些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活动的时期就那么慢慢地流逝了，没有任何术语来表示它们。[①] 在这里，时间是不连续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某一特殊的时期缺乏社会影响或社会重要性，那么，在时间上就可以发现间断。[②] 群体的社会生活被反映在对时间的表达上。日、月、季，以及甚至是年的名称，都是由集体生活的节奏来确定的。活动的社会脉搏和跳动的同质性，使得天文学的参照系成为不必要的了。每一个群体往往都包含有由社会活动的某种共同的和彼此理解了的节奏所构成的内在关系，会设定它的时间来固定其行为的周期。要使社会的行为做到同步和协调，并不需要那种建立在有关天文学观察的数学上的准确和严密基础之上的高度复杂的计算。

因此，卡西人（the Khasis）是依据每个月所发生的活动来命名他们的月份的："给地除草的那个月"，"耕种者烘干他们从地里收获的农产品的那个月"，等等。[③] 在 Meithesis 部落，所有的时间计算都是依照 the chahitaba：每年都是以一个重要的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④] 科德林顿（Codrington）说到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的制度："不可能把月份的天然的相继放到一个太阳历年中；月份是根据做什么来命名的"。[⑤] 在纳瓦霍族人（Navajos）中，"日历中月份的名称很明显是关于他们所控制的羊的生活路线以及家庭生活的记述"。[⑥]

这样，我们看到，计时系统反映了群体的社会活动。它们具有集体性起源；坚守它们具有社会必要性。它们产生于群体生活的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活动的惯例和工作日的日常事务安排。从根本上

---

① 参见 Best, E. (1922) The Moari Division of Labour, *Dominion Museum Monograph*, No. 4.

② 见本书第十三章。

③ Gordon, D. M.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 Lexington Mass.: Heath, p. 193.

④ Hodson, T. C. (1908) *The Meitheis*, London.

⑤ Codrington, R. H. (1891) *The Melanesians*, Oxford, p. 340.

⑥ Coolidge, D. and Coolidge, M. R. (1930) *The Navajo Indians*. Boston and New York: Harper, p. 60.

说，它们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迪尔凯姆清晰地观察到这一联系，他说："日历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与此同时，它的功能就是要确保集体活动的规律性。"①

农耕民族和狩猎或游牧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节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划分时间间隔的。周期性的休整在不断流动的渔猎民族中或在漂泊的游牧部落中似乎都是闻所未闻的，虽然远古的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通常有这样的生活习惯。② 同样，大城市也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小乡村的时间参照体系。这就是说，时间计算基本上依赖于集体的组织和功能。生活的方式决定着哪些现象将代表季、月或其他时间单位的开端和结束。即使在那些自然现象被用来固定时间周期的范围的例子中，那些现象的选择也是取决于它们对于那些集体的影响和有用性。因此，在希伯来人那里，年"也像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那样可能是很自然地"取决于庄稼的生长和收获的每一轮过程（Woods，1991）。③ 时间的体制是伴随着社会结构而变化的。

天文时间是统一的，同质性的；完全是量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我们能够这样来刻画社会的时间吗？很明显，是不行的——存在着假日，用来进行有特殊文明功能的仪式的日子，"良辰吉日"和"不吉利的日子"，集市贸易的日子，等等。因为与特属于某些时间周期的活动有联系，这些时间周期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我们发现，无论是对远古的社会还是对更复杂的社会来说，这都同样是真的。因此，詹姆斯说：

> 我的一位聪明的朋友有一个问题长期令他感到困惑，他想知道为什么一周的每一天对他来说有如此典型的外观。周日这一天很快就引起注意，是因为城市的喧闹停止了，人们的脚步声回响在人行道上；星期一的这一天，其特点来自晾在庭院中的衣服，衣服反射一道白色的光到天花板上；周二这一天，等等……可能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对

①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p. 11.

② Webster, H. (1916) *Rest Days*, New York: Harper.

③ Woods, F. H. (1911) 'Calendar (Hebrew)',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3, p. 108.

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有某些与这个小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外部或内部的征候，这些征候与一周中的那一天也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道家根据那本神奇的占卜用的老黄历，规定“哪些天是黄道吉日，可以在这一天结婚、乔迁，或者裁衣服；哪些天我们可以开始修房子、庙宇和船只”。② 伊斯兰教徒认为周一、周三、周四和周五是吉利的日子；而周二、周六和周日是邪恶的和不吉的日子。周五，被伊斯兰教徒当作一个神圣的日子，一个休息日，犹太人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周六，而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这样的日子是周日。在希腊人当中，日历有着一种确实神圣的特性，完整地指明了幸运和不幸运的日子。因此，第十四天是驯牛的一个好日子。③

我们几乎不需要说明我们在这里不涉及这些信念所表达的内容的有效性。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社会事实；它们显示了实际上归属于确定的时间单位的不同性质；它们有助于说明，关于时间的一种纯粹量的测量不能说明某一群体的成员赋予不同时间单位的性质。量的方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的心灵的确总是给日历中的每一天都附加上一种不平常的价值，因此，每一天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显著不同的”。① 仅从这一点，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社会时间没有量的方面。但是，我们的确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时间不是一种纯粹的量，不能说其所有的组成部分是同质的，总是可以与其自身来比较，并且是可以准确地加以测量的。在关于时间的判断中，包含了对趋向、机会、持续性、稳定性和相似性等方面的考虑。被归属于时间间隔的相同的价值，并不意味着相同的测度标准。

在性质上的这些区别导致时间延续的相对价值，不仅依赖于时间延续的绝对长度，而且依赖于它们的品质及其强度。量上相同的时间长度在社会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不同的，而不同的长度却在社会的意义上看作

---

①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first published in 1890), p. 623.

② De Groot, J. J. M. (1912) *Religion in China*, New York: Harper, p. 245.

③ 参见 Hesiod, (1858) *Book of Days*. London.

① Kroeber, A. L. (1923)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p. 262.

相等。举例来说，“印度教的劫（the Hindu Kalpas）在数字上相等的部分，并不被理解为是相等的持续时间”。[①] 或者，与此类似，重黎（Chongli）用代（是用来表示年长者的地位的术语）来测量长的时间阶段，代与代之间在量上可能是不相同的，但是，就其完全相同的质的方面来说仍然被看作相等。[②]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到这里为止，我们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这样一些事实，与天文时间相对照，社会时间，是质的，不完全是量的；社会时间的这些性质来源于为群体所共有的信念和习惯；还有，这些性质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它们在其中被发现的不同社会的节奏、律动和韵律。

数学的时间（Mathematical-time）是“虚空”（empty）。它不存在所谓标记，也不存在所谓空白，被用来作为开端或结束的点。然而，历法的形成需要某种初始点或确定的数据。必须设定某一开端，不管是不是人为的，以便开始某一种意指持续的计时体系。为了这一目的，“一般就要求助于按照惯例来选择的某些社会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日期”。[③] 在所有情况下，出发点都是社会的或者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含义；它总是某一被看作是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事件。

因此，就引入了种种社会性的参照背景，诸如，亚历山大之死或者巴比伦人的盖扎之战（Battle of Geza），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罗马的缔造和罗马人的亚克兴角之战（Battle of Actium），戴克里先的迫害和基督徒的基督诞生，神武天皇神奇地缔造日本帝国以及在日本发现铜（和铜时代），穆罕默德的逃亡[④]，白雉被呈献给日本天皇的事件（白雉时代）。[⑤] “埃及人从来没有任何按日子来写编年史的想法，而只是依据在位的法老统治的年数来写”。[⑥] 亚美尼亚人同样根据国王或者族长在

---

① Hubert, H. and Mauss, M. (1909) *Me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Alcan, p. 208.

② Mills, P. (1911) *The Ao Noyas*, New York: Hiet.

③ Philip, A. (1921) *The Calendar*, Cambridge, p. 48.

④ 指公元前 622 年穆罕默德从麦加流亡到麦地那。

⑤ 参见 Ginzel, F. K. (1906) *Handbuch der matematischen 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 Leipzig.

⑥ Foucart, G. (1911) 'Calendar (Egyptian)',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3, p. 92.

位的年数来计算的。从浩如烟海的事例中精选的这少数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对以下这个命题作了某种证明，这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民族都是依据某些有重要社会含义的显著事件来排列它们的时代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牛顿的天文时间观中所假设的持续性特征沿用到社会时间之中。意义重大的日子中断了这种连续性。尼尔森（Nilsson）[①] 坚持这样一种论点，他关于原始人的时间计算的研究也许是最彻底的。时间计算的 pars pro toto 原则（即，计算的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种单位，而是在这一单位内出现但仅此一次的某一具体现象）表明，时间的计算本质上是非连续的。自然的年度会是连续的，但是，历法的年度既有一个开端，也有一个结束，它们时常是由暂时性的中断来标示的，也通常伴随着某种社会仪式。

认为时间的区分都是由天文学现象所决定的那种一般的信念完全不准确。[②] 我们把一周划分为量上相等的时期的体制，是由习俗来决定时间计算的一个很好的代表。卡西人的一周几乎普遍是由 8 天组成的，因为集市每 8 天举行一次。卡西人的一周有着一种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起源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一周几天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到，它们都不是行星的名称（用行星的名称来命名是后来一种人为的演绎），而是主要的集市举办地的名称。同样，罗马人的一周也是由集市（nundinae）来标示的，集市每 8 天举办一次，每当有集市的时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到城市来卖他们的产品。波哥大的穆伊斯卡人（Muysca）的一周是 3 天；许多西非部落以 4 天为一周；在中部美洲，东印度群岛（East Indian Archipelago），古老的亚述（以及苏联），发现有 5 天一周的；多哥（Togo）多数族群是 6 天为一周；古代希伯来人和大多数当代文明化社会是 7 天为一周；在罗马人、卡西人以及许多非洲部落那里，也能找到 8 天为一周的例子；印加人曾经以 10 天为一周；所有这些关于星期的算法，尽管长度不同，但是，事实上都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它们总是被发现就其起源来说都是与集市联系着的。科尔森（Colson）[③] 相当清楚地说明，有连续性的一周，我们多少有些了解的种种最早的形

---

①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und.

② 参见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③ Colson, F. H. (1926) *The Week*, Cambridge.

式，它们合适还是不合适，这都是由它们的群体所确定的，而基础与月亮没有什么关联。这种时间单位的出现和传播，总是与某些被周期性观察到的社会事件关联在一起，不是通过天体的观察能产生得出来的。此外，正如赫顿·韦伯斯特（Hutton Webster）[①] 所精辟地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某种状态通常引起一周长度发生变化。

3、4、5 天的较短的间隔反映着初民生活中经济还比较简单，因为人们手头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储存量不很大，这样，集市就必须以足够的频率来举办，以使得相邻社区能通过集市彼此交换这些东西。而 6、8 和 10 天这种较长的周期，相形之下是不那么常见的，很明显是以前的周期的倍数，其目的是举办一种大的集市，便于在广阔的区域内交换产品。[②]

同样，一个月的持续时间必定不是由月亮的盈亏来确定的。莫姆森（Mommsen）指出，例如，在罗马人那里，存在过一种历法体系，“它实际上与月亮的运行完全没有关系”；这导致“月份的长度是人为地规定的”。[③] 在确定一个月的持续时间时不考虑月亮的运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天文学时间中不相同的时期在社会的意义上被看作是相等的，这种情况在按月发薪水的做法上得到了佐证。月份的相等是约定的，而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社会的持续时间不等同于天文学的持续时间，因为，前者是一种符号化的持续，而后者的持续时间是以实验为依据的。

即使是今天，天文学时间成了一种普遍化的色调，那也是因为种种社会的考虑，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见证了“充分利用日光的时间”这种新的约定。增加有日光用来娱乐和休闲的时间，这一理想化的结果，通过把劳动时间调到 8：00－4：00 就已经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但是，“9：00—5：00”的规定已经如此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经济之中，以至改变 24 小时的周期之内时间单位的数字上的指定这一大概不那么激进的革新曾经被认为更可取。时间指定的约定性因此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所有的历法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起源于社会的需要，

---

① Webster, H. (1916) *Rest Days*, New York: Harper.

② Webster, H. (1916) *Rest Days*.

③ Mommsen, T. (1885) *History of Rome*, New York, p. 279.

并因这种需要而长久地存在下去。所有周期性的，要求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有许多个人出席的事件（尤其是当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集体或者来自某一大的社会群体时），都会使有某种共同的，也就是所涉及的那些人相互能够理解的时间指定的方法，成为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宗教仪式，典礼，季节性的节日、打猎、军队远征、集市、部落之间的会议，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许多人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进行复杂的合作——都是严格界定的时间标示体系的种种由来。随着互动领域的扩展，那些由具有相同社会节奏，彼此关系很近的小群体所共有的时间体系就会变得不再适合了。个人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聚合到一起，如果他们想要协调他们的行动，使他们的行动保持同步的话，就会要求某种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都同样可以理解的时间安排。

在古代的城市中，最先出现了由背景不同的人数众多的个人出席的大聚会。然后，创造一种相互可理解的参照系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因此，在罗马人那里：

> 当城市生活开始时，自然地就发现有必要对城市生活中所包括的年份和宗教事件形成一种更准确的计量方法。农业是人们生活的经济基础，在城市之内，为了继续这种农业的宗教仪式，如果说不是绝对必要的话，那至少可以说把这些仪式固定到具体的日子也是便利的。无疑，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历法的由来。①

与此类似，也是管理宗教祭仪的必要性，“最先在希腊创造了历法”。② 根据斯平登（Spinden），即使是玛雅人（the Mayas）的明显是严格意义上的天文学的历法，基本上也是出于宗教的目的。③

前述观点也许可以用许多基本的命题来概述。时间体系为数众多，各个不同，就其对有不同特性的种种事件的实际可应用性来说也是相互

---

① Fowler, W. W. (1911) 'Calendar',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3, p. 133.

②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p. 366.

③ Spinden. H. J. (1928) 'Maya inscriptions Dealing with Venus and the Moon', *Bulletin of the Buffalo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s*, 14, p. 7.

区别的。说天文学的或者甚至历书上的时间最适合用来指明和测量社会现象的同时性、次序和延续时间，这种设想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所有的时间体系都可以被归结为提供手段来使群体各组成要素的活动和习惯达到同步和协调这样一种需要。地方性的时间体系会因为不同群体的范围、功能和活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群体之间互动的扩展，就必须形成一种共同的或者范围扩大了的时间体系，以取代或者至少是扩大原先的地方性时间体系。因为在不同的群体中或者在同一个高度分化了的社会内，社会活动的节奏互不相同，这样，地方性的计时体系就不再适合了。随着互动领域的扩大，即使是生物的自然的事件（例如，庄稼的成熟）也不再能够成为一种时间参考的框架。最后的共同的基础，在天文学的现象中以及在或多或少传播开来了的约定的时间连续中发现……时间计算和指定作为一种协调社会活动的必要手段的社会功能，因此就成为天文时间体系的真正的促进因素。随着联系和有组织的互动的扩展，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活动节奏中缺乏一致性，地方性时间体系的不恰当性使得天文学时间体系的引入势在必行。天文时间，作为一种“时间世界语”（time esperanto），是一种社会性涌现。这一过程因为取代了混乱和纷繁变化的活动的城市化而加快。

地方性的时间体系是质性的，表达着独特的地方化的意义。致力于包含这些在质上不同的地方性体系的一种时间体系，必定从这些不同体系的个别的性质中分离出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在确定一种纯粹量的、一致的、同质的时间观的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因素；单维度的天文学时间很大程度就被替换为多维度的社会时间。

为了促进和丰富社会动力学领域中的研究，社会时间的概念，如果不是作为天文学时间的一个继任者的话，也必须作为一种辅助的东西而重新引进来。在未加质疑地采纳天文时间标准的基础上来探求社会的周期性，这种做法几乎一直都是不成功的，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现象涉及的是“符号意义上的”而不是“实验意义上的”不相等中的相等；根据天文学的测量方法来看现在似乎缺乏周期性的社会过程，按照社会的时间来看，可能被发现实际上是相当有周期性的。这至少值得一试。只有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通常的方法确实包含天文学的（或者历法的）的现象与社会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可能的反对理由，即，这种种努力只是集中研究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才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对于

预料中的天文学的（历法的）和社会的次序之间的相关性，隐含的或已经得到表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最后，如果发现了这种相关性，那么，这种相关性的可能的意义是什么？事实是——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其意义一直遭到忽视——*当社会的和天文学的（"时间"）现象被联系起来时，在这些关系获得任何科学意义之前，这同一种天文学现象的其他社会相关性必定被确定*。否则，这些相关性就算存在，但仍然只是经验上的一致性，其在理论上仍然是没有结果的。如果我们要提高我们关于社会变革和社会过程的时间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必须扩大我们关于时间的范畴，以包括社会时间的概念。

第五章　社会时间的多样性[①]

乔治斯·古尔维奇

社会时间

社会时间是总体社会现象运动集中与发散的时间，不管这种总体社会现象是全球的、群体的还是微观社会的，以及它们是否被表达在社会结构之中。总体社会现象既产生社会时间又是社会时间的产物。它们产生社会时间，又在社会时间中运动和展开……因此，如果不对总体社会现象进行界定，也就无法定义社会时间。

“总体社会现象”（total social phenomenon）这一术语是由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创造的。他起先想到这一术语，是要对分解社会实在的做法提出三重抗议；最后，也是为了反对在社会与作为个体看待的人之间的对立。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在做了太多的区分和抽象之后，有必要”，莫斯写道：“在其不可还原性的意义上重构整体。”不同的社会活动（宗教的、巫术的、技术的、经济的、认识的、伦理的、司法的、政治的），只有作为是总体社会现象的同一整体的表现，才能……得到理解。与此同时，在一种凝固的状态中，按照莫斯的表达，打个比喻说，按照“僵尸”（cadavérique）状态来思考这些现象，会是极端具有误导性的。这些动荡的力量大于“制度的特例或总和，大于所有的组织”，甚至也大于存在于结构中的社会实在的所有表达。总体社会现象是生活的来源，也是社会行动，“集体性行动”的来源。最后，在这里，

① 选自 Georges Gurvitch,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trecht: Reidel, 1964.

莫斯同意卡尔·马克思，在总体社会现象与总体的人之间存在一种对应的趋势。不存在经济的人，政治的人，人作为法律的主体，作为伦理的能动者，homo faber 和 homo sapiens（智人）一个是与另一个分离开的。人只有作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总和存在。不能把这“总体的人”还原为他的精神生活，甚至也不能集体意识。他是社会的一个参与者，由团体所组成的阶级的一个参与者，我们（We-nesses）的一个参与者，同样也是一个主体：全部都代表总体社会现象。

通过这种相互的参与，正像人加入到整体之中一样，总体社会现象也参与到人之中。莫斯以最显著的方式表达了总体社会现象与总体人之间走向对应，或者，还有一种更好的说法是，走向“观点互换”（reciprocity of perspectives）的趋势。

为了更接近总体社会现象，接近这些人加入人之中的实际上总是在变化着的总体性，非常有必要利用莫斯没有指出来的参照点。这些参照点一方面就在于这些社会现象的纵深层次；另一方面也在于非结构的、可结构化的和已结构化的因素之中……总体社会现象对所有总体社会现象的纵深层次，诸如，生态基础、组织、仪式、礼节、惯例、风气、时尚、规范、社会角色、集体态度、记号、信号、符号、思想、价值观念、奋发向上、集体的精神等等，有着一种本体论的重要性。从社会的外壳——它的生态学的基础（地理学的、人口统计学的、工具的），经过组织、有秩序的行为、规范、记号和符号，到创新性的集体行为，到集体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再到直觉地把握或者创造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意识——总体社会现象有节奏的跳动，在一种不间断的来来去去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所有这些层次，彼此渗透，又彼此竞争，因为种种持续和非持续的跃动而激发出无穷的活力。此外，它们的着重点伴随着每一类型的总体社会现象而发生变化，不管这种总体社会现象是某一类的“我们”（We），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或者是一种全球的社会。更进一步，这些着重点也伴随着同一结构之内的事态而发生变化。平静的、激越的、革命的、日常的事务（葬礼、婚礼、打猎、出战、内部或外部的斗争）都影响着这些着重点。

这些非结构的、可结构化的和已经结构化的因素（结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表现为多样的层次）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永远的冲突，往往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同时性的和有组织的因素之间的激战。试图利用这些因素的

社会结构，彼此反对，它们是把握总体社会现象生命力的另一参照点。事实上，总体社会现象，虽然总是处在由所有这些因素和所有这些斗争所组成的网罗之中，但是，从来没有在它们的任何方面得到完全的表达，其所意味的东西总是比这些因素的相互渗透还要多，甚至很明显超过它们的总和。

总体社会现象的纵深层次这一方面与其结构和非结构因素的方面，它们之间一方面相互补充、相互牵连，存在着观点的互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背离、紧张、冲突和对抗。在对这些情况的研究中，我们会逐渐地意识到，总体社会现象的各个层次的非持续性与持续性，只有用辩证的方法才能得到研究。这是在其潮涨潮落以及属于它们的所有分裂和统一中把握社会总体性的唯一道路。在发现了总体社会现象以后，如果说莫斯没有足够清晰地对这一术语进行概念化，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承认辩证法。我们认为，社会时间的研究加倍地需要辩证法，没有它，无论是时间的概念还是社会实在都不能够得到清晰的阐明。

为了对社会时间的特殊性形成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在下一节，我们将试图勾画和解释不同的时间，它们在总体社会现象的不同纵深层次，以及在这些相同现象的非结构的、可结构化的与已结构化的因素之间的对立中相互关联又相互冲突。

社会时间的多样性

我们已经把社会时间界定为***既产生时间又在时间中消逝的总体社会现象运动的集中与发散***。具体说来，总体社会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现实的、整体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这是潮涨潮落的无穷的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一种情形。建立一种多维度的视角以把握总体社会现象的必要性，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换句话说，参考框架必须包括纵深层次和非结构的、可结构化的和已结构化的因素的复杂的作用。社会时间，被嫁接了极大的社会意义，它极端复杂，充满着许多预料不到的东西。社会时间在总体的社会现象中处于真正中心的地位，但是，不同的社会时间又在不同层次的缠绕中相互冲突，又相互结合。我们必须努力达成一种更具体的社会时间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研究社会时间的不同表现。

首先，必须对社会时间的多样的表现进行一种社会学的概念化。时间的社会表现，就其变化和相互渗透的情形而言，具有如此复杂的一种特征，以至如果没有一种操作性的框架，就根本无法对它们进行描述和研究，而这种框架唯有社会学的理论才能系统阐述和提供。这不是说唯有社会学才有资格来研究社会时间的频谱，它也为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知识，提供了一个研究对象。到底它只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时间的问题，或者它也还是关于这一时间的意识，正如它被直觉地把握、被理解、被符号化、被概念化、被测量或者被控制的那样，这些问题都不能作出过早的判断。所谓被控制，是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特定的结构化的社会框架中所展现的种种努力，目的就在于以一种等级化的尺度对时间的种种表现形式进行排列。无论如何，要分析现实的社会时间以及理解和控制社会时间的许多方式，就需要一种社会学的概念化。

在 *Déterminismes sociaux et liberté humaine*（《社会决定论与人类自由》）（1955 年；第 2 次修订版，1963 年）一书中，[①] 为了研究与社会实在的不同纵深层次、不同的微观社会群体以及包括一切的总体现象相应的种种时间，已经建构了关于种种社会时间的一种一般的类型学。现在，我们对“导论”中提到的这一类型学作详细的介绍。

（1）持久的时间（Enduring-time）（长久地、慢慢地持续的时间）：这里，过去被投射到现在和未来之中。这是种种社会时间中最有持续性的，尽管它保留有渗透着多样的意义的某些质的和偶然的部分。举例来说，生态学的水平是按照这一时间运动的，尤其是其人口统计学的方面。过去是相对遥远的，然而，它占有支配性的地位，被投射到现在和未来之中：后者因而有被遮蔽和否定的危险。它丧失了它自己的许多具体的和质的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它与所有其他时间相比都更容易用日常的量的测量方法来表达。不过，量的方法总是不充分的。亲属关系以及地方性群体，尤其是农村的，是那种总是按照这种时间行动的特殊群体。在社会阶级中，是农民阶级，而在全球社会中，是家长制的结

① Gurvitch, G. (1955) *Déterminismes sociaux et liberté humaine*. 2nd edn, 1963.

构，似乎在实行这种时间。

（2）欺骗性的时间（Deceptive-time）：在长久而缓慢地延续的外观之下，时间隐藏了突发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危机发生的现实性。在这种“令人惊诧的时间”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出现了，增加了不连续性。社会生活的有组织的层面是在这种时间中展开的。这是一种悖论的时间，在缓缓前行的同时又出现剧烈震荡。它是一种长期延续的时间，却又被突然的危机和未曾预料的爆发所分裂，被不持续性的洪流截断。这一时间属于政治“公众”，也属于大城市，以及消极的团体。在全球社会中，它是属于那种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权结构的时间（与其他时间一起），古代中国，尤其是埃及证明，这种结构曾经被普遍认为是会长久存在下去的，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却是常常发生革命。

（3）不规则的时间（Erratic-time）（由节奏的出现与消失之间的不规则的震荡所构成的时间）：在延续的时间内出现一系列令人费解的间隔和瞬间。这是一种最不确定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偶然性得以凸显，而质的东西和不持续性最终成为主要的方面。现在似乎胜过过去和未来，与之相联系的是，有时发现难以形成种种关系。举例来说，它是属于社会角色，以及属于集体性态度的那种时间，在这种时间中，受控制的社会角色常常与被压抑的、人们所渴望的，尚飘忽不定的和未曾被预料到的社会角色发生冲突。这是那种属于技术模式的时间，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中。在微观社会领域，这是属于群众的社会性，尤其是消极的群众的社会性的时间。这是属于处在转变之中的全球性社会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社会更是常常处在这种转变之中。

（4）轮回的时间（Cyclical-time）（在这一时间中，一种表面上的下落掩护着一种向自身的撤退，“一个点的舞蹈”）：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投射，突出的是持续性，偶然性被弱化，而质的方面得以凸显。这通常是属于教派团体的时间，这时，它们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质。这一时间显然盛行于神秘而引人入迷的团体（教会、教派成员、神秘而引人入迷的信仰）之中。它在古代社会中占支配性的地位，在那里，神秘的、宗教的和巫术的信念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巫术，如果与宗教比较，那么，很明显，就不属于这种轮回的时间了。

（5）迟滞的时间（Retarded-time）：是一种被延迟的时间，其展开要等待如此之长的过程，虽然未来已经实现于现在之中，但是，它总是

不胜任。在这种被延迟的时间中，不会达到持续性与不持续性的平衡。它们往往相差无几，但是，质的和偶然的因素得到加强。作为例子，这是属于社会符号的时间，当它们被明确的时候就总是已经过时。因为它们要等待如此长的时间，得到表达之后，要不了多久，它们通常就会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在社会性的种种表现形式中，社会的社会性常常强调迟滞的时间。社会顽强地坚持它的符号，提倡法律上的规则，法律的实施更适合在被延迟的时间内发生。在迟滞的时间内运行的团体往往是封闭性的，或者是那些外人很难进入其中的团体：例如，贵族、乡绅、其成员经过挑选的某些团体，尤其是那些经过特殊许可的职业，诸如学院或者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机构和职业。在全球的种种社会中，就封建的束缚达到的统治程度来说，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封闭性团体的典型。

（6）交替的时间（Alternating-time）：时间在延迟与前进之间交替，在这种时间中，过去和未来的实现在现在之中竞争。这里，不持续性强于持续性，不突出质的因素，也不增加偶然性。这是属于模式、规则、信号、记号和具有某种一致性的集体行动的时间。这里，延迟和前进无休止地斗争，因为它们两者势均力敌。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斗争才能……结束，而问题总是不确定。这通常是走向静止的趋势被摆脱的时候的种种社会的时间。这是属于经济团体的时间，至少当其他的因素没有干预到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是这样。最后，在资本主义开始的时候，这种时间在全球的种种社会形式中第一次获得了它的位置，当时绝对的君主仍然统治着整个社会。

（7）超前的时间（Time in advance of itself）（或者时间向前推进）：这是不持续性、偶然性和质性的东西一起击败它们的对立面的时间。未来成为现在。这是集体奋发向上的时间，是渴望理想和共同价值的时间，是集体采取充满果敢和创新行动的时间。这也是积极的大众和宗教团体进行反抗的时间。通常，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时间。正如在我的《人类自由的社会决定性》一书中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时间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中居支配性地位。

（8）爆发性的时间（Explosive-time）：在这种时间中，过去和现在都消融在马上就被超越的未来的创造之中。在这一时间中，不持续性、偶然的东西以及质的东西都达到了最大化，而它们的对立面却被减少到最小。这是属于集体性创造的行动的时间，只要集体性创造的行动是奋

发向上的行为，就总是会干预社会现实。但是，从一个基础性的层面来说，在革命的过程中，这种集体性创造的行动会变得显著而有重要影响。这也是属于创造性的圣餐仪式的时间。在中心化和多元化的集体主义之中，存在一种企图，就是使这一时间成为支配性的。在一种更具技术主义的形态中，至少存在一种主张，也就是使这种时间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挥一种支持的作用。不过，它通常只是表面上这样，因为它只是“巫师—学徒”的时间问题。爆发性时间，当它有效的时候，会危及全球和在这一时间运行的部分结构。爆发性的时间过程是危险的，它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以克服它所带来的危险。

现在，我们需要澄清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知道“如何去区分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时间与历史学所研究的时间”。换句话说，“在社会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之间存在区别吗?”

这里，有必要区别所研究的**实在**（**reality**），应用于这一研究的**方法**（**method**），以及作为前面两个因素密切结合的结果的**目标**（**object**）。为了结束在作为实在的历史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之间的混淆，必须认识到历史实在是社会实在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历史实在是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体，在其中，我们、群体、阶级、全球社会逐渐意识到它们自身以及它们改变它们自身的能力，并且去改变总体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相应的结构和组织。任何具有全球特征的总体社会现象，只要因为参与者的集体意志的激发，对可能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意识高涨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历史性的社会**（**historical society**）。历史实在，存在于所有历史方法和所有历史编纂学之外，因为其固有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维护和突出不持续性。

但是，如果我们从实在走到方法，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悖论。历史作为科学，运用的持续的方法比社会学多得多。社会学的方法是类型学的，而历史学的方法则具体化到顶点。社会学的目标是总体社会现象的类型学，涉及微观社会因素的类型，群体的类型，阶级的类型，全球种种社会的类型，以及在它们的大多数之内，总体社会现象的结构化和去结构化的运动的类型。后者被社会学以**重新构造的时间**（**reconstituted-time**）所取代，社会学所依据的是某一给定的现存社会的标准，是从某一具体的社会阶级或者某一特殊的群体的角度来考虑的。在这种重新建构的时间中，过去被变成了现在或者现在被变成过去。从方法论的观点

来看，社会学是非持续性的，与历史学相比，这种倾向要强得太多，因为它被导向对作为时间的多样性表现的类型、尺度和等级的不持续性的强调。而历史学则相反，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被导向去填补破缺和间隙，在社会类型之间铺设桥梁，在没有找到持续性的条件下从一种全球性结构过渡到另一种，方式是把超越于它们之上的不同的全球社会现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是通过重构总体现象之间的转变，进而重建时间的连续性来做到这一点的。

研究倾向于不持续的历史实在的历史科学中的持续性，以及研究与历史的实在相比更具有持续性的社会实在的社会学中的不持续性所构成的悖论，有三个来源：(1) 历史时间的模糊性；(2) 总体社会现象以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侵袭和颠覆社会的结构及其类型；(3) 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性质，独特，同时又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有第一点。我已经在两篇著述中讨论了这一问题：'La crise de l'explication en sociologie'（"社会学中的解释危机"），[①] 以及在我的一本书 Dialectique et sociologie（《辩证法与社会学》）之中。[②]

在这最后的书中，我最彻底地形成了我的观点。在我前面的著述中，我把历史时间的模糊性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已经消逝的东西，就是已经完成的，而社会学的时间是处在发生的过程之中的。我补充了我的观点，认为历史的时间是根据现存的社会和群体的标准而加以重构的，这就是历史学家被迫持续重写历史，使历史时间更有活力而且也更具意识形态性的原因。最后，历史时间的模糊性，诱导历史学"预见过去"(forecasting the past) 并把这种预见投射到未来之中。我仍然坚持，这些特征都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并不足以胜任来解释社会学中以及历史学中所研究的社会时间的多样性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学时间和历史学时间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历史实在，正如我已经特别提出的，是一个圆，内切于社会实在的那个更大的圆。社会时间在历史实在中的多样的表现之所以变得显著，是因为它们与普罗米修斯主义有着一种隐秘的关系，普罗米修斯主义强

---

① 参见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Vol. Ⅱ, 2nd edn, 1963, chapter XVI, pp. 462－481.

② Gurvitch, G. (1962) *Dialectique et sociologie*. pp. 224－232.

调由领先于它自己的时间，以及更具决定性的是创造的时间的不规则的跳动所组成的交替性时间。不过，在历史编纂学之中，实际的历史时间是根据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观来重新建构的，而历史学家总是被引诱选择这些时间中的某一些，而排除另一些。这样，历史编纂学的时间的表现形式并不与属于实在的那些时间严格对应，而是与时间的持续性的那些多样表现形式对应。因此，即使在历史编纂学的核心，时间多样性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对抗的。这种竞争远比研究不同社会和群体的历史学家所能复活的有戏剧性。历史学家不可能成功地复活不断展开的时间，除非以把他们自己的现状投射到这一时间为代价。如果不假定在属于这些不同社会的时间的不同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那么，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实现这种投射。

历史学的方法是个体化的，它必须强调事件之流的独特的和不可重复的性质这一事实，导致强化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它的确有助于历史学家强调历史时间的准无限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仍然大大不同于符合社会学兴趣的时间。但是，历史学家的时间，无论如何是特殊的，也总是持续的，不仅因为它是被投射的和被重新建构的，而且因为它确信属于这些不同社会的有着不同时间尺度的时间之间的迁移和转变。

因此，历史时间的这种辩证的模糊性，如同其多样性一样，是随处可见的：

（1）它存在于历史实在的时间与被历史学家所投射的时间之间的矛盾之中。

（2）它存在于历史时间的双重的多样性之间的竞争之中。所谓双重的多样性就是指真实的多样性与被解释的多样性。

（3）它存在于它们的多样性（既包括真实的多样性同时也包括被投射的多样性）与它们的总是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持续性之间的对立之中。

（4）它存在于历史时间的个体化和单一化之中，历史时间……只能用于强化它们的被建构的持续性。

（5）它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一直处在展开过程之中，某种意义上接近于被完成的时间，完全没有什么与处在掌控过程中的时间相同的性质。

（6）最后，它甚至存在于历史学时间与社会学时间之间的密切关系

之中。尽管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种种冲突和紧张的关系，但是，它们彼此都需要对方，它们有着辩证的互补性，通常是相互包含。

历史学家把他们在解释历史时间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意见提供给社会学家。他们也根据关于历史时间的具体丰富的变化及其不同的统一的发现提醒社会学家，属于不同类型的全球社会现象之间的持续的转变往往超越它们的结构。社会学家给历史学家提供参考性的观点来具体地分析不持续的社会时间。他们也帮助历史学家考虑他们自己关于时间的视角的意识形态性，揭示多么有必要去限制时间尺度之间的持续性。社会学家说明为什么历史学家会被他们的重构性的、投射性的和个体化的方法推到这种持续主义。

与历史学家相比，社会学家的心胸要开阔得多。最近，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声称，[①] 唯有历史学家才能“在白色的、强烈的、统一的光亮中”同时达到时间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这种光亮对历史学家的时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因为……［布罗代尔］相信唯有历史学家才能掌握超越“事件的最有限的结局”的秘密，而接触到“长久的延续性”。既然提不出什么论据来支持这一论点，如果它不是一个信念的东西，那么，它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之上，即，唯有历史学家才能研究有全球特征的总体社会现象，唯有他们才能说明这些现象超越于具体的结构，以及最后，也唯有他们才有能力去揭示社会时间的变化着的又是走向统一的相互贯通。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暗示过的……所有这些假设……只不过表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心理状态，在历史科学与社会学之间，偏爱前者，忽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只能认识到这样一种心态，为这种心态的存在表示惋惜，并且希望它将得到重新的评价，这样，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真正的合作才能建立起来，也才可能深入地研究社会时间的多样性及其各种各样的统一方式。

---

① 参照他的研究‘Histoire et Sociologié’，*Traité de Sociologie*. Vol. 1，1958；2nd edn，1963，pp. 96－97.

第六章　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①]

J. 大卫·刘易斯和安德鲁·J. 韦加特

（节选自 J. 大卫·刘易斯和安德鲁·J. 韦加特，“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社会力量》，60，1981 年，第 432—462 页）

自从索罗金和默顿发表关于时间社会学的创始性论文，[②] 引领我们探索时间的质的特征和意义以来的这些年里，许多有洞察力的著作和论文探讨了社会—时间的方方面面。不过，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没有给予时间问题以与其他的调查研究相同的重视，只是把时间作为其他社会学问题中的附带的东西来对待。因此，就一直缺乏关于时间社会学的理论著作，从而也就一直没有形成一种一般性范式，以整合这一正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子领域内的种种互不相同的经验研究。

更遗憾的是，许多社会学家并不把时间看作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往往以一种随随便便的方式来介绍社会组织和社会互动的时间维度。如果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中，社会—时间受到了应有的关注，那么，任何关于人类组织和互动的研究，除非考察了这些组织和互动过程的时间构成，不然，这种研究就不会被认为是比较好地完成了的。索罗金说道：“人类生活原本就是通过带有其自身的动机和目的的不同活动来竞争时间的过程。”[③] 推想起来，社会学家应该至少以与现代社会中绝

---

① 选自 Lewis, J. D. and Weigart, A. J. (1981)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 60, 1981, pp. 432—462.

②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见本书第四章。

③ Sorokin, P. A. (1943) *Sociocultural Causality, Space, Tim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p. 209.

大多数人相同的强度来体验这一竞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学家通常忽视时间在他们想解释其行动的那些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①

典型的时间划分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这些时间中的每一个都能依据物理的或社会的参照点来界定。物理学的时间扩展到与人类情景相关的过去和未来，我们有时会参照物理学的时间点，而且不只是几百万年以前或一个世纪以后。在这些范围之外的物理学—时间中的事件关系到的是天文学家和神学家，所涉及的其他人就比较少了。与通过诸如地球绕太阳作轨道运动这种物理学事件的相继来计算时间相比较，通过建立社会事件的时间参照，时间能够被人文化。当我们说："比赛之后我去见你"，我们所使用的是社会—时间，而不是物理的或力学的数学—时间，在那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可能会说："太阳在最高点的时候，我去见你"，或者"在正午 12 点钟"。正如索罗金和默顿所说的，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上的计时方式以相对同质的单位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而社会—时间是以变化着的节奏展开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出现暂停（如，睡觉或假期）。

我们既把时间体验为物理的演变，也体验为一种社会推移的过程。物理学—时间和社会—时间的这种混合，由我们使用日历的方式得到了清晰的展示。有意义的社会事件，诸如，基督之死，被当作是时间的标记，天文时间单位是依据这种社会事件而得到界定的。与此类似，当我们提及一个孩子的心理年龄时，我们同时考虑到了社会的时间、心理学的时间、生物学的时间以及物理学的时间。大家都知道，一个事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这一表达所传达的社会意义，要大于说这个事件发生在 1947 年。我们总是参照其他社会事件或周期来从时间上确定社会事件的位置，而使用专门的物理学时间手段去简单地对有意义的社会事件之间的时间"作标记"。

仅仅用物理学的相继来测量时间，社会的周期性就不会出现。社会的阶段和周期在社会的时间中是可以确认的，而在物理学的时间中却可

---

① 参见 Hendricks, C. D. and Hendricks, J. (1976) 'Concepts of Time and Temporal Construction Among the Aged,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C. F. Gumbrium (ed.), *Time, Roles and Self in Old Age*, New York: Human Science Press.

能表现出没有周期性。索罗金和默顿解释说：

> 在未加质疑地采纳天文时间标准的基础上来探求社会的周期性，这种做法几乎一直是不成功的，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现象涉及的是“符号意义上的”而不是“实验意义上的”不相等中的相等；根据天文学的测量方法来看现在似乎缺乏周期性的社会过程，按照社会的时间来看，可能被发现实际上是相当有周期性的。①

与物理学的时间相比，社会时间的不均衡的特点，在反思附加于事件的社会意义的丰富性时就显现出来了，举例来说，年龄12岁和18岁之间的美国一般男性的发展情况，与例如32岁和38岁的人比较会很不相同；或者，诸如大萧条这种大事件的影响，② 这些事件对个人的生活有着持久的影响。社会时间中的这些重要的点，进入到对人类世代的定义之中，在社会学上，这些点比用物理的—生物的时间来界定世代更有用。③

这一讨论不仅表明社会时间完全不同于物理学的时间，而且告诉我们社会时间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对社会时间的这种广泛的渗透性，我们可以通过找到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发挥作用的社会时间的不同类型而在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阐明。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一种合适的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的方面或层次，在社会理论家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多少独特的社会结构的层面或成分存在？应该怎样对它们进行描述？有些理论家建议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个体的、群体的、形态学上的、系统的和文化的方面或层面，④ 而另一些理论家所发现的社会结构的层次要少些，或者，他们对社会结构的层次作出了不同

---

①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26.

② Elder, G. H.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③ 见 Mannheim, K. (1952)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Ortega, Y, G. J. (1962) *Man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④ 例如，Udy, S. (1968) 'Social Structural Analysis',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的描述。大多数社会学家，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可能都肯定，社会结构能够，以及出于分析的目的，应该被构想为包含几个或多或少可以被清晰地界定的组成部分或分析层次——例如，个体的、群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层次。

因此，我们把个体的、群体的和文化的层次，当作是现存社会结构理论中最普遍的区分，我们把这三重区分作为形成社会时间类型学（a typology of social-times）的出发点。更确切地说，我们看得出来，这些层面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社会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self-time）；在群体层面，是适应于非正式互动的“互动时间”（interaction-time）和适应于官僚机构和其他正式组织的“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time）；以及在广义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循环时间”（cyclic-time）（日、周和季），这一时间贯通整个社会。

为了简化关于这一社会时间类型学的介绍……［我们首先］讨论……代表社会组织的微观层面的自我时间和互动时间，接着……分析组成有时间性的社会组织的宏观层面的制度时间和循环时间。这两个部分的目的是提供“一套标准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选择、抽象和组合”，以建设一种社会时间的“建构性的类型学”，促进社会学理论的发展。①

然后，我们转向一种实质性的社会时间理论，这一理论将对前述程序性问题作出有用的系统阐述，并试探性地指出这些问题得以产生、并可能部分地得到解决的社会过程。我们使用的三个关键的概念——嵌入、分层和同步——常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时间社会学的现有文献中，但是，每一个概念都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彼此也没有形成什么联系。我们的目的……就是围绕这三个最主要的概念形成一整套命题，这三个概念可能成为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最后……我们会举例说明一个研究者怎样才能从我们这套有内在关系的命题中演绎出可检验的假设。

---

① McKinney, J. C. (1966) *Constructive Ty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p. 25.

社会时间的生平的和互动的结构

自我时间

海德格尔断然地说："没有人就没有时间。"[①] 如果把这一陈述看作是关于作为过程或纯粹延续的物理学时间的一个论断，那么，它显然是荒谬的。当然，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也没有想到对这一陈述的解释会与社会时间相关。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对时间感兴趣，是因为它直接出现在孤独的自我体验当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时间"(self-time)。海德格尔希望指出的是，没有有知觉力的、理性的自我，也就不存在什么过去、现在或未来；甚至也没有什么此前或此后。这些结构是由我们的心灵强加于世界的。它们并不是被给定于存在中的，而是以被记起的过去、被体验的现在和被想象的未来这种形态而被投射在存在之上的。

此外，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实际上是四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一种可以称之为第四维的时间结构，海德格尔追随康德，称第四维的时间结构为"正在接近的接近"或"接近的状态"(nahheit)。[②] 它是我们所体验到的空间意义上的接近在时间上的相同之物。例如，当我们的汽车沿着道路快速行驶时，我们看到远处的物体慢慢地向我们靠近，快速闪过，然后又消失在远处。除了对物体的体验，我们也体验物体变近和变远的这个过程本身。这是对空间意义上的"正在接近的接近"（nearing nearness）的体验。与此类似，时间上的"正在接近的接近"，把过去和未来与存在于关于事件的体验之中的现在连接起来，而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之中的事件，是根据它们与被看作是现在的东西是近还是远来进行排列的。海德格尔把现在想象为在两个方向上伸展出去，拥抱过去和未来，而不是把它看作我们被放置其上的即刻的

---

① Heidegger, M. (1972) *On Time and Be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p. 16.

② Heidegger, M. (1972) *On Time and Be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p. 15.

尖尖的山脊。正如物体因为它们空间上的接近而有不同的呈现一样，事件在时间上接近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呈现，这与“相同的”事件在时间上很远有不同之处。时间上的恐慌，是对正在接近的时间的一种反应，它快速地靠近，已经超出了人完成现在的行动的能力。[①] 在社会快速变革的时代，自我的时间恐慌（temporal panic）成为文化上的“未来冲击”（future shock）。[②]

不像物理学的时间，自我时间不是同质的。在物理学的时间中，相当遥远的个体生活中的事件，在意识中可能会被描绘得就像对 5 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事情的记忆那样生动。科特尔（Cottle）[③] 把这种时间称为立体的时间（spatial-time），因为我们的记忆能够操纵时间中的事件，似乎它们就是平常的物体，能够被随意到处推动。立体的时间与那种线性的时间观形成对照，依据后者，事件是以一种不可违背的时间次序出现的。在立体的时间中，我们能够把一个过去的事件带到现在，并且使它进入一个不同的事件之中；历史和生活故事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在诸如下棋、做手术或攀岩这样完全使人全神贯注的活动中，自我体验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流动感，在其中，时间似乎停止了。[④] 一个人所具有的体验的类型，它们的时间上的接近，以及它们的立体的形态，确保每个人的“自我时间感”是独特的，而且对自我与他人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互动时间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发生直接互动，自我时间就会与一种不同类型的时间框架发生部分重叠，这种不同的时间框架就是“互动时间”（interaction-time）。它是一种主体际性的实在，因此，互动时间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每一自我的经验和控制之内。互动时间的流动依

---

① Lyman, S. M. and Scott, M. B. (1970)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② Toffler, A. (1971) *Future Shock*, New York: Bantam Books.

③ Cottle, T. J. (1976) *Perceiving Time*, New York: Wiley.

④ Csikszentmihalyi, M. (1975)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赖于（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他人的行动，当然，也取决于盛行的界定互动中适当“轮换”的规则。互动者相对的社会地位，使支配互动时间中进行轮换和其他时间间隔的规范成为必要。①

除了诸如进行轮换这种一般化的有关互动时间的文化规范之外，还存在着在如朋友、好朋友、熟人、陌生人、对手、死敌或销售人员-顾客等等这样的社会双边关系中形成的特殊互动规则。某人似乎在遵循着互动时间的规则，而他人却认为这个人的做法就他或她对他们之间假定的关系的界定来说是不恰当的（例如，在街上遇到一个朋友，只是用通常用来招呼熟人甚或陌生者的一句敷衍了事的“你好”来对待他），这个时候，立刻就要求某种类型的解释或者话语的弥补行为。否则，他们的关系就要经受重新定义了。②

影响互动在时间上的组织的社会时间，它的一个关键的结构特征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在时间上顺应更大的社会行动的。我们把这称之为时间嵌入（time embeddedness）。举例来说，一个人在交通高峰时间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停下来买报纸，这表明他用来与卖报纸的人闲谈的互动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反过来说，卖报纸的人知道他不应该试图与顾客有更多的交流。如果这样做，有可能从根本上打乱日常生活的有序流动，影响所涉及的人，甚至间接影响无数的人。被嵌入时间的行动在时间上的进程，即使出现小的偏差，也会引起可怕的后果，像一个国际机场被迫关闭短短数小时，或者一件大事落败，一大笔债务到期这样一些事例所产生的反响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时间的嵌入，反映在构成社会世界的多样的观点上，也反映在构成自我意识的多样的角色上。③

在那样一些事例中，一两个人，他们的时间紧紧相连（例如，“对

---

① 参见 Schegloff, E. (1968) 'Sequencing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0, pp. 1075－1095.

② Scott, M. and Lyman, S. (1968) '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pp. 46－62.

③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illman, M. K. (1972) 'Temporality and Role-Taking in G. H. Mead', *Social Research*, 37, pp. 533－546.

不起，我必须走了，因为我还有一个约会”），时间的嵌入会有力地影响互动的定义和过程。时间嵌入的紧密性因社会的阶级和年龄群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与一个人对未来的想象有密切的关联。科特尔和克兰伯格（Klineberg）[①] 注意到，与其他动物相比，人花在现在的时间比较少；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指向未来以及（在相对少一点的程度上）过去。单纯的娱乐的一个最愉快的方面就是它允许我们完全地活在现在之中，对流逝的时间的体验暂时停止了。有可能，小孩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是指向现在的，而年龄比较大的人的思想和行动则更多地指向过去。正因为如此，老年人在凝视不确定的未来时在情绪上较少忧虑，而就年轻的成年人来说，不仅其指向未来的时间眼界要长远得多，而且因为试图去控制迎面而来的种种事件而心事重重，不管这些事件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人们因为他们首要关心的是短时期的未来还是长时期的未来，[②] 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是采取宿命论的观点还是自我决定论的观点，[③] 而在显著的时间关注点上形成差别。与未来相关的时间结构上的这些变化，对人们管理互动时间和他们的生活的时间嵌入方式有着种种影响。一种极端的影响在一起变老的两个人的经验中得到证明。[④] 长时间的朋友或爱人，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相互之间有着种种内心的呼应、感动，从而使得他们的互动时间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他们共享的经验的这种特殊品质是在其他任何互动的情景中都找不到的。生活中的各种群体，比如说，家庭的成员，如果他们希望作为称职的家庭成员达成时间上的协调的话，就必须使他们各自被以不同方式嵌入的时间保持同步。[⑤]

---

① Cottle, T. J. and Klineberg, S. L. (1974) *The Present of Things Fu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② Polak, F. (1973) *The Imag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Elsevier.

③ Bell, W. and Mau, J. A. (eds) (1971) *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 New York: Russell Sage.

④ Schutz, A. (1962)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Nijihoff.

⑤ Kantor, D. and Lehr, W. (1975) *Inside the Famil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社会时间的制度的和文化的结构

不仅自我时间的结构被嵌入到互动时间结构之内，而且这两种微观层次的时间结构，又都依次被嵌入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组成的更大的宏观层次的时间秩序之中。这种嵌入性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在时间上的整合，从而产生了时间“分层”和“同步”的要求——在这里以及下一节，我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制度和文化结构之间的社会时间宏观层次结构内的区分，是基于社会时间的宏观层次结构在形态和范围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在每一制度领域内形成的个别组织（学校、工厂，等等），是在制度的范围之内来建构它们自己的时间表和有关时间的规则的。虽然它们会（而且惯常的确会）考虑它们必须与之进行交流的其他组织的时间结构，但是，在任何具体组织中支配时间使用的规范和处罚措施，只会直接延伸到该组织自己的成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以文化为基础的时间结构（日、周、季），这些结构总会以某种形态延伸到社会中所有发挥作用的成员中去。

在工业社会中，制度的和文化的时间结构在形态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文化结构，如日、周、季，以不断循环的方式，或者用我们的简单说法，以周期性的时间方式重复出现，而大多数的组织是按照线性的时间来操作的，在这种时间中，人与物穿越非重复的、呈现出不规则间隔的时间框架。因为这些理由，我们把关于宏观时间结构的讨论，区分为两个……范畴：社会时间的周期与制度时间的周期。

社会时间的周期

在社会时间中，未来不是像在纯粹的物理学时间中那样是无色彩的东西，是无结构的、空的扩展。相反，我们走近未来，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时钟的滴滴答答的声音所构成的一种平稳和标准的次序来度过的，而主要是把它看作是包含着部分可预见的，而且广泛地重复出现的种种社会事件的整块整块的时间所构成的一种次序。正是围绕这些一块一块的时间，我们建构起种种周期，它们把社会时间条理化为或大或小的按时间嵌入的结构。现在，我们转向描述我们的社会中的三种时间周期，它

们或多或少是建立在被定义为有意义的时间单位的三种自然次序之上的。我们把与这三种单位相应的社会周期分别称之为每日事务、每周常规以及一年各季。

每日事务

自然的一天，有着由黑暗和光明所构成的次序，以及由黎明、早晨、下午、傍晚、黄昏和夜晚所形成的进展的过程，它为日常生活中每天社会的时间结构，或者每天活动的范围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每日事务是以两件基本的事情为标志的，早上醒来，晚上入睡。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也只有它的大多数成员高度模式化地和可靠地从事日常事务，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齐美尔[①]观察到，便携式的时钟或手表帮助城市居民创造了一种精神生活，这使得他们能够以在农村的环境中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精确性来协调他们的日常事务，而在农村，时间是以更多的自然节奏（如公鸡打鸣）为标志的。与农民不同，城市居民必须使他们的手表与其他千百万人的手表保持同步。他们在由日常事务所组成的迷宫中的活动中，被如此细致地协调起来，以至每天社会的日常事务都是准确地按时开始的。[②] 在现代社会中，不遵守准确的时间，就是冒丧失社会能力的危险。因此，提供正确的时间成为不能够被拒绝的一种相互帮助的形式，即使是除了集体屈从于时钟时间以外，可能没有其他更多共同之处的城市陌生人之间也同样如此。

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严格的时钟时间的屈从成为一种异化，而这种异化形式正是从那些并不由时钟支配的社会事件的一般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教堂礼拜、学院课程、电视节目、午餐时间等等活动被协调地组织起来，它们准确地“填充”在分配给这些活动的时间之内，并且及时结束，而不考虑参与者的社会和心理的状态。通过这种把时钟时间具体化的做法，我们剥夺了社会世界的许多自发性、创造性和新颖性。随着越来越小的时钟时间单位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日常生活可能也就越

---

① Simmel, G. (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参见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来越类似于每日事务在其中被精确控制的总的制度的那种紧密的时间结构了。[①] 伴随这种紧密性而来的是越来越大的压力、紧张和对时间减少的担忧。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把时间具体化的时钟时间有这种产生压力的影响，但是，我们不仅期待对事件进行严格的时间控制，而且对这种做法作出积极的评价，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预定的活动被拖延、推迟或取消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愤怒和沮丧中清楚地看出来。也许，在许多社会中，较少机械化和科层化，社会生活的日常进程的自发中断，更受欢迎，或者至少威胁更少。

每周常规

每日事务又出现在另一种时间结构之内——每周常规。西方历法的7天一周，体现了6天劳动后，接着有一天进行宗教活动和身体上得到休息这样一种宗教的基调。把星期日设立为参加宗教活动的日子，是有组织的宗教在确定历法结构方面的传统力量的一个例证，其方法主要就是用创造宗教节日来培养宗教意识。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历法改革中使历法世俗化的尝试遭遇到坚决的抵抗，改革的失败证实西方时间结构的制度化根深蒂固。[②]

不过，最近几十年内，星期日的定义以及在那一天合法地进行的活动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职业的体育活动，现在填补了城市星期天下午可能有的相对空的时间段。星期天被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所占据的过程，因为电视的出现而得以完成。“主日”（the Lord's day）世俗化的另一个例子，是零售和贸易机构在星期天做生意问题上的战斗。虽然许多禁止星期日商业活动的法律已经被废除，但是，公开销售白酒问题上的战斗仍然在进行。最后，长久的改变进一步表现为参加教堂礼拜的人越来越少，以及把教堂礼拜改到一周的其他日子。在包括星期天世俗化的历史时期内，劳工运动赢得了一种较短的劳动周。这两方面的发展帮助把一周分成两个不同的周期：工作日和周末。

周末作为每周固定过程的支配性时间标记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非

---

① Goffman, E. (1961a) *Asylu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② 见 Zerubavel, E. (1977) 'The French Republican Calendar: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T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pp. 868—877.

常有象征性的承认。举例来说，国家纪念日，像华盛顿（Washington）和林肯（Lincoln）的生日，不管生日实际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现在都移到了星期一，这进一步强化了周末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暂停时间（a socio-cultural time out）的意义。[①] 周末作为一段不需要从事世俗工作的时间的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倘若医院的职员在平日对病人生病的症状给予恰当的关注的话，即使精神病院的病人似乎在周末也找时间不出现疯狂的行为。[②] 即使是必需的专业人员，像医生、牙科医生、护士，现在所有或部分周末都不当班。欧洲语言对英语中 week-end（周末）这个术语的借用，也表明了这一时间意义扩散的情况。

每日的事务因为一周的日子不同也发生了变革。“郁闷星期一”（blue Monday）的通俗定义，得到了关于美国男孩子们对一周中的每天所作的评价的一项研究的支持。[③] 一周中的几天被按以下顺序进行排列，分别给出积极到消极的评价：星期六，星期五，星期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最后是星期一。星期一的消极意义和影响，由这样一个事实作了肯定的说明，没有心脏病病史的人，在劳动岗位上突发死亡性的心脏病，死于星期一的足足达75%，[④] 死于家里的人，46%死于星期一。每周的固定过程意味着美国人是为周末活着，而平时的日子则真是度日如年。现在，的确大多数的特殊事件和休闲活动都被恰当地安排在周末，这样，对于那些在职业生活中休假日出现在平日而不是在周末的人来说，他们就不得不承受一个影响很大的职业上的劣势。很明显，每周常规过程的意义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要充分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以及我们的劳动，就需要我们把握一周的固定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意义，以及它们是怎样与制度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

① Lyman, S. M. and Scott, M. B. (1970)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② Melbin, M. (1969) 'Behaviour Rhythms in Mental Hospita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pp. 650—665.

③ Osgood, C. E. (1974) 'Probing Subjective Cul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pp. 82—100

④ Rabkin, S. W. (1980) 'Chronobiology of Cardiac Sudden Death in M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44, pp. 1357—1358.

一年各季

和一周的每天相类似，一年的每周也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像付账单这样的事来说，周被按时间组织成以月为单位的周期，但是，月，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较少有与它们在其中被把握的季那样的意义。[①] 尤其是在温带，四季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自然秩序，从极其古老的时代以来，人类就把这种自然秩序转变为有社会意义的周期。季节引出了来自个人的不同的情感反应，个人的这种反应又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举例来说，年轻的总经理在夏天炎热的月份搬到湖边的别墅那种凉快的地方，享受一个工作加娱乐所构成的一个闲暇性的季节。总经理是以一种与内城平民区的守门人不同的情感来过夏季的，对这些守门人来说，夏季带来闷热、潮湿、烟雾、固定的街头生活、不愉快的情绪以及在一个长长的炎热的夏天内喧嚣嘈杂的威胁。一年各季的意义因此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种影响是与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关的。[②]

伴随季节的周期而来的有两种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给季节的周期添加了独特的社会含义。首先，我们常常选择适合季节的食物、衣服、劳动和娱乐活动，因此，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天气和温度方面的变化。其次，每个季节的特征是由主要的节日来刻画的：圣诞节——新年，复活节，七月四日[③]，以及万圣节前夕——感恩节。每个季节的意义和基调都是由这个季节主要的节日设定的，无论我们是作出喜悦还是沮丧的反应，这种氛围远比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的要更浓厚地、季复一季地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在那项对年龄在 10 多岁的美国男孩的研究中，也包括他们对一年

---

① 见 Michelson, W. (1971) 'Some Like it Ho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se as Functions of Seas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pp. 1072－1083.

② 参见 O'Rand, A. and Ellis, R. A. (1974)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Time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53, pp. 53－61.

③ 即美国独立纪念日。——译注。

的周期中季节和月份的评价。[①] 冬天被评为最低，主要因为它是一年中温度最低的月份。对二月的评价比一月要稍微好一点，对十二月的评价又稍微积极一些。对三月的评价明显更加积极，对四月和五月的评价又稍微要积极些，这样，结合起来，把春季评价为第二个积极的季节。积极的评价在六月这里达到顶点，这是有关所有月份的评价中最高的，接着对七月的评价有轻微的下降，这是评价第二高的月份，关于八月的评价有一个明显下降，几乎到了三月份的水平。总的说来，夏天是排序最高的季节。在解释这些发现时，我们必须记得它们涉及的是十几岁的男孩。属于其他社会地位，或者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人，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评价和排序。

关于一年各季的这一讨论，最后，还必须涉及时间的周期结构，这种周期结构更直接地建立在宇宙论的秩序基础上，也与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有必要形成由活动和不活动构成的交替性的周期有关。因为季节的次序客观地存在于自然之中，这样，它们就可以被普遍地赋予时间意义。通过象征性的转变，这些次序就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变成为在这一具体时间我们为什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思考、感受或作出决定的理由的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相信占星术解释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的塑造会不同于不相信的人。这样，一个基督徒对于一年各季、每周的常规或者每日事务结构化的方式，也不同于犹太人；或者，一个 70 岁的农夫，会不同于一个 26 岁的木匠学徒。

时间流逝的时候，周期性的和重复性的时间对于体验稳定性和同一性来说是必要的。白昼跟随着黑夜，黑夜过去又是白昼；星期周期性地循环；一年各季也在重复它们自己。宇宙伟大的时间次序和永恒是通过周期而得以体验的，种种周期为重复性的时间提供了基础。

制度性的时间表和个人的经历

关于个人时间（personal time），我们有两种体验。首先，我们与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共享生命的开始、成长、变老和死亡。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自然的阶段被象征性地转变为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来界定的

---

① Osgood, C. E. (1974) 'Probing Subjective Cul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pp. 82－100.

阶段以及个人的身份。[①]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第二种生平，社会生平（social biography）。由生物学的“生命之种”所组成的时间结构[②]控制着我们的身体的生平。极端的生活方式会稍微降低或者加速衰老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生物钟都会稳步向前。

一种非常不同的时钟类型——社会时间——控制着我们的社会生平。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投票，饮酒，开车，参战，上学，结婚，参加政治上的竞选以及退休。在我们的社会中，在我们被界定为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之前，我们在身体上已经成熟。两种生平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把我们的社会中的十几岁孩子和年轻的成年人置于一种尴尬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把数量庞大的这些人赶到大学里去，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含糊的环境，在这里，处在心理和社会暂禁期的他们，被便利地储藏起来，直到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两种生平达到同步为止。

社会为个人铺设一条时间轨道，我们就从这一轨道出发，形成恰当的时间表和计划。[③] 种种计划迫使每个个体通过经历种种资格和地位而建构一种生平，这种资格或地位部分是由自然所决定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社会生活的约定结构所决定的。这种生平时间是由个人的“地位演变”[④]来表示的，而“地位演变”意味着在社会中可以得到的种种不同的地位和身份。很显然，这些地位是否可以获得，受到年表上的年龄、性别、种族和所出身的社会阶级的强烈影响。这种因素决定着在社会时间的什么点上，如果有的话，这些地位和身份将成为对个体来说是可以得到的。得到这些东西，不只是得到这样简单的事实，形成得到这些东西的时间表，从许多方面看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社会分层和流动方面的一般研究都很少意识到这一因素。[⑤]

个人以一种被认可的次序经过彼此在意义上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地

---

① 参见 Erikson. E. H. (1959)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Psychological Issues*, 1 (monograph), 1－171.

② Ward, R. R. (1971) *The Living Clocks*, New York: Mentor.

③ Roth, J. A. (1963) Timetabl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④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L. (1971) *Status Passage*, Chicago: Aldine.

⑤ 见 SanGiovanni, L. (1978) *Ex-Nuns: A Study of Emergent Role Passage*, Norwood: Ablex.

位演变的过程，这种过程构成为一种经历（career）。[①] 我们这里用的不是职业世界中关于经历的一般定义，而是用这个术语来指“个人用来把他的生活看作是一个整体，并且解释他的不同品质、行动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意义的那种变化着的视角”。[②] 在这种意义上，经历是指构成一段统一时期内其地位的次序，像高中的四年或者一个母亲分娩孩子的经历。在社会时间的一个时期之间，人们形成一种视角，通过这种视角，他们不同的经历被给出特定的评价和被赋予特定的意义。而且，随着个人经历的变化，每一段经历都要经受重新的评价。

经历带来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批判意识：随着个人不仅经历在诸如中学这样一个机构之内从一个身份到另一身份的过程，而且经历从中学到变成劳动力，到退休回家的从机构到机构的过程，社会生平的时间像一个钟表，向前奔跑或在滴答声中溜走。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时间迅速地从出生跑到成年，以后就要慢很多了，因为年老的个人很明显经历较少受重视的过程，或者说经历在社会的意义上较不重要的过程。不过，身份状态变化的速度在往后的年头里又变快了，因为人们通常要经历退休、配偶死亡、健康状况下降、变化了的生活安排，等等。

大多数的职位都有它们自身的由社会所规定的持续时间。每一职业都有它的时间表，[③] 这包含给每一个人分配正常的时间去履行被指派的职位的计划。以较快或较慢的速度经过某状态，导致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或年龄上的偏离，被看作具有特别的个人特点，从而导致离开了按年龄分级的正常状态。[④] 被作为不正常挑出来的可能性，通常就足以马上迫使个体要么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要么作出超常的努力去符合时间表——这是使社会活动听从社会时间、历法时间以及时钟时间的命令的又一个例子。在这里，时间表是按次序排列的，不符合某一时间表的计划，那就要求某人下一次提前或推后到达。

---

① Hughes, E. C.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New York: Aldine; Roth, J. A. (1963) Timetabl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② Hughes, E. C.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New York: Aldine, p. 137.

③ Roth, J. A. (1963) Timetabl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④ SanGiovanni, L. (1978) *Ex-Nuns: A Study of Emergent Role Passage*, Norwood: Ablex.

考虑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平。婴儿出生在一所医院里，一个被高度组织起来的环境，这种环境按标准化的身份设定称呼。甚至在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他或她可能就已经体验到了保育园、日托中心或者幼儿园的那种官僚化的时间表。每一个这样的机构都有有效的、标准化的完善的指标，以及相对清楚的关于进步的衡量标志。接下来的就是12年、甚至25年的预期的社会化，在这个期间内，个人的教育经历是在由种种学校所组成的官僚化组织之内展开的。

当这个人进入到职业领域时，一种不同但同样需要的时间表就出现了。在像艺术家或作家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与大多数其他的工人，尤其是蓝领工人之间的一项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相对地说不受时钟时间的控制[①]：他们不会那样受一种被严格地规定的日常事务所限制。[②] 与工厂工人不同，自由职业者能够避免每日高峰时间交通的折磨，避免下班后傍晚5点到6点钟在食品杂货点排长队，尤其是避免了投入到劳动中的呆板的时间，以及以一天、一周或一季度为基础对时间进行分配。从社会分层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无形但却真实的好处。的确，有些人为了拥有这种好处，愿意以更实在的利益，包括金钱来进行交换。

在我们所描述的时间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确定的分层。一般地说，组织的时间优先于互动时间，而互动时间又依次要求优先于自我时间。举例来说，两个雇员，如果他们经常使他们午餐时间的谈话（互动时间）延续到被安排用来吃午饭的时间（组织时间）之外的话，那么，他们就可能陷入与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麻烦之中。与此相似，一个可能冒被看作相当鲁莽的危险的人，可能是在一次谈话当中（互动时间）来开始做一份食品清单（自我时间的活动）。当然，存在特殊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时间分层的这种排序可能要求颠倒通常优先的次

---

① 见 Sennett, R. and Cobb, J. (1973)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Vintage.

② Zerubavel, E. (1979a)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Zerubavel, E. (1979b) 'Private-Time and Public-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58, pp. 38—58.

序，但是，这种例外相对地说是不常见的，而且要求进行适当的解释。[①] 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要求社会分层，而且存在有力的赏罚来确保这一分层体制的稳定，因为分层了的时间也是彼此相互嵌入的。

官僚化的时间表的严格性是组织时间指向未来的特性的一个结果。就其面向未来的时间指向而言，与大多数的个人相比，组织（在韦伯所说的意义上）是更加一致、更具系统性，也是更理性的。官僚机构持续地评估完成目前的项目所需要的时间，以及预先指定有未来展望的时间表。一旦以这些时间表为基础，资源得以分配，工人们就被强制去遵守时间表。虽然紧凑的时间结构更是官僚化组织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组织的特征，但是，即使是自愿性的组织，一旦某人在这个组织中承担了一个核心的角色，那么，它们也总是对这个人的时间进度表以及总的时间投入情况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②] 组织时间中的严格性的基本社会根源，是其高度的分层和嵌入。在工厂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组织中，生产是按照由许多时期和阶段所构成的一种固定次序来安排的。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花的时间太长，这就会打乱其他阶段的时间安排。对于任何试图在一个组织中灌注更大的时间灵活性（例如，“灵活的时间”）的人来说，这都有着清楚的政策含义。

概括起来说，组织时间有着在其他类型的社会时间中所发现的相同的基本维度。不过，主要的区别是，在组织时间中，这些维度（未来指向、“分段”、分层、嵌入性等）得到更大程度的结构化，所包括的没有界定的或者自由的时间也要少得多。这是组织时间的众多特征之一，它使组织时间难以与持续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同时性社会时间达成一致。自我时间、互动时间、生平的或履历的时间、组织时间，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时间，已经足够难以单独管理的了，但是，我们还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在物理学的时间或天文时间的个别点上，强加于我们的交叉在一起的时间要求这种非常复杂的任务。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努力保持这些时间在物理学时间中的那种分离的状态，因为它们都有着那种难对付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侵占其他的时间领域。

---

① Scott, M. and Lyman, S. (1968) '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pp. 46—62.

②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走向一种适应于时间社会学的范式

对社会时间的探究，是对人的社会性的一种基本特征的探索，它极具诱惑力，而且从根本上是没有止境的。时间，像空间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深刻的过程或结构，而人类生活是与作为一种在象征的意义上形成的环境而获得意义的自然和符号实在[①]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仅仅触及社会时间的几个方面。基本的考虑是，社会时间应该被解释为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人的意义的另一种形式，虽然受有机体和自然的物理实在性的限制，但它是每一社会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组成部分。[②]

我们强调了社会时间的三个特征，它们是我们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类型学的核心：嵌入、分层和同步化。嵌入（embeddedness）意味着构成嵌入的人类生活和社会行动，是在它们的实际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行动和意义的复杂交叠。一个表面上被赋予特殊权力的中年男性专业人员，当他作出不可避免的转变，进入到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时，他就会意识到属于一种中年危机的种种紧张。中年人的体验的一个构成性特征是社会时间的嵌入性：他认识到那种产生忧虑的基本的事实，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不久就会死，在他的生命中有生产能力的年头只能指望有十五或二十年了；这种逐渐清晰的意识嵌入到不管是长或短，但是，假定在他的余生一直还会过下去的婚姻之中；被嵌入到这些社会时间之内的，是他的生涯中这样一个阶段，就可预见的未来来看，这个阶段已经是一个稳定的时期。这是他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而孩子的教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贵得多。就他的身体来说，这也是活出年轻人的想

---

① Harre, R. (1978) 'Architechtonic Man'. in J. H. Brown and S. M. Lyman (eds), *Structure,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rokin, P. A. (1943) *Sociocultural Causality, Space, Tim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Zerubavel, E. (1979a)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象力和完成成年人的计划的最后的精力旺盛的时期。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他感受到时间的恐慌。①

时间嵌入作为这样一种机制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会经历不同的情景，但是，总是需要体验到自我的持续性，一种持久的身份。时间嵌入，对于体验复杂性越来越强的现代自我的统一和持续来说，是一种似合理的结构（a plausibility structure）。② 在传统的宗教社会之中，自我时间被嵌入在一种超验的时间之中，所谓超验的时间是指死后的生活、永恒或者群体的集体生活。宗教的社会组织，为贯穿一生以及死后的自我持续性和身份的意识，提供了似合理的结构。③ 在世俗的和多元主义的现代社会，时间嵌入局限于由生命历程、事业、机构的时间表以及个人的计划所构成的世俗的种种实在；它提供了一种很不确定的主体性和自我的持续性，但是，它是现代人可能得到的唯一一种似合理性。④

社会时间的第二种特征是它的分层。从经验上说，正如现象学家所强调的，时间和空间是从作为那种（0，0）坐标的与自我同在的被感受和嵌入的现在开始延伸出去的。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在迪尔凯姆所说的意义上研究时间的组织，研究时间组织的客观的和强制的事实性，以及因为符合或者偏离那种时间而出现的组织性的权力或者互动性的赏罚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时间是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转交给个人的。国家告诉个人什么时候他们能够投票、结婚、签订合同、拥有公民权或者取得社会保障的资格。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自我时间就像一个实验性的、不完全透明的羊膜，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且通

---

① Lyman, S. M. and Scott, M. B. (1970)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② 参见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③ Bellah, R. (1968)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D. A.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3, New York: Macmillan; Berger, P. (1967) *The Secret Canopy*, New York: Doubleday.

④ Berger, P., Berger, B. and Kellner, H. (1973)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Toffler, A. (1971) *Future Shock*, New York: Bantam Books.

过它而体验构成我们的经验的无数客观的和强制性的时间。

作为人的生活的一个中心的结构特征，社会时间分层（stratification of social-time）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使关于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体验似乎可以成为一种单独的实在。人的生活的客观性部分来自于它在社会时间分层中的位置，在这一分层体系之中，自我此刻作为一种自由的个体行动，此刻也遵循着国家的时间表，此刻同时又执行着一个机构的职业时间规定。个人行动的客观预见性是由组织每个人的生活的客观社会时间所保证的。适当满足在一个社会中被分层的时间安排的预期，保证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同时，展示了他或她的正常状态。不能够按照社会时间的分层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会落下懒惰、无能、不值得信任和显然彻底自私的恶名——对不能根据现代科层化社会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的那些人的坚决的、清教徒式的反应。这种否定性的反应，尽管解释是错误的，但也是有理由的：这不仅是浪费时间，七大罪之一的一种形式；[①] 而且，缺乏一种共同的社会时间的分层，就不可能去进行计划——一个现代组织和心理的关键特征。

作为人的生活的第三个结构性的特征，同步性（synchronicity）是从时间的嵌入和分层中派生出来的，它是作为一种使人的行动和计划的合理性成为可能的机制而发挥作用的。合理性涉及作为达到未来目标之手段的行动和期望的秩序化。这种秩序是一种主体际性的结果：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实在，借助它，许多的个人对未来形成相同的理解。使人们的生活同步化，这是一种公共的成就，它把从被嵌入的时间中形成起来的个人存在的那种联系不了的个体性，与由分层化了的社会时间所构成的社会秩序的不可规约的集体性结合起来。由千百万公民的数以亿计的各式各样行动所持续地反复创造出来的整个社会的同步性，使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成为可能。挫折、罢工、恐怖袭击、地震以及其他在社会的意义上不同步的事件，经常挑战着这种公共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正式组织是同步化的奇迹，这种奇迹表现为登月工程的那种细分为毫秒的时间组织，或者，一条流水作业线的经过细心计算的速度。这些组织也是种种机构中最合理的——只要它们仍然保持同步

---

① Lyman, S. M. (1970) *The Seven Deadly Si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一致！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被分层和嵌入的时间不断增加的同步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个人的生活的确就是通过与它们所处的有结构的环境保持同步，而获得符合于它们所属的历史时期的合理性。[①] 这样，被分层的时间的客观的和强制性的结构，就成为自我时间的主观的和有意义的嵌入。个人同步地生存，因此，也可能与他们的历史时间保持同步。社会时间的外部结构，成为每个人的存在时间（existential-time）的理所当然的正式形式。[②] 他们感到很自在。

当我们关于社会时间的类型学在理论上与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整合起来时，我们就有了一些建立一种正式的社会时间理论所必要的建筑材料了。为了具体说明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我们把隐含在到现在为止所作的讨论中的关键命题和推论抽象出来，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以提纲的形式来表述，当然，这只是一个起步，可以由未来的理论和经验劳动来进一步推敲和改进。

命题 1

在物理学时间之中的两个点之间嵌入时间的事件数量越多，那么，被感知到的两个点之间的时间距离越短[见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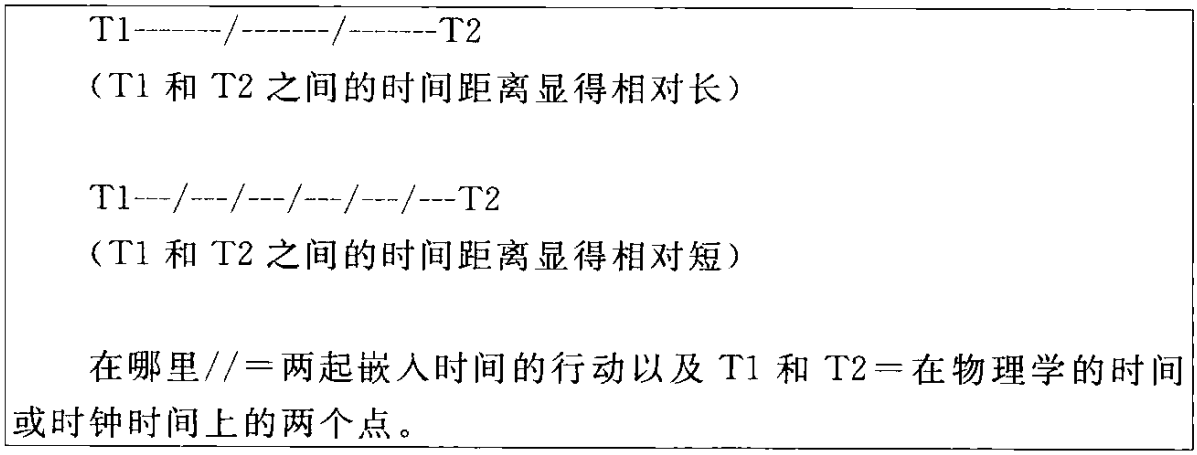


图 6.1　嵌入时间的事件与被感知的时间间隔

① Harre, R. (1978) 'Architechtonic Man'. in J. H. Brown and S. M. Lyman (eds), *Structure,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 Cicourel, A. V. (1974) *Cognitive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推论：

1.1　通过增加更多的社会角色来增进个体的社会整合，使得他或她感觉社会时间的速度在增加，因此，缩小了被感觉到的物理学时间的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1.2　因为老年人有着更长的时间“地平线”或记忆，因此，与8岁大的小孩相比，一年对80岁的人来说，在时间上的间隔显得要短。

在一群互动者之中，如果在某一给定的一小段物理学时间之内被嵌入的事件的数量增加，那么，行动者之中的相互依赖也随之增加。举例来说，如果那一连串被嵌入的行动要在时钟时间的某一固定的时期内完成，那么，人们就有必要在时间的准确的以及可预见的点上（如，约定的时间表）达成互动。只有当所涉及的不同社会时间同步性增加的时候，被嵌入的互动时间的这种协调才有可能出现。所以，时间嵌入性的社会结果的分析，就直接导向同步性的问题。

正如迪尔凯姆所注意到的，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过程一直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刻画这种有机团结方式之特征的不同社会角色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得到了最明显的表达。与其他制度领域的社会组织中的变革一致，一直存在着社会时间（自我的、互动的、制度的—组织的）的全方位的重组。一般地说，这些变革可以被描述为社会结构的任何层次的因素之内和之中时间同步化上的一种量的飞跃。同步化的概念是指把不同的时间表协调在一起的过程，这样，高度复杂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行动的次序，就会按照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的社会时间有计划地展开。

探索这种总在增加的同步性的社会结果，不仅对于社会总体的组织，而且对社会的个体成员的意识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这些结果可以用下面相互关联的命题和推论来展示：

命题 2a

行动者的相互依赖越强，时间同步的必要性越大。

命题 2b

时间同步的难度是所涉及的时间表数量的一个正指数函数。

推论：

2.1 一种社会制度中（时间）同步化的压力增加，互动时间和组织时间的规范在数量和种类上也会增加。这会产生回馈性的影响，进一步增大同步化的压力。

2.2 一个组织的某一附属单位中的同步化，会在相关单位中产生同步化的压力。

2.3 随着同步化的进行，越来越小的物理学的时间单位获得了与社会相关的意义。

2.4 随着越来越短的物理学时间获得与社会相关的意义，被感觉到的物理学时间的“稀缺性”会增加。①

2.5 随着被感觉到的物理学时间的稀缺性增加，某人生活中的事件被感觉到的控制却会减少。这种被意识到的控制的丧失最终会导致忧虑、沮丧，角色无能的情绪，以及类似的时间恐慌的心理症状。②

---

① Iutcovich, M., Babbitt, C. E. and Iutovitch, J. (1979) 'Time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a Developing Nation', *Sociological Focus*, 12, pp. 71－85.

② Bull, C. N. (1978) 'Chronology: The Field of Social Tim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0, pp. 288－297; Cottle, T. J. (1976) *Perceiving Time*, New York: Wiley; Lyman, S. M. and Scott, M. B. (1970)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O'Rand, A. and Ellis, R. A. (1974)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Time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53, pp. 53－61.

如果，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现代社会中对时间同步性的持续的要求导致被感觉到的时间稀缺性增加，那么，人们就应该能够对社会时间应用相同的社会分层的原则，这一原则一直被应用到其他稀缺的资源上。一种资源的稀缺性增加，它的价值就会增加，因此，获取这种资源的竞争就会得到强化。如果可以利用的时钟时间的量基本上是固定的，那么，对时间这种资源的竞争，确保用于某一社会时间（自我时间、互动时间、组织时间）的时钟时间的任何重新分配，正如上面已经证明的，都要求调整在其他社会时间中进行分配的时钟时间。所以，社会时间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接近零和的游戏。因为对时钟时间的需要总在增加而其供给是有限的，所以，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案是形成社会时间的分层（stratification）。在下面的命题和推论中，我们给出时间分层对时间嵌入和同步性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某些社会影响。

命题 3

社会时间是依以下的层次来分层的（按重要性从最高排到最低）：循环时间、制度的—组织的时间、互动时间、自我时间。

推论：

3.1　时间稀缺性一般向下传递到社会时间的各层次之中。（举例来说，组织时间内被感觉到的稀缺性，是通过增加互动时间的稀缺性（例如，超时劳动）来解决的，而互动时间稀缺又会通过相同的过程产生时间压力，导致自我时间的更大的稀缺。）

3.2　获得更多自我时间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回避或逃走，而不是通过计划。[①]

3.3　职业角色非人格化的程度越大，在劳动环境中可利用的自我

① Cohen, S. and Taylor, L. (1978) *Escape Attempt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时间就越少，而界定职业的时间结构的周期就越严格。①

3.4 （与命题2a，2b，以及它们的推论相关联）在一个社会体制中，如果时间嵌入的广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同步性的中断次数增加，那么，社会时间的分层也就变得更正式和严格。②

3.5 与其他社会分层体制一样，社会时间的分层也得到意识形态和种种惩罚手段的支持。

在下面一节，我们提出一些可行的实地调查的策略，可以用这些策略来从经验上检验我们的与时间嵌入、同步性和分层之中的理论关系有关的命题和推论。这一讨论将简单陈述我们的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其中的具体研究会对我们的类型学和命题或推论作出进一步理论提炼的一些领域。

这一理论对研究的影响

如果，正如我们的理论所断定的，社会时间在日常生活的平常过程中彼此相互嵌入，那么，用来研究社会时间的理想的研究场所就是这样一些社会环境，在其中，社会时间的每一种类型都有着极大的独特性，并可以在其操作中加以观察。正式组织（如，学校、医院、军事机构等）提供了这样的场所。这不是说组织时间的强制不会进入到像周末朋友聚会这样的相对来说非正式环境的社会互动之中。组织时间的强制是会发生这种作用的。但是，在这些非正式的环境中，研究社会时间之中的关系的方法论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每个个体都有着对形塑互动时间活动的组织时间的不同理解和把握。与此相对照，单一的组织时间结构支配着正式组织中的互动，这种时间结构的特性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相对明显的。除非时间社会学中的理论和研究超越了目前这种还不令人满意

① Zerubavel, E, (1979b) 'Private-Time and Public-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58, pp. 38－58.

② Iutcovich, M., Babbitt, C. E. and Iutovitch, J. (1979) 'Time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a Developing Nation', *Sociological Focus*, 12, pp. 71－85.

的水平，不然，我们就应该把研究上的努力首先集中于最简单的个案。泽鲁巴维尔[①]关于医院生活的时间结构的研究，具体说明了这样一种优势。

选择研究场所来对我们的命题以及推论进行经验研究的第二个考虑，可能是在不同类型的社会时间之中时间紧张或调整的时期，社会时间的组织当中目前出现的时间同步中断的程度。通过研究正经历在其时间组织中的重大变革的种种组织，我们就能更好地探索嵌入、同步和分层发生问题和得以重组的过程。

让我们具体说明一个可能是这样的研究环境，在这里，我们的理论的因素能够得到有效的检验。一个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工业制造企业重组它的工厂前后的一段时间。举例来说，如果这家公司在改进它的生产线或者更新它的生产技术，那么，这种机会就会出现。新的时间表会出现，会增加新的身份—角色，其他的也会被重新界定，而社会时间的比较旧的模式可能不再与工厂的新的组织保持同步。在对旧的组织所有类型的那些社会时间结构——与在组织的设置过程中发生的变革中出现的结构相冲突的——进行重新评价时，一种之前—之后的研究设计可能会有帮助。关于这种研究的测量工具，可以把调查问卷、结构式访谈以及直接观察结合起来使用。

把注意力转移到在这样一种研究环境和设计中对我们的命题和推论进行可能的具体的检验，那么，可以演绎出几个可以检验的假设。根据命题 1 和推论 1.1，我们能够假设：作为工厂重组的结果，其劳动得到扩展的雇员（即，他们有了更多正式的责任，必须在某一小段给定的时钟时间内与更大数量的个人进行互动，等等），将感受到与变革之前相比，钟表之间的点之间的距离更短了。这可以通过由这样一些项目组成的一种差不多的刻度来进行计量，例如："当我看表的时候，它总是比我可能一直期待的要迟。"我们也可以假设在管理者与流水线上的工人之间所出现的相似的区别。

根据命题 2b，我们假设：对于工厂的与很大数量的其他附属单位有

---

① Zerubavel, E, (1979b) 'Private-Time and Public-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58, pp. 38—58.

着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的那些附属单位来说，将会出现更大数量的对延续到更长一段日历时间之外的组织时间表的修正，这种数量的增加是指数的，而不是线性的。研究者可能不得不进入现场，进行田野劳动，以决定除了那些在科层化的等级和规则中正式承认的东西以外所存在的非正式的相互依赖。正式时间表修正的数量以及时间表不稳定的总的持续时间，是更容易被观察和量化的。

随着组织中同步化的压力增加，命题 2a 和 2b 的推论应该就变得可以应用了。我们知道，同步化的压力是按照一种时间表而逐渐增加的，也就是说，这种时间表必须与数量在增加的其他时间表保持协调。这样，根据命题 2b，我们假设：当越来越多的时间表必须被考虑进来的时候，对要求多种时间表保持协调的计划中的事件来说，可以得到的自由度会戏剧性地收缩。推论 2.1 预见：组织作出调整以应对这种压力的一种途径，就是收紧调节社会时间的规范。举例来说，被允许喝咖啡休息的时间或者其他休息的时间在数量上可能变得越来越少，持续的时间会变短，或者，将作更严格的计划。根据推论 2.2，我们能够预见：当上层的压力在增加的时候，组织的较低的层次（秘书、园艺工人、领班等）也会直接感受到同步化的压力。推论 2.3 可以通过比较组织变革前后个人日常约会的时间表来检验。最后，在推论 2.4 和 2.5 中所描述的心理学上的相关性，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来调查研究。

根据命题 3 及其推论，我们假设：组织时间的这些中断对互动时间（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外部的）以及对构成组织的成员的自我时间，都有衍生性的影响。根据推论 3.1，我们能够预料到组织中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确定变化。随着被感知到的组织时间稀缺性增加（可以通过这样一些调查问题来测量，如，“我似乎很少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每天的劳动”，或者“我每天达到的劳动目标似乎比以前完成的要少了”），个人在劳动的时候参与的互动时间的活动将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将走向短的、与组织相关的手段性的谈话。这一变量可以通过对公司内的电话通话长度的时间统计，以及通过做谈话以及办公室备忘录的内容分析来测量。许多其他的影响，从越来越多的劳动午餐到越来越少在劳动之后喝酒和聚会，都可以被看作是时间分层强化的结果。在某个时间点，旷工会增加，这是引起紧张的疾病的一个结果（推论 2.5）或者是用来逃避的自我时间的要求（推论 3.2）。最后，但是，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外

出的时间会越来越稀少，这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以及朋友圈子的变化。

为了从经验上检验从我们的理论中得出的命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策略。从我们的建议来看，很明显，因为这一理论涉及社会结构的多种层次，因此，它也孕育着许多潜在的经验解释。此外，这些解释对调查研究、访谈、内容分析、参与性观察以及其他标准的社会学方法论都是有意义的。虽然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设计，但是，对这一初步的设计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将产生富有成果的研究机会。

结　论

由于制度的理性化在加强，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也在逐渐增加，这样，事件在组织时间、互动时间和个人时间的结构上的嵌入，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结果，在组织时间表和个人生平之内的行动和行动者的同步，更越来越成问题。这一问题通常只能通过从某一其他形式的社会时间那里抢夺时钟时间来解决。这样，社会时间的分层变得越来越明确，导致社会时间与遍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发生冲突，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因此，绝非偶然，形成一种社会时间的类型学，以及对我们的理论在研究上的意义进行专门阐述，将深刻影响着范围广泛的社会学的专门研究，这也表明社会时间对社会学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第三篇

资本主义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①]

奈杰尔·思里夫特

机器造就了工业人，这只是一个神话；工业主义，从其最初的起源来看，是计算理性在生产秩序上的应用。[②]

引　言

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描述为从建立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由劳动和经济中的工具性行为所组成的体系，一个是由交往和文化中的符号性互动所构成的体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演变为单向度的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文化性（the cultural）逐渐被合并到经济性（the economic）之中，成为一种（建立在量化和计算基础上的）形式理性，而且这种形式理性逐渐渗透到所有个人或集体的事业之中，从而将实践理性撇在一边。英国社会渐渐变成了技术的领地。结果，不同意见变成了“毫无生气的而不再是生产性的或者人道的”，充满理解的生活越发被挤压成“相互误解或彼此孤立的碎片”。[③] 资本主义秩序采取了一种“新霸权”的形式，这种新霸权得以确立的基础是程式化的、相互确认

---

① 选自 Nigel Thrift (1980) '*Owners' Time and Our Time: 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1300－188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②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③ Steiner, G. (1978) *On Difficult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XI.

的计算性实践，以及生产和消费在功能、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化设计。这不仅扩大了劳动分工，而且也促成了空间和时间的分化。

本研究只关注英国习性的祛魅与返魅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时间意识在14世纪到1880年这一时期中的变化，这一时期见证了封建主义的灭亡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我们可以详细地描述一种建立在计算理性基础之上的新型时间是如何在这一时期逐渐普及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融入到实践意识的缝隙之中，变成了习性和霸权的概念所意指的理所当然的日常世界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安排如下：下一节记录了新时间意识在中世纪的最初的开端。此后，我追溯了这种新时间意识在1550—1750年这段时间内作为日常经济计算逐步散播，这一时期为新时间意识能够在工业资本主义的严厉统治之下的19世纪逐渐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正是下一节的主题。接着就是新时间意识传播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以表明这一传播过程的地区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最后，我们会得出一些简要的结论。这一研究只是一项更加庞大、更加详细的研究计划的框架，但是，我希望它至少能够为这种新型“社会--时间”的内—外辩证逻辑的关键性变化[①]提供一个概要。

第一阶段：在永恒之海中的计时岛屿，1330—1550年

休·奥尔德姆（Hugh Oldham）主教凡事讲求准时，他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确定了用餐时间——上午11点钟吃中饭，下午5点钟吃晚饭——并且严格遵守这一事先安排好的、惯常的钟点。而且，为此他还特地在家里摆了一座时钟，并指派专人看管它。但是，他经常因为事务繁忙而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时间安排。每当这种情况出现，不管当时是什么时间，他都要求那人调整钟表走时；在他吃中饭或者晚饭的时候，它必须显示为11点或者5点。很多时

① Pred, A. (1981b)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ska Analer*, 63, pp. 5－22.

> 候，家人们会向钟表看管人问及时间，而那人会随主人的意愿回答，或者在主人准备吃中饭或晚饭的时间再来回答。主教对此很清楚，却也会故意向这名仆从问及时间，而那人就会回答：随主人您的意愿，当您吃午饭的时候，时间就是11点。主教笑了笑，走开了。①

15世纪以前，日晷可能一直都是英国主要的正式计时仪器，它们通常都被安放在教堂的墙上。然而，从14世纪起，教堂大钟和公众时钟就开始矗立于大部分城市和大型市镇，而且到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绝大多数教区都拥有了教堂时钟，但是它们并不准确，常常需要用日晷校正。② 但是，究竟这些时钟是否对大多数民众造成了重大影响，对此依然存在着很大争议。③ 对农民来说，每天的生活作息安排主要还是依据劳作来确定的，所以比较灵活。不过，在这种灵活性中还穿插着一些确定的时间点。这些确定的时间点是基于事件的，例如，吃饭时间，做礼拜时间等。所以，要确定这些时间点，需要通过视觉、听觉或者生理上的依据，以及一些简单而且稳定有效的方法或者装置，例如，直接观察太阳的位置，或者把木棍插到地上做一个简易日晷。④

可以肯定，对于中世纪的农民而言，周（week）并不是一个常用的时间单位。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很少用到“周”这个字眼，也不使用太阴历或一周七天及其名称。一年的周期被划分为12个月、4个季节，这种划分有时会与较为正式的教会历（church calendar）和礼法历（ritual calendar）同构。但是，这种“历法”更多地是实用性的。它不是一种形式化的、纸面上的东西，倒更像是各种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实

---

① 摘自 *The Commonplace Book of John Vowell*, unpublished.

② 参见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参见 Le Roy Ladurie, E. (1978) *Montaillou: 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 London: Scolar Press.

④ 参见 Thrift, N. J. (1977b) '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Part On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 pp. 65—101.

践与传统的集合，一个实践知识的仓库。[①] 因此，它既是宗教历法，又是世俗历法（涉及每年的集会，交租日等），还是一部备注吉凶日期的准确的农业历。农民们知道“如果羊在米迦勒节（Michaelmas）期间怀孕，就会在圣烛节（Candlemass）前产崽；在圣安德鲁节（Andrewmass）来临之前要完成耕作；路加节（Luke）期间，发情的母羊会冲向公羊；应该在圣马丁节（Martinmas）期间雇用仆人；天使报喜节（Lady Day）过后，在牧场放牧的时间就不能超过两周时间。[②] 这种历法是一个自明性（self-evident）组织原则，是农村共同体最主要的整合力量。

因此，在中世纪的农村地区，日、周、年的组织方式是周期性的，但是并没有固定的规则。根据人类学的相关文献，我们就可能重构这种时间经验。时间参照点被当作是“时间之岛”，是自我封闭（self-enclosed）的单元，而不是连续时间线上的组成部分，那么可以预想，时间是非匀质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准时（punctuality），它取决于参照事件。人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是残缺的、模糊的。在言谈中，现在时态的使用更具有普遍性。历史，特别是发生在更为久远的过去的历史，几乎不为人知，但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外，即“那些源于基督教和其他信仰的末世论的只言片语”。[③] 它是一种传统民间智慧，往往反映了以下事实：对于那些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未来“当作是一个可以通过计算来理解和把握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领域”更让人感到陌生。但是，更准确地说，它们要面对的未来是唯一的，也就是既存的社会模式。所以，它们并不是想象不到未来，而是想象到的未来在形式上还和过去一样。每天计划的目标只是简单的再生产（reproduction）。这其中的差别就如同以利润为目的的积累和贮存（hoarding）之间的区

---

① 参见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kes, D. N. and Thrift, N. J. (1980) *Times, Spaces,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Chichester: John Wiley.

② Thomas, K.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p. 738.

③ Le Roy Ladurie, E. (1978) Montaillou: 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 London: Scolar Press, p. 281.

别一样。[①]

> 如果未来没有被视作是一个无限可能的领域，那是因为由传统建构和维护的秩序只有在被认为是唯一可能而不是最大可能时，也就是说，只有在排除其他所有的、挑战其支配地位的可能性时，才能存在。对传统主义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就是它不能承认排斥了各种未知的可能性。[②]

然而，即使是在中世纪，还是有一些可以实现更加准确地计时的“岛屿”。那就是修道院和城镇。为了每日祷告和奉行宗教礼仪，修道院特别需要准确计时。但是，它们对时间精确度的要求会因为宗教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别。[③]

有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的城镇中，人们的时间感更加精确。响钟和教堂大钟最初就出现于城镇，并且也只有城镇生活才需要它们。正如一位15世纪的作家所写的，在“城市和市镇，人们用时钟来管理它们”。[④] 与贸易相关的项目协调，需要更加精确地计时。各行各业在某些具体的操作中（例如，金属加工），也需要更加精确的计时。在这些操作中，沙漏是最常用的计时工具。商业贸易中的计算逐渐变得极为必

---

①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见本书第十四章；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70.

③ 参见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④ Thomas, K.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p. 744.

要。书信变得越加重要，所以使用更加准确的日期也变得越加重要了。[①] 最终，每一个时间单位都得到了更加广泛和精确的应用；人们对“周”这个时间单位的使用情况就是一个例子。[②] 我们还可以确定，对一种建立在金钱和信用基础上的全新的、更加形式化的计算的需要赋予了许多城镇居民更长远的未来时间视界。[③] 尽管如此，城镇中的时间经验仍然是周期性的，因为那里的历法混合了农业历、礼法历、教会历，以及市镇和行会的特定习俗。[④] 所以，那里的一年和霍曼斯[⑤]所谓的旷野耕种的农夫（open field husbandman）的一年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中世纪的城镇中，“商人时间”已经开始取代“教会时间”。[⑥] 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例如，在考文垂（Coventry），从1450年到1550年，这两种时间的对抗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半年遵循宗教惯例，半年履行市镇的事务和礼仪习俗。[⑦]

---

① 参见 Clanchy, M. T. (1970)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the Good Law', *History*, 55, pp. 165—176; Clanchy, M. T. (1979)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Edward Arnold.

② Glasser. R. (1972) *Time in French Life, and Though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③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 Phythian-Adams, C. (1972) 'Ceremony and the Citizen: The Communal Year at Coventry 1450—1550', in P. Clark and P. Slack (eds),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⑤ Homans, G. C. (1941) *English Villag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 参见 Le Goff, J. (1960) 'Au Moyen Age', *Annales, Economic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15; Le Goff, J. (1963) 'Le Temps du Travail Dans le "crise" du XIII Siecle', *Le Moyen Age*, 69; Le Goff, J. (1977)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Paris: Gallimard.

⑦ Phythian-Adams, C. (1972) 'Ceremony and the Citizen: The Communal Year at Coventry 1450—1550', in P. Clark and P. Slack (eds),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第二阶段：四旬期（Lent）的胜利，1550—1750 年

沙尔斯通（Shalstone）
星期六，9 月 23 日，1738 年

帕克少爷

你离开我这里已经三天了，尽管你曾经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在完成这里的工作之前不会离开；如果你下个星期一还不来的话，我就会找其他人来做这份工作。如果你无视于此，我就只得认为你是一个很可耻的人。今天天气真好！我是

你的朋友
亨利·普里福伊（Henry Purefoy）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地工作吧……每个行业会为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提供充足的职位。

约翰·韦斯利（John Wesly），塞蒙·L（Sermon L.）[①]

在 17 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英国，很少有家庭拥有家用时钟。例如，德文郡（Devon）和康沃尔郡（Cornwall）的 266 份制作于 1531 年和 1699 年的家庭财产清单中，只有 8 份包含时钟。[②] 大多数人仍然依赖公共时钟和响钟来确定时间，而且它们也逐渐开始在固定的时刻报时。例如，1562 年，埃克塞特（Exeter）市市长下达命令：埃克塞特要和伦敦一样，每天早晚都要在圣玛利（S. Mary）主教区响起钟声，每次历时 15 分钟；从圣灵降临节到 9 月，早上 4 点鸣钟，其他时间则从 5 点开

① 引自 Briggs, A. (ed.) (1969) How they lived: Vol. 3, 1700－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②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始，而每天晚上都是9点鸣钟。[①] 这种状况意味着，在16世纪中期，守时可能还只是一件被试探性地提出的事情，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还有[很多]人没听到过钟声，也不曾看见过钟表。例如，在肯特和萨里的上流社会，因为普遍都没有精确的计时仪器，再加上当地糟糕的道路状况和恶劣的天气，几乎很少有准时的、参与人数众多或者共同参与的集会。[②] 但是，从1658年起，家用时钟开始在英国普及。[③] 祖父钟（落地式大摆钟）也是在17世纪60年代之后才开始普及的。不过，此时怀表还很罕见。直到1674年，对控制摆和盘旋平衡弹簧的改进才使怀表成为精确的计时仪器，而不再是单纯的炫耀品。到1680年，英国钟表制造业在整个欧洲已经举足轻重，并在1796年达到了顶峰。因此，到1750年时，钟表已经在整个英国，尤其是较大的城镇得到广泛普及。例如，1718年，法国使团看到“现在的伦敦有**很多**时钟，所以丝毫没有必要再在家里安放时钟；但是，这种艺术品在这里是那么普通，也相当流行，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块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摆钟。”[④] 但是，从钟表的价格来看，几乎可以肯定，拥有这种新时间的人仅限于中上阶层人士、雇主、农场主和商人等。[⑤]

由此可以肯定，从1550年到1750年，人们的时间意识普遍发生了变化，这为资本主义时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宗教改革是对

---

①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pp. 45－46.

② Clark, P. (1977) 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voluti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Kent, 1500－1646, Hassocks: Harvester, p. 119.

③ 参见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Cipolla, C. M. (1967)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London: Collins; Ward, F. A. B. (1966) *Science Museum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Illustrating Time Measurement*, London: HMSO.

④ 引自 Briggs, A. (ed.) (1969) How they lived: Vol. 3, 1700－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 43. 强调为原文所有。

⑤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67.

前资本主义时间的第一击。世俗的力量逐渐侵蚀着宗教的神圣领地，尤其体现在解散修道院的运动上。尽管有些教会历节日被保留了下来（除了像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的重大节日之外），但这通常是出于简单的实用性考虑（例如，恰好与每年的集会日重合），或者是因为它们对农业生产有意义。小型公立语法学校及其时间表在偏远地区的中上层阶级中的普及，也开始对时间意识产生影响。可是，即使在这里，也常有旷课现象出现，这不仅仅是由于学生的贫穷和农业生产对人力的需求造成的，更是由于传统的时间观念造成的，因为传统的时间观念并不考虑计时仪器，它的基础是任务定向（task orientation）。①

清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主张一种有规律的 6 天工作制，安息日（Sabbath）休息。到 1600 年底，他们的理念可能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尽管在实践上还未必得到贯彻。② 很显然，由这些理念所带来的工作习惯上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开始接受现代时间观念的重要一步，甚至也是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一步。尽管如此，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精确计算的需要仍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到 17 世纪中期，很多农场主都在“计算被雇用者的每日工作为他们带来的预期收入”。③ 甚至还有一些难度更大的计算。汤普森是这样写的：

> 这种计算体现了一种简单的关系。被雇用者感觉到，雇主的时间和他们“自己的”时间之间存在着差别。雇主必须**使用**他所雇用的劳动者的时间，并且确保它不被浪费：因为最重要的是时间的价值，而不是工作任务。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

---

① Clark, P. (1977) 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voluti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Kent, 1500－1646, Hassocks: Harvester, p. 195.

② 参见 Thomas, K.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③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61.

是被花费的。[①]

因此，对于很多工人来讲，时间越来越明显地被分割成所有者的时间、工作的时间和他们自己的时间，即（理论上的）休闲时间。时间成为日渐异化的主题。

卫理公会派教徒和福音传教士最终也在18世纪时接受了那种综合了经济的和“伦理的”双重性质的清教徒观念——像计算金钱一样计算时间，并且热衷于管理时间。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强调由这些影响所引发的时间意识的普遍变化。例如，1660年的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之后，英国社会中传统信仰的力量，在众多贵族的扶持下，经历了一次复兴。[②] 的确，17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清教徒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清教徒的观点本质上是城市性的。当时形塑着大多数英国人生活的仍然是季节性周期（seasonal cycle），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那种建立在重复实践基础上的自明性的（self-justifying）认识论确保了节日间歇的持续存在，这些节日间歇通常建立在专门功能的基础上，比如教区宴会、牲畜买卖集会、招聘集会和普通假期。[③] 市镇以及新兴工业中的工作模式，因为工人们缺乏经济计算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工人们只要一赚够一周的开销，就会离开。此外，农村对劳动力还有季节性需求。[④] 1751年，英国爆发了对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 Calendar）的抵制运动，人们的口号是

---

①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21.

② Mingay, G. E. (1976)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London: Longmans.

③ 参见 Malcolmson, R. W. (1973)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K.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Redlich, F. (1965) 'Leisure Time Activities: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3, pp. 3－24.

④ Briggs, A. (ed.) (1969) How they lived: Vol. 3, 1700－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tedman Jones, G. (1971) *Outcast Lond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归还我们的十一天”，这凸显了那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中持续存在着的特征——理所当然。①

到1750年的时候，资本主义时间形成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它们不仅存在于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工人们的头脑中。此时，传统时间意识可能遭到更快的侵蚀。在1800年到1850年期间的某一时候，社会上各个阶级都拥有了钟表。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工业革命的发展提出了提高劳动同步性的要求。这很难说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第三阶段：囚禁，1750—1880年

> 时间脱离了人类经验，其中超验的因素受到了压制，现在，它被感知为一种客观力量，人们被囚禁其中。③

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中，新时间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the new time）早就出现了。以时间的不准确性为基础的旧习俗——以一套旧俗为例，在窗边点上一支蜡烛，表示欢迎访客，并且长期在家中摆放一张桌子以备访客到来——让位于更严格的社会时间安排（social timetabling）和一种固定的、具有近乎拜占庭式复杂性的社会历法。人们迷恋上了时钟时间（clock-time）。进餐时间，工作时间，梳妆时间，探访时间；所有的活动都要严格守时，因为不守时的行为“会被当作是一种有损良好品位的行为，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④ 19世纪初，盘形钟和家

---

① 参见 Thrift, N. J. (1977b) '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Part On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 pp. 65—101.

②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Hearn, F. (1978) *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an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④ Davidoff, L. (1973) The Best Circles: Society, Etiquette and the Season, London: Croom Helm, p. 35.

用响钟首次出现于上流社会的家庭里。到19世纪60年代，盛装出席晚宴已经成为一件平常事。在拜访他人的时候要留下拜访卡片，这种做法是一种复杂的新型社会互动系统的基本要求，这种新的社会互动系统中的互动过程要遵照精确的回应时间。在19世纪早期，这样的社会时间表还比较简单，例如，“正式的拜访时间表：下午3点到4点是礼节性拜访时间；4点到5点是半礼节性拜访时间；5点到6点则是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的探访时间。而周日这一天历来都是留给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的”。[①] 而到19世纪后半期的时候，这些时间表就变得越加详细了。

与这种富裕而矫饰造作的生活方式相反，农业工人的生活和以前大致一样，甚至更糟。支付周工资的工作越来越多，而任务定向的计件工作越来越少。另外还有一些抱怨指向季节性的集会，赶集日，以及每年的教区宴会或是“守夜日”，指责它们浪费了时间，它们和之前所述的那些情况共同冲击着农场工人的自由时间，并且导致许多守夜日被取消。（表7.1）守夜日的取消与以下事实不无联系，即在这一时期之初，大多数作坊工场都设在城市区域以外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人们还保持着传统的周期性的时间意识。例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卡斯特桥市长》中，[②] 让一个农场劳工来说明亨察尔（Henchard）的死亡时间，他说：“大约半小时以前，不过这只是根据太阳的位置估计的；因为我没有手表。”

表7.1 北安普顿地区（Northampton area）被取消的守夜日

时期	1724年	19世纪40年代中期
1月—5月初	1	1
圣灵降临节前后	4	15

① Davidoff, L. (1973) The Best Circles: Society. Etiquette and the Season, London: Croom Helm, p. 43.

② Hardy, T. (1886)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London: Pan edn (1978), p. 324.

续表

时期	1724 年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
6 月底—7 月初	38	31
7 月下半月	20	6
8 月初	1	6
8 月 15 日前后	14	5
8 月底/9 月上半月	22	0
9 月下半月	—	16
米迦勒节前后	31	—
10 月	18	20
万圣节前后	33	7
万圣节后以及 12 月	23	11
	205	118

但是，在工业领域，随着工业劳动力的快速增加，时间意识彻底地改变了。与农村不同，城市中的“圈地”（enclosure）不仅发生在空间上，同时也发生在时间上。

在城市中，时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接点，因为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交换价值。[①] 一种依赖于无处不在的时钟而确立起来的新型劳动过程重塑了工人的时间感。与此同时，时间也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可计量的数值，而这足以使它成为一种商品。劳动分工以及与之相应的技能丧失（deskilling）使劳动力变成了以时钟时间的单位来计量的商品。但是，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 action）的领域。时钟时间逐渐成为参照标准，并且工作时间也逐渐从个人时间中分离出来，[②] 吊诡的是，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也在逐渐趋同。

---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② 参见 Pred, A. (1981a) '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手工制造业”阶段，复杂的功能分化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农村的大片土地和众多生产部门从属于城市资本家。但是，此时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依然是外在的、形式化的。生产任务分工仅仅改变了生产形式；劳动过程依然和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情况一样。随着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现代工业”阶段到来了，它包含了劳动和工厂制。在英国，机器是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被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现在看来，从这一时间一直到1880年，正是手工制造业逐渐向现代工业调整和转变的时期：起初，手工制造业与现代工业并行不悖，后来，后者依据生产部门和地区上的需要逐渐把前者并入了自己的体系。[①] 现代工业要求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对以大城市作为其劳动力主要来源的生产过程进行变革。但最重要的是，现代工业若要实现工人与机器的结合，就需要工人规训。这就要求对工人进行培训，直至他们把一种与上述（人与机器的）重组相适应的新型时间结构视作理所当然。

村民、农民和外包工（outworker）都不需要面对这种被划分开，并被人为规定的时间所带来的问题。在他们那里，“调控生产活动的依然是工作任务，而不是钟表”。[②] 但是，随着人的活动开始被要求与机器的运转实现同步，或者说，“卷入”（entrainment）生产过程，对人类意识重新定时的过程开始在工具性行动与符号性互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

在工具性行动领域需要的是规训。

> 需要做的是，以规律性和稳定的强度代替无规律的工作冲动；以精确性和标准化代替个人设计；以对设备和生产资料的谨慎使用

① 参见 Samual, R. (1977)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l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3, pp. 6 – 72; Gregory, D. (1978)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 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②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73.

取代倾注于劳动工具上的自豪感。[①]

现在，机器被用于生产，所以那种挣够一个星期的钱就离职的旧习惯必须被根除。这其中涉及时间规训的三种基本方法：威慑，工资激励，以及培养一种新型工作精神。[②] 直接威慑，例如开除、罚金、惩罚，在第三阶段初期，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旨在督促工人“节省时间”的新手段。工人在一天之内出现严重不守时的行为会受到惩罚，例如，处以大数额罚金。工厂的大门往往会在每天开工的时候关闭。但是，到19世纪中期时，工资激励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

培养一种新型工作精神的办法也并非令人难以理解。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和汉纳·莫尔（Hannah More）[③] 热衷于鼓吹它的道德意义，而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到处将这种新的世俗时间强加于人的意识。墙上的时钟总在注视着，工厂的汽笛和监工（knocker-up）在不停地提醒和劝服。“时间表”（19世纪所特有的一个词）和工作规章，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出现的新型办公室里，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在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领域发生了更为微妙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尤其是在教育和休闲两个领域。在教育领域，许多为新兴的工人阶级设立的学校和主日学校，明显就是“抽象的机器”，[④] 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复给（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灌输时间规训的习惯。在这些学校里，“时间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各项活动的细节

---

①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p. 213.

② 参见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④ 参见 Pred, A. (1981a) '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都要遵从命令，而且这些命令都必须立即执行”。[①] 这里和工厂里一样，有罚金（和其他肉体惩戒），甚至还有金钱激励：[②]

> 18世纪末19世纪初，推动大众教育发展的一部分动力还来源于这样的一些愿望：利用小学教育来驯服工人阶级，使他们养成遵守工作规训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是工厂生产所必需的。而设立主日学校的建议是为了提供一个有秩序和规则的场景：也就是为了使工人们更加“温顺和顺从”，工作出勤更加守时。把小孩送到学校，让他们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学习一些枯燥的课程，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习惯于劳动和疲劳，且更不用说适应它们了”。这些对工业资本主义教育的一个影响就在于，为学校的惩罚和纪律提供了支持。有些人认为，学校的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体制，它会摧毁意志，使孩子们适应工厂里程序化、例行化的劳动。只是到了后来，以下事实才凸现出来：工业社会还需要大众掌握广泛的智力技能，而且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③]

在休闲领域，时间规训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听从命令、遵守纪律这个更宽泛的问题的一部分。闲暇时间必须被利用起来，并且要以某种方式把它和工作联系起来。否则，它就会成为使人分心的危险之物。起初，工作时间就是娱乐消遣绝对的权威性限制。到19世纪的时候，随着工作时间总体缩短，娱乐消遣的时间大大增加。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大众（喧闹的）娱乐消遣却遭到了道德和法律的猛烈攻击，并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而促使上述情况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

---

①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p. 150.

② 引自 McCann, P. (ed.) (1977) *Popul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Jones, K. and Williamson, K. (1979) 'The Birth of the School Ro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5, pp. 59—110.

③ Stone, L. (1969) *Schooling and Socie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p. 92.

当时新建设的生存环境，它几乎没有任何游玩场地或者其他公共设施。[①] 因此，当人们再次拥有娱乐消遣的时间时，那些有组织的、商业化的娱乐消遣活动得以兴起。例如，火车短程旅行（最早出现的时间不晚于1844年），新式观赏性运动，以及像圣经研习会那一类的活动。这些新的娱乐消遣活动建立在付钱消费，而非参与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且更容易被限制在特定的场所和时间之内。[②]

工人阶级的传统消遣习惯被打破，这是与日渐式微的传统工作日历、工作周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休假历的繁复结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守夜日和欢乐集会被逐步废黜。工作周也被安排得更加具有规律性。“神圣星期一”（Saint Monday）成了这一过程中的牺牲品。[③] 过去，在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外包加工工场和煤矿里，星期一一直都是工人们的休假日。而且，在一些新兴的制造业中也是如此。这一天通常被当时的作家直接描述为喝酒和赌博的日子。而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随着旧式娱乐消遣方式被新式娱乐活动——例如廉价的火车短途旅行和板球比赛等——所取代，这一天就变得相当平淡无趣了。但是，少了整整一个工作日，显然会给资本家带来不便。有证据显示，雇主们曾经把周六半天休假制用作取消周一休假的谈判筹码。[④] 新的假日安排部分地取代了旧的假日安排，但是对新的假日安排的采用情况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并且至少部分是地方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工人对当地半天（休假制）运动的抵制及其强度。有意思的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圣星期天依然存在于某些行业当中，这些行业都还保留着非机械化的小型作坊生产。

---

① 例如，Malcolmson, R. W. (1973)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 Meller, H. (1976) *Leisure and the Changing City*, 1870－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③ 参见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Reid, D. A. (1976)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71, pp. 76－101.

④ 参见 Reid, D. A. (1976)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71, pp. 76－101.

当然，工人们对所有这些变化都进行了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都被瓦解了。尽管如此，工人们仍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各种缩短工时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 1836 年到 1886 年，历经其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平均工作时间缩短了五分之一；[①] 1847 年颁布的《10 小时工作法案》(the Ten Hours Act) 成为最重要的里程碑。19 世纪 70 年代，这类工人运动又取得了重要进展：1871 年颁布了《银行假日法案》(the Bank Holiday Acts)，1875 年设立了一年中的四个（不带薪的）全国性假日（节礼日，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和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②] 然而，随着相对剩余价值逐渐取代了绝对剩余价值，缩短工时运动出现了问题。因为工人们此时并不是在反对新的时间观念，而是为了适应它。[③] 从此，他们或许会赢得几场战斗，但已经输掉了整个战争。现在，时间就是金钱，而不是工作任务。

1880 年，一套新的管理策略逐渐取代了过去那种完全建立在简单威慑基础上的老策略。由此，直接威慑或者（暴力）统治（葛兰西的“dominatio”）被一种更具渗透性、更有效的霸权取代，后者依赖于一种建立在经济上的文化。惩罚观念被一种强调自我改进的改革观念所取代。在工具性行动的领域，随着工人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管理制度，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它们围绕着工作时间及其安排以及工作报酬，而不再是工作时间本身。一天中被称作“工作时间”的那部分时间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 1847 年颁布的《10 小时工作法案》；实际上，上述妥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非均一化，速度在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④]

---

① Burnett, J. (ed.) (1974) *Useful Toil*, London: Allen Lane.

② 参见 Pimlott, J. A. R. (1947) *The Englishman's Holiday: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reprinted 1976, Hassocks: Harvester); Walvin, J. (1978) *Leisure and Society: 1830—1950*, London: Longman.

③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④ 参见 Gregory, D. (1978)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 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在符号性互动领域，一种霸权式控制（a hegemonic control）的形成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教育领域，学校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学校所实行的是具有监控功能的军事化管理，时间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片真空，可以把受规训的道德行为填充进去。现在，这些学校正在逐渐被取代，但是新式学校依然要以它们为基础。例如，此时贫民学校的时间表：

> 规定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交替进行，其间穿插在操场上进行的户外活动，如果是在工厂学校或者救济院学校，还会安排一些时间，让学生们在监督之下做工。在这种细致的教学日程安排中，时间本身作为一种受监督的活动的结构化排列，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训练存在于孩子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①

学校变得越来越“人类行为学化”（anthroponomic），② 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为了造就工人，更是为了造就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工人。基础教育和一种制度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得到了重视。标志性的转折点大概就是 1861 年，公立学校监察团所采用的标准发生变化，它们此前只要简单地视察“道德状态”，而现在还要考虑基本技能水平。此时，制度自身的存在问题变成了制度优化的问题。在休闲方面，娱乐消遣活动变得越来越秩序化，越来越被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例如，在设有围墙的空间中举行的规定时长的比赛。对闲暇的消费过程开始取代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标志性日期有——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火车短途旅行出现；或者是 1863 年，英国足球联合会（the Football Association）成立，以及 19 世纪 70 年代末，首个职业俱乐部成立。

---

① Jones, K. and Williamson, K. (1979) 'The Birth of the School Ro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5, p. 89.

② Bertaux, O. (1977) *Destins Personals et Structure de Class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类似的日期还有很多。[①]

但是，在工人阶级对这种时间感的内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经济理性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某一点上，与消费产业的发展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消费需求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渴望（economic aspiration）。[②] 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的“创造需要”（creation of wants）的观念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储蓄存款增加，像建房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贷机构逐渐发展起来，还出现了像分期付款这种新型高利贷。于是，人们开始重视固定工资和“事先打算”。工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要赚够一周的花销就离职。新的经济计算赋予未来时间一种经济价值，这样一来，一个客观的未来变成了工人习性中的一部分。如今，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都是金钱。这里出现了一条难以言喻，但又十分重要的分界线，布迪厄（Bourdieu）对阿尔及利亚工人的记录中也描述了相似的情况：

> 如果一个人想通过组织各类资源，通过平衡资产和负债，节省，对投资或信贷进行资本管理，或者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对他的现在和环境具有最低限度的控制力。1954 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家工厂里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工厂决定把工资提高 20%；工人们按照传统主义精神的逻辑，把他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 1/5。然后，工资变成了两倍，达到初始工资的 240%。第二次提高工资的结果与第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似乎是一个门槛被打破了，工人们显示出工作的欲望，想要赚更多钱，渴望加班，要通过节俭而期待未来。好像是一个单独的属性的改变造成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重构，好像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的人突然

① 参见 Magoun, F. P. Jr (1938) History of Football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871, Bochum Verlag Heinrich Popinghaus O. H. G; Delaney, T. (1963) *A Century of Soccer*, London: Heinemann; Keeton, G. W. (1972) The Football Revolution,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② Reid, D. A. (1976)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71, pp. 76－101.

发现他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①]

因此，在这个以现在换取未来，以文化换取经济的过程中，工人们有得也有失。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关于普及格林尼治时间的案例研究

铁路与电报时代
开始于“伦敦城”；
我猜想，伦敦时间是否会
接踵而至。

（伍尔默的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报，1852 年 8 月 14 日[②]）

本文最后这一部分是一个案例研究，关于精确而统一的计时与时间意识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③] 这一部分在展现前资本主义时间

---

①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p. 71. 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② 转引自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1.

③ 参见 Thrift, N. J. (1977a) '*The Diffusion of Greenwich Mean Time in Great Britain*', University of Leeds, School of Geography. Working paper, 188. Leeds; Parkes, D. N. and Thrift, N. J. (1979) 'Time, Spacemakers and Entrainment',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 pp. 353—372; Smith, H. M. (1976) 'Greenwich Time and Prime Meridian', *Vistas in Astronomy*, 20;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苟延残喘的同时，也表明新时间的普及过程并非坦途。这一转变的速度在不同地方有所不同，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①

定期公共马车服务（伦敦至布里斯托尔）出现于1784年，此后便得到迅速推广。到1785年时，定期公共马车服务已在伦敦与25个城镇之间开展起来。② 这种新的规律性产生了一些直接的社会影响。例如，它对伦敦的一些工作习惯产生的影响：

> 从前，人们会在上午晚些时候打开来信，在这一天闲暇时处理它们，晚上才寄出回信；邮局办事员工作到多晚都不是问题，只要他们赶上了午夜投寄，就要等到晚上11点关邮箱。现在，所有邮件都在晚上8点从邮政总局发出；邮箱7点关闭，办事员在7点之后就下班了。③

但是，新出现的定期公共马车服务也并非没有问题。尤其是地方时间之间难以控制的差别所产生的问题，因为英国大部分城镇，还依然处在各自的“时区”之中。1792年，英格兰各个社区都同意采用平均时间（mean time），但是，具体所遵循的时间要以它们与子午线之间的位置关系而定。这就意味着，不同地区所遵循的时间大相径庭。例如，伦敦与普利茅斯之间的时差是16分钟。但是，在这一时期，时间上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公共马车行进速度较慢，可以进行时差调整。例如，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的路途中，就要由控制行程的车长负责调整时差。而他要做的就是简单地调一调时钟，使南“下”伦敦的行程少20分钟，而北“上”布里斯托尔的行程就多出20分钟。（布里斯托尔当地时间与伦敦时间的时差是20分钟）。

---

① 参见 Gregory, D. (1978)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 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② Bagwell, P. (1960) *The Transport Revolution From* 1770, London: Batsford;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③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p. 125.

1825 年，斯托克顿和林顿之间的铁路线路开通，自此开启了铁路时代。火车所能达到的速度迫切需要英国各市镇实现时间上的一致性。起初，铁路运营还处在试探性阶段，并没有对其他交通方式造成重大的冲击。例如，1831 年，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发布了一份联合时刻表，包括了它们的火车时刻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公共马车和汽轮的时刻表。在这张联合时间表上，马车时刻表占了 8 页，轮船时刻表有 2 页，而火车时刻表仅占了四分之一页。而当时的时间感并不会有助于情况的改善。例如，在 1839 年，当乔治·布兰德肖（George Brandshaw）准备为《铁路指南》（*the Railway Companion*）编写首份时刻表的时候，铁路公司的一名主管拒绝向他提供火车到达时刻，他说："我认为这会使准时成为一种义务"。①

1838 年，铁路开始运送王室邮件。这使得形势更为迫切。尽管邮政马车的传统还在，但东西方向的线路却已经被取消。（能传送时间信号的）电报公司的诞生又进一步提出了时间的一致性问题。在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英格兰，至少有 3 类组织机构发现，很难在不同的地方遵循不同的时间。它们分别是邮局，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

这一时期的铁路乘客的经历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例如，乘客们使用 1841 年的大西部（Great Western）铁路公司的时刻表时，就会看到一些令他们感到不安的话：

> 铁路沿线各站都使用伦敦时间，而伦敦时间比雷丁（Reading）时间早 4 分钟；比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时间早 5 分钟；比切本哈姆（Chippenham）时间早 8 分钟；比布里奇沃特（Bridge Water）时间早 14 分钟。②

所以，大可不必对以下情况感到惊讶：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铁路乘客都戴着有两个表面的特制手表，一个表面显示当地时间，另一个显示目的地时间。

---

①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p. 28.

② Great Western Railway, (1841) *Timetable*. York: National Railway Museum.

很快，对统一时间的需要变得迫切起来，尤其是随着铁路线的延长，铁路交通量的增加，以及像第一次火车短途旅行那样的新事物的出现。亚伯拉罕·奥斯勒（Abraham Osler）在伯明翰哲学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对时间不统一的状况发起了第一次猛烈攻击。[①] 而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大臣亨利·布思（Henry Booth），则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里，清楚而有力地确立了标准时间的地位：

> 现在，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真实情况。先是最东边的六七个村庄或渔业城镇的教区大钟接二连三地响起，随后便开始了一连串长时间的、不和谐的钟声；诺里奇（Norwich）和雅茅斯（Yarmouth），哈维奇（Harwich）和拉姆斯盖特（Ramsgate），几百个大钟和合奏钟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接着，坎特伯雷（Canterbury），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和剑桥延续了这致礼的钟声；而其间还有上千个城镇鸣响教区大钟或市场鸣钟，在宣告自己的时间……往西，噪音还在继续，一直到达大都市的郊区；波普勒（Poplar）和利默豪斯（Limehouse），斯捷潘尼（Stepney）和贝塞那·格林（Bethnal Green），每一个地区的时钟和响钟……都在发出刺耳的鸣响，令人心焦；这些连续不断的嘈杂声之后，圣保罗大教堂的大钟St Martin-de-Grand开始哀鸣，敲响了一点的钟声，仿佛在庄严地谴责之前的嘈杂。然而，嘈杂之声依旧；继续向西延续——从布伦特福德（Brentford）和温莎（Windsor），到雷丁（Reading）和牛津（Oxford），再到斯托特汉普顿（Stouthampton）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钟声持续到最后的一小时，“什鲁斯伯里（Shrewbury）的钟声”响起；每个城市，市镇或者镇区，或者“教区以外的地方”（extra-parochial place）的上空都回响着阵阵钟声，昭示它的时间；它呼喊着——“这是我的轰隆声！”[②]

---

①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Booth, H. (1847) Pamphlet published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House, 1980), p. 11.

亨利·布思，还有工业资本主义，都乐于看到时间的一致性：

> 圣保罗教堂的大钟敲响一点的钟声的时候，从大不列颠的最北端到最南端，每个城市的时钟和村庄的合奏钟也都敲响了一点的钟声。而且所有手表或者座钟的指针都会指向这同一时刻！不管是在伦敦，爱丁堡（Edinburgh），还是坎特伯雷（Canteibury）或是加的夫（Cardiff），工人们都是在同一时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工作。商人们准时约见；旅行者们自信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时间），而不再为眼前的“经线”而感到不安。全国人民一齐行动的理念是如此庄严伟大；在每一次活动中，只需一个共同的指令就可以调控一个伟大民族的行动！①

1840 年 11 月，大西部铁路公司开始在其铁路沿线各车站和时刻表上使用伦敦时间（伦敦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之间的时差是 23 秒）。1846 年，西北铁路公司也开始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车站使用伦敦时间。不过，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些协调上的困难。例如，1846 年 11 月，“一班火车晚点，而原因就是，(由 Midland 铁路公司运营的）拉格比（Rugby）和约克（York）之间的铁路线上使用的是伦敦时间，而（由西北铁路公司运营的）拉格比车站使用的却是拉格比当地时间”。②

因此，各铁路公司经由铁路技术情报交换所（the Railway Clearing House）（该组织建立于 1842 年，负责协调英国铁路运营的各方面事务）的调解，最终决定：“只要邮电部允许，就建议每家铁路公司在其沿线各站采用格林尼治时间”。③ 邮电部似乎也并不反对。于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铁路线都改用了格林尼治时间，而且几乎都是在 1847

---

① Booth, H. (1847) Pamphlet published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House, 1980), pp. 10－11.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7.

③ Smith, H. M. (1976) 'Greenwich Time and Prime Meridian', Vistas in Astronomy, 20, p. 221; McCrea, W. H. (1975) The Royal Greenwich Ohservatory, London: HMSO.

年12月1日这一天改的。1848年1月版的《布拉德肖铁路指南》（*the Bradshaw's Railway Guide*）上列出了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的铁路公司名单，包括伦敦西南、伦敦西北、米兰德、切斯特—伯肯黑德（Chester and Birkenhead）、兰卡斯特—卡莱尔（Lancaster and Carlisle）、东兰开夏郡—约克—北米兰德（East Lancashire and York and North Midland）。而大西部、东南和喀里多尼亚（Caledonian）这三家铁路公司也都已经改用了新时间。①

但是，如果只有火车站改用格林尼治时间，而周围城镇并未这样做，不免会出现混乱。（表7.2）

表7.2　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公共时钟时间，1852年2月17日

格林尼治时间 *		地方时间
英格兰		
贝里村	蒙茅斯	阿克明斯克
贝德福德	纽贝里	贝辛斯托克
伯明翰	纽卡斯尔	巴斯
布里奇沃特	纽波特	博德明
白金汉	北安普顿	布里德波特
海滨博纳姆	诺丁汉	布里斯托尔
坎特伯雷	奥斯沃斯特里	剑桥
卡莱尔	彼得伯勒	切姆斯福德
切尔腾纳姆	普雷斯顿	科尔切斯特
切普斯托	拉姆斯盖特	克雷迪顿
切斯特	雷丁	达特茅斯
奇切斯特	里彭	迪韦齐斯
考兰普顿	罗切斯特	多切斯特
考文垂	索尔兹伯里	伊利
考斯	斯卡波勒	埃克塞特
德比	设菲尔德	法尔茅斯
唐克斯特	什鲁斯伯里	哈维奇
多佛	南安普顿	伊普斯维奇
德罗伊特维奇	斯塔福德	朗塞斯顿

①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续表

格林尼治时间 *		地方时间
达勒姆	斯托克波特	马盖特
福克斯通	桑德兰	牛顿 阿贝波特
格洛斯特	汤顿	诺里奇
黑斯廷斯	蒂克斯伯里	牛津
赫里福德	蒂弗顿	彭赞斯
赫尔	托布里奇	朴次茅斯
肯达	托基	普利茅斯
兰卡斯特	惠灵顿	廷茅斯
利兹	韦尔斯	托特内斯
莱斯特	滨海韦斯顿	特洛布里奇
利奇菲尔德	怀特哈文	特鲁罗
林肯	威根	伍尔弗汉普顿
利物浦	温莎	雅茅斯
伦敦	伍斯特	
林恩	约克	
曼彻斯特（1847）		

* 括号里的日期是所知的当地改为格林尼治时间的日期。

我们看到，各个车站的时钟都根据“伦敦时间”重新调校。例如，大多数读者会注意到，伦敦市 12 点与其他地方的 12 点相比或早或晚，这具体要看后者与伦敦之间的距离和方位关系。因此，当某个地方小镇的时钟还显示为差 5 分 12 点时，伦敦时间已经是 12 点了。此时，定于 12 点出发的火车已经开动，而漫不经心的乘客却以为还差几分钟。我们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在伦敦以外的地方车站下车时，明智的做法是，注意一下当地时间与伦敦时间的差别，以便在此后的行动中适当地考虑这一差别。[①]

① Simmons, J. (ed.) (1971) *The Railway Traveller's Handy Book of Hints, Suggestions and Advice before the Journey, On the Journey, and After the Journey*, Bath: Adams & Dart (1862 edn.), p. 32. 参见 Cockman, F. G. (1973) 'The Railway Age in Bedfordshire', Publications of the Bedfordshire *Historical Record Society*, 53. pp. 1—143.

由于负责出版地图的是一家钟表制造商（Henry Ellis and Son of Exeter），所以所有购买地图的消费者都可以知道，在1852年使用当地时间或格林尼治时间的城镇各是哪些（表7.2）。实际上，其中某些城镇在铁路改换时间之前，就已经采用格林尼治时间了；例如，在不屈不挠的奥斯勒“领导”下的伯明翰。其他城市，像曼彻斯特，则在地铁路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当天，才改用格林尼治时间：

> 大众意志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General Purposes）在认真考虑了兰开夏郡—约克郡铁路公司的来信之后，于1847年12月1日，建议铁路公司管辖的所有时钟和教堂时钟，都必须适当调整9分钟，以保证与铁路时间一致；这标志着工商界对新的交通主人的顺从和效忠。①

在苏格兰，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进程要迟一些。1848年1月29日，爱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格里诺克（Greenock）、斯特灵（Stirling）和珀斯（Perth）开始在公共时钟上使用格林尼治时间。②

但是，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处于东西轴线两端的城镇，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调整最大。因为有完备的文献记录，我们才有幸知道发生在西南部的那场争论的相关细节。1844年5月1日，埃克塞特（Exeter）开通了第一条通往市区的铁路。从1847年12月开始，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公司改用格林尼治（伦敦）时间，但埃克塞特坚持使用其当地时间。1850年，怀特的《德文郡指南》给铁路乘客的建议是：

> 各车站都在使用的伦敦时间，比巴斯和布里斯托尔时间早11

---

① Kellett. J. R. (1969) *The Impact of Railways on Victorial Cities*, London: Routlcdgc & Kcgan Paul, pp. 173-174.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分钟，比埃克塞特时间早 14 分钟，比普利茅斯时间早 13 分钟。[①]

市区的时钟既显示格林尼治时间又显示当地时间：

> 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便利服务，一面新型表盘被加装在这个城市，西尔街前，圣约翰教堂的墙上。它既准确地显示了埃克塞特的时间，又显示了较之提前几分钟的铁路时间。只要你一不留神（看错时间），就可能使聚会变得不愉快。银色分针指示铁路时间，金色分针指示当地时间。

（特里曼的埃克塞特飞翔邮报［Trewman's Exeter Flying Post］，1845 年 10 月 16 日[②]）

人们也可以买到同时显示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的手表。

1850 年，埃克塞特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慢了 14 分 12 秒。于是，要求改变这种时间差异的请愿运动正式开始，而该运动的领袖就是前文提到的亨利·埃利斯。1851 年，在一次市镇议事会议上，人们要求市长请求埃克塞特教堂（镇上最重要的时钟的所在地）主教将教堂时钟调整为格林尼治时间。请愿书在前一天晚上就起草好了，并且“已经得到市里重要公司的签署”。[③] 随后便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这场辩论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场围绕着一位年轻女士的成年时间问题的争论中，如果依据礼拜教堂的时钟，她已经到了成年年龄，但如果依据大

---

①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1.

② 转引自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1.

③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2.

教堂的时钟，她还没有到成年年龄，而法院判定大教堂的时钟的权威高于其他时钟”。[①] 此次请愿的投票结果是 16 比 5，但大教堂的主教拒绝更改大教堂时钟的时间。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与之相类似的情况，促使当时的《阿森埃姆》（*Athenaeum*）作出如下评论：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发现巴斯和埃克塞特出现在列有为了地方权利而宁愿落后于世界趋势的地方的名单上”而感到惊奇。[②]

1852 年 8 月初，电报电缆铺设到了埃克塞特火车站，进一步加大了埃克塞特火车站改变时间的压力。当地报纸的一位编者这样写道：

> 与前几年相比，公众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会感到一种不便，也就是在不同城镇就要以不同的时差换算时间所引起的不便……我们相信，埃克塞特的市民将会努力争取统一时间，以便获得由此带来的便利。在美国，很多重要城镇早已经迫不及待地占据了这样的便利。[③]

此后，斯塔福德·诺森特（Stafford Northeote）男爵继续了这一事业，他帮助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向英国西部——布里斯托尔、巴斯、埃克塞特——施加压力，促使它们都采用统一的格林尼治时间。1852 年 8 月 31 日，改用统一的格林尼治时间这一议题又被提上埃克塞特的议事会议。随后，也就是 10 月 28 日，在市政厅又举行了公众会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改变公共时钟的显示时间。主教最终做出让步，于是埃克塞特从 1852 年 11 月 2 日开始改用格林尼治时间；就在第一个电报常

---

①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2.

②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3.

③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3.

规时间信号从格林尼治发送到埃克塞特的第二天。

> 特此通告“从周二，即接下来的十一月份的第二天开始；大教堂的时钟和这个城市中其他公共时钟都将显示格林尼治时间”。
>
> （通告原文摘自《西部早报新闻》，1936 年 12 月 29 日）

在布里斯托尔，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决议已经在 1852 年 9 月 14 号的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①] 此后不久，普利茅斯、巴斯和德文郡也改用了格林尼治时间。此时，西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实现了时间上的同步性。

1855 年，英国百分之九十八的公共时钟都已经被设定成格林尼治时间。[②] 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1858 年，税务法庭（the Court of Exchequer）的一项决议致使当地时间被指定为法定时间。[③] 1880 年 8 月 2 日，当这一法律议案（“时间界定”）提交给王室御审的时候，最后的异例也被消除了。从 1880 年的这一天起，英国国内所有的活动都被纳入了格林尼治时间。

结 论

中世纪时期的霸权建立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之上。19 世纪末，它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结构重组，经济变成了社会的主要方面。这次结构重组的进程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儿向前几步，那儿退后几步，那儿又误入歧途。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在 18 世纪晚期以及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表现为简单的高压统治和粗暴的意识形态控制。但是，到 19 世纪晚期的时候，它已经彻底完成了向新型霸权的转变。这种新型霸权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很多，而其中之一正是本研究所

---

① Latimer, J. (1887)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A. C. (1978) 'Greenwich and Standard Time', *History Today*, 28, pp. 194—199.

关注的主题，即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它是一个计算的领域，一种对未来的占有。到1880年，所有者的时间（owners' -time）变成了拥有的时间（own-time）。内在和外在的时间标记方式逐渐趋同。此时，时间是被消费的：人们不再根据完成的工作任务来衡量时间。此时，时间与未来取向的计算理性密不可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时间和计算理性已经变成同一样东西：不断积累的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

现在来看一下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工作方面——是泰勒主义（Taylorism）、福特主义（Fordism），甚至新福特主义（neo-Fordism）；[①] 学校方面——是人类行为学（anthroponomy）、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②] 家庭方面——是家庭监控和闲暇时间的炫耀性消费。[③] 而且，工作、学校和休闲是彼此割裂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国家和资本用"思想治理"（govern-mentality））[④] 和实证主义科学构成的复杂的难解之

---

① 参见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alloix, C. (1976) 'The Labor Process: From Fordism to Neo-Fordism', in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Brighton: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② 参见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Chamboredon, J. C. and Prevot, J. (1975) 'Changes in the Definition of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New Forms of Symbolic Violence', *Theory and Society*, 2, pp. 331—350; Karabel. J. and Halsey, A. H. (eds) (1977)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nstein, B. (1970) *Class, Order and Control*, vol 3,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③ 参见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New York: Pantheon; Pasquino, P. (1978) 'Theatrum Politicu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4, pp. 41—54; Knemeyer, F. (1980) 'Polizei', *Economy and Society*, 9, pp. 173—196; Linder, S. B. (1970)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red, A. (1981a) '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④ Foucault, M. (1979) 'On Governmentality',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5. pp. 5—21.

结捆缚在一起。

如果存在着斩断这一难解之结的办法，那么这一办法必定会部分地涉及改变时间意识。但是，并不是通过毫无限制的回返过去。必定会有一种方法：

> 将新旧要素综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意象，它既不是建立在季节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类需要的基础之上。在工作中守时是对工作同伴的尊重。任由时间白白逝去的行为也会受到文化的认可。①

①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96.

第八章　资本主义与“工作—时间”思想史[①]

克里斯·尼兰德

从1870年到1980年，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主要国家的年工作时间总量缩短了大约40%。标准工作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本研究概述了这场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对该问题的内在实质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代关于工作时间的争论，都局限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工人对工资和闲暇的偏好，这些偏好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以及作为个体或者集体的工人如何实现其选择。这类争论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偏离主题。因为它们建立在众多误解的基础上，而且还忽视了一个曾经主导着整个问题的关键因素。这个关键因素就是与工作和时间相关联的工人的心理—生理能力的特性。这一因素被遗忘了太久，致使许多争论参与者都没能意识到，偏好论只是对标准工作—时间为什么发生变化的两种传统解释之一。

放弃对人的能力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不合理的。希望对这场争论的历史的详细描述将有助于这个因素的重新融入，重新引发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的真正严肃的讨论。此时重新展开这一讨论是尤其必要的。从传统上看，在高失业率时期，工作—时间就会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经济危机时期，工人运动总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应该缩短标准工作时间，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工作。“长期繁荣”之后一直持续的经济危机也未能例外。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持续衰退……那么，组织起来的工人对缩短时间标准的要求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坚决。因此，理解工作时间怎样变化以及为什么变化，具有直接和重大的意义。

---

① 选自 Nyland, C.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1986, pp. 513—534.

重商主义与工作—时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分析……工作与时间之间关系的第一代政治经济学家，就是重商主义者。这些作者被松散地归类到重商主义名下，主导了大约从1500年到1700年的经济思想。严格地讲，不应该认为那些对重商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人们构成了一个学派。这一时期已经被恰当地描述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的时代。[①] 对于这些理论家而言，在一个或者多个理论观点上达成共识，绝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观点上也会如此。但是，他们至少在两套学说上达成了广泛共识。一是贸易平衡理论，二是关于劳动者对国家的重要性的思想。这两个因素在重商主义建立其工作—时间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要繁荣，就必须实现贸易顺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保证出口价格最低。此时的欧洲还处于前工业社会，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生产成本。所以，若想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就必须使这种商品（劳动力）的价格也降到最低。他们相信，只有把直接生产者的收入尽可能地压到最低，国家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就一个“正常”工人对工资增加所作出的反应而言，低工资政策也被认为是必要的。重商主义者发现，当他们社会中的直接生产者的工资增加时，他们往往会缩短其愿意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劳动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所以这就被看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③] 贸易或许可以增加财富总量，但直接生产者的努力工作却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因此，他们认为：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努力工作，而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偏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国家有权要求和强制直接生产者为工作倾尽全力。所以，懒散和精力不集中总是一再遭到

---

① Johnson, E. A. J. (1937)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London: P. S. King.

② Furniss, E. S. (1920)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③ Meek, R. (1956)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这些学者的谴责。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使用强制力、道德劝说以及干预等手段介入劳动力市场，操控劳动力价格，以确保工人们能够在稳定而持久的基础上劳动。①

重商主义者用以克服工人的休闲偏好的处方中包括：通过政府来降低和固定工资，松动加入国籍的法律以增加入境移民，而最为重要的是控制食品供应，进而抬高物价。实质上，所有这些办法的目的都是降低劳动人口的生活标准，从而迫使他们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劳动。如果高收入会降低劳动者劳动的意愿，那么低收入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不仅要保持低工资，还要使穷人继续生活在贫穷之中。

古典经济学与工作—时间

这种主张——将劳动人口的收入保持在维持生活的水平上，以便延长他们可以用于劳动的时间——在1500年以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然而，在18世纪上半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种主张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是懒散浪荡的，尽管许多工人仍然如此，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对重商主义正统思想的质疑者还认为，压低工人生活标准的政策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有人甚至认为，高工资可以作为一种诱惑、刺激，激励工人们为工作付出更大努力。

对重商主义者的工作—时间观点的质疑，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过程中，真正遭到挑战的是重商主义者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念，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劳动者的本性的观念。过去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直接生产者天生就是懒惰的，他们只有在外力强制驱使下才会工作。然而，这一正统观点的挑战者们却认为，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体人类都不是天生懒惰的，即使他们的行为表现如此，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动机使他们不懒惰。

---

① 参见 Wiles, R. C. (1968) '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pp. 113—136.

在1750年以前，只有少数作者认为，在人类本性中并没有懒惰和对劳动的厌恶。然而，从1750年到1775年这段时间里，这种观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个分水岭。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一场重大转变发生了。

关于工作—时间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一种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任何经济学体系都是如此。这一点，在亚当·斯密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将人类视作是一种有理性的创造物，认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和实现那些影响社会本质的长期策略。然而，他也对这种能力附加了严格的限制，认为人类理性的发展状况尚不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社会塑造成某一特定的形态。他提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不受社会成员的政治、法律行为的影响。

斯密还指出，尽管人类的能力有限，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发挥作用，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某些特定的欲望和需求。

> 在政治躯体之中……天性的智慧，足以补救因为人类的愚蠢和不义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后果，其方式就和它在自然躯体内矫正人类的懒惰与放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方式一样。①

斯密认为，这些内在的动力特征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合。这些天赋的本质是人类的交换倾向和一种利己主义，后者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的不懈动力。斯密相信，人类会为了改善生活而坚持不懈地奋斗，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拒绝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如果工人们有机会获得更丰厚的收入，他们就会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他还强调，更多的财富会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更多的财富可以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他们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且它还会给工人带来一种希望：如果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不仅能够改善当下的生活条件，甚至还能在以后过上舒适的生活，并由此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

① Smith, A. (196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 Vol. 2, p. 168.

斯密承认，确实会有一些人偏好休闲胜过收入。但他也指出，绝大部分人并非如此。大多数工人的收入偏好都很强烈，以至于在那些支付计件工资的地方，工人们会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甚至往往到了不惜在几年内毁掉健康的地步。

在1776年之前的25年里，英国经济首次遭遇工作—时间大幅度缩短。在这一时期，技工每天10小时的工作时间被确立为一般标准。[①] 如果斯密的分析仅限于交换领域，以及对工人的休闲和工资偏好之本性的考虑，那么这一新情况就可能会给他的观点带来困难。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收入偏好者会一致要求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但对于斯密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承认，不管工人们对更多收入的渴望有多么强烈，生产过程中的因素总会迫使他们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间。另外，斯密基于其关于人类本性和有限能力的论断提出：工人们选择限制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度的原因通常是快速的工作节奏。

> 一周中有四天过度劳累，通常是导致其余三天懒散的真正原因，而后者遭到很多人的强烈谴责。大多数人在连续几天的繁重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想要放松和休息的强烈欲望。而且，除非有外力或者某种强烈的需求存在，否则这种欲望是难以抑制的。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求，需要通过某种放纵来得到释放，有时只需要放松一下，而有时则需要挥霍和消遣。[②]

如果雇主忽视人性中的这一方面——而斯密认为，事实往往如此——就会对工人很不利。斯密承认人类肉体上的局限性，并由此指出，在工作—时间的时间长度和强度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他认为，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最优工作—时间。斯密建议雇主们重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而不要强迫工人去适应一种

---

① Bienefeld, M. A. (1972) *Working Hours in British Histo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② Smith, A. (196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 Vol. 1, p. 73.

过快的工作节奏。

庸俗的反革命

贪图物质和享乐是人的本性，高工资可以激励工人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这样的信念已经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统理论中的一部分。这些学者总体认为，分析者若要理解市场，首先需要洞穿表面现象。换言之，分析者必须找出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那种基础性关系，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市场关系。[①] 例如，李嘉图（Ricardo）认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确定这样一些规律，“这些规律调节产品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②] 对这些规律的探索使他得出如下结论：在产品分配的问题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随着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主导英国的政治经济环境，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的紧张程度相对减弱。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为促进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对资本家和食利者造成了威胁。到 19 世纪 30 年代时，很多经济思想家的作品开始反映他们社会中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他们的作品还反映出这样一种认识：很多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可能会被那些同情工人阶级的激进作家不恰当地使用。这一认识在很多学者那里表现为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性分析，而采用一种越来越具有辩护性的方法论，其作用更多的是赞颂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证明它的合法性，而不是解释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这直接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竞争的经济思想传统——边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工厂运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来创建边际主义传统的学者们开始抨击古典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

---

① Meek, R. (1977) *Smith, Marx and After*, London: Chapman & Hall.

② 转引自 Robbinson, J. (1964) *Economic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p. 36.

这位学者为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然而，令他声名鹊起的却是发表于1837年的关于工作—时间问题的评论性文章。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多地区的大规模失业。这赋予了资产阶级更大的市场支配力。在许多行业中，他们就运用这种市场支配力，残酷地延长工人们的劳动时间。[①] 作为对这种新情况的回应，要求法定最长工作日的“工厂运动”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也逐渐发展起来。

这一运动获得了纺织工人的大力支持。而且这些工人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知识界中自由主义改革家的支持，甚至还获得了部分统治阶级的支持。后者主要是托利党地主和那些能够以极小的成本缩短工作时间的制造业主。托利党地主支持纺织工人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担心对工作日的法律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辉格党领导了改革议会。[②]

要求对工作日加以法律限制的斗争，给那些庸俗（vulgar）经济学家带来了困扰，因为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标准时间会普遍缩短。19世纪20年代，这一运动刚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些理论家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然而，当这一运动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且变得更加激进时，他们就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工作—时间问题也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理论问题。由此所引发的争论的主题并不是为什么享乐主义的人会一齐选择缩短其愿意工作的时间长度，而是是否应该支持对工作日加以法律限制。起初，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斯密所谓的自由人的市场权利问题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成人作为自由人，有权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如果他们选择进入市场，并过度出售这种劳动力商品，那么这也是他们的权利。由国家来限制工作—时间，显然违背了这种自由，所以在

---

① Bienefeld, M. A. (1972) *Working Hours in British Histo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② Nardinelli, C. (1980) 'Child Labour and the Factory 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4), pp. 739—755;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und; Marvell, P. (1977) 'Factory Regul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Engl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 (2), pp. 379—402.

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加以反对。在这些观点上很少有异议。引起争论的是自由人的界定问题。儿童一般被认为是不能自由缔结合同的，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行使独立判断能力。那么，由政府来限制其劳动力的买卖难道就是正确的吗？布劳格（Blaug）[①] 指出，在 19 世纪 30 年代，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然而，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时候，一种统一性立场基本形成。共识性的观点是，对儿童的保护在道德上是正义的，那些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们不应该继续延伸，因为这必然会涉及限制成人的工作时间长度的问题。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侵犯”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此，儿童也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生存下去。

与保护儿童的法律相对立的立场难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这可以解释以下情况：一旦共识达成，那些经济学家就不会再公开宣扬上述对立立场。[②] 这还可以解释他们急于抓住由西尼尔（Senior）抛给他们的“救生索”的迫切性，这条“救生索”把争论的主题从个人自由和道德转向了生产过程。西尼尔认为，必须反对工厂运动，因为它们会消除利润，进而毁掉工业。但是，他的应急性论题犯了根本性错误，而且带有明显的偏见，所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能接受。但是，他的核心观点——“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大比率关系使长时间的工作更可取”，[③] 却被广泛地认为是正确的。他的关于缩短工作时间长度会导致产量成一定比例下降的假说，和他的结论——10 小时工作法案会导致价格上涨，进而破坏英国经济——一样，几乎都没有受到质疑。19 世纪 40 年代，经济学家们为了反对工厂运动，展开了这些围绕着生产（过程）的争论。必须反对对工作一时间的限制，因为它会给贸易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会使得与工人要求相对立的立场获得道德上的恰当性——因为如果经济衰退，工人们也必然会遭受损失。尽管先前这种性质的法律的确没

---

① Blaug, M. (1958)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A Reexamin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p. 212.

② Ricciardi, J. (1981) 'Class Struggle,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 Towards a Reformulat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4, pp. 91—92.

③ Senior, N. (1837)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s*, London: B. Fellows, p. 11.

有导致这种情况，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先例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了。

布劳格分析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工厂法案的反应。他认为，他们的理论分析对这场流行的争论并没有什么贡献。然而，这种评价并不公正，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这些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着实作出了诸多贡献——此后成为边际主义立场的核心观点。首先，他们开创了一种方法论，即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市场范围内的个人权利和欲求，而忽视那些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导致工人们要求法定工作日的因素。其次，工人阶级对工作—时间法律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时，他们对此作出的回应已经变成该传统的标准：即，对已经颁布实施的这类法律，只要还没有被证明对资本不利，就给予支持甚至是鼓吹，但同时又指出，这类法律的延伸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最后，他们开创了一种不理会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新范例，因为那些证据表明斯密所主张的缩减工作—时间的长度或强度并不一定会导致产量下降的观点是正确的。

上述最后一个原创性贡献尽管几经挫折，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到19世纪中期，它得到了广泛认可，直到工厂法案实施之后才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此期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亚当·斯密的观点，例如桑顿(Thornton)，但他们几乎都已经被遗忘了。桑顿曾经在1846年指出：

> 缩短劳动时间并不一定导致生产的缩减。不被强制长时间工作的人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在短时间内也可能完成以前用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第十一小时和第十二个小时里的工作很可能是在十分疲惫的状态下完成的，或许，在之前的十个小时里加紧完成也没有太大的难度。①

尽管这一论点对经济学家产生的影响甚微，却深受工人及其部分支持者的欢迎。而且，它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工作—时间理论的要点就是：工人们在缩短的时间段内更加辛苦工作的能力。

---

① Thornton (1971) 399. 本书参考文献中遗漏了具体版本信息。——译注。

马克思的工作—时间理论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里，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工作日的长度问题，还讨论了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他的论述首先就指出，工作日的小时数是一个变量。在一个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买卖的社会里，这引起了很多矛盾。当资本家购买到一天的劳动力时，总是希望能够从中获取最大的使用价值。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人们需要在第二天能够继续工作，而且为了正常地度过一生，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因此，工人们必须进行斗争，以确保他们每天所出售的劳动力商品的数量与这种需要相符合。这种根本的利益冲突，致使工人和资本家围绕着前者必须工作的时间长度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斗争。

马克思坚持认为，如果工人阶级无法抵制资本家对更大劳动量的要求，那么竞争会驱使资本家超越社会和身体的限制去延长工作时间。一旦所有剩余都被消费掉了，那么这种过度消费往往就会抬高这种商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是符合资本家的共同利益的。但是，这种共同需要的存在并不能保证个别资本家不会强迫工人过度劳动。如果条件允许，竞争必然会驱使资本家们这样做。马克思指出，单靠资本家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使各方面都满意的标准工作—时间安排的。因此，这就要求有一种力量，它凌驾于个别资本家之上，并由它来建立和强制执行这个标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就是国家。

工作—时间的强化

马克思认为，工作—时间法律的出现并没有终止资本主义过度消费劳动力的倾向。这种法律的颁布实施，从法律上限制了工人被迫从事劳动的时间长度。然而，至于在此限制之内能够做什么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最重要的是，国家没有，也不能控制工人们在既定时间内的劳动强度。换言之，几乎不存在对工作—时间的强度方面的限制。可见，过度消费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马克思指出，工作日缩短促使资本家大力提高生产效率，而达到这

一目的的手段是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投入都尽可能高效率地得到使用。这其中也包括对劳动力的使用。他指出，对于劳动力这种商品，标准时间的缩减不仅会增加资本家提高劳动—时间效率的需要，同时还会建立起使之成为可能的主观条件。他认为，工人们劳动时间长度的缩减会使他们保持一个更加密集的劳动力消耗水平。

> 要求缩短工作日的第一次努力，源自这样一条自明性法则：劳动力使用效率与其使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某些限制之内，因缩短劳动时间长度而遭受的损失，要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弥补回来。①

马克思坚持认为，由于工作—时间被强制缩短，资本家在竞争的驱使下会尽可能地在较短的时间内激发工人更大的工作能力。换言之，竞争会驱使资本家强加给工人更高的平均劳动强度水平。

> 工人被迫承受既定时间内更多的劳动支出，更高的劳动紧张度，以及近乎毫无间隙的工作日——总之就是一种被压缩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它只能在缩短的工作日的限制之下获得。将大量的劳动压缩在既定的时间段内，实际上就是变相增加劳动量。现在，劳动—时间除了具有一个“广度”值之外，还获得了一个强度值，或者说密度值。与过去的 12 小时工作日中较松散的时间相比，10 小时工作日中更加密集的时间包含着更多的劳动，亦即支出的劳动力。②

提高既定劳动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围绕着既定工资正常能够购买到的劳动力数量问题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工厂法案颁布之后。资本家只是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工作—时间强度方面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提高平均工作强度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在某些行业中，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很低，仅仅缩短工作日就会显著地

---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p. 535.

②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40.

提高“劳动过程的规律性、一致性、有序性、连续性以及劳动能量”。[①] 在这些行业里，建立计件工作制度，实施更为严密的监管以及重组生产过程，往往就可以确保每小时增加的产值足以抵消由于工作时间长度的缩短所带来的损失。但是，资本家对机器设备的系统化使用，才被马克思看作是确保工人能够在较短的工作日中从事更高强度的工作的主要客观手段。马克思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两种方式。一是，提高机器运转速率；二是，让工人们操作或者监管更多台机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作日缩短使得资本家要求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于是他们就会加快机械化进程，提高技术水平。马克思对工厂法案的回应是：资本家对提高每小时产出水平的需要，体现在机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上，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动机，也就不可能实现机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他引用英国工厂监察员的话来支持他的这种观点：

> 对每类机械的重大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劳动时间的缩短推动了这些改进。后者与强加在工人们身上的更大的压力相结合，致使较短工作日的产量并不低于以前较长工作日的产量。[②]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导致了更高的劳动强度。而这往往又会导致正常劳动时间长度的进一步缩短。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婪使他们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而这些错误使工厂法案从一开始就成为必要。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家们任意提高工作—时间的强度，往往会使它达到与工作时间的长度发生冲突的程度：

> 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劳动，而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重复性劳动。因此，必然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工作日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提高变得相互排斥，以至于延长工作日只能与低劳动强度相适应，反之，高劳动强

---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35.

②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40.

度只能与缩短工作日相适应。①

因此，缩短的工作—时间会导致劳动付出更加集中，进而导致标准时间进一步缩短。简言之：

> 一旦禁止延长劳动时间，资本家就会通过系统地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这种损失，并把对机器的每一项改进都转化为一种更为完美的压榨劳动力的手段。毋庸置疑，这一过程必将在短时间内再次导致一个关键点的出现，在这一点上，劳动时间的进一步缩短将不可避免。②

马克思的观点的命运

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在本质上具有预言性和易接受性，但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忽视了它，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好像又误解了其观点的本质。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专注于这一理论的有限的几个方面。在关于工作—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针对一些个别事例作出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并不充分，很容易遭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

克利弗（Cleaver）③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此类分析的典型案例。这位学者指出，工作—时间缩短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他认为，随着工人阶级逐渐发展壮大，它就会有能力向资本家发起挑战，并强行引入现代工作日和周末休息日。工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受阶级力量对比的影响，这一观点并不和马克思的相冲突。他还强调，标准工作日的确立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带有些隐秘性的“内战”的结果。但是他认为，资本家延长工作时间的能力受到工人们“强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33.

②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42.

③ Cleaver, H. (1979)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ondon: Harvester Press.

大意志”的限制，尽管他们只拥有“虚弱的身体”。[①] 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保持工作时间内的劳动强度不变而不断延长劳动时间长度，或者相反，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必然会在某一点上达到人类那种难以逾越而又具弹性的（身体）限制。人的能力与意志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马克思的工作—时间理论的核心。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释标准时间逐渐缩短的原因时，往往不强调或者忽视理论中人的局限性这一方面。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观点的唯物主义基础。剩下的部分明显是不充分的，就像海曼（Hyman）所指出的：

> 马克思的理论高度根本上源自一种创造性张力，即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决定性（structural determinacy）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历史主动性的双重强调之间的创造性张力。[②]

对标准工作时间缩短的解释，例如克利弗的观点，如果仅仅强调政治力量，那么它本质上是理念主义的（idealist），因为它把人的意志或意识当作是导致标准工作时间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边际主义的偏好论。

为什么那些解释工作—时间为何发生变化的非唯物主义观点基本上没有遭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这一点很难解释。毕竟，马克思对人的能力、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马克思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去研究生产过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没有追随他。《资本论》第一卷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布雷夫曼（Braverman）指出，尽管如此：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贡献极少……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再也没有人按照

---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26.

② Hyman, R. (1980) 'Theor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Toward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in *Paul Boreham and Geoff Dow Work and Inequality*, Melbourne: Macmillan, p. 5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做法继续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①]

对作为一种分配体系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取代了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在工作—时间方面，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因此就忽略了劳动时间的强度方面，或者仅仅给予其形式上的肯定。劳动—时间的单位，如小时、天等等，都被当作是同质性的概念。他们大多忽略了以下情况：生产领域中的新进展正在改变着这些时间单位的质性内容。而缩短工人必须从事的劳动时间长度则被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发展。

杰文斯（Jevonsian）革命

在对工作—时间变化的分析中，马克思延续并扩展了由亚当·斯密开拓的分析路径。但是，他仅仅关注其中集中于生产过程的部分，而很少关注收入问题，以及收入如何影响工人愿意从事劳动的时间长度的问题。而边际主义传统却将斯密思想中的这个方面当作其工作—时间理论的核心。然而，工人阶级对法定工作日的要求使这一传统的支持者们难以继续坚持这样一种作为个体的工人所持有的观念：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总是会选择最大程度地延长工作的时间。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享乐主义的人会选择缩短其愿意从事劳动的时间。杰文斯（Jevons）对效用概念的使用就满足了这种需要。[②] 对边际主义者而言，效用会成为一种享乐主义理论的关键概念，这一理论把人看作是这样一些个体，他们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快乐最大化。效用被等同于欲求或者需要。他们认为，尽管这些主观因素不能被直接测量，却可以通过它们所引发的外显现象实现对它们的间接量化。因此，尽管某人对某物的欲求程度不能被直接测量，但是可以通过观测此人为满足其欲求而愿意付

①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 9.

② 参见 Jevons, W. S. (1965)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 M. Kelly.

出的价格，来评估其欲求程度。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人的需求在其多样性方面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但在任何个别对象上却是有限的。

杰文斯认为，劳动是一项“痛苦的付出”，要么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要么为了获得快乐，而且这种快乐要大于获得它时所经历的痛苦。他指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当劳动所得的报酬正好抵消所付出的代价，人们就会在其需求的驱使下，努力跨越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他们会停止通过工作获得快乐。如果这一过程继续下去，另一个点就会出现，此时增加的劳动过于沉重，超过了所有其他因素。杰文斯指出，在这个时候，工人会停止工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人类本性。

杰文斯认为，将这种简洁的关系复杂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究竟工人们会对工资率的变化作出何种反应？他认为，工资变化会产生两种结果。当每小时工资增加时，工人就会得到更多报酬，因此，工作的动力也会更大。这当然就会促使工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情愿以工资收入代替休闲，因为这样做会增加其总效用。另一方面，现在工人每工作一小时就会获得更多的报酬，这一事实意味着额外收入的边际效用减少了。如果工作时间不变，较高的收入可能更容易满足工人们的欲求；如果劳动的痛苦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工人们就会通过减少卖出的劳动力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两种情况就是现在所谓的替代品效应与工资效应。杰文斯认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就不能判定工人面对工资变化时会做出何种反应。但是他相信，有证据可以表明，如果工资上涨，工人们大多会选择缩短工作—时间。他的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英国的工作时间在过去 25 年里的总体下降的趋势。

巨大的羞辱

杰文斯的论题，包含了当代边际主义工作时间理论的所有要素。[①] 个人追求其（按照收入衡量的）效用最大化，决定了工人正常劳动的时

① Blaug, M. (1958)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A Reexamin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p. 212; Kerton, R. M. (1971) ‘Hours at Work: Jevons’ Labour Theory after 100 years’ *Industrial Relations*, 10, 2, p. 230.

间长度。这一假说几乎得到了所有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可。但是，这一共识的达成并非易事。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很难接受将个体意识作为对工作—时间不断变化的唯一解释。其中有许多重要人物都极力反对工厂法案。这些人认为，由于生产过程的本质，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实，即他们的孩子必须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他们坚持认为，工人的主张——较短的工作日并不一定会影响产量——是毫无道理的。结果，他们遭到了当众羞辱，因为10小时法案实施后，他们的“科学”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工人们因此谴责经济学家只是资本家的仆人而不是科学家，这些谴责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而这时又正是经济学的有效性遭受全面质疑的时候。[①] 19世纪6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公开承认，他们的论断已经被新法律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忘记和忽略工作—时间和产量之间的非比例关系的重要性，而赞成那种忽视这类因素并局限于对个人欲求进行分析的观点，对他们而言并非易事。

而且，当时英国的发展也使他们无法忘记羞辱。1871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理论》出版，此时正值第二次工作—时间缩短的大潮横扫英国之时。1872年，争取提高工资和9小时工作日的罢工运动席卷整个工业界。此后，这场动荡的势头逐渐减弱，但还是持续了两年。最终，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每周54小时到56.5小时的正常工作周。在那些工作岗位固定的行业中，9小时工作日基本上成为标准。

> 这场运动遍及整个经济领域，几乎对所有有组织的行业（organized trades）都造成了重大损失。甚至连那些未组织起来的和无法组织的行业也遭受了影响，所以，1872年6月那场“争取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的罢工运动，遍及了所有的工业行业。”[②]

这场动荡使关于工作—时间的讨论再度活跃了起来，并且恢复了对

---

① Checkland, S. G. (1951) 'Economic Opinion in the England as Jevons Found It',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 p. 147.

②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 106.

它的政治性讨论。这些讨论引来了众多关注和广泛参与，而且一直延续到1874年的“大萧条”之后。

经济危机及其理论

大萧条持续了20多年。它严重地压缩了利润空间，并且明显地提高了英国资本家的竞争压力。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最初的对策是削减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中高度组织化部分的抵抗。[①] 雇主们发现延长工作—时间会引发工人抵抗，而且这样做的好处也很有限，转而更加重视提高工人劳动—时间的强度。据利特尔（Littler）称，在大萧条时期，资本家利用其增强的议价能力，强制加快工作节奏。在经济危机期间，提高工作强度的问题变得意义重大，甚至取代了工资问题而成为工业争论中的主要议题。

经济萧条一方面使资本家能够要求并且强制从工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工人抵抗运动的决心。工会坚持认为，由于高失业率的出现，必须从总体上缩短每个工人被迫从事劳动的时间长度。工会还利用资本家的传统论调，即，缩短工作时间将会减少产量，据此指出，强制执行8小时工作日会自动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他们还指出，8小时工作日法规是提高英国工业的生产效率所必需的，后者曾经因为过长的工作时间安排而遭到破坏。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实行8小时工作日，资本家实际上也会受益，因为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产量，降低单位成本。可是，反对者很快就指出了工会主张的矛盾性，并以此反驳工会的主张。因为工会一方面想要通过缩短工作日来削减个人产量，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又认为这样做会提高生产效率，所以不会影响产量。这种自相矛盾性一经指出，就在工会的支持者中引起了混乱。

随着众多自由党政客转而支持8小时法定工作日的建议，克服上述

---

① Littler, C.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ur Proces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London: Heinemann.

矛盾性的需要就变得更加紧迫。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宣传鼓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关于工人生产效率的观点的有效性被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所证实。为了维持与自由党人的同盟关系，工会及其支持者们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放弃有关失业问题的争论。结果，这个议题就被悄无声息地隐匿了。[①]

技术决定论

面对如此多的争论，英国边际主义者发现，他们不能将工作—时间仅仅视作是收入的函数。他们的确把收入假说包含在对工作—时间缩短的解释之中，但这种假说已经被降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让位于一种围绕着生产过程的解释。查普曼（Chapman）[②] 关于工作—时间的论述，是1930年之前的那一时期的经典论述。他指出，实际工资的增长既能改善工人休闲的质量，又能降低工资的边际效用，而且还可以促使工人们缩短其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但是，查普曼坚持认为，这一因素仅仅是导致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长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的补充。这个更为重要的主要因素就是工业化进程。

查普曼指出，与农业劳动相比较而言，工业劳动必然更具规律性和连贯性。而且，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劳动会变得更加严格。机器的使用通常可以大量减少劳动过程中的身体紧张，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少的劳动付出。机械化要求专业化，所以机械化就意味着要消除浪费，这其中也包括对工作时间的浪费。这就会导致在传统工作过程中间或出现的闲暇时间被部分地甚至完全地取消。由于劳动单调性加重，时间安排加紧，工作日变得集中起来，也必然更加劳累。查普曼指出，很多调查报告表明，在过去几年里，工人们在工作中所遭受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它不断盘剥人们的精力，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总之，这才是工人们一再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首要原因。

---

① Harris, J. (1972)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② Chapman, S. J. (1909) 'Hours and Work', *Economic Journal*, 19, p. 355.

现在你明白了。现在你没有明白。

查普曼对工作时间趋于缩短的解释，在他自己所在的传统中，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到20世纪30年代时，这种解释已经被英国的经济学家广泛接受，而且他们往往会把那些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与查普曼的贡献联系起来，查普曼的观点已经被当成了公理。罗宾斯（Robbins）就是一个例子。1929年，经济萧条期即将到来，对工作—时间变化的就业创造能力的兴趣再次出现。罗宾斯试图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缩短工作时间，市场力量是如何影响工资和就业的。罗宾斯承认，工作—时间与产量之间不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这一事实对他想要澄清的问题并无助益，反而使他的分析复杂化了。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采用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方法论策略。他假设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工作时间长度的任意变化都会偏离“最大生产能力”那一点。[①] 在这样一个假设的情景中，工作—时间缩短必然就意味着产量减少。但是应该强调的是，他并没有说实际的工作时间就是这一点上的工作时间。他只是采用了一种抽象化的手段来突出他的兴趣领域，并简化他的讨论。

三年后，希克斯（Hicks）为了简化他对个体劳动供给问题的分析，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同罗宾斯一样，希克斯认为查普曼已经给出了所有导致工作—时间变化的原因。但是，为了获得一个匀质的劳动力单位以便运用边际生产率理论，他“暂时”假设存在一个最优工作日，与其他工作日相比，它能带来更多的劳动供给。[②]

通过这种简化抽象的策略，罗宾斯和希克斯就无须在各自的分析过程中再考虑工作时间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假设的世界里，工作时间的长度缩短必然会导致每个工人的产出下降。这种抽象，作为一种强调和澄清这些学者想要考察的那些理论方面的手段，是完全有效的。而它的风险在于，使用它的人有可能会忘记自己是在对真实世界进行抽象。所以，希克斯提醒到，当提出这种简化假设时，需要特别小心。

---

① Robbins, L. (1929)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Variations of Hours of Labour', *Economic Journal*, 39, p. 25.

② 参见 Hicks, J. R. (1963)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 当处理一些特殊问题时，这样做显然是十分便利的；但是这种方法隐含着许多危险，只有通过尽可能经常地将我们的论断还原为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现实的形式，才能避免这些危险。①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有人会相信这种存在于抽象之中的假定关系真实地描绘了现实世界。边际主义的工作—时间理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1945 年以后，科学被应用于工作—时间问题，再加上长期繁荣时期经济稳定，使工作—时间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政治性，而变成一个引发阶级内部矛盾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克斯警告过的那种危险出现了。

在当代边际主义理论中，由罗宾斯与希克斯所设计的那种假设的世界，被隐含地和明确地认作现实。它们的预设是：工作时间长度的缩减必然伴随有产量与工资的下降。大多数边际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工作—时间只有一个单一的维度，并且产量的下降与工作时间长度的缩短之间存在着成比例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对市场力量与个人欲求的片面关注，几乎已经把人的局限性和生产过程从这一传统的整个分析方法中完全剔除出去了。

> 劳动投入的单位被指定为“工人”或“工时”，如果不涉及工作时间的长度，劳动投入的变化会影响产量。正如生产函数外在于经济学而存在于工程学领域，确定适宜的工作日长度是属于劳动生理学和劳动心理学领域的问题。②

边际主义者们将生产过程从他们的分析中剔除出去，所以与杰文斯对工作时间缩短的解释相比较，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个不纯正版本。他们并没有接受杰文斯的全部观点。对无差异分析的应用又将其修改成为一种更为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形式。由于对无差异方法的运用，他们只需

---

① Hicks, J. R. (1963) *The Theory of Wages*. p. 93.

② Grossman, P. (1970) 'Hours and Output: The Reduction in the Soviet Workweek, 1956 – 1961', PhD thesi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p. 11.

要考虑究竟是收入效应是主要的，还是替代效应是主要的。杰文斯承认工人会历经痛苦，并且认为需要确定和量化这种痛苦的程度，不过这些也被剔除而不予考虑了。在当代边际主义的文献中，甚至连工作是工人面对贫困时的替代性选择这个观点，也逐渐变得模糊了。无差异分析将工人所面对的两种痛苦抉择——饥饿与工作，变为了两种商品——工资与闲暇。这就意味着，工人并不是被迫按照某一特定的时间表工作，甚至根本不用工作。工人工作的时间长度只是一个偏好问题。雷诺兹(Reynolds) 就曾经简明地提出：

> 从长期来看……工作小时数的变化反映了工人的偏好。每周工作的小时数从世纪之交的大约 60 个小时，变成了现在的 50 个小时左右，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工人发现，与按照以往的时间表工作获得高工资相比，他们更偏向于增加闲暇时间。当大多数工人们得出结论，认为一周工作四天或是一周工作 30 个小时会使收入与闲暇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关系。那么，管理方法和工会政策就会往这一方面调整。①

边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在战后的几年里，无论是边际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作—时间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都已经从生产的角度转向分配与交换的领域。他们大都忽略了以下观点：人的能力与生产过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会引起该领域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学者认为需要涉及这一议题，但他们基本上都会断言：尽管这一观点在早期的时候还具有一定的意义，若要解释工作时间降低到每周 48 小时以后的变化，再考虑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更确切地说，这两个传统的支持者分别把不断增加的收入和阶级力量对比当作是导致工人正常劳动的时间缩短的主要原因。既然忽略工

① Reynolds, L. G. (1974) *Labour Economics and Labour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p. 34.

作一时间理论中关于人类局限性方面的合理性还没有在理论上或者经验上得到证实，对待这些观点的时候就必须谨慎。所以在接受任何一种观点之前，明智的做法是，认真检验以下两个观点的依据，即工作一时间是收入的函数，以及人类的局限性可以完全忽略。

第四篇

工作与组织

第九章　时间与职业满意[①]

罗纳德·罗伊

本研究描述了一种社会互动，并对它进行了探索性分析。这种社会互动发生在工厂里机器操作工人的工作小组之中，我对它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本研究给出的事实的和概念性的材料集中了两方面的研究兴趣，具有双重意义，对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贡献。这些操作工人要做的就是一周 6 天、每天都忍受着超长的工作日，重复着简单的操作，所以，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付令人生畏的“单调猛兽”。工作小组究竟如何利用其自身的资源与这个“猛兽”作斗争，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值得那些探索如何提高职业满足感或者员工士气这种实际问题的人的关注，也为那些试图揭示小型群体的奥秘的人提供了洞识。

将这两方面的兴趣相结合的做法并非（本研究的）创举。在涉及“群体”与“工作中的快乐”之间的联系的众多研究者和文献作者中，沃克和格斯特（Walker and Guest）[②] 曾经观察过汽车组装流水线上的社会互动。他们引用组装流水线上工人们的话说，“我们有很多乐子，而且一直在闲聊。”[③]“如果不闲聊，也不开玩笑，你就会疯掉。”[④]

---

① 选自 Roy, D. F.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 1960, pp. 156—168.

② Walker, C. R. and Guest, R. H. (1952) *The Man of the Assembly Lin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③ Walker, C. R. and Guest, R. H. (1952) *The Man of the Assembly Line*. p. 77.

④ Walker, C. R. and Guest, R. H. (1952) *The Man of the Assembly Line*. p. 68.

一组机器操作工人如何避免在枯燥单调的工作环境中“疯掉”？我试图在对这一问题的说明过程中，展现（工人们）一连串的互动，正是它们构成了工人们适应行为的内容。闲聊、逗乐和玩笑解决了“心理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将依据它们在群体内部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来描述它们。另外，由于一次偶然的“自然实验”，我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维持群体平衡的行为。我无意间在连续的互动过程中引入了一些易起争议的内容，结果导致群体互动突然地、暂时地消失。

我与我的工人同事在漫长的工作日中从事着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且是和工厂里的其他员工相隔离的。我们的机器生产线被冲切车间的四面墙封闭起来，从而与工厂里其他的工作领域分隔开来……我们偶尔也会与“外面”的员工接触，但通常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尽管每天都会有一个人来我们这里取走加工好的材料，并将它们送往下一道工序，但除此之外，这样的到访都很偶然也很少见。

另外，我们和管理层成员进行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不多。没有所谓的工头来回巡视。在这两个月的观察期中，唯一一位出现过多次的公司管理人员是厂长……

就我们这个工作小组的情况而言，这里实行完全放任式管理，没有专家的干涉，也没有时间研究工程师或者对效率和良好人际关系的情况感兴趣的人事人员紧盯不放。而且也没有以安全、娱乐或者生产委员会的形式出现的工业民主……

我们的工作小组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来获得工作中的乐趣，而且根本也没有积聚起对管理层的敌意，而这种敌意有时可以激发一些有趣的活动，以占据工人们的手和脑。缺乏产生创造性经验的不竭源泉，群体就会面临群体内部冲突的威胁，因为创造性经验可以填补由无意义的工作所造成的空洞的时间。①

平压冲切机被安置在一个大约 30 英尺×24 英尺大小的房间里。一共有 4 台这样的机器，它们被沿着一面墙排列成一排，忙碌的工人只要一抬头，就可以透过三个严实的大窗户中的一个看到外面，以此来振奋

① 参见 Roy, D. F. (1953) 'Work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Reward in Quota Achievement: An Analysis of Piecework Incen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pp. 507－514.

一下精神……在生产线的另一端，摆放着一张桌子，它间或成为一名女职工的工作台，她会在这里完成各种更加复杂的工序。这个位置的四周堆满了生产原料和货架，看上去就像是一座监狱中的监狱……

工作小组

起初，我只是一心一意地关注三个相关目标：提高我的机器操作技术，增加我的产出率以及确保我的左手不被机器截到，所以没有特别留心我的同事，只是通过观察发现，他们都是中年、外籍，为人友善，经验丰富，并且非常健谈。从他们彼此的称呼中，我得知他们的名字是乔治（George）、艾克（Ike）和萨米（Sammy）。乔治快 60 岁了，个头不高却很壮实，他操作的机器是最边上的一台；我发现，他是年轻时从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移民过来的。艾克的工作岗位在乔治的左边，他长得高而瘦，刚刚 50 出头，是犹太人；年轻时从东欧来到这里。萨米，在这条生产线上位列第三，就在我的旁边，长得很笨重，快 60 岁了，也是犹太人；在希特勒即将进军东欧之前，他从那里逃了出来。近年来，这三个人都已经在职业上走下坡路了。

我还发现，这条生产线体现了一种等级体系，从乔治到我，呈降序排列。乔治不仅是我们这个群体里资格最老的，实际上也充当着小组领导者的角色。以下事实就可以表明他较高的地位：他每个小时比其他冲切操作工多领 5 美分；接受最长的工作日；负责每天的工作交接；在工作场所之外，与厂长交流整条生产线的工作事务，并把他接到的指示传达给我们……

艾克在资历上仅次于乔治，再次是萨米，我当然是资历最浅的。还有其他现象可以表明地位差别，但是它们都表现在非正式互动中，会在后文中加以描述……

女职工就在乔治机器后面的一张与外界隔绝的桌子上工作。这份工作是正规的 8 小时白班，从 8 点到 4 点半。在我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有两名女职工做过这份工作；先是梅布尔（Mable），后来贝比（Baby）接替了她。她们两个都是黑人，年龄都接近 30 岁。

第五个冲切机操作工是个阿拉伯流亡移民。他叫布（Boo），自己一个人上夜班。他经常会在晚上 7 点的时候到工厂，接手艾克的机器。

工　作

我在筋疲力尽地完成第一天的工作之前就明白了，我的冲切工作将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对手就是钟表，在这里就特指那个被安放在乔治机器旁边的架子上嘀嗒作响的老式钟表。就过去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历经过各种不同情况，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糟糕的工作条件——超常的工作日，精神刺激匮乏，身体活动极度受限……这份工作需要待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在三个老家伙旁边站一整天，透过严实的大窗子只能看到仓库的砖砌外墙，腿部运动基本上仅限于将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外一只脚上，手和手臂的运动大多也只是重复性的：放冲模——砸按钮——放冲模——砸按钮。智力活动则只剩下计算距离下班的时间。

在第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前，枯燥的工作又带来了疲劳。我感觉筋疲力尽。我的腿很疼，我的脚也疼……

我的头脑里萦绕着这样的想法：放弃这份工作，再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也是一样：单调枯燥的工作，疲惫的双腿，疼痛的双脚，以及放弃工作的想法。

工作中的游戏

亨利·德·曼（Henri de Man）[①] 曾经讨论过以下话题：工人们会奋力“坚守工作中剩余的快乐”，他经过全面的观察后认为，“从心理上，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丧失其全部的积极情感要素”，而且工人会在任何指派给他的工作中发现意义……”

于是，我就在那连续不断地将塑料片切割成小椭圆形、手指形和梯形的工作中寻找意义……我确实发现了“某些发挥主动性的空间”，也就是变换工作活动的自由，而且工人从这种极其有限的自由中发展出一种工作游戏。

这种游戏相当简单……它基本上包括：（1）变化材料颜色，（2）变

① De Man, H. (1927)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 New York: Holt.

化冲模形状，以及（3）所谓的“打磨印模”。游戏的基本程序就是将以上各部分进行特别组合，它可以被表述成：“这种我已经做了很多，要开始做那种了……”或者，“……目标中就包含了变换模具”。

打磨印模可以增加可能的变化，从而使游戏变得更加有趣；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当某些工作日的工作安排要求工人只使用一种模具和一种颜色的材料时，此时只有它才能提供实在的回报。打磨印模在操作上很简单；用一把粗齿锉刀将印模上表面的粗糙不平的地方磨平。但是，作为工作游戏中智力与情感内容的组成部分，这一活动本身就是变化之源。在冲切出1000个白色的梯形切片之后，印模的左上角可能就被磨损了，然后就打磨。接下来是右上角，等等……

所以，工作游戏可以被描述成一系列连续的短期生产目标的组合，完成目标的报酬就是变换活动……

但是，还是应该避免草率地得出以下结论，即冲切游戏令我乐在其中……

这种情况只是反映了亨利·德·曼关于“坚守工作中剩余的快乐”的说法。至于坚持的程度和坚持的时间，却还没有定论。第一周结束之前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使我对工作环境的适应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工作游戏还在继续，只是情境已经改变。工作游戏的作用已经绝对地从属于另一种职业满足感的来源。

工作小组的非正式社会活动：时间与主题

当我开始认真留意身边的社会活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对这种活动的介入，我开始关注它。在我开始主动倾听之前，我所听到的只是一连串不连贯的交流片断，毫无意义。他们的外国口音浓重，谈及的对象在意义上也不连贯，只是一些“叽里咕噜”。在我开始观察之前，我所看到的只是突然爆发的喧闹，它们形式简单，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十分幼稚，以至于不值得注意。例如，当萨米去厕所或者去喝水的时候，艾克就会关掉萨米的机器。而萨米则总是成为这场阴谋的受害者。因为他回到车间后总是试图直接操作他的机器。每当萨米鲁莽地陷入这种简单的圈套，他就会大声责骂以表达愤慨，艾克则会得意地傻笑，而乔治会给予父亲般温和的责备。起初，我对这个过程的兴趣在于，我想

知道艾克什么时候才会厌倦这种乏味的玩笑，或者萨米什么时候才会在他使用机器之前，先检查一下电源。

但是，当我开始更加细致地观察的时候，当我开始逐渐熟悉这个交往系统的时候，之前的不连贯开始变得连贯了，无意义的也变得有意义了，模糊的也变得清晰了，愚蠢的其实是好笑的。当这种互动的内容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意义时，这种互动开始显露出内在结构。其中有“（各种）时间”与“主题”，以及它们各自的作用。这种互动有很多微妙之处，我也开始品味和鉴赏它们。我开始记录那些现在看来还并不重要的情况了。

时　间

随着对结构和意义的认识逐渐清晰，我发现漫长而枯燥的工作日已经被一类间断事件打破。它们并不是前文所提到的那种在常规工作中正式制定的或者刻意安排的间断。另外的这一类间断事件每天都重复地出现于一系列有序的非正式互动之中。它们部分地，但也只能是部分地和粗略地类似于生产过程中的那些平常间断，例如，咖啡时间，可乐时间，吸烟时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发生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作为每天日常安排的组成部分，它们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发生；它们持续的时间很短，所以对工作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它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作为中间休息所发挥的功能，尽管它们确实提供了身体上的休息。它们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对时间流逝的过程点的强调，尽管它们也能够发挥这种作用，而且比乔治那个闹钟指针的作用更显著……这种互动性间断（interactional interruptions）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兴趣。这种使工作活动暂时中断的身体互动（physical interplay）会引发小组成员的言语交流和思维活动，直到下一次休息时间的到来。因此，这种群体互动不仅把时间划分开来，还赋予时间内容，加快时间的流逝。

一天之中大多数的中间休息都被工人们称作“（某某）时间”，工人们在这些“时间”里，主要就是吃东西或者喝饮料……

在我工作的第一周里，当我被鼓励和他们一起分吃两只桃子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注意这种有关“时间”的事情。桃子是萨米拿来的；他大声宣布“桃子时间！”之后，就从午餐盒里取出了两只桃子。一开

始，我拒绝了他们递过来的水果，但是后来每每都会吃掉我那半个桃子。萨米每天都带桃子过来，并且高声宣布“吃桃时间!”，尽管有时候要艾克提醒他，催促他赶快拿出上午的零食。艾克总是抱怨水果的质量不好，而他的抱怨让桃子提供者与挑剔的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嘲弄愈演愈烈。在深刻洞察“桃子时间”的功能之前，我确实也发现桃子的质量不太好，但我当时觉得艾克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对送上门的礼物还挑三拣四。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萨米还会继续和这个不知道感恩的家伙分享桃子。

桃子时间之后大约一个小时，香蕉时间又开始了。依然是萨米提供零食——一根香蕉。我们四个没有办法一起分享萨米的香蕉。艾克会偷偷地溜到萨米的工作台后面的架子那边，从架子上的饭盒里取出香蕉，然后一口吞掉。每天早上，艾克偷偷拿走香蕉之后，就会大喊“香蕉时间!”然后他就很快地吃下他的“战利品”。萨米就开始抗议、谴责，但是这些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乔治会温和地批评艾克几句，但有时也会责备萨米太小题大做。香蕉原本是萨米留着午饭时间自己吃的；他从来没有吃上自己带来的香蕉，却还坚持每天带一根。起初，这种每天都会发生的偷盗事件使我感到震惊，但是后来，我逐渐开始期待这种每天的抢占行为以及随后发生的言语互动。

接下来就是窗户时间。它在香蕉时间之后，是气愤的萨米对艾克苛责的结果。艾克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指责成一个缺德的和坏性格的人之后，采取了他的“最终”报复：打开萨米机器所正对着的窗户，让萨米吹“冷风”。因为，“乔治是个好爸爸! 艾克是个坏人! 很坏很坏的人!”……萨米不断重复这种招惹怨恨的比较，让艾克失去了耐心和克制力。

下午会有取货时间（pickup-time），腌鱼时间和可乐时间。我所说的取货时间，指的是一种工作性质的来访，即每天都有一个人过来把成箱的加工好的材料运走。这个过来取货的人是个黑人，他来的时候总是很吵，就好像是每天运行的客运列车到达一座与世隔绝的小镇一样。互动强度很快就达到了顶峰；所有的交流，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都集中在这短短几分钟里。来取货的那个人总是要大声贬损冲切部门在之前 24 小时内完成的工作量。他的那些挖苦大概就是“这就是你们干的全部？你们几个整天都干了些什么?”这些贬低的话也会遭到反击，

暗示取货人享受着“轻松的工作”。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会顺便谈及一些很重要的新闻，例如，公司下属各工厂中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裁员事件，或者公司产品订单的增减情况……

在取货时间的互动内容中，有一部分是不变的，即由艾克把取货人引领到乔治那里。艾克会模仿一种庄严的语气说“拜见 Papeatis 先生!”取货人每天都会“拜见”Papeatis 先生，而这显然使后者很恼火。在另外一个取货时间里，贝比（或梅布尔）会被卷入互动：“我希望你能离贝比远点！他是亨利的女朋友!”亨利是一个强壮的黑人，有着隆隆低沉的嗓音，不经常来冲切车间，偶尔会开着叉车来送材料……贝比则在旁大笑，这也是她唯一的参与内容。

下午过半，腌鱼时间到了。乔治和艾克会把手头工作停几分钟，吃一点艾克带来的腌鱼。我和萨米既不会去分享这种营养品，也不会被邀请共享。我很感激他们不叫上我；那些腌鱼带来时用报纸包着，头尾也都没有去掉，这让我大倒胃口……

可乐时间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这是一个全体参与的时间。我们四个人轮流到四层的自动售货机那里去买饮料。经过乔治的整体协调，去四层取可乐变成了我的日常工作；我们这位组长注意到，我往返四层的速度比萨米或艾克快很多……

主　题

更详细地说，在“（某某）时间”的互动框架中，工作小组发展出了多种言语互动的“主题”，而且这种言语互动已经在不断重复中实现了标准化。这些话题的内容涉及广泛，从毫无意义的闲聊，到认真严肃的谈话。与各种时间不同，这些主题混杂在一起，也没有固定的顺序。在喧嚣的玩闹之中会突然插进严肃的谈话，或者相反。认真严肃地讨论生活成本高这一话题的时候，艾克可能会突然在易受惊吓的萨米的背后丢下一个重物，或者用一个满是灰尘的纸袋子敲萨米的脑袋。互动立刻就变成了一场低俗滑稽的打闹——拍打、威胁、大笑以及非难，萨米也总免不了要絮叨 10 分钟：“艾克是个坏人，非常坏的人！乔治是个好爸爸，非常好的人!”……“玩笑主题”通常是由乔治或艾克发起的，而萨米经常是被取笑的对象。有时艾克也不得不成为笑柄，但乔治很少……

萨米偶尔会接到妻子的电话，他总是说他妻子在电话里要求他在回家的路上去商店买些日用品，而工人们则常常对这种说法假装怀疑。大家常常取笑萨米被老婆盯得紧、管得严，还怕老婆。大家总是翻来覆去地念叨："你究竟是男人还是老鼠?"而且不仅限于上述情境。艾克与夜班工人布共用一台机器，也一起负责这台机器的工作计划。所以，艾克总是在产量问题上陷入一种不公平的比较。在社会关系上遭到隔离的布，选择在孤独的夜晚上班而不睡觉，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绩效水平，而乔治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艾克指出这一点。恰好布是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穆斯林，他不喜欢犹太人；而艾克是犹太人，所以他尤其不喜欢布。每当乔治称赞布前一天晚上的产量时，艾克就试图把他们两个的谈话变成一种共同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对阿拉伯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乔治绝不允许对这个话题展开严肃讨论，所以总会笑着警告他："你要小心布！他有一把长刀!"

另一个玩笑主题是从一些私人信息发展而来的，而这些私人信息又是在关于个人财产和高额税收的严肃讨论中被透露出来的。我曾经提到自己在西部的某个州拥有两英亩土地。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听一些关于"达内利（Danelly）的农场"的问题、建议和胡说八道。这个"农场"很快还畜养上了马、牛、猪、鸡（和）鸭……

严肃主题会涉及小组成员过去所遭受的不幸。乔治会反复提起他的生意因为火灾而失败。艾克的抱怨总是围绕着长期患病的妻子，他的妻子做过很多次手术，还经常住院……萨米则总是回忆起自己放弃上升的事业逃离欧洲的情景。

但是，并非所有的严肃话题都是悲伤故事。一个最受欢迎的严肃主题就充满乐观气氛，它可以被称作"达内利的未来"或者"让达内利有个好工作"。他们知道我上过"大学"——通往机会的神奇之门，但是并不清楚我具体的学习历程。他们会向我建议一些好工作，而他们的这些建议都是以他们朋友的朋友的情况为依据的，因为那些人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获得了成功。"你为什么在这里工作?"面对这个意料之中的问题，我总是强调这里"加班费高"的特点，而这个解释似乎可以暂时搪塞过去。

"教授主题"是一个相当重大而严肃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可以被称作"乔治女儿的婚事主题"；乔治的独生女的婚事和乔治与高等教育的

联系密不可分。他女儿刚刚与一位教授的儿子结婚，这位教授在当地的一所大学执教。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个教授主题并不是一个交谈的主题；只要提及这一主题，就只有乔治自己在说。两个犹太工人则在旁满怀敬意地静静地听乔治谈论那个包括结婚照在内需要花费 1000 美元的盛大婚礼。这是乔治的个人演讲，但是当乔治说自己在周日下午和教授一起在中途岛散步，或者在周日晚上与教授共进晚餐……就会有倾听、有交流，就像神殿中的神圣交流。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乔治并不是因为是我们的组长，或者加班一小时多得 5 美分，而是因为他与教授的关系，才在小组中保持了较高的地位。

如果教授主题可以被比喻成言语互动中的奶油，那么“唠叨主题”就应该被比作残渣。唠叨主题几乎不能被看作是主题；也许它们应该被称作“言语状态”，或“口头表达的自我中心主义”（oral autisms）。其中有一些都很难被说成是交流状态；它们就像是动物的咆哮和啼叫。它们是叫喊，突然说出的激动言语，歌曲或打油诗的片断，自言自语和低声抱怨。它们被确定为主题的原因在于其重复性这一特点。它们是一些重复性话语，被翻来覆去地说了一遍又一遍。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萨米总在重复的话：“乔治是个好爸爸，一个非常好的人！艾克是个坏人，一个很坏的人！”还有一个例子，当艾克在……萨米背后落一个重物（吓唬他）的时候，萨米会连续 10 分钟不停地唠叨：“别烦我！没看见我正在忙吗？我非常忙！”……

起初，我以为他们缺少社会互动，还因此感到灰心丧气。而我现在意识到这只是因为缺少观察。互动一直都存在着。它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保持兴趣，以便度过漫长的一天。于是，“砸电钮——移动冲模——砸电钮——移动冲模”的 12 个小时变得和油田上从事各式活动的 8 个小时，或者在机器车间里玩计件工作游戏的 8 个小时一样，可以轻松应对。“单调之野兽”变成了温驯的小猫。

黑色星期五：工作小组瓦解

之前所说的一切在“黑色星期五”结束了。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破坏了这个互动系统，以及由（各种某某）时间构成的框架和像马赛克一样的主题，这里的工作环境退回到了原子化状态和看管机器的苦差。成

为导火索的事件是被故意引入的，其后果却没有被预见。

黑色星期五那天，萨米没来，他休假。所以，这天早上没有桃子时间，也没有香蕉时间。但是……稳定的主题流使上午的时间变得很充实。从进展情况来看，这一天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至少也会达到由于萨米不在而造成的稍微降低的期望。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改变教授主题。当时，我正在萨米的机器上工作，正在冲切皮夹上的皮革部分。这个主意一下子就引起旁边艾克的注意，我小声提议："告诉他（乔治）你看见教授在麦迪逊大街上的一家美发学院教课，怎么样？……就说那个地方离霍尔斯特德街（Halstead）很近。"

艾克想了几分钟，认为可行。他继续工作了一会儿之后，就把自己在西区的新发现告诉了乔治，他说自己看见教授在贫民区深处的一所美发学院里教课。

乔治听后默不作声。我就承担起向艾克询问详情的任务。艾克没有详细讲述这个故事，直到我们发现这场戏已经无法收场了。乔治的脸变红了，嘴唇也抿得更紧了，他开始更大力地砸电钮。我为了把这场戏演下去，做了最后的尝试：我说美发学院的报酬很高。乔治转过头来，冲我愤怒地吼了一声："你和艾克都得去坎卡基（Kankakee）！"我不说话了。艾克小声告诉我："乔治发火了！"

乔治确实发火了。他上午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吃午饭的时候也没有和我们说话，中午过后也是一样。冲切车间被沉默所笼罩。腌鱼时间没有了。乔治也没有碰我给他买的可乐。漫长而乏味的下午继续着……

接下来的几天都很沉闷，没有各种时间，也没有交流的主题。艾克没有唱歌，也没有背诵淫秽诗。这只车间鸣鸟被冰冷的冬天冻住了。此时贫乏的交流在形式上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而这些变化只是在事后才会觉得有趣。

第三天，乔治向我通告了新的交流策略，这是专门为对付艾克而设计的，还有萨米，只是他还没有来上班。现在的互动是建立在"仅限工作"的基础之上，重点是提高车间产量水平。但是，这个新政策对生产的影响还无法确定。在第四天结束之前，乔治在其狭隘的利益的驱使之下丧失了自制力，说了一些挖苦的话，称缺席的萨米的工作表现很糟糕。尽管这些刻薄的指责是对我说的，但很显然是给艾克听的。同一天

的晚些时候，艾克又对我说，萨米在制作皮夹配件上很出色，这当然是给乔治听的。接下来的四天，工厂车间里继续弥漫着沉默的气氛，但是，这种气氛偶尔会被对萨米的工作表现的尖刻批评或者过度表扬所打破。对于这些批评或表扬，我都不再冒险搭话回应，因为我担心会被卷入而加剧事态的恶化。

12 个小时的工作日再次变得十分漫长。仅限工作的交流对此毫无助益。偶尔爆发出的对萨米工作能力的厌恶或赞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疲劳也伴随着厌倦重新回来了……

在绝望中，我又开始玩我的工作游戏，那些蓝色的、绿色的和白色的切片，那些椭圆形和梯形切片，以及打磨印模。我在产量上超过了精力充沛的夜班工人布。乔治称我为“白天的布”（白班布），并建议我“占用”萨米的机器，而我总是以依恋自己的机器为借口，避免这种地位提升，也避免和萨米疏远。

当萨米回来上班的时候，他发现了乔治和艾克之间的间隙，这使他很震惊。他迷惑地对我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乔治会直接地、粗鲁地批评萨米的工作。一连好几天，禀性温和的萨米都忍受着乔治的口头侵犯；但是，当乔治冲他喊“你干起活来就像个传道士!”时，萨米变得很生气。有几次，当我想到这两个老朋友可能会大打出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安。

黑色星期五过去 13 天之后，互动形式突然发生了转变。乔治和艾克又开始说话了，那是一种友好的对话……

那天下午，艾克和萨米又开始玩起来，艾克又一次突然唱起歌来。老主题突然重现，这就像沙漠的花朵又遇春天一样。起初，乔治还会尽力维持一些高等人物的尊严，但当艾克开始唱“你是我的阳光”那一段时，乔治就劝他应该有“更高的产量”。然后，艾克就会力挺乔治，并让萨米注意提高产量。萨米则把这种激励变成了低俗滑稽剧，他管艾克叫“奴隶监工”，而且还大喊好几遍，“别烦我！我很忙!”……

我知道，当乔治冲萨米大喊“你是人还是老鼠?”的时候，他确实已经回到以前的状态了，他的“是人还是老鼠”的唠叨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乔治一度不愿接受别人递给他的水果，在喝可乐时也没有最终屈服，直到那些逗乐和玩笑重新出现的五天之后……

当然，乔治对更高产量的要求是一种隐喻的喧闹。他那“请注意产量”的叫喊，也成为一个伴随着艾克和萨米的各种滑稽行为的唠叨主题。

教授主题被彻底抛弃了。乔治再也没有提及周日和教授在中途岛散步的事。

第十章　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①]

埃维巴特·泽鲁巴维尔

现代社会中，随着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人类对社会世界的多元化参与。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的各种群体从属关系（group affiliations）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同心圆的格局。如果一个人从属于某一个社会群体或网络，就意味着他必然也从属于另外一些社会群体或网络。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从属关系则应该被表征为由相互交叉的圆所构成的网络，这些圆彼此互不包含，至少也是部分地相互独立。[②]

现代人对社会世界的多元化参与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个人被他对各种社会群体和网络的从属关系割裂开来。这些从属关系彼此独立，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完全包含他。从属于同中心的社会圈子就意味着被它们完全接纳；现代人从属于各种相互交叉的社会圈子，但其中的每一个只需要他部分地参与其中。因此，现代人与他所承担的每一种角色之间的差别引起了广泛讨论。个人不能完全认同任何一个社会圈子，因此他的每一种参与必定是不完全的。

个人与角色之间的差别与一种相似的社会学上的差别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后一种差别就是私我（private self）和公我（public self）之间的差别。现代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

---

① 选自 Zerubavel, E. (1979) 'Private Time and Public 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58, 1979, pp. 38－58.

② Simmel, G. (1964)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域的分离。除了对某些从公共性到私人性的定时性退变的一般需要之外，[①] 这种分离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更加具有必要性。个人所从属的各个社会圈子的要求相互矛盾，个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要求相互冲突，于是，对缓解这些紧张关系的方式加以制度化，对于现代社会生活而言是十分必要的。[②]

尽管如此，还应补充一点，因为纯粹的公共性与私人性是极少的，所以此二者并不是互斥关系。例如，和自己的配偶单独在一起的情况，与正式接待的场合相比，显然要缺少公共性，但它也不是完全私人性的。因此，私人性与公共性应该被看作是处于一个连续体两端的理想—类型，而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

专业承诺的官僚化

虽然我特别将公共—时间、私人- 时间与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区分开，但是，也只有在工作领域，我们才可以最好地理解生活中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二者在时间上的区分。或许，私我和公我的现代时间区分在这一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现代人的官僚式分割，就是将现代人分割为个人和承担特定职业角色的在职者。这种分割的时间方面可以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反映，即现代人对职业角色的部分参与往往可以从时间上加以规定。现在，大部分职业承诺是被正式规定的，比如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或者一周工作几天（当然，更不用说全职员工与兼职员工之间一般的官僚式分割了）。即使人们在一年中会有一部分时间并不与其职业角色积极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假期的时候，仍然还是根据时间来界定的。因此，在假期中，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和任何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至于我们何时可以休假，以及可以休假多长时间，却是被正式限制的。（就像

---

①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Schwartz, B. (1968) 'The Social Pychology of Priva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pp. 741—752.

② Merton, R.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一般的私人时间一样，假期被定义为远离某些事物，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剩余范畴。假期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空的”）。

在此，我并不打算对工作时间进行量化描述，所以不会关注像工作日、工作周的长度，或者每年休假的天数这类问题，这些都是工会和研究休闲的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恰恰相反，我要依据社会可及性程度的不同对各种时间段之间的区别进行质性描述；尤其要对作为公共时间的工作时间进行质的描述。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代工作时间表的时间刚性**（***the temporal rigidity of modern work schedule***）。（我在此不会涉及“弹性工作时间”（flexitime），因为它强调的只是私人与公共之间边界的时间定位的刚性程度，而我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些边界自身的刚性或弹性。）

现代工作时间表的时间刚性，至少可以部分地由经济现代化来解释。在前工业时代，“几乎所有的工匠都自己经营生意，在他们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①] 然而，工业化的到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工作的时间刚性化。[②] “在那些正在迈向经济现代化的不发达地区，由在时间上松散而多变的工作模式向**时间安排紧凑，按工时支付报酬的工作安排**的转变，是当地新招募的工人必然要经历的重大态度转变之一。”[③]

而且，为了全面理解现代工作表的时间刚性，我们还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所经历的一次意识形态上的重大转变。随着坚持人类尊严具有普遍性的民主信念的普及，以及人们对隐私的要求日渐增强，个人有时会出于实践的或者象征性的考虑而需要社会不可及性（social inaccessibility）——作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普遍的承认。在工作领域中，对一部分个人时间的私人化的正式性承认，清楚地体现在对带薪假期、病假，以及像休假日和个人休假那种奖励式休假的制度化上。

我们通过对比主仆之间的传统关系与上下级之间的现代关系，就可

---

①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p. 116.

②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p. 25－26.

以洞悉时间私人化的象征性意义。现代下属和传统的仆人不同，他不仅仅是一名从属者，而这一事实间接表明了现代下属的人格尊严。像这种部分的认同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他和他的职业角色之间的联系是从时间上被限定的，其方式是刚性的和周期性的。在现代西方社会，下属不会被认为生来就比他们的上级低等：

> 他们只是根据契约规定才**暂时**变成这样。在契约的限制条款内，一方是仆人，另一方是主人；而在契约之外，他们是两个公民。①

> 在民主制度中，从事家政服务并不会降低从事者的人格，因为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且也只是暂时的选择。②

换言之，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人与职业角色之间的暂时性关系。

就像我之前所指出的，现代西方社会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个人有权要求在他的私人时间内控制其社会可及性。根据把时间当作商品的现代观念，③ 拒绝某人对这种权利的要求的最通常的办法之一，自然就是向他购买。这表明，工作时间应当被视作私人时间的一部分，雇主将这部分时间从雇员那里购买过去，从而把它转变成为公共时间。④ 很多靠工资为生的人的工资都是依据时间单位来衡量的（例如，小时或天），这既反映了又提高了工作时间表的时间刚性。

---

① Tocqueville, A.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 194.

② Tocqueville, A.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 194.

③ Zerubavel, E. (1976) 'Time in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Philadelphia.

④ Soule, G. (1956) *What Automation Does to Human Beings*,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强迫人们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这种做法，会遭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抗议。一位美国立法者曾经倡议一个法案，希望以此禁止雇主解雇，甚至惩罚拒绝加班的员工……他责问："个人的时间应该被其所效力的大公司控制吗，或者说**个人是否应该拥有一种基本的权利，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过自己的生活**？"[①] 根据"超时"一词的词源所揭示的内容，今天的人们已经公开承认：个人在其职业角色中的可及性以其"售出"的部分时间的时间边界为限；在此边界之外，他有权拒绝与该角色发生积极的联系，也有权拒绝认同该角色。现代职业角色中所包含的大多数承诺和责任已经被正式地限定在在职者的公共时间的时段里。他们并不被期望去超越这些时段的时间边界，这些时间边界被用来区分这些职业角色和作为个人的在职者。现代人并不总是在工作，在某些公共时段的时间边界之外，他们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摆脱他们的职业角色（这一点在那些 24 小时作业的组织机构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要声明，这些公共时段的时间边界也构成了当班（on duty）和不当班（off duty）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边界，因此，我建议将这些公共时段称作当班时段（duty periods）。这其中暗含一种观点，即将当班与不当班之间的一般官僚化区分看作是一种时间区分，是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之间的区分在工作领域中的特殊例子。实际上，从社会组织的立场来看，大多数现代专业承诺边界的时间定义，绝对要先于其空间定义，而且迄今为止，前者都比后者更具有约束力。现代人的专业承诺主要是根据某些当班时段的时间边界被界定的。只要是在那些边界之外，即使仍然身处工作场所，也通常被认为是不当班的。不管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其他地方，办公室咖啡休息时间和午饭休息时间都可以被看作是将个人与其职业角色的关联暂时悬置的制度化形式之经典案例。另外，从空间角度看正在工作的人，也可以拒绝工作责任，而他的理由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已经不当班了，或者还没有轮到他当班。

关于现代社会生活中日渐增强的专业化趋势，此前已经有过很多讨

---

① Knickerbocker, B. (1978) 'More Workers Balking at Compulsory Overtim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2 March, p. 7.

论。这些讨论曾经要求专业人士总是处于工作状态。但是，总是在工作的专业人士已经不多了。现代西方文明中，社会生活理性化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社会可及性和专业承诺的日渐官僚化，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它们的时间边界的刚性化。现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专业承诺的时间边界的刚性界定。随着官僚时代的到来，现代人的时间被严格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在某些部分里，人们处于其职业角色之中，在职责上是可及的，而在其他部分中则是不可及的。现代人作为在职者对其职业角色的认同必然是部分的，因为它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界定的时间段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工作描述对该工作的专业承诺的时间边界的说明是严格而明确的。这些边界的刚性源于以下事实：它们被日历和时钟所限定——例如，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每年有三周假期。

现代专业承诺的官僚化，绝不仅限于那些像银行出纳员、接待员，或流水线工人的工作职位。事实上，它甚至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最神圣的领域。下面，让我们来看医疗保健领域的专业承诺的时间结构。在这个领域里，对生死攸关的紧急事件成为日常内容，我们期望能够在这里发现，职业角色与相应在职者之间至少存在某种近似的同一性。

1847 年，美国医药协会正式通过医药行业道德准则，第一章开头第一句话是："一名医生不仅要**随时**准备好回应病人的召唤。"[①] 这意味着，医生把随时可及性（ever-accessibility）视作一条根本原则——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专业职责。直到今天，医务工作还在坚守着，或者至少还在意识形态上坚守着专业人员的传统观念，把它视作职业角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行业已经为数不多了。医生*持续地*为病人的健康状况负责并承担责任，人们也期望医生们总是在工作，希望*无论何时*，只要人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履行其职责。当医生离开医院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被期望留下找到他们的方法。更甚者，还会有人上门求诊。在过去的 20 年里，一种特殊的单向式无线电系统被引入医院生活。医生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传呼机"；所以，无论是在实践意义上还是在象征的意义上讲，他们*随时*都可以被找到。因此，至少从理论上

① Leake, C. D. (ed.) (1927) *Percival's Medical Ethics*.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p. 219.

讲，他们没有完全私人性的和不受干扰的时段。

医院医疗服务的时间结构可以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医生的专业承诺被社会地界定的方式。医生工作时间表最重要的结构特征之一——也是从时间角度界定他们的专业职责的依据——是它们的相对弹性。医院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建立在当班时段基础上的，而且这些当班时段的时间长度是比较灵活的，因为当医生们完成每天的任务时，他们的当班时间就算结束了，它们并不受制于时钟时间。医生的下班时间没有任何硬性规定，因此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合理拒绝探诊病人。只有在像急诊室或门诊那样的医院服务中——在那里，医患关系比较不具有连续性——医生的当班时段在时间长度上是固定的，也有固定的下班时间。

然而，即使在医疗行业中，我们也发现了专业承诺的官僚化。这里的专业承诺也认可了——尽管并非正式地——某种私人时间的观念和定期的不可及性。医生半夜出诊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一些年轻实习生会对那些在假期或者周末还来医院应诊的资深医生表示钦佩，而这只能表明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医生们自己也承认——虽然是非正式地——将传呼机关掉已经变得很平常。另外，每当实习医生们给医生的住处打电话时，或者到医生家里找他们时，首先必须确认这样做是否妥当，并且几乎总要为在非医疗时间打扰医生而表示歉意。若需要在凌晨三四点钟给医生住处打电话，他们总要再三犹豫，尽管在夜间随时应接电话是医生的职责所在。这种情况还被一些玩笑话所强化，例如“如果有急诊，别犹豫，不要叫醒我”，这尽管说是[作为一个笑话]……却不能仅把它当作笑话来理解。

私人医生有合伙执业的体制。因此，他们既能遵从道德准则，提供持续的医疗服务，[①] 又能确保离开诊所后的时间的私人性。对此，我们可以以健康疗养机构为例。那里的每一位医生都可以与其他医生（甚至是其他的健康专业人士）共同对病人负责，这样一来，他们既能为病人提供持续的医疗服务，同时也无须牺牲他们对那些私人性的不当班时段的权利要求。

---

① Zerubavel, E. (1979a)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然而，医疗职业——至少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坚守着传统的专业观念，视其为职业角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医生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时刻都处在工作状态中。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职责的官僚化，在护理职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护士与医生不同，他们的工资按小时支付，因为他们的专业职责是以每周工作的小时数来界定的。他们的时间被正式地分割成多个严格界定的时段。在其中的一些时段里，他们作为护士，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在其他时段则不是这样。只有在当班时段的时间边界之内，他们才被期望积极地承担起职业角色；而在这些边界之外，他们就可以摆脱任何专业职责。

与医生的角色相比，护士的工作日与工作周要短得多。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护士角色的突出特征，而护士的专业承诺和可及性的时间边界的刚性界定同样也是护士角色的突出特征。[①] 这种（时间）刚性不仅涉及当班时段的长度，还涉及每天的时刻规定。通过构成护士专业承诺的正式边界的固定到岗时间和离岗时间的制度化，这种刚性被嵌入到护士的服务体系之内。一般来说，护士并不是在完成当日的工作安排的时候下班，他们有固定的倒班时间。他们的工作记录就像一种高度程式化的仪式，描述了他们进入和脱离护士这一职业角色、担负和摆脱专业职责的过程，这种工作记录的时间安排是固定的，通常很少出现推迟很久的情况，即使是在非常繁忙的时候也是如此。

护士的专业承诺的时间边界所特有的刚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制于钟表（时间）。按照时钟时间来结束工作，显然要比按照工作任务是否完成来决定下班时间，更具有时间刚性。而且，也更加具有人为性。为了理解护士服务体系的时间刚性的人为性基础，我们就需要注意：他们轮班的起始点是固定的，而且通常是被设计成整点。这就是说，护士轮班时间通常是在整点时刻开始和结束的，而不会是像 4 点 14 分或者 8 点 37 分这样的时刻。这也就意味着，护士轮班时间的长度通常被设计成完整的几个小时，而不会是像 7 小时 42 分这样的时间段。

无论何时，当护士长或护理管事要求护士加班时，护士有权拒绝。

---

① Zerubavel, E. (1979a)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如果他们同意加班，他们就会得到比平常高得多的每小时报酬，就像是对他们放弃拥有更多私人时间的权利要求而作出的充分补偿。（一般认为，夜间时间比白天时间更具私人性，所以在晚上工作或者值夜班的护士通常会得到更高的每小时报酬。）他们还希望能够尽可能早地接到加班安排的通知。因为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准备时间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他们可能正好在那天晚上安排了其他事情——另外，这种做法也会被认为很不礼貌，因为在对更多私人时间的权利要求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方面，护士表现得尤为敏感。因此，即使没有正式规定明确说明护士应该提前多长时间请病假，护士们多数也会对此形成共识：如果超过某一时间限度再请病假就太晚了，因为这样做不能给替班护士留下足够的准备时间。而且，这也是对替班护士的私人时间的不尊重。在家待命的护士甚至也会期望自己得到这种象征性的尊重。护士即使只是在家等待可能的替班通知也会有（低水平的）工资，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提前一点得到通知，这主要是出于象征性的原因。（在家待命这种情况，是体现实际的私人性与潜在的公共性的微妙联结的一个绝佳的例子，这种情况还表明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并不是互斥的范畴，而是一个连续体中相对的两极。）

一般而言，现代护士的社会世界被清楚地分割成私人时段与公共时段。与医生相比，护士在医院外的时间更具私人性。他们不必随身带着传呼机。他们也不被期望留下说明，告知他人在晚上或者周末可以在那里以及怎样找到他们。很少有登门求诊的情况。简言之，他们可以放心，只要他们离开了医院，不当班时间的私人性就受到了保护。

护士的职业道德允许他们……在规定的当班时间之外卸去任何职责。（有趣的是，当医生拒绝在某一时间为病人看病这种极少见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不仅会遭到同事们的严厉批评，同时也会遭到护士们的批评！）如果一个护士还没有接到报告本，或者已经上交了她的报告，根据正式规定，她此时是不当班的，尽管她还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护士们通常会在其轮班时间开始之前到达他们的服务岗位，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没有人期望他们立刻开始工作。另外可能的情况是，一名护士在轮班结束之后还会在自己的位子上再待一会儿，但她会提醒要求她做事的人她已经不当班了。（但应补充一点，这种情况在急诊室更为常见，急诊室里病人的变动相当快，所以这里的医患关系与住院部

的情况相比，相对缺乏持续性和私人性。）护士的报告就像是一种闭幕仪式，如果此后还要求他们回到医院，就只能要求他们来医院完成原本应该在当班时间内完成的工作。例如，护士上交报告之后，还可以要求他们待在医院，补写每个病人的进展情况记录，这是下班之前需要完成的工作。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也不会期望他们履行和承担其他护理职责与责任。

护士通常会提前 15 分钟或 20 分钟到达工作岗位，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甚至根本不会去看病床和病历卡——因为他们还没有上班。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即使是纯粹的关心和动机也能被官僚化。它们都是人为规定的，严格地遵照时钟时间，因此不可能在心理学层面上得到完全的解释。专业承诺的官僚化在护理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意味着……［它］已经渗透到一个最神圣的医疗保健领域之中；很明显，这种分析也可以被应用于秘书、银行出纳员、工厂工人等职业。而且，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只要其中的专业人士被认为应该是随时可及的（例如军事领域、政治界、宗教和警察），就不可能没有这种划分相对私人性的时间和相对公共性的时间的机制。

更进一步说，我认为，上述对护理行业的分析不仅仅适用于大多数现代职业，它的适用性绝不仅限于工作领域。我围绕私人—时间与公共—时间概念所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必然也适用于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互动的一般分析……

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①]

史坦利·柯恩和劳利·泰罗

现在与未来

那些不喜欢思考过去与未来的人常常会无视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正常生活安排上与此相关的断裂；他们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在做计划、安排时的情况，例如，计划何时出院，何时出狱，或者何时离家度假时的情况。即使在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时候，他们还要考虑支付账单，安排探亲事宜，计划（度假归来的）家庭派对。通过不断地处理这些财务的、家庭的和社会的事务，人们就把关于个人事务的一般的时间安排置于其思想背景之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二十年时间被抽走，那么就连这些事务也会一并消失。关于时间的回顾和展望，即过去和未来，以及此时此刻的现实意义时刻占据着人的头脑。在E区（监狱中的多个警戒区之一；鉴于监狱的特殊设计结构，它也是整栋建筑的一座配楼）的囚犯们会发现维克托·瑟奇（Victor Serge）对这种无法摆脱的状态的描述最为准确：

> 时间的不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秒钟都很漫长。从一个钟头到另一个钟头是何其漫长。当你提前告诉自己此后六个月——或者六年——要这般度过时，你会感到面临深渊一般的恐惧。底下是

① 选自 S. Cohen and L. Taylor, Psychological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Long Term Imprison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黑暗中的重重迷雾。[①]

囚犯对这种无限时间的主观兴趣不同于嬉皮士瘾君子，僧侣或者隐士。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并不情愿拿出二十年来自我反思，也没有一套现成的解释，一种个人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他们的自我反思。老练的瘾君子会自觉地利用其膨胀的时间意识去制造精神幻想，隐士和僧侣会在其无时间的出神状态中与上帝对话，但是长期囚犯却没有此类现成的、奇幻的神游来替代他们对计划、安排和惯常事务的事先参与。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无须惊讶于以下事实：这些囚犯只是活在现在——并不是因为对规划未来心存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藐视，而是出于必需。在这里要引述一名美国囚犯的经验："服刑的时间要在每天的点滴推进中度过，从一次细小的欢愉到下一次——从早餐的薄煎饼到蓝天闪现的一瞬间……你如果试图尝试其他任何方式，就只会（痛苦地）撞墙，喊叫，直到没有力气再喊。"理查德·伯德（Richard Byrd）孤身一人待在极地营地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

> 我在自己和过去之间建了一堵墙，并且尽量从当下环境中寻求消遣和创造性。每天我都会尝试一套新计划，以此来丰富时间的内容……周遭环境是恶劣而困难的，而我却发现了使其变得宜人的方法。我尽量加快做饭速度，越加熟练地完成天气和极光的观测，更有条理地完成日常事务。我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下一时刻。[②]

监狱里的囚犯也需要找到"丰富时间内容"的方法，但不同于探险者，甚至是短期囚犯，"控制下一时刻"对于那些对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之后的未来没有清楚概念的人而言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只要能被看作是释放之前那无限期等待的一部分，从事一些相对"无意义的"活动倒也很好，比如说天气观测。长期囚犯只能在此做出抉择：要么屈服

---

①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p. 56.

② Byrd, R. (1938) *Alone*, London: Pitman, p. 109.

于这个无意义的世界，将它视为自己的人生设计，要么纠缠于对未来的思索——几近一种艰难度日的做法。

这一讨论使我们看到长期服刑的囚犯对待未来的方式存在着内在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是无法想象的。罗伊（Roy）曾经说："如果我确实认为自己还要服刑十七年，我就会自杀。"其他囚犯会抵制监狱官想要搞清楚时间问题的企图。乔克（Jock）说："无论何时，只要有看守问我认为自己还要在监狱待多久，我总是说：'哦，大概三十五年吧'，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在交谈中占上风了。如果我说'二十年'，他会说：'噢不，我想至少还有二十五年吧。'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数字都有什么意义。"悖论就在于此：尽管这些人拒绝别人提及该话题，或者拒绝考虑未来的本质，但他们还是要靠对将来狱外生活的设想支撑自己度过这些在时间上毫无差异的日子。

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监狱外的生活心怀期待，如果不是真正相信"狱后生活"的存在，那他要么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他的生活从入狱那一刻起就结束了；要么就是另一种情况：他的生活要在监狱中度过。在我们的文化中，"我的生活"是一个重要概念。年轻人会展望人生，老年人则回顾人生。人们会谈论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把生活等同于我们存在的特定时期，等同于介于青年和老年之间的那段时间，入狱前的那段时间，出狱后的一段时间。一个人在狱中经历生活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也许是在经历生活，却不是经历"我的生活"。我们了解的这些人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费伯（Farber）在他对"八名出狱无望者"的采访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形。他概括说："在这些出狱无望者中没有一个彻底放弃，甘愿终老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最让人沮丧的陈词滥调展现出了新的活力。"①

标记时间（Marking time）

在这种情形下，囚犯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到

①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20, p. 180.

处寻找规划时间进程的方法，区别、划分时间的方法。计时器突然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却很少关注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问题。或许是严格遵循预定时间表的职业安排使他们感觉不到其他人还不得不经历那种空洞而无形的年岁。但是至少还有一项关于该问题的重要研究，这项研究是由社会学家朱利叶斯·罗斯[①]开展的。当他走出自己的学术生活到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养病的时候，突然被时间安排问题所吸引。

住进这种疗养院的病人经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确定的出院日期。在这件事情上缺少信息导致了一种狂乱行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即使是很模糊的信息也会被当作重要的线索。对时间表的需要促使病人们与医师商议他们病情好转的情况和程度，以便争取早日出院。罗斯主要想表明时间表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中是何其重要，并证明当其中各阶段变得模糊不清或者不存在时就会产生焦虑。

罗斯的研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疗养院管理制度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准，亦即一种划分时间的方式，是线性发展的观念。（例如）病人的身体状况好转，变得更加强壮；他能够做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在E区里不可能存在这种线性发展的依据。在这个体系中并没有建立起积极评价个人进步的标准，也没有奖励与惩罚的分阶。尽管假释算是一种对良好表现的奖励，但是我们了解的这些人大多认为获得假释的（实际）可能性太小，所以它很难成为一种发展阶段。的确，假释机会会因为报纸上突然出现的一则关于某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新闻报道而立刻受到影响。这个（监狱）警戒区里的人们认为周日报纸上涉及他们的任何内容都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减刑机会。他们久经事故，了解假释委员会的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尽管它对外宣称只关注被评议人的表现情况。

与罗斯描述的那些肺结核病人不同，这些人没有机会和当权者商议。他们的行为影响不了时间表，他们没有机会和他们的管理者“做交易”以缩短刑期或者争取提前释放。而且这里也不像医院，在工作人员

① Roth, J. A. (1963) Timetabl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的行为中找不到任何线索暗示何时会有事件发生。内政部官员掌控一部分短期的和情境性的结果，他们的缺席及显现的高深莫测被视作控制局面，维持安定的必要手段。

因此，这些人往往会自己创制各个（发展）阶段。他们构建起自己的主观时钟以便保护自己不陷入“迷雾的深渊”般的恐惧。他们会用取得的成绩来标示时间的流逝。他们可以投入到精神活动（阅读或研究）和健身运动（通常是举重）中。有些人会谈到教育生涯，充满激情地描述从“O”评到“A”评，直到大学的经历，而这种激情即使在那些因为职业需要而特意参加专业性学习（也就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人们身上也很难找到。在这种情况下，举重的意义可能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小。在这个警戒区里的人可能会认为能举起更大的重量意味着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绩，但是在我们写过的文章中有一篇涉及这个问题，在回答中存在一个有点讽刺的观点。这个班的一名前成员写道：“我认为健身运动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它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动机而不仅仅是对获得实际进展的需要。有些囚犯宁可把二头肌增高一英寸也不愿减刑一年。”

无论如何，这些精神和肉体追求总是有危险的，因为很快就会有一天，进展受阻，阅读的书减少，写的文章变少，能够举起的重量变轻。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我们对这类事情的兴趣减弱了，而且我们的兴趣已经顺利转向出国旅游和高尔夫。可是对于这些囚犯而言，没有了这些事情就标志着又一次回到无结构的时间中。

还有其他标记时间的方法。他们可以用记号勾掉某些确定的、可界定的时期：日、周或者月。但是这可能只会令人更强烈地意识到时间的不真实性。就像瑟奇（Serge）所写的：

> 为了记录日期，你必须留心计数天数，用叉号标记每一天。某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已经过了四十七天了——或者一百二十天了，或者三百四十七天了！——而且过去的经历就像一条直线，丝毫没有间断——枯燥无趣，毫无意义。看不到任何一个划分时间的标志。经历几个月时间就好像只是许多天，经历几天时间就像只是许多分钟。未来的时间是可怕的，而现在是迟缓而沉重的。
>
> 每一分钟可能都复杂到令人惊讶，或者说令人害怕。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有时一小时过得飞快，而有时一秒钟也令人

> 难耐。过去的时间是空洞的。没有对事件的顺次排序可以标记时间；外部时间也不复存在。[①]

瑟奇在这段描述中提到的最重要的情况莫过于缺少事件的顺次排序（the chronology of events）。虽然一样是日复一日，但是（监狱）外面的情形是不一样的，人们会等待事件发生，仅仅是因为它们不再是一条线上的珠子，或者牌桌上的筹码，不会随着某人越加接近目标而逐渐被耗尽。它们是彼此分隔的片断；存在于正常的累积的线性语境之外。用罗斯的话说："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盼着周日的到来，因为它打断了枯燥的常规生活，而连续的周日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会不顾外部时钟而倾向于利用主观计时手段，比如情绪或者感觉上的变化。它们会有一种实在感和时间意义，而这些是时钟、日记和日历的世界所没有的。克里斯托福·波尼（Christopher Burney）在专门描写单独监禁时也捕捉到了这一转换：

> 监狱里的日子必须通过一些罕有的（意外）事件相互区别，这些事件有时会使某个人受到同伴们的注目。尽管我坚持记录周数或者日期，但这只是下意识的行动，生活被划分成了更长的周期，由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限定的周期；安排历法的依据不再是太阳或者月亮而是这些更加个人化的符号。[②]

毫无疑问，对付较短的刑期只需要这种正统的做法：把过去的日子从日历上划掉，用铅笔把释放前的每个小时写满所有的墙。实施这种时间管理的技巧已经成为监狱中公认的口传知识。利里（Leary）[③] 记得他注意到这样的情况：钉在受信托人墙上那些表示日期的数字条每天都会被拿走，但是当他看墙时，当日的数字条已经不在了。他问囚犯其中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按照囚犯们的说法，当你早晨醒来时，那一天已经结束了"（第77页）。曾经有人试图改造这种技巧以满足长刑期时间管理的需要。当罗兰

---

①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pp. 56—57.

② Burney, C. (1952) *Solitary Confinement*, New York: Coward, p. 23.

③ Leary, T. (1970) *Jail Notes*, New York: Douglas.

刚到E区的时候，就如何结构化时间的问题征求了保罗的建议。“我要怎样度过这二十年呢?”保罗有同样长的刑期，他以其服刑三年的经验安慰对方说：“很简单，一次过五年。”就他所知，这也是唯一的安慰了。

当然，在这个警戒区里也会发生伯尼所说的“（意外）事件”，这些事件打断了枯燥无趣的时间。其中有很多都没有事先安排，所以人们也不可能对它们有所预期或者做任何准备。比如突然有人从这个警戒区转走或者有新人进来就是典型的无法预期的事件。这种突然发生的事件在这里失去了它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很容易忘记日常生活中对此类事件的预期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周四晚上允许外出，枯燥的周一早晨变得可以接受；因为令人期待的复活节假期，漫长的冬天也可以忍受。每一个事件本身可能微不足道，甚至无须多少精神投入，可有可无，然而所有这些事件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组刺激物，推动我们在时间中前行。

E区的生活中缺少事件，以至于我们的课堂也变成了某种重大时刻。他们有意识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有时为了与我们会面会做精心准备（例如，“穿着打扮一番”）。（因为）至少我们是外来人，这让他们感到安慰。我们能详细地告诉他们监狱外面发生的变化，我们会向他们解释在政治气候、违禁药物（毒品）使用情况、流行音乐、对性行为的容许程度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而对他们来说，能够内化这些变化，能够赞成或者接受吸食大麻行为的广泛流行或者对电影业的容忍度增加，在某种意义上确保他们在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时不至于面临过大的压力。可以夸张地说，我们帮他们跟上了外部时间，而且由此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标示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是仅仅涉及剩余的刑期。

然而，我们这种探访并不会像亲友探访那样具有情感意义。后者是一种经过计划，可以预期的事件。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讨论过这种事件产生的“手风琴效应（accordion effect）”（或者“折叠效应”）：一个人会把这一事件在时间上延伸开来，从对它的事先预期开始直到相关的事后讨论。[①] 瑟奇[②]对这种效应的命名更富情感性，他称其为“欢腾”：那种期待受到他人关注的喜悦，而且短短十五分钟的探访

① 转引自 Calkins, K. (1970) 'Time: Perspectives, Making and Styles of Usage', *Social Problems*, 17, pp. 210－225.

②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足以使前后所经历的漫长的日日夜夜充满意义。

但是很不幸……当囚犯服刑接近十年时，这种事件会越来越少。由一次探访所带来的喜悦以及由对它的预期而实现的时间结构化，已经不足以克服焦虑引发的痛苦，这种焦虑源于探访与对它的预期之间的关联发生断裂的可能性。

工作与打发时间

维克托·瑟奇把狱中的“现在”描述成“迟缓而沉重”。在狱中度过的每一天都不会依循其常规节奏。然而，在这种混沌的情境中适应安排时间的新方法不是长期囚犯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他们既关注时间的划分也关注时间流逝的速度。怎样才能让时间过得快一些？在这一方面，对探访的预期或者对信件的期待都毫无作用。执著于未来的事件可能还会让时间变慢，任何曾经待在水壶旁等待水开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投身工作时，时间就过去了。我们因为埋头工作而没有时间不停地关注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即使对一般囚犯也没什么用处。如果说希望一名在潘克赫斯特“金属包头商店”工作的男子投入自己的工作——在整理文档卷的绿色编绳的两端镶上金属包头——只能是徒劳的，那么认为那些要在监狱中度过二十年的人会忘我地投入到修理缝纫机或者制作蚊帐这种工作（它们是向E区提供的工作中的两项）中的设想恐怕就更加不合理了。虽然监狱外面的人确实能够应付如此枯燥的工作。一位评论家在谈及工人们为了“坚守工作中剩余的快乐”所进行的斗争时，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从心理上说，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丧失其全部的积极情感要素”。（亨利·德·曼）[①] 工人总会在分配给他的工作中找到某种意义，找到发挥积极性的空间，发现消遣和创新的机会。

我们猜想长期服刑的囚犯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此，工作丧失了其在文化上的含义，即为家庭、经济利益而学习一门手艺，做事情。即使监

① 转引自 Roy, D. F. (1960)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 pp. 156－168. 参见本书第九章。

狱里的工作很有趣，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工作对于一个被判终生监禁的囚犯而言实际上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工厂工人迫不及待地赋予工作意义和时间标志，那么没有清晰意义和时间标志的囚犯必须在被给予的工作中找到它们。所以，后者的问题是双重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也无须惊讶于这样的发现：42 人的样本中只有 5 人把工作列为一种令时间变快的方法。另外有 10 人认为根本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剩下的人则提到了兴趣爱好，阅读或者自学，但如果在监狱外面，这些活动则会被认为是消遣。E 区于 1968 年设立了工作车间，其事实依据是囚犯们已经有 6 个月没工作，开始变得懒惰了。当然还有许多人认为设立工作车间是一种额外惩罚而不是摆脱迟缓时间的措施，这也是随后出现的抗议和阻挠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一篇编辑评论认为狱中的工作既无趣又毫无意义。这些新设的工作车间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们会“占据空闲的双手和头脑，并贯彻这样一种观念：与游手好闲相对的工作是生活的需要”（《纽卡斯特日报》）。

其实，在此语境中使用的“工作”一词具有误导性。就像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避难所》中观察到的：

> 根据我们社会中对生活的一般安排，工作场所的权威在工人们收讫薪金时就止步了；家庭及休闲消费作为工人的私人事务，这一安排形成了一种机制，将工作场所的权威严格限制在它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社会机构中的被收容者而言，他们的全天时间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基本需要也必然要受到规定。无论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是什么样的，都不会具有它对外面世界产生的那种结构意义。于是这里需要不同的工作动机和工作态度。而这正是被收容者和劝服他们工作的那些人需要做的根本调整。①

在监狱警戒区的语境中使用“工作”一词是荒谬的，而以下事实或许就是最好的解释：在一个警戒区中被当作工作的活动——制作填充玩具——在另一个警戒区中却只是一种兴趣爱好。

---

① Gofffman, E. (1961a) *Asylu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p. 10.

我们发现关于工作的交谈在E区里总是进行不下去。他们的表现给人的感觉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此时正在从事的工作并不会对他们的狱中生活感受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再次从费伯(Farber)那里找到支持这些发现的有趣的证据。他在监狱官员和囚犯们的帮助下，在一条“好—差”轴线上区分各种工作，然后根据囚犯们体验到的痛苦程度与工作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加以核对比较。结果是二者根本没有关联性。从事差工作的人并不会比从事好工作的人经历更多或者更少的痛苦。比对了工作满意度之后的结果也足以令他惊讶。(一开始)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从事好工作的人恰好不喜欢他的工作，而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在工作满意度与经历的痛苦之间也没有发现关联性。费伯在结论中说：“某一活动之所以被视作最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并不在于它与痛苦经历之间的关联性。痛苦经历与生活境遇中更宽泛的，更间接的方面有关。”①

然而，在否定工作作为一种加快时间流逝的方法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点过于绝对。因为监狱中确实有人感觉聊胜于无。他们承认这只是自我欺骗，但是同时又声称别无选择。他们会赞同伊凡·杰尼索维奇(Ivan Denisovich)的观点：“当你工作的时候，时间飞逝。那是他以前经常注意到的情况。劳改营里的日子过得很快——你刚说出‘刀子’这个词时，它们已经过去了。但是几年时间不会匆匆逝去，它们绝不会转瞬即逝。”②

有一段时间，我们认定，在可否借助工作打发时间这一问题上存在的态度差异源于个人的特殊偏好。但是，实际上，在对工作的怀疑态度背后存在着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即通过工作打发时间会发生什么。正是这个群体中那些比较叛逆的成员贬低了参与此类活动的意义。因为他们发现，在工作中适应他人的安排时就丧失了个人自主性。凯茜·凯尔金斯(Kathy Calkins)曾经对康复医院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相当细致的研

---

①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20, p. 174.

② Solzhenistyn, A. (1968)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p. 104.

究，她在描述这种特殊的适应类型的时候保留了“时间流逝”（time passing）：

> 一段时间过后（强调是我加的），病人往往会放弃一部分对自己时间的控制。从根本上说，他就是在按照别人的规定适应他们的时间。病人就是以此种方式自愿地遵循了该机构的时间安排。①

对于长期囚犯而言，通过埋头于监狱的惯常事务来打发时间可能就等于赋予监狱某种合法性。这也就等于承认他在服刑期间要遵从当局的意志。

标记时间和打发时间是长期囚徒生活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时间本身变成了一个问题。它不再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而是被思考的对象——就像一片未分化的景观，必须被规划，被穿越。不能使用常规标记，也无法利用常规方法更早完成旅程。然而，人们总是专注于旅程的长度，因为只有完成这段旅程，生活才能继续。

---

① Calkins, K. (1970) 'Time: Perspectives, Making and Styles of Usage', *Social Problems*, 17, p. 215.

第五篇

文化与视角

第十二章　时间观与社会结构[①]

刘易斯·科塞和罗斯·科塞

计时方式的社会根源——即群体中持久的思考时间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是某些社会学家的兴趣所在。迪尔凯姆（Durkheim）及其学派[②]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例如，迪尔凯姆认为“历法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而它的功能就是确保它们的规律性”。[③] 在原始社会，不同的日、月、季，乃至年的名称往往都是由经济、社会活动的节奏确定的。在我们这个更加复杂的社会里，天文历法提供了计量时间的“客观”方法，但是我们发现仍有必要引入像“学期”、“周末”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些词表达了社会性意义而不是纯粹的时间次序的意义。当我们在社交聚会上讲述过去的事情时，会把那些事件置于社会背景中，像“罗斯福新政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等等，因为这些相关事件只有被置于社会时间而不是纯粹的历法时间之中才能获得意义。默顿和索罗金

---

① 选自 L. A. Coser and R. L. Coser, 'Time perspective and social Structure'. 首次发表于 A. W. Gouldner and H. P. Gouldner (eds), *Modern Soc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3.

②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Durkheim, E. and Mauss, M. (1910－12) 'de quetques form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L 'Annee sociolagique*, 6, pp. 1－71; Hubert, H. and Mauss, M. (1909) *Me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Alcan; Halbwachs, M. (193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Alcan.

③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Free Press, pp. 10－11.

(Merton and Sorokin) 认为："计时系统反映了群体的社会活动。它们具有集体性起源；坚守它们具有社会必要性。它们产生于群体生活的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活动的惯例和工作日的日常事务安排。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社会互动的产物。"① 他们在最后总结时说："计时方式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组织形式和功能。"②

然而，不仅是计时方式，群体成员把自己和过去、未来联系起来的方式——即他们的时间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的结构和功能。时间观是一个社会中各种价值观的整合部分，个体要根据与其共享价值观的群体确定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方向。

和动物社会不同，所有人类社会都包含这样一些机制，它们使每一代人都通过学习与过去建立联系。无论是部落长者讲述神话故事和部落传说，还是神父或者萨满教巫医传授智慧；无论是祖母的仙女故事，还是祖父的往事回忆，③ 每一代人都被要求与整个文化或者其中某个群体所共有的过去相联系。同一代人共有同样的过去，这不仅使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强化了他们当下的价值取向。同样，在所有动物中，唯有人类能够计划未来，他能够为了未来的回报而推迟现在的享受……因此，人的行动总是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影响，而他却总是把这些行动与现在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过去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然而，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侧重点上，不同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而上述侧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体价值系统。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约翰·斯派格尔 (Florence Kluckholm and John Speigel) 指出：西班牙裔美国人认为人类是自然力量的遭受者，所以他们只关注现在，而不关心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试图通过现在的行动控制未来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或者过去更好，所

---

①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p. 620—622. 见本书第四章。

②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21.

③ Halbwachs, M. (193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Alcan, p. 140ff.

以比较少有被我们称作“计划”的行为。[①]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最先关注文化的时间取向的学者之一，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他断言：“古希腊罗马人的存在……只在即时……他们的存在中没有‘时间’。”[②] 然而，在古埃及以及现代西方文化中都有过去和未来取向。

欧文·哈洛韦尔（Irving Hallowell）[③] 曾经指出：在 Saulteaux 族里（加拿大的一个印第安部落），“所有不同的时间取向都是局部性的，分别适用于邻近的未来，最近的过去和此时此刻的活动”。马里安·W. 史密斯（Marian W. Smith）[④] 说：关注未来是当今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以现在为接点（focal point），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上平衡展开；华盛顿州的 Coast-Salish 印第安文化则完全是只考虑现在的。

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指出了时间取向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方法和成果不加批判地移植到社会学理论中就会出现问题。[⑤] 这种做法的错误很明显：能够有效研究无文字文化的一体化的时间观的方法被应用于分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社会就变得十分危险。比如说，西方文化是未来取向的，那么美国“倾向于未来取向”，[⑥]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在这些社会中，重要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并不是其他群体的目标；其中有些群体可能会坚持自己的价值规范而且在时间观上和主流文

---

① Kluckholm, F. R. and Spiegel, J. P. (1954)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Family Behaviour', *Committee on the Family Group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 Report No. 27.

② Spengler, O. (1926)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Knopf, p. 132.

③ Hallowell, I. (1937) 'Time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9, pp. 669—735.

④ Smith, M. W. (1952) 'Different Cultural Concept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sychiatry*, 15, pp. 395—400.

⑤ Bienefeld, R. (1948) 'The Limitations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pp. 22—30.

⑥ Ruesch, J. and Bateson, G (1951)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orton.

化存在很大分歧，这个命题似乎就毫无助益了。克拉克洪的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社会包含主流的和其他替代性取向，所以即使我们有把握描绘出美国主流文化的概况，也“不能由此认为所有美国人都能够、会或者想——在任何情境下——实践那些反映主流文化的行为模式。寻求在单一维度上的文化整合的做法总是错误的”。①

在美国社会里，一些群体或阶层的时间观可能受到了未来取向的乌托邦思想或者千禧年思想的影响，例如政治党派和宗教团体；而其他群体或阶层，例如南方的古老家族，则更关注过去而不会考虑并专注于现在和未来。② 如果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此时此地，那么他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现在，不会把现在视作通向未来的工具或者仅仅是辉煌过去的残留片断。而这些差异既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亦存在于同一社会中同时代的不同群体之间。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经有力地争辩说：“只有当我们试图根据群体的希望、渴望和目的去理解它的时间观念时才能够清楚地把握群体最深层次的心智结构。”③ 因此，如果不能理解一个群体的时间观，观察者会更难把握该群体的一般取向，而同属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会产生社会沟通障碍。

例如，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中普遍存在着对下层阶级行为的负面成见，这些成见部分地源于以下事实：对于未来指向的中产阶级而言，后者的行为是令人反感和不理性的，它们源于一种短视的时间观——即，现在是首要的，而对未来的思考却被推到了次要位置上；因此，中产阶级愤慨于社会底层因为缺乏远见而导致了高生育率，或者中产阶级会谴责下层阶级缺乏节俭的意识。这其中涉及对现在指向和完成

---

① Kluckholm, F. R. (1949—50) 'Dominant and Substitute Profiles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Social Forces*, 17, p. 383.

② Warner, W. L. and Lunt, P. S. (1941)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 et al. (1941) *Deep S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nupfer, G. (1947) Portrait of the Underdo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pp. 103—114.

③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p. 188.

行为（consummatory behaviour）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源自一种鼓励为了未来的回报而推迟享受的立场。

当然，也有例子反映相反的情况。正如边沁（Jeremy Bentham）在《为高利贷辩护》（*Defense of Usury*）一书中所说的，“决心为未来而牺牲现在的人自然会成为为现在而牺牲未来的人嫉妒的对象。这就好比吃掉蛋糕的孩子自然就成为有蛋糕的孩子的敌人”。

在时间观上的差异并不总是阻碍一个社会系统的整合；在一定条件下，它们还会有利于它的维持和适应。例如，美国的主流文化强调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并且重视为了将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巧妙利用现在的资源所获得的成功，下层阶级背离了这种观念，反而有助于维持阶级分化结构。如果下层阶级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未来，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完成行为而不是中产阶级那种推迟享受的做法，[①] 就可能抑制对上层地位的竞争，从而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现有的权力、资源分配。[②] 同样，即便是在像扬基城（Yankee City）或者琼斯维尔（Jonesville）这样的小镇上，我们也会发现有人偏离主流的未来取向，而倾向于现在或者过去取向（下层群体倾向于现在取向，上层群体倾向于过去取向），这种差异就像一座水坝，阻止了对职业（等级）体系中较高地位的过于泛化的竞争……

如果偏离主流的时间取向依然维护现状，或者至少不会威胁到它，那么主流群体会觉得它们并没有实际影响。例如，宗派主义者只有在周日的礼拜仪式上、沉浸于乌托邦希望之中时才会有不同的时间观，而在

---

① Davis, A. (1946) 'The Motivation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rker', in W. F. Whyte (ed.), *industry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Ginzberg, E. (1948) 'Sex and Class Behaviour', in D. P. Geddis and E. Curie (eds), *About the Kinsey Report*, New York: Signet; Zweig, F. (1952) *The British Worker*,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Leshan, L. L. (1952) 'Time Orientation and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47, pp. 589—592.

② Hymam. H. H. (1953) 'The Value System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Ⅲ: Free Press; Schneider. L. and Lysgaard. S. (1953) 'The Deferred Gratification Patter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pp. 142—149.

一般的工作生活中却还是追求通过个人主义奋斗来取得成功，所以他们只需要面对邻居们温和的嘲弄。另一方面，有些群体的时间观所导致的日常行动违背了或者威胁到了主流文化的基本取向，比如千禧年教派，它们相信基督将再次降临人间，并且拒绝个人主义行为的价值观和职业成就，因此，这类群体会遭受形式上更加严厉的非难和谴责。最后是共产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群体，它们以一种乌托邦的名义积极地试图推翻现在的社会，它们的乌托邦是理想中完美社会的写照，所以它们将面临最为严厉的惩罚。

偏离主流的时间观类型

当西方文化中主流的“积极的、个人主义的未来取向”被认为没有回报并且令人失望时，就会出现对它的偏离。这种偏离可能发生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利用文化上禁忌的手段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退避到享乐主义的，快乐取向的完成行为，放弃对未来目标的追求，寻求即刻的满足。另外，（个人）也可能通过加入某些亚群体（sub-groups）——例如，工会——寻求帮助。这些群体试图借助集体行动，在不久的将来，改变其成员的困顿境况。最后，心灰意冷的个体可能会寻求群体归属感。因为这些群体预想了一个更有利的遥远未来，于是，现在的被剥夺感也变得可以忍受了。

时间取向往往和其他类型的取向相联系；对时间的关注焦点的不同可能伴随着集体行为或者个人行为取向上的不同。而且，就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它还可能与积极主动的或者消极被动的取向相关联……表12.1试图展现美国文化中主流的和歧异的时间观中最普遍的四种类型。

表12.1　美国文化中的主流及与之相异的时间观

Type 类型	Time perspective 时间观
I. Individualistic and active 个人主义的、积极的	Conformist 顺应主流的

续表

Type 类型	Time perspective 时间观
Ⅱ. Collective and active 集体主义的、积极的	Oriented towards individual future 个人主义未来取向的
	Oriented towards collective future (Utopian) 集体主义未来取向的（乌托邦的）
Ⅲ. Collective and passive 集体主义的、消极的	Chiliastic 千禧年主义的
Ⅳ. Individualistic and passive 个人主义的、消极的	Hedonist 享乐主义的

类型Ⅰ（表 12.1），并没有从根本上偏离制度上认可的时间观。一个人，不管是试图利用合法手段（例如，勤奋工作）获得未来的领先地位，还是借助非合法（non-legitimate）手段追求未来的回报，都没有偏离追求个人成功这一主流取向，因此也没有偏离主流时间观。

类型Ⅱ，希望以集体主义的方式缓解困顿处境的人们可能（1）坚持他们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理想，仅仅偏离了主流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或者（2）还同时树立起了集体主义的反信念（counter-symbols），即，通过现在的集体行动可以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者只是一种有限的偏离，例如为了建设或者完善组织，以便为个人带来更好的未来，宁可牺牲个人当下的满足；后者则表现出对主流时间观更加彻底的拒绝。

类型Ⅲ和类型Ⅳ指的是那些拒绝主流文化中积极主义的未来取向的人。无论是静观事件发生，还是独自沉浸于享乐之中，他们的时间取向是消极被动的，因此与之前讨论过的两种时间观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分类引出了下面的问题：在不同的处境中的群体是否更倾向于一种时间观而不是另一种。

类型Ⅰ：个人主义的、积极的：顺应主流的时间观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向上的社会流动受到推崇，并且向上流动的途

径实际上就是现在，那么那些因为下层社会出身而目标受挫的人会把上层社会及其时间观作为自己的基准。他们会积极地通过个人努力去追求未来的回报，其手段既可以是社会认可的也可以是社会不认可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主流阶层的时间观都没有被替换。即使这些取向可能需要涉及（文化上）严格禁忌的或者道德和法律上禁止的行为，它们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偏离公认的社会目标，因为它们还是要通过个人努力达致个人成功。

鉴于本文的目的，我们更关注另外三种时间观类型，因为它们都偏离了主流价值体系和主流时间观。

类型Ⅱa：集体主义的、积极的“个人未来”——工具性志愿团体（voluntary instrumental associations）的时间观

工会就是这一类型的例子。工会通过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人行动争取未来的回报，而组织起来的工人所要求的是：他们的工会能为每一个工人增加经济回报和工作上的保障。就像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工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事物而不是可以相信的事物”。[①] 就这个例子而言，加入工会只是偏离了在文化上占主流地位的个人主义手段，却并没有严重地偏离个人成功这一制度化目标。工会组织涉及另一种达致个人成功的手段，替代了传统的个人主义手段。它们是追求个人目标的集体主义手段。

然而，因为追求未来利益的集体活动需要以集体行动的名义临时重新整合直接利益，所以它不同于主流的行为模式。因此，为了壮大工会，工人们愿意在罢工活动中有所牺牲。工会拥护者的时间观中包含着一种旨在壮大工会的集体主义策略，所以他现在的行为往往不同于主流文化中的情况。尽管他利用了集体主义手段，但基本上还是追求个人成功，所以他并没有严重偏离主流时间观。

类型Ⅲb：集体主义的、积极的“集体未来”——乌托邦的时间观

我们沿用卡尔·曼海姆对乌托邦的界定，即，乌托邦是指“源于信念……和理想，而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效力的任意思维过程；它们最广

① Mills, C. W. (1951)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08.

义的含义是不存在的（non-existent）……而且它们会激起旨在改变当前现实的集体行动”。[①] 乌托邦超越了现实，使人们从是什么走向应该是什么。[②]

如果个体发现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生活机会，同时又没有发现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这种困顿处境的可能性（无论这种个人努力是循规蹈矩的还是离经叛道的），他们会倾向于接近那些生活机会同样受到损害的人们，而不会接受主流群体的价值取向。他们无法寄托于主流目标和主流文化中制度化的手段，试图坚持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反对当前文化。但是他们又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在目前的社会中无法得到实现，所以必须反对这个社会而支持一个“更好的”未来社会；到那时，这样的现在将被表明是应该在未来实现的，而根据未来的目标，反现在的行为会被合法化。

根据这一取向，今天的行动即使受到重视也只是因为它加快了未来世界的出现。例如，“有阶级意识的”欧洲工人共有一种时间观，即，现在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预期。乌托邦理想变成了未来的希望，而且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人们会共有一种乌托邦思想，它有助于他们应对现在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可以说，美国工人主要生活在现在，或者希望获得个人成功和机遇——它们渗透在主流文化的时间观之中。但是在欧洲，工人向上流动的愿望明显受阻，于是被乌托邦的时间观所吸引。他们的行为特点不是努力满足眼前的短期需要，而是在现在实行一定程度的禁欲，即为了未来而牺牲当前的享乐。

人们参照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来适应现在的环境。M. L. 费伯[③]的研究已经表明囚犯所遭受的痛苦——即，在其现在的角色上所遭受到的痛苦——很少取决于他们是否满意现在的处境，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对释

---

① Mannheim, K. (1931) ‘Utopia’,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5, p. 201.

② Coser, L. and Jacoby, H. (1951) ‘Utopia Revisited’, *Common Cause*, 4, pp. 370－378.

③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20, pp. 153－227.

放时间的预期。囚犯们期望被释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这些期望和乌托邦的思想状态发挥着一种类似的功能：它们可以让一个人“忽略”并且克服现在的挫败，而期待未来的幸福。有关集中营的研究也表明，被囚禁者的行为往往可以通过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加以解释。新进去的人们还心存希望，以为很快就会被释放，往往拒绝适应现实的恐怖，而那些老囚犯通常已经适应了现实，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还有被释放的可能了。而且，不仅是“将来的服刑时间”，规范性设想的时间（time normatively conceived）也会导致适应上的差异。坚持乌托邦的价值观的囚犯，例如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被证明，能够比没有未来取向价值观的人更好地抵御集中营生活的侵蚀性影响。这种取向让他们感到没有必要去适应“集中营的世界”（concentrationary universe）。而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超越现实取向的囚犯就很容易受到侵蚀。①

类型Ⅲ：集体主义的、消极的：千禧年主义时间观

这一时间观类型不同于乌托邦的时间观，它导致了消极被动的而非积极主动的行为模式。其重点并不在于通过积极的组织活动改变现实，而在于相信有一个撼动世界的大事件可以改变现实，只需消极地等待它的到来。

卡尔·曼海姆也描述过这种千禧年主义类型：“千禧年主义者期望与当前的现在相结合。因此他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沉浸于对未来的乐观的希望或者浪漫的回忆。他的态度可以被描述成一种紧张的期待。他总是翘首企盼吉祥时刻的来临，所以内心并没有清晰的时间概念……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的指望对他而言并不是推迟的理由，而只是一个定向的起点。”②

有些人不能够理解未来与现在之间存在着联系，他们的思维模式展现出童年早期的思维特点。年幼的儿童经常会把满足愿望的主观幻想和客观实在的要素相混淆，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尽管儿童把幻想和梦境体验为外部实在的一部分，但是正常的成长会使他逐渐能够区分主客观

---

① Bettelheim, B. (1943) “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ur in Extreme Condi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pp. 417—452 (also abbreviated version in T. M. Newcomb and 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1974)

② Mannheim, K. (1931) ‘Utopia’,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5, p. 195.

存在，即一方面是愿望和期望；另一方面是关于现象的知识……[①]这样，个体就能够开始准备性行为，把现在当作通向未来的途径。

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在其关于集中营囚犯的研究中也有对这种精神过程的有趣的描述："囚犯在集中营中待的时间越久，他的白日梦越不真实；以至于那些老囚犯的希望和期望通常都是末世论的或者是对救世主的期望或信念所激起的。"[②]

如果要求现在得不到满足，通过行动改变未来的可能性似乎也并不存在，一种千禧年主义的时间观出现的条件就满足了。于是，行动不再需要计划和展望，因为未来被看作是涌现出来的，它不依赖于行动的个体（acting individuals）的意图。就像劳伦斯·K. 弗兰克（Lawrence K. Frank）的争辩，未来可能"太遥远了，以至于丧失了它对现在的所有效力"。[③]

类型Ⅳ：个体主义的、消极的；享乐主义的时间观

尽管沉浸于千禧年美景和满足愿望的幻想的人们看上去已经丧失了积极谋划和事先准备或者计划的意识，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团体归属感……而类型Ⅳ涉及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既不能以一贯的方式行事也不能和他人实现持久的联合。他们完全没有未来意识，沉浸于此时此地的完成行为之中；他们不把现在看作是未来的准备阶段的或者是对未来有帮助的。就像劳伦斯·K. 弗兰克所说，"关注焦点越直接，就越容易有完成行为，越容易做出幼稚的反应，越容易忽视后果"。[④] 在这一类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边缘性社会类别，像无业游民、乞丐、流浪汉。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无法成为任何团体的成员，每天都逍遥自在地生活着。[⑤]

---

① Piaget. J. (1926) *La Representation du Monde*, Paris: Alcan.

② Bettelheim, B. (1947) "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ur in Extreme Conditions", in T. M. Newcomb and 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1947, p. 635.

③ Frank, L. K. (1948) *Society and the Patient*,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 344.

④ Frank, L. K. (1948) *Society and the Patient*. p. 344.

⑤ 参见 Anderson, N. (1923) *The Hob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well, G. (1954) *Down and Out in London and Paris*, New York: Permabooks; Bedarick, K. (1957) *The Young Worker of Toda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时间观发生了断裂，或者说遭到了破坏，其程度之彻底，导致自发的群体倾向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如果拥护一个群体，至少要为了整个群体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即刻的满足。

时间观的严重断裂还与其他指导行为的价值观的崩溃，以及自我的幼稚化（primitivisation of the self）——它破坏了计划的基础，使它们在根本上只能反映个人的当时的有效状态——有关。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是向儿童的适应模式的倒退——其中涉及的时间观主要由邻近的过去和即刻的现在构成。

精神病学观察已经积累起了有关这种断裂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社会情境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社会情境中，以前形成的时间观突然不再有效，导致时间观发生断裂。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士兵当中，“一种消极被动的适应导致时间观缩短，因此他们只生活在眼前短暂的时间之中，更加关注手段而不是目的。战斗部队中的这种享乐主义是由来已久的”。[①] 很明显，这里的缩短的时间观是一种逃避的表现，因为眼前的现实不再是评价过去和计划未来的基础。[②]

长期失业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时间观幼稚化的过程。赖特·贝克（Wright Bakke）注意到：

> 在很多方面，工人，尤其是失业劳动力，缺乏长远眼光，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展望未来，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他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举动就可能造成苦难甚至是灾难。濒临贫困就意味着很容易只为眼前，甚至不惜以未来为代价。[③]

加哈达和蔡扎尔（Jahoda and Zeizal）对马林索尔（Marienthal）的失业人员的研究，强有力地表明了长期失业如何同时导致了“解组”

---

① Stouffer, S. A.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Combat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90.

② Oberndorf, P. (1941) 'Time, Its Relation to Reality and Purpose', *Psychodynamic Review*, 28, p. 144.

③ Bakke, E. W. (1933) *The Unemployed Man*, London: Nisbet, p. 42.

(degrouping) 过程——即丧失了与他人沟通联系的能力，丧失了未来取向的时间观以及与之相伴的理性地计划和安排生活的能力。

结 论

对各个反常时间观类型的讨论已经表明，个体或者群体对这些时间取向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对不同时间观的选择问题的研究还不足以得出最终结论，但是至少可以提出一些相关假设。

我们可以假设：乌托邦取向往往出现在这样的群体和个人身上，他们疏远主流文化价值，同时又感到自身的社会权利和重要性——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经济领域中承担着关键性的角色。乌托邦思想通常会盛行于上升阶级或者阶层，例如十七、十八世纪的中产阶级或者十九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有一些社会阶层和个人，内心非常失望，没有安全感，感觉不到自身的力量和优势，他们就更倾向于接受消极的千禧年幻想；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和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黑人。

那些感到无法在现在找到寄托，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位置上还有相对安全感的人们更容易接受乌托邦思想，这会激发群体行动而不是千禧年希望。只有那些既与现在相疏离又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产生消极的期待。我们认为：提高相对安全感可以使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社会阶层倾向于摆脱千禧年希望和幻想——即，摆脱消极的期待，进而采取主动的、集体主义的未来取向。南部黑人近期的发展情况似乎就体现了上述转变。

最后，解组如果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会使时间观遭到破坏，进而导致人们被危险的现在所淹没而无法抗争。对于这些人来讲，要想获得希望或者期望，似乎必须在客观条件上有所改善——这是从根本上与未来建立联系的前提条件。

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足以表明时间观是决定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作为人际关系和文化行为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中，这个概念还可能被证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十三章　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计时方式[①]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计时系统在每个文化中都是实践和情感的需要，尽管它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类群体中的成员都需要安排各类活动，需要确定将来的日期，需要回忆往昔，需要计算已经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时间。

计时的实践需要产生于任何一项具有一定复杂性的劳动，它需要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逐步完成，并且需要很多人共同合作。当要开始耕耘土地，或者要进行一次长期捕捞或长途捕猎活动时，就必须根据一些可以预见的、明确的周期性自然现象来确定日期。当要举行巫术或者宗教节庆时，往往需要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事前准备，还必须将这些准备劳动置于其他活动的进程和计划之中。另外，不同地方的人通常很难见面，当需要择日聚会时，就必须用某种方法提前确定一个将来的日期。

这些实践需要必然涉及关于往昔的情感。朋友或者亲人去世会令人长久难以忘怀。重要的部族事务、军事远征，尤其是盛大节庆，会被每个成员铭记于心。

人们往往会铭记那些重要的或者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例如，有很多人饿死的饥荒年，或者一场瘟疫，或者是共同体内部的一次严重的争吵，一场捕获奴隶的行动或者猎头远征。而且他们会将它们置于对往昔那一连串回忆中的某个适当的地方。即使只有最低限度的历史兴趣（总是可以在“最简单的野蛮人”那里发现这种最低限度的历史兴趣）也需要有一种编年体系（a system of chronology），尽管它无需追溯很远，而

---

① 选自 B. Malinowski, 'Lunar and Seasonal Calendar in the Trobriand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6－57, 1926－1927, pp. 203－2015.

且通常会在传奇的迷雾中迷失。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尝试，即形成一个协调自然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模糊信息的系统。

然而，所有这些需要，无论是实践的还是情感的，并不决定，甚至也不预示计时的方式。对于我们而言，凭借现有的天文知识，很明显，（只有）根据天文知识对时间进行计算，才能够达到时间计算上的精确性，避免在时间计量上陷入恶性循环的危险。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种初级的天文历法不会超越最简单的野蛮人的思想界限。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土著人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怎样思考它以及怎样调整他们的知识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就能够满意地回答所有问题。

接下来是一些细节性描述，每一个都反映了土著人的天文、气象知识状况，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以及他们利用自己的信息来满足编年需要的方式。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再现土著人的视角——即，什么对他们而言是最适用的计时方式，重复出现的自然事件中什么是最适宜的，他们是以什么方式将各种可能的计时体系协调起来的。

这里将给出有关土著人计时方式的材料，这些材料是根据美拉尼西亚群岛西南部的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情况得出。他们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状态，他们的活动，像园艺、捕捞，跨海远征，部落战争以及节庆，葬礼仪式和纪念仪式，需要确定的历法安排。实际上，他们可以提前几个月确定一个日期。他们也能历数过去的好几个世代，并且大体上将某个事件确定在某一年的某个时节。

在界定时间时，他们使用了许多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大体上分成三类——天文的、气象的和文化的。第一类基于对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观察；第二类则是基于风向和气候上的周期性变化；第三类是基于人们的季节性活动。请将这个划分记于心中，接下来，首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天文知识。

土著人（时间）计算中的天文要素

土著人都知道太阳运动具有周期性，每年有两个运行方向——冬季由北向南而夏季由南向北，但是却没有据此构想出一个太阳年的观念；实际上，土著人对这个主要天体及其与万物生长的事实上的关系明显不感兴趣。当被问到时，他们会说，太阳在空中“行走”或者移动；傍晚时，它会落下；此后它移动到地球的边缘以下，从西边沿着南边的地平

线移动到东边，然后在早晨的时候从东方升起来。但是，即便是这个理论也可能只是由那些最有智慧的土著人提出来的，依然没有包含最起码的热情或者兴趣。任何其他问题的回答可能都是不知道（ayseki）。

土著人对太阳主动采取的主要态度体现在 waygigi，即阳光巫术。它与 to'urikuna——祈雨巫术相对应。然而，阳光巫术只是负面的，它是雨巫术的反面；它总是被归为邪恶巫术，并且土著人更多会认为它阻碍了降雨而不是制造了阳光。它也是至高无上的首领们的尊严和威信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民间故事中，太阳有时候会被人格化，但是，实际上只是一些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被讲来消遣。它在严肃的传说中只出现过一次。这个传说解释了火的起源，但是，只在开始时讲到太阳、月亮和火都是由同一个女人所生，其余就只是关于火的故事了。至于太阳以神秘的或者象征性的形象出现在任何其他故事中，那或许是由属于某个著名的“自然神学派”（Natur-Mythoogische Schule）的不切实际的哲学家发现的，但是，一个智慧的土著人，甚至是人类学家，则只会付之一笑。

太阳在巫术套路中不少被提及，但纯粹以一种描述的方式；它经常表达行动的迅捷。例如，正常情况下要持续多天的活动在巫术咒文中则被描述成开始于早晨，终止于下午。这种巫术套路的例子，还可以在作者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找到。

这一类型的巫术咒文与主要依据太阳的计时方式紧密相关——即日间各段时间的含义。这里有一系列表述用以描述凌晨、清晨日出前、日出、太阳的光线呈水平线、微微翘起、在头上、倾斜、往下沉、完全落下去的时间。它们明显都是参照了太阳的位置。

至于星星，土著人并不清楚它们与太阳运动的关系。但是，他们注意到，在特定的时节，夜空中的星星会展现出不同的构型。他们给一些星座起了名字，比如昂宿星团，猎户座的一部分，南十字座等等；他们知道在什么时节看得见这些星星，但是并不利用它们来计量时间。人格化的星星也仅仅出现于一个神话中。

比起太阳和星星，月亮在土著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依旧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土著人对它抱有伪科学的好奇。他们不关心月亮的变化和月相；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神话故事中，他们都不倾向于以神秘或者象征的方式解释月亮周期。在一个故事中，月亮是

由一个女人所生，在另一个故事中，她被人格化了。但是，当问及土著人关于月亮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回答："月亮就是月亮，就像你看到的那样，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任何活物。"

没有制造或者消除月光的巫术，没有任何形式的关于月亮的仪式。月亮唯一与巫术相关的联系就是它出现在关于爱情和美的咒语中，因为，就像我们目前所见，月亮的圆满就是美好外貌的比喻。土著人并不相信月盈和月亏对植物成长的影响，特定月份与各种经济性活动——尤其是园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经验性的。下面就来对这些方面的情况作些描述。

月亮在部落生活中的巨大意义，以及土著人对它的兴趣，完全是直接的、非象征性的。乡间的人工照明设施极为原始，月光发挥了重要作用。夜晚因为它从一个最好待在家中围坐壁火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在热带地区散步或玩耍，或者沉浸于任何室外活动的最愉快的时间。因此，在太阴月的四个阶段的第二个阶段，村落内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周期性的增加。所有节庆活动、经营的事业以及仪式活动，高潮都出现在满月。

第一阶段，或者，按照土著人的说法，从月亮刚刚出现到日落时月亮正当头这段时间，被称作"未成熟的月亮"（tubugeguda）。人们对这一阶段中的每一天都没有单独命名。

第二个阶段，被称作"高月"（bitowota tubukola）——也就是说，此时月亮在夜晚高悬于夜空。但是，这个名字也被用于指称这一时期的第一、二天，也就是太阴月的第八、第九天。此后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名称（见表 13.1）。最后一个四分之一时期被称作 odubiliviyaka（意思是"在漆黑之中"），这一时期的每一天都没有名称。

第 13 天（yapila）被认为是满月的开始。从这一天开始有连续三天的节庆活动。村庄里一般的庆祝活动通常会有舞蹈和与爱情相关的活动。女孩们通常会去祈求一份满月礼物（iyupalaygu）："请给我一份 yapila 的礼物吧！"。当人们刚刚看到新月时，孩子们会拖长声喊出："Katugogova。"这就算是满月开始的仪式。第 14 天（vala'ita）被认为有最高的满月（the full moon at its highest）。满月在第 15 天（woulo）结束。

满月的统称是"buata"。它包括三天，时常也会延长至五天，从第 11 天到第 15 天。新月也有一个统称，即"Kapatu"（意思是"细脸的，

丑陋的”）；当它开始变盈时，人们就认为它变得“美丽丰盈”（bibubowatu）了，直到它变得盈圆，就是“bwata”了。很显然，这个四阶段划分系统把一个太阴月划分成四个周，并且简单确定了太阴月中的每一天。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阶段中的几天并没有被命名。

表 13.1　太阴月第二、第三阶段中每天的名称

阶段（Quarter）	天（Day）	名称（Name）
第二阶段	第 10	Bitovila
	第 11	Urokaywo
	第 12	Yomkovila
	第 13	Yapila
	第 14	Yala'ita
	第 15	Woulo
	第 16	Tolukwaya
	第 17	Namisa
	第 18	Taygakibuli
第三阶段	第 19	Misilowa
	第 20	Sidagu
	第 21	Kalubuwotu sepu

注：第 18 天的名称也被用来指称第三阶段（Taygakibuli）。

土著人生活的季节

在美拉尼西亚，季节的主要划分方式是根据两个主要风向来确定的。五月到十一月的冬季月份的信风是朝东南方向的。这是一种有规律的风，每天上午晚些时候开始，下午风力达到最强，持续几个小时后，在晚上停息。很少没有这种风的时候，偶尔会有一天，风力微弱，或者风向发生些许变化。整个信风季中，岛上少有陆地风，所以，这种风向条件对于航海和粗陋原始的船具是不利的。

从十二月持续到四月的西北向季风则十分不同。在此期间，总会有几天风平浪静，或者只有西北向的微风。有时候季风会突然发作，形成暴风雨甚至飓风。在这一季里，经常呈现多云天气，雨量较多。它还是植物成长的季节。在无风而晴朗的日子里，就可以体会到热带夏季的温暖。然而，东新几内亚最热的时间是两季之间的几个月-——例如，四月和五月，以及十一月和十二月。

这种季节划分和植物生长相联系，植物在湿季之初开始新一轮生长。而信风盛行时则是干季，此时，许多水果和作物就成熟了，但是，有时候也会遭遇到干旱和歉收的坏年份。这种划分在农作物的例子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各种准备农耕的活动，包括锄草烧田，必须要在干季后期进行，以便农耕时赶上最初的几场雨。所以，农作物的生长也是整个自然界开始恢复盎然生机的时候；干季开始时也正是收获农作物的时候。因此，园艺活动的时间跨越了整个季风季并且一直延续到干季。

季风季和两季中间的平静期也是另外两类重要活动——捕捞和航海-——的唯一合适的时间。风向自南向东的时候，捕捞活动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非常困难，因为那个时候，强劲的冷风使驾船和涉水都陷入了困境。而且，当地的独木舟无法逆风航行，甚至连勉强航行都不可能，所以航海活动只能在风向改变以及有陆地风时才能进行，这对于沿岸航行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生活的密度并非在全年中均匀分布，而是集中于湿季、平静期和风向变化的月份。粗略地说，就是从八月到九月，从四月到五月，因地理位置不同会有变化。这把我们引向土著人的观点，这种观点使我们能够像特罗布里恩德岛土著人一样理解一年的周期，和他一样用阴历月份的名称作为他的时间协调体系。

月份的命名

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在观察原始习俗时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不带任何理论问题和理论观点，往往就无法看到给定的不同事实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就不能深入探索每个细节，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充分和无趣的信息。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种学学者遇到的问题则是容易过于轻率地下结论；也可以说他太急于要达致问题的核心。

就计时问题，我在新几内亚的经验曾是后一种错误的典型代表。业

余人士基本上不会劳神于土著人建构历法的方法，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假设有一位一流的业余观察者，他向我们提供了很多，他可能已经获得并且告诉了我们土著人自己对阴历月份的理解，若再经过比较人种学的业余人士的分析，可能就已经得出历法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了。我准备系统陈述一个计时的问题，并且热切地希望解决它，所以，我带着很多具体的问题开始着手。我想知道土著人是否为月亮命名，他们起了多少个名字——十二个或者十三个，以及他们是如何调和阳历计时和阴历计时的。经过在南海岸的莫图（Motu）进行的历时一个月的前期准备劳动，我发现土著人有 13 个指涉阴历月份的名字。既然已经发现了这十三个阴历月份的名字，我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土著人知道了一年之中的阴历周期的真正个数，并且我假设他们根据这些周期来计算时间。对新几内亚南海岸上另一个部落——迈卢（Mailu）——进行的更加详尽的调查中，我发现那里的土著人根本就没有指涉阴历月的名字，这在我看来也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的最终和满意的答案。

当我来到特洛布里恩德岛群时，我依然遵循同样的研究计划，但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尽管存在不同的阴历月份的名称，但不是十三个，也很难找出究竟有多少个。我从一些人那里听到十个、十一个或者十二个，有时通过追问还能得到十三个，但是，很显然，并没有一个共识性数字。一般而言，这些阴历月份会被划分为两组，每组五个，（另外）有一个或者两个处于中间。因此，回答第一个问题——土著人知道一年中会有多少个阴历月份，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很明显，除非第一个问题得到回答，否则关于历法观念的问题也无法适当提出。

真正的麻烦在于这个问题过于僵化。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当土著人为阴历月份命名并计算其数目时，其目的是计时，无论一年中有十二个还是十三个，不好的还是好的，我认为整个体系就是一个时间坐标系统。然而，正确的程序应该是这样：先不假设这个体系的作用和功能，而只是深入调查。如果发现人们给不同的阴历月份命名，那么，下一步就应该了解人们是在何种情境下以及以何种方式使用这个阴历月份命名体系的。换句话说，第二步就应该放弃自己的思想文化习惯。我们给不同的阴历月份命名的目的是计时，我们使用历法来划分、计数时间，确定日期；对于我们而言，整个体系就是时间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更原始的文化中也使用类似的（时间）系统。

实际上，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群上，很少或者只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使用阴历月份计时；命名及排列阴历月份的整个系统在土著人的计时方式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这一切都只能根据土著人的社会经济观念加以解释。

首先需要认识到，土著人并不根据太阳或星星的位置，或者根据给定的阴历月份的数目来界定或者决定一年的周期。如前所述，人们根本不能立刻说出一个给定的阴历月份的数目，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园艺师（gardener）和巫师（magician）也不能。他们要掰着手指一一计数不同的名字。对于特罗布里恩德岛人而言，决定一年周期的是园艺耕作的经济周期。

语言学，尤其是辞源学的证据通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 taytu（有两个意思，即“年”和“甘薯”）一例中却反映出了真正的土著人观点。实际上，所有其他部落活动都从属于这一观点。

一年被划分为作物未成熟的时期和它们开始成熟的时期。节庆活动和纪念性活动的时间取决于收获（时间），它们要在收获之后举行。航海和海外远征也不会仅仅考虑风的条件，人们只有在主要园艺劳动结束之后才会出海，而从来不会在季风雨季刚开始时就出海，尽管那时出海的条件已经很有利了。土著人生活的全部，他们的交谈、兴趣，甚至激情，都围绕着园艺、炫耀食物以及在这些活动中需要的技术和效率。

仅仅通过重复土著人做的事，我开始习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模式，相应地，也逐渐意识到一个与上述一切相关联的重要事实；所有关于时间的实际计算，对过去事件的所有记忆，以及日期的确定都要依据园艺活动。土著人要确定一段时间或者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总会说：它发生在园艺活动的某某时期——o takaywa，清除灌木时期；wa gabu，烧田时期（在这个阶段，要用火烧掉被砍倒的、干枯的灌木）；wa sopu，种植时期；o katatam，架藤时期；o pwakova，除杂草时期；wa basi，去除多余根茎的时候；o kop'i，去除蔓藤的时候；watum，首次挖甘薯的时候；o tayoyuwa，收获的时候。

显然，这些时间划分并不精确，而且在不同地区还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某个地方的主要食物是又大又长的甘薯，收获的时间很早，整个园艺耕作的周期很快就结束了。沼泽地带的主要食物是芋，要早种早收。主要农业地区的主要作物是小甘薯，收获时间要比最早收获甘薯的地区

晚两个月。可见，这个计时系统不仅涉及土著人的真实兴趣，还涉及所有真正相关的事件，土著人的计划和安排就取决于此。

这种历法不仅最能满足心理需要，而且是所有实际安排中最有效的。如果土著人把一次远征定在某某阴历月，他们或许能也或许不能遵守这个时间，但是，如果他们说要在除杂草的时候走——那时男人在田园中的劳动已经结束而女人的劳动开始了——那就是真正会出海的时间。

因此，当地时间划分的真正框架，也是他们对一年的想象图景，表现为园艺的一系列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计数阴历月份的做法就是多余的。对于园艺巫师以及规划园艺劳动和其他部落生活事宜（节期、远征、葬礼等）的长者们而言，一种独立的计时系统依然是有必要的，而且（使用）各个连续月份的名字也很方便。（因此）利用阴历月命名来计时的做法会以秘传的和专门化的方式为主。

现在我们来看连续的阴历月份名。对于土著人而言，一年的开端是旧园圃的完结和新园圃的开始。这期间历经了三个阴历月：完成收获的阴历月，Kuluwasasa；收获后举行庆祝活动的阴历月，milamala；此后的阴历月，yakosa。土著人都知道这些名字，并且每个人都会用到它们。

但是，至于一年开始的真正时间，并不存在共识；他们没有“新一年”（new year）或者“新年”（new year's day）的说法，这样的观念对他们而言也并不重要，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年代性的编年体系。

最好在一个图表中展示这些阴历月份并附说明。（表 13.2）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清楚地认识到，在什么情景下使用这个阴历月命名体系，怎样使用，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它唤起了什么样的兴趣。只有这样的功能性知识，才能赋予我们洞悉本质的能力。

对这种阴历的实际应用并不十分广泛。长者们的会议时常会在第一个阴历月举行，他们讨论并以仪式的方式正式决定来年的计划。每年的庆祝活动总会在第二个阴历月里举行，但共同体时常会决定将节庆延续到第三个阴历月；此后，他们就不得不稍微调整园艺活动的进程，或者推迟 Kula（出海远征），最后安排回来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节庆、航海和仪式等活动与阴历月的关联才是更为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知，人们要在满月期庆祝所有达到高潮的活动，而准备性活动只能在之前的 28

天里进行。

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偶尔会提及阴历月份的名字并数计它们。不难看出人们更关注前六七个阴历月份，或者当人们计划好一场出海远征时，兴趣还会被延伸到第八或者第九个阴历月。在这些情况下，除了划艇的建造和投水，除了对行程本身的讨论，返程的时间最晚会在信风季开始的时候，那时，土著人只得向南航行，乘着东南朝向的信风回来。

人们对第八个阴历月之后的各月份确实不怎么感兴趣。因为在那一时期里，风向变成了东南向，捕捞和航海都不可能而只能返航，园圃里最重要的劳动已经结束，只能开始早期收获。早期收获开始得很早，因为仓库通常早在第五个或第六个阴历月时就空了，土著人就不得不吃他们不喜欢的野生植物。因此，他们会尽可能早地收获较早耕作的或者次要的园圃，它们被称作 kaymugwa。当赶上大丰收，并在此后的 milamala 月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他们对时序的兴趣就变成了焦点。

关于这个阴历月、有关其命名和决定它的事件，以及在该区域内三个不同地区确定这个阴历月的方式，还需要补充几句。

这个阴历月的名字来源于一种奇特的海洋环节动物，palolo 虫，特罗布里恩德岛土著人称之为“milamala”。它每年在繁殖的时候会在海面上出现一次，时间就在 10 月 15 日到 11 月 15 日之间的那个满月期。这一现象只发生在该地区最南端的 Vakta 岛上，因为这种环节动物只出现在 Vakuta 岛和 d'Entrecasteaux 群岛的 Sanaroa 岛之间的暗礁上。Vakuta 人会在它们出现的晚上用小网抓住它们，然后以仪式的方式把它们烤熟吃掉。在 Vakuta 岛上，它们出现的那个阴历月就被称作 milamala。一年一度的节庆会在一个叫 palolo 的节期里举行，它包括了收获欢宴，礼仪性拜访，和一系列与死者还魂相关的仪式。但是，同样的节庆活动在该岛主要地区会提前一个月举行，北部是这样，而在南部和偏僻的岛上还要早一个月。这里的差别恰好对应于上文提到过的差别，即各地区因为栽培的主要农作物的不同而造成了收获时间上的差别。确定这个日期的困难在于这样的事实：虽然所有土著人都承认 Vakuta 岛上的 milamala 是绝对有效的标准，但是它却是最晚的。

其他地区主要依据园圃的状况，误以为（确定该日期的）根据是庄稼成熟的早晚。阴历的重要性之小就表现在以下事实上：在这些例子中，只有一些嘲笑和一个滑稽的依据，土著人会说某某地区“在其计时

方式上犯傻了”。

由此可见，只有一个时期，也就是收获之后的那个时期，才是人们普遍的兴趣所在，尽管此后几个月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在这列阴历月份名的单子上，位置越靠下的越不重要。土著人对它们的使用情况就完全能证明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 milamala，大多数成年人都知道第一、第二个阴历月的名字。大多数成熟男性能够数出一些阴历月份的名字，但是，会漏掉几个或者在顺序上出错，这样最多能数出八个，有时候有十个；会有几个人因为精通民间传说而能够正确地数出十二个月。

但是，要正确理解事物的状况还需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历法除了具有实践价值，还为记录一年中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参照框架。无论何时，一名老人如果被问及关于阴历月份的事，他不会给出一个清楚的解释，而是立刻讲述一个故事，详细生动地描述在连续的各个月份中发生的事，由此给出各个阴历月份的名字。一位智慧的长者会清楚地知道：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阴历月份的名称，只有那些了解园圃并且知道一年是怎样经过的人才会熟悉它们。然后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会有五个阴历月是未成熟的（geguda），而另外五个是成熟的（matuwo）。他会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在第一个阴历月里砍倒灌木并待它们被烈日晒干之后烧掉的；之后又是如何闲下来并为收获劳动做准备的。接下来，他会描述节庆活动以及它们是如何在满月期达到高潮的。如果他对习俗感兴趣又具有想象力，那么他会迷失在细节中，并且很可能随时对习俗和该时期的部落生活加以解释。如果只局限于时序问题，他会继续描述园艺劳动，这自然是当地“年代记”的主脉。他会解释第一次种植的原始仪式，并且概述仪式中的实际活动，然后是架藤仪式和开始除草的仪式。他可能还会详述未成熟月份的本质，植物在这个时期是如何生长的，汁液是怎样进入甘薯，增大其根茎，并沿藤枝上升的。从表 13. 2 可以看出，土著人会在第三个阴历月里种上（甘薯）块茎，它们在第四个阴历月期间成长，接着，人们要在第五个阴历月里为它们架设藤架（kavatam）。除了以园圃为参照框架之外，还有与之并行的另一个方面的参照系，土著人对此也抱有很浓厚的兴趣。一个资料提供人，可能是一位园艺巫师，会强调园圃作物的生长，而另一位却可能对村庄中的食物贮存量更感兴趣。

最受欢迎的阴历月是第一个到第四个，它们被称作充足月份（ma-

lia)。在此期间，甘薯房被填得满满的，身份地位高的人会夸耀自己仓库的美丽装饰和每年的收获。从第一到第四个月，食物存量不断增加。人们在第二个阴历月里要大肆炫耀食物，以便给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激起欢喜的回应。人们在描述它的时候也会使用热烈的辞藻。但从此以后，土著人开始了低调的生活。到第四个月的月底，仓库里的食物几乎就用尽了。只有部落首领还有足够的食物。新的作物还没有成熟，于是，饥饿时期（molu）开始了。第五个月是个糟糕的阴历月份，它是第一个未成熟月，或许也是最严重的饥饿月。土著人不得不到灌木丛中寻找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坚果和水果，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只能吃野生植物的根茎。这一直要延续到第九个阴历月，所以，土著人通常会把一年划分成五个充足月（1 到 4 月以及 12 月），和五个匮乏月（5 到 9 月），其间有两个中间月（10 和 11 月），它们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组。然而，真正的饥饿时期不会持续到第七个月之后，因为那时成熟月就开始了——有时候甚至会更早。

成熟月与未成熟月的划分，更多是依据植物的生长过程而非食物状况。未成熟的时间反映的是这样一个时期：藤枝发芽、攀长，长出了叶子和幼嫩的块茎。随着雨水的减少，风力和日照的加强，叶子开始变黄、干枯，根茎发育成了块茎并开始成熟；这些都发生在 matuwo。

饥饿月份过后的食物就是早期园圃的收获。起初，食物少到只够孩子们吃，但是，从第九个阴历月开始，食物就够所有人吃了。在第九个月里，主要园圃开始收获，但是，收获的食物要仪式性地贮存起来，以便将来呈给首领和某些亲戚。

我在这里提供的关于阴历月的情况是经过删减的。信息提供者经常会离开本题，谈论特别的历史事件，大饥荒或者大丰收。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总是园圃中的食物，充足与饥饿之间的对比，成长和成熟的过程等。最初的五个阴历月被认为是未成熟的过程和生长期，接下来的五个阴历月则是甘薯根茎成熟的过程和收获的时候。在所有这些划分中，有些阴历月明显比其他显得更不重要。土著人的讲述到第十个阴历月（utokaka）之后就断了。在成熟与未成熟的划分和贫乏与充实的划分之外还落下了两个阴历月，所以，园圃耕作周期完结之后的那段时间才是真正的结束时间，在此期间的收获劳动少有变数和干扰，而且没有饥饿，充裕的收获也不能被用于节庆和纪念活动。因此，土著人对这段时

间并不感兴趣，所以，这段时间总体上是无名的。

我已经谈过均分两组的划分方法。一般来说，每一组包括五个阴历月，（在这两组之外）剩余两个月。很少会有人将它们划分成每组包含六个的两组（表 13.2）。成熟与未成熟的划分和充足与匮乏的划分并不对应。似乎还存在第十三个阴历月的名字，我听到的词有“Kuluwalasi”和“obuwatayayo”，其他地区则有“gaygila”和“katabugibogi”。我的信息提供者中有几个似乎各自给出了第十三个阴历月的名字，但得出这第十三个阴历月的名字的过程仅仅出于偶然：有几个阴历月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有不同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前十个名字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并且很容易获得，至于剩下的古怪的月份有时就会有一到三个名字，而且总是在每组五个的两组划分体系之外。

我想补充一下：相对于第十一个农历月，第十二个农历月更少被忽略；因为它就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农历月之前，所以，从它们那里获得了一些重要性。

与此体系相关的一点是：土著人把阴历月划分成五个一组或者六个一组，给它们命名，加以分辨，是因为他们确实对它们感兴趣。这种兴趣并不是一种直接对历法的兴趣，（如果是）它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种更加系统的做法。整个体系并不是将一年划分成数个阴历月；而是一种计算阴历月个数的方法，尤其是满月，因为它代表了重要的部落活动，它们是一年中有趣和戏剧性的时期。就像一年之中让土著人感兴趣的时期首先要与园圃和食物贮存量相关，人们还会为与这些方面相关的阴历月份命名、知晓它们的名字，并把它们划分进一个生长的体系，表现为充足与匮乏。其余农历月就被主要兴趣忽略了。

一年有十个或者十二个阴历月，这不是因为土著人不能正确数计一年中阴历月的个数，也不是因为他们没能发现十三个比十二个更接近真实，而是因为数字十或者十二更符合他们的实践和实用兴趣。到了年底，收获之后的平淡期开始了，直到节庆活动开始之前，这段时间都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以至于第十三个阴历月就被完全落掉了，甚至在秘传的描述中也是如此。

表 13.2　阴历月份表

Malia	1. Kuluwasasa 2. Milamala 3. Yakosi... 4. Yavatakulu	Geguda	Geguda	大丰收 Milamala 节 Usigola 节	Takayva Gabu
				植物成长	Sopu Kavatam Puakova Basi Tum
Molu	5. Toliyavata 6. Yavatam 7. Gelivilavi	Matuwo	Matuwo	不重要的时期	Takayva
Molu	8. Bulumaduku 9. Kuluwotu				
Malia	10. Utokakana 11. Ilaybisila 12. Yakosi				

注：大约第三月西北季（季风）开始；在阴历 8 月东南季开始

第十四章　卡比尔人的时间观[①]

皮埃尔·布迪厄

一位老卡比尔人曾经说："法国人的行事方式就好像他们永远都不会死。"在阿尔及利亚的本土文化中，没有什么比试图把握未来的想法更加另类，也没有什么比以下观念更加奇怪：未来是广阔、开放的，它蕴涵着无数的可能，人们能够在其中发掘和选择这些可能性。那么，这里是否要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农民（fellah，特指阿拉伯国家的农民），一种暂时性的人（mens momentanea），沉浸在直接感知到的现在，而无法想象遥远的未来？是否有必要说，我们可以从他们屈从于时间流淌的态度中看出，他们仅仅顺从于气候的灾难、自然的无常和诸神的旨意？为了避免提出错误的问题，也许必须要分析他的未来意识的实际模式。对于时间的意识，不仅仅是他生活经验的一个方面，更是生活经验据以组织的形式。

卡比尔农民的生活节奏遵照一种仪式性的历法，这种历法完全是一个神话式的系统。这里并不需要详细分析这个系统，而是试图展现它是怎样形塑农民的世界观的，而且这样就足以指出上述世界观的大体轮廓了。对自然现象的感知，并不是凭借自然主义的描述方式获得的。日常经验会分离出某些特别的重要方面，这些方面会被当作一个复杂符号体系中的功能性符号。这个神话仪式系统表现为一簇互补性原则的对立关系。与耕耘和播种相对的是收获；与纺织、犁耕的季节性活动相对的是烧陶。春天与秋天相对，夏天与冬天相对，以及湿季和干季这一更大、更清晰的对立，这一相对关系涉及这两个季节的各个方面。这种对立的

---

① 选自 P. Bourdieu,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6, 1963, pp. 55－72.

关系也包括日与夜，光与影，日出和日落，东和西，等等。所有这些成对的对立观念，界定了农业劳动和手工艺活动的历法，同时，也构成了两性劳动分工的基础，区分了秋冬两季的湿润的食物和春夏两季的干燥食物。同样的逻辑决定了社会生活的节奏，节庆季和闲暇周期，构成共同体的特定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例如，（共同体中）相对立的两个集团；它也决定了室内的空间安排；提供了作为价值系统基础的那一对对立的关系。因此，与多产和生发相联系的湿季和与消亡相联系的干季之间的比照，与两性相关联的种植和纺织和与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收获之间的对立，这两种对立关系是平行的；最后是促发生命的犁刃与毁灭生命的镰刀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都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对立体系之中，包括生与死的对立，水与火的对立，需要平息的自然力量与需要谨慎对待的人类技术的对立。

农民进行技术性和礼拜活动时仿佛就处于一个符号世界之中，这些活动可以被整合到一个被称作活动着的神话（mythology-in-action）系统中。每年的劳动和仪式看上去旨在解决处于农业核心的冲突：自然，如若弃之不顾，就闲置下来，变得贫瘠了。但是，使土地肥沃的人类活动及其技术，虽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却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是一种违背，还因为对工具的使用本身就是有罪的和可怕的，因为，那些工具——犁刃、织机和镰刀，在制作时都使用了火。农业年中的重要时刻——耕种和收获——是人与自然这两个角色上演的悲剧的高潮。在这场戏剧中，农民为了使养育他们的土地变得富饶肥沃并从中获取财富而被迫对她使用暴力。

卡比尔农民对于自然和时间的态度与其日常生活实践中所隐含的神话的意义和深刻的“意图”之间存在一致性。卡比尔农民远非将自己置于与自然面对面的有效行动者的地位上，他是自然的一部分，沉浸其中。这种休戚相关和依赖的感情在很多仪式中有所体现：例如，冬至的时候，女人们到马厩去，敲打金属器具发出很大的噪声，目的是在自然觉醒的同时“唤醒牲口”。

尽管这个社会和所有人类社会一样与自然相对立，但是，它并不承认这一点。由一家之主规定的个人劳动，往往都是与整个家庭成员协作进行的，有时候还要和整个家族或者村庄协同合作，这些劳动伴随着仪式性活动，而且要大摆筵席庄重举行，就好像和他人以及整个世界都处

在一个共同的宗教团体之中。土地并不被理解成一种原料，一种只需从中攫取的天然（生产）要素。它是 alma mater，养育之土地，而不是 materies。人们说，“土地需要其应得之物。”它会知道怎样惩罚那些急躁而贪婪的或者缺乏技术的农民对它的恶举。

顺从自然和对与自然节奏合拍的时间行程的顺从是无法分离的。虽然自然有其无常和严酷，他们依然对它怀有深刻的休戚相关和依赖的感情，而且因为他们的技术对于它的节奏和限制尤为小心，也就更加服从于这些节奏和限制了。上述深刻的感受以及节奏和限制共同使卡比尔农民形成了一种顺从和对时间流淌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会梦想控制时间，消耗和节省时间。卡比尔的文雅礼节，也就是有闲者的礼节，也是以对时间的漠视为特征的。生活中的所有活动都没有时间限制，甚至是睡觉，更甚者，劳动也丝毫不会着迷于生产效率和产出量。匆忙的举动被视作缺乏教养，同时具有凶恶的意图。El ah'ammag 就是指未经考虑就急于行事的人；说起话滔滔不绝又吵吵嚷嚷的人；手舞足蹈随便比画的人；跑着追赶某人或者弥补逝去的时间的人，此外还指一种人，他因为劳动不够快，就冒险滥用土地，因而“将会受到召唤”作出解释。急躁、贪婪和不知满足的人没有归属感。他希望“利用土地”，忘记了流行歌曲中谨慎的教义：

追赶这个世界是白费力气，
没有人会追赶上它，
匆忙的你，
停下来接受责备，
每日的面包来自上帝，
它不是被你用来关注自己的，
那些令你觉得陌生的，
不要让它烦扰你，
如果你应该来，幸福，
我们不会要求更多，
如果你不应该到来，我们也不会，
把你留在某地，
我不知道，

我的幸福是在前方还是已在身后。

这里已经发展出了消磨时间，或者更好的说法，使用时间的一整套艺术。闲暇时，只要白昼结束，“人们就聊天来消磨时间”。待到离去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说，“你要离开我们了，我们都坐不住了，我们还没有聊够。”这种艺术在聚会（tajmaat）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充满了礼貌和尊严，人们机智地控制着没完没了的传统惯例的拖延，人们的对话都很有技巧，交织着格言和谚语。最大的失礼就是直达主题，使用尽可能少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些被有意拖长的没完没了的讨论和争论，老掉牙了，一直在进行着，与参与这些活动的人的年龄一样老了，就好像获得最终结论和结束争论的愿望只是假装出来的，就好像每个人都模糊地认识到，争辩本身要比争辩的主题更重要。

农民们不担心时间计划，忽视时钟——有时候被称作“恶魔的磨坊”——的时间专制，从容不迫地劳动，今天完不成的劳动就留到明天。虽然闹钟和手表在很多年前就引进来了，甚至也进到了农村，却没有控制（这里的）生活的全部。它们仅仅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计时方式）更加精确的参考体系。例如，（妇女们）还是在孩子们哭的时候而不是在特定的时间给他们喂奶。自尊的农民必须不停地做事。如果无事可做，“就让他去把自己的刀磨锋利”。人们说，“让没人雇用的牧羊人去雕刻他的羊鞭吧。”那位老卡比尔人总是随身带着轻便斧子，以便在闲下来时伐木。白天是用于劳动的。整天在家中游手好闲，不会受到尊重。在夜间劳动会受到谴责。他们说：“他在夜里劳动，就好像他的白天被 djin 吃掉了［by a djin］。”他们认为劳动与疾病和死亡一样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本身并非德行。

对于准时的漠视在各种行为中都有体现。没有精确的吃饭时间；只要饭菜准备完毕，有空闲时间吃就开饭。他们没有一个准确的约会概念；他们只会同意“在下一次集市”时见面。在城市里，经常可以看见女人们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在医院或者医生办公室外等待。

时间是延伸开来的，因为劳动和休假循环往复和昼夜接续交替而被赋予了节奏。这样被标定的时间并不是通常显示的测量时间。主观体验到的时间间隔并非相等和统一。时间之流中的有效参照点是从事物表面

看到的质的细微差别。在白天的各个阶段中，被感知的世界展现出不同表象，其中的细微差别因为印象上的差别而被领悟："当东方天空微亮时"，然后"当天空微红时"，"早祈祷的时间"，然后"太阳接近地面"，"山羊出来的时候"，"山羊躲藏起来的时候"，等等。这些在奥雷斯山脉地区使用的表述，描述了特定时间里世界的特定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表述被用于描述身体体验或者指涉一种活动："他在 taulast 起床，taulast 的意思是早晨的时间，这个时候人们因为冷而寒战就好像因为发烧（taula）而寒战一样。"与此相似，人们根据值得纪念的事件来定位过去的事：人们说："那年充满了痛苦"，"那年流行瘟疫"，"那年下了好几天雪"，或者，在阿尔及尔，"那年，那条船在港口被烧毁"。参照的时间点就只是那么多的经验。这里必须避免产生划分点（points of division）的理解，因为这会预设规则性的测量间隔的观念，也就是说，关于时间的空间观念。由这些地标确定的时间之岛（the islands of time）不能被理解成一条连续的线上的节段，而是许多自我封闭的单元。

卡比尔人说："Tasuait tasuait"，即"时刻就是时刻"。这些时间单元彼此并列，每一个都是单独一块。例如，在许多地方，表示"星期"的词"es-suq"，就是市集，意思是两次市集之间的实际时间间隔。构成现在的时间是在感知统一体之中的一个行动的全部，该统一的感知包括了记忆的过去和预期的未来。行动的"现在"，超越了感知到的现在，包括了与现在相联系的过去和未来，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意义背景。意识出现在与现在时刻完全相接的直接的未来。过去亦是如此。存在的"现在"并不仅仅局限于瞬间的现在，因为只要看一眼，意识就把被感知的世界的各方面从被感知的那一点上统合起来了。

时间是被内在地感觉的，它正是生命的运转而不是限制性的界限，它无法与活动的经验和活动发生的空间的经验分离。持续的时间和空间是根据一项具体劳动的实施来加以描述的；例如，持续时间是一个时间单元，是人们做一项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驱牛耕地所需要的时间。同样，空间要通过持续的时间加以评定的，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根据一段时间内的活动，例如，一天在犁地，或者一天的步行。这一切的共同要素和共同基础就在于对活动的体验。

过去和未来的时间与"生活空间"具有同样的界限。被感知的世界

之界限也是现在的界限。曾经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老卡比尔人第一次登上山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村庄，他大声喊："噢！神呀，你的世界是多么的大呀！"关于时间的体验，就像对空间的感知，是不连续的，由一系列分割时间片断的异质性"小岛"构成。超越了现在的视界的就是幻想的世界了，它无法与经验世界相连接。在经验语境中似乎是可笑的和不可能的可能会在遥远的未来或者在遥远的地方成为现实。有些故事以这样的套路开始——"当世界说话时"，"当动物说话时"，这说明已经从经验世界走向了幻想或者梦想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有可能。对于一位从移民者的故事中才获知法国的老卡比尔人而言，法国就属于上述幻想的世界。圣者的奇迹也是这样的，Sidi Yahia 使一头被屠宰的公牛复活，Sidi Kali 自己变成了一头狮子，Sidi Mouhoub 为了平息两个敌对家族的纷争而分割了泉源，Sidi Moussa 让油从柱子中喷涌而出。对发生在熟悉空间中的事情和发生在直接经验领域之外的传说之地的事件，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真实性评判标准。在前一种情况下，感性经验是唯一的标准，视觉的，触觉的，或者听觉的，或者，在不存在这些的情况下，还可以是与认识的并值得信赖的人的权威相联系的确定性。在其界限之外存在的那个世界里，就其本质而言，一切都有可能；关键性的条件并不那么苛刻，而且由集体意识提供的所有断言都是能接受的。

这一分析似乎是理解农民具体行为的必要前提。例如，如何解释对时间的顺从和对把握未来的任何努力的怀疑，可以和预见多年后获得好收成的前瞻性共同存在？如何解释尽管预测和计划都被认为是僭越的、多余的和企图不良的，整个传统却要鼓励先见之明？

尽管看上去有演绎之嫌，但是，为了系统陈述差别和一个可能会说明事实的假设，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对阿尔及利亚农民时间经验的分析，尤其是对即将到来的时刻的经验。被经验到的"即将到来"，被理解作感知到的现在的界限，它本质上不同于未来，未来是一个有着诸多互斥的、可替换的可能性的抽象集合。先于感知的预期，即，对内在于观察到的"既定事实"中的潜在性的领会，嵌入一种感知意识，这种感知意识的依据是信念而不是计划（也就是一种可能性的推算，这些可能性是由一种意识构想的，而这种意识中不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在先于感知的预期中，未来并不被这样认为：它作为一种潜在可能，被整合到被感知的统一体之中。同样的，人们并不仅仅是通过颜色、形状和其

他直接感知的属性来理解谷物的，还会借助其潜在的固有性质，例如“用于食用”，等等。这些由一种感知意识领会的潜在性，就像一个立方体隐藏起来的面，是以信念的模式被感知的。“即将到来”和真实的现在的被感知方式是一致的。潜在性不同于可能性，并不被认为是从无数机会均等的可能性中涌现出来的，它们不可能不发生，因为，它们被攫住了，就像真实的现在一样，被直接感知。投射的、虚构的意识把与事实的一致性悬置起来，而将潜在性视作“即将到来”的意识则涉及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一个充满来自感知世界本身而不是幻想世界的紧迫性和威胁的世界。

“即将到来”是现在的具体界限，因此，它是一种呈现，而不是再现，这与客观的未来不同，未来的国度中是抽象和未知的可能性。把未来与“即将到来”、可能性与潜在性区分开来的，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在于与直接感知到的现在的距离更遥远或者更接近；实际上，所感知的真正的现在是和潜在可能共在的，尽管这些潜在可能从客观时间上看（与现在）远近不一，但仍然和现在一并处于一个简单的意义统一体之中。

普遍的意识产生、实现了这一区分，而无需清楚这一点。然而，有时候，在自我嘲讽中，它也会偶尔被提升到意识层面。自我嘲讽是卡比尔人偏爱的明晰意识的方式。某人问 Djeha（Djeha 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卡比尔人乐于在他身上看到他们自己）：“你要去哪里？”他回答说：“我要去市集。”那人说：“什么！你竟然没有加上‘Please God’？”Djeha 继续赶路，当走进一片树林的时候，他被强盗打了，还被扒光了衣服。他的朋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问他：“你要去哪里，Djeha？”他回答：“我要回家，如果这会让神高兴。”“如果这会让神高兴”包含两种意思：“这可能不会让神高兴”和“愿这能让神高兴。”这句惯用语标志着通向另一个世界，统治这个世界的逻辑不同于那个被感知的世界的逻辑，通向未来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同样的机会发生或者不发生。这是一个幻想的世界，欲求的世界。一个过分关注未来的人忘记了未来的本质就在于其难以把握，人们会说“他妄想成为神的伙伴”，并且为了唤起他的平常心（a sense of proportion），还会说：“不要烦恼于那种奇怪的事情”，或者“不要把钱包之外的钱看作资金；不要把没有小孩的女人算作家庭成员；不要在打谷之前就以为丰收了。”像那些僭

越者一样忘记可能性的不确定本性，以及企图像科学那样通过计算的方式将无数可能性减少到一种的做法是“傲慢的”。据说，50 年前，老卡比尔人会以最具讽刺性的方式说：“法国人甚至可以战胜死亡。”预测就是一种僭越；考虑到预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神的无礼行为，人们也会避免过早安排农业计划。说“未来属于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属于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人：“azka D'azqa”，“明天就是坟墓。”未来是一种空虚，试图抓住它的努力是徒劳的；未来是空无，它不属于我们。从此产生了所有关于计算的禁忌。例如，不计数参加聚会的人数；不数留作播种的谷粒个数；不数孵化的鸡蛋的个数，但是，会点数孵化出来的鸡的个数。计数谷粒数和清点鸡蛋个数，会变成对未来的滥用。

“就像你会永生一样去生活；就像明天就会死去一样去生活，”这句谚语说明了这样一个必须理解的矛盾，即，一方面鼓励前瞻；一方面又顺从于时间。谚语以及所有的口传智慧，有教益的诗歌、故事和寓言都赞誉前瞻。但是，就这种前瞻的精神、动机和目的而言，是否能够成为实质上的预测、预言？为了袭击敌人或者为抵御围困而增加储备，是否就是在直面未来？首先，被储备的产品基本上是“消费品”。第二，土地的产品，像小麦或者大麦，既可能被当作“直接产品”（即，被用于提供或者潜在地提供满足）也可能被当作“间接产品”（即，有助于直接产品的经营，而本身并不实现任何满足）。遇到丰收或者歉收时，农民们就会面临这些抉择，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会选择把它们（土地的产品）看作直接产品。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倾向于不惜影响下一次收成，为家人储备必要的食物而牺牲他的牲口和种子——也就是说，生产的工具。比起他的农田，农民更相信他的谷仓，因为他总是害怕自己给予土地的比它的回报更多。因此，为未来的消费牺牲未来的生产，为手头已有的牺牲潜在产品，为谨慎的前瞻牺牲预测，为“即将到来”牺牲未来。

接下来有必要区分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将来的消费而储备一部分现有的直接产品，一是资金积累。前者预示着前瞻和克制消费；后者是对间接产品（会被用于投资）的积累，只有和遥远的未来相联系才有意义，然而，未来却是抽象的、缺席的。这种“创造性的”节省的基础在于计算和理性预测，然而，作为储备活动基础的计算——即，单纯被延迟的潜在消费——则假定面对一次具体的，包括在被感知的现在之中

的“即将到来”，一次“把握之中的即将到来”，这就像农民身边的消费品，它们构成了一种可以触及的安全感。有人会说：“预期未来不等于看透未来。”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预测正是这样。农民的前瞻却与之相反，它是预想的视界，先于感知的预想（anticipation），根本不是预测（forecast）。

这在激发他的原因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原因基本上都是传统遗留下来的，所以，更多是制度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当一位阿尔及利亚农民储备一定量的食物时，他是在遵从社会命令，例如，是出于（社会的）荣誉（感），而不是做出一个理性的经济选择。很多富裕的农民把只消费自己土地上的产出作为一种荣誉；因此，人们可以经常观察到：大户人家要根据这种认识，吃蒸粗麦粉，而穷人家却吃小麦。同样的，当第一次使用一对公牛耕地的时候，按照习俗要请邻居们和被请来的佃户（khammes）（如果有的话）吃一顿饭，也就是一顿蒸粗麦粉，里面要添加专门为此购买和储备的石榴籽。因为预想到宴请，也要腌制食物，例如咸肉，可见这些腌制食物是为客人消费准备的而不是为家庭自己消费；这是荣誉（感）的要求。这些传统态度包括对毫无储备者的蔑视，尤其是那些城市居民，他们被说成“晚上就耗费了白天做的”。要有前瞻性就意味着走标定好了的路，而不另辟蹊径；要遵守祖先流传下来的以及共同体承认的模式。因此，奥雷斯山地区的肖威亚人（Shawia）储备食物的集体谷仓（geelaa）的例子中，为了使丰收成果在时间上得以延续（有时候要延续许多年）而必需的前瞻性，家族首领调控个人消费的权利，因为害怕匮乏而产生的终其一生都强加于自身的被剥夺感，都来源于集体惯例（collective institutions）。家庭或者家族的谷物储存仓库（matmura）也是这样，它是在地里面挖出的一个坑，由灌木丛保护着。谷物储备不断增加，确保了阿拉伯语社会群体的内聚力和首领的权威和独立，也构成了经济、社会、道德三方面均衡的基础，就像集体谷仓（geelaa），家庭谷仓（matmura）为敬意和仪式所保护。前瞻行为更多地被对过去的模仿和对传统价值的忠诚所决定，而不是对所设想的未来的预先设计。

有一种荣誉感（nif）促使卡比尔农民不断积累储备，或者增加所继承的财产，以便使留给后代的遗产至少不少于他所继承的财产。土地的价格是随意的，而亲戚之间买卖土地时，甚至会低到不要钱，这样就可

以避免土地落到其他家庭手中。一般情况下，农民们会有些投资，但是，他们在投资时，并不会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计算利润，而是根据上一季的收入情况。收入盈余主要会被用于购买牲口。因此，当定居特尔（Tell）不久的人遇到好收成，手头有了现钱的时候，就会购买牲口，牲口不仅是生产的需要，还会树立威望。一场大丰收之后，牲口数量会增加很多。但是，耕种和喂养牲口是相互补充的，所以，农作物和动物之间保持着永久的战争状态。如果雨水丰富，耕耘过的土地面积会扩大，但是，保留给牲口的部分（谷物储备）就会作为代价而受到威胁；如果燕麦收成好或者牲口繁殖成活率高，牲口数量就会增加，以致超过了水源供给和畜牧地的容纳能力。牲口实际上是一种资产，农民们相信它的数量可以无限增加，无需考虑其数量与畜牧地面积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牲口棚，一个严冬将会导致许多体弱的动物死亡，于是来年的耕种会因为缺少役畜和种子钱而减少。可见，这种平衡是由自然的力量自动实现的，并非理性计算。

卡比尔农民只要可能就会买地。但是，现在这种交易已经很少了，因为荣誉（感）禁止他们这样做。20 年来，有的地区已经有 50 年，发生一场经济变革：许多卡比尔人买了榨油机、电动打磨机、客车，等等。然而，在这个新社会中和在旧社会中一样，荣誉感依然在经济活动背后（发挥作用）。从前，要在夏季买第二对公牛，其借口是它们是脱谷的必需（脱谷，是一种显示收成好的方式）。夏末是结婚和宴请的时候，此时，社会生活达到了顶峰，此时人们会说："房子成了两对公牛和一只骡子的住所。"很快，对于一对公牛而言已经不那么充足的草料就会被吃光，所以，第二对公牛在被用于耕地之前就被卖掉也绝非什么稀罕事。但是，整个家庭的声誉就保住了。同样地，就在几年前，村庄中两大派系（或许是两大家族）之间的声望竞争，还会导致双方添置同样的集体设备却不考虑其利益。

根据一种更一般的说法，就是预想产生于情景的逻辑，就在那情景之中。它和外部行动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在这种预想活动中，行动的目的仅仅被设想为"即将到来"而不是未来，只要目的和现在被一种直接在经验中领会的或者由以往经验提供的有机联系统一起来。所以，以下这种情形也是可理解的：纯粹的理性计划和设计会遭遇反对或者怀疑，而所有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因为它们包含了无限发展的信

念。这也许是因为在人们直接能够触及的世界与想象和梦想的世界之间没有一个中间领域。农业经济的整个生产周期很容易理解，农产品的更新周期一般情况下是一年，农民不会将劳动（现在）和它的经济成果（“即将到来”）分裂开来。当生产周期发生变化，不能够以习惯的规律和速度收获成果的时候，困难就产生了，而上述情况至少是此处困难的一个原因。因此，在阿尔及利亚的各个地区，为农民们免费建设植树梯田的土壤保护与恢复［Defense et Restauration des Sols（DRS—Soi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服务，遭到了阿拉伯语地区农民的抵制而欧洲拓殖者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欧洲殖民者土地上的成功范例被用来教育那些阿拉伯农民，他们也经常被要求接受以前被他们拒绝的服务。最初的抵制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他们拒绝为了抽象的，无法被具体直觉所领悟的利益而牺牲既有的可触及的利益，例如，原本用来畜养牲口的畜牧地（却要被保护和恢复）。卡比尔人是这样说的：“吞倒掉的蜜有什么好呢?”

现代经济中，整个生产过程是极长的，根本不可能以直觉领会，以至于若没有一种全面的视界，就需要最精确的和最复杂的计算来弥补。只有消解掉在生产过程中将现在和“即将到来”联结起来的有机统一体，这些计算才是可能的，这样的统一体实际上就是产品本身的统一体，它消失在从制造整个产品的工匠的技术向建立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工业技术的过渡过程中。农民的劳动不能被轻易地简化成小片断。实际上，它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在联合和分工上拥有自身的原则，几乎容不得任意分解。

计划不能产生激励，因为计划基于抽象计算；它看上去就像梦一样不真实，因为它属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虚构世界，对真实的执著在那里必须悬置起来。经过计算的计划和单纯的前瞻之间的鸿沟就像数学证明和实际演示之间的鸿沟一样。

同样深刻的差异也还存在于互助的例子中。互助各方是通过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传统也鼓励和推崇这种互助。而合作与之相反，集体劳动指向抽象的目的，需要人们共同安排、共同面对。在前一种情况里，群体存在先于共同执行的同一劳动，这一共同的劳动证明了群体的存在；在后一个情况下，如果没有共同设想的未来目标，群体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它在群体之外——在计划设想的未

来——找到了联合基础，为群体设定的计划结束时，这个群体也就不存在了。

一个发展性的计划要获得接纳，就必须能够提供可感知的结果，而且，个人自己的所得状况，或者每个人的所得状况都必须得到改善。以自身利益为名的计算往往会受到拒绝，除非是由一位受尊敬的人提议的。在许多卡比尔村庄中，老式教师，chilh el-lakul——老人们还有关于他们的记忆——会因为他们的声望和道德权威而能够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引入许多变革。对建议变革的人的信任而不是支持变革的理由会吸引更多的拥护者。正是因为对有声望的人的个人忠诚，说的是“为他的面子”，人们决心不再按照传统模式行事。

个人层面上的人的关系的重要性，也许在交换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体现得更明显。信用假设了关系总体上的非人格化和一种对抽象未来的考虑，与之相反，一份礼物则建立起了个人之间的超经济的关系纽带。利益只能根据抽象计算获得理解，而回赠的礼物——虽然在时间上推迟了，却是“即将到来”——实际上已经在关系中存在了，并且由接受者直接经受考验的个人忠诚担保。合同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个人不会和熟人、亲戚或者朋友以外的人签订合约；他们的总体直觉保证了联系的“即将到来”就在现在本身之中，而他们的总体直觉就是：每个面对他人的个体知道对方是有荣誉感的人，他忠于他的承诺，这就使得所有正式的和明确的规定性文件都显得多余了。

同样的分析还能够让我们理解人们对金钱的不信任。金钱，这种最高的非直接“产品”本身就是不满足的根源。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旅行者的故事得到说明，故事中的旅行者死在沙漠中，身旁是他刚发现的装满金币的羊皮袋。种类方面的交易，即物物交换之于金钱交易就好像（产品）储备起来用于投资的资金积累。绝大多数的交易方式，Khammes（佃户）或者是熟人、神父等的支付方式，曾经都采用物物交换方式，并且要根据传统规定的等价物。利息要用小麦来偿付，即使长达数年的利息也是如此。铁匠们制造的犁一般要用于交换燕麦而不是卖掉。游牧者，作为交易人，在 Tell（特尔）要用一量筒椰枣交换三量筒大麦或者三量筒椰枣交换一量筒小麦。陶器被用于交换时，通常要根据它容纳杂物或者小麦的数量。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物物交换保持着它自身的逻辑，但是，却被货币交易的逻辑强加以功能性的重新解释；于

是，春季小麦的价值是收获时节的两倍，借用人必须归还两倍的数量。在任何地方，甚至是50年前，市场都是货物的直接交换场所，而不是需要依靠信用和使用货币的商业交易的场所。当钱确实介入交换时，它主要被用作交换标准或者衡量价值的共同标准。这是因为所有人或购买人可能在所持有的或者所购买的物品中，感知到“即将到来”的使用价值，在他看来，其固有的使用价值和它的重量、颜色和品位一样。若使用钱，这种直接的理解就不可能实现；其中暗示的在未来才有的对物品的使用是遥远的、抽象的。至于发给穷人的票据（pauper currency），更是如此，人们甚至连物的符号都不再拥有，有的只是符号的符号。有人说，“一个产品的价值，如果用金钱衡量，要比其对等物的价值更高”，（要）“聚集产品而不是金钱”。由此可知，用一只羊来交换钞票就是一种信念实践，和一个阿拉伯农民将一只羊埋到他正在建的房子的地基里的行为是一样的。

无论何时何地，金钱可以被用于任何一种交易操作，它是一种抽象的经济关系媒介，其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方面，它包含了无限多个不确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因为收付之间多少会存在一个时间差，所以，它构成了抽象未来的具体象征。当前拥有的金钱本身并不是满足的源泉，只产生占有的愉悦。然而，它包含着无数的可能性，可以被随意用来购买一定量的小麦或者大麦，或者某种完全不同的产品；但是，如果要实现其中任何一种可能，这些各不相同的可能性就会是互斥的。一个人不可能用所有钱都买了小麦还能再买到大麦。他必须选择，他不能够期望同时得到两个东西。相反，物物交换的基础是传统规定的等价性，所以，物物交换中涉及的商品本身就包含了潜在的愉悦；它所显示出的价值基于其作为可使用产品的品质，能够直接投入使用，并且不像金钱那样要依赖于外部条件。由此可知，当有计划地使用储备时，计算具体的产品要比在整个月份中分配一定量的工资或者选择购买最需要的东西容易得多。一次消费掉所有储备的欲望，远小于将所有钱都换成产品的欲望。卡比尔人把谷物存放在巨大的陶制坛子（inkufan）里，通常这种坛子的不同高度上会有孔，当坛子里的谷物储量水平低于中间高度的孔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减少消费了。显然，这种计算是自动进行的，坛子就像沙漏，可以随时测量用量和余量。

所以，与物物交换相反，金钱的使用预示着采纳了可能性视角，一

种规划的态度，这种态度承认存在无数可能性，而且它们各自实现的机会均等；另外，金钱的使用还预示着一种预测的态度，它认为某些具体的可能性是不可能不发生的，而此外的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金钱的使用假设了一种抽象未来的视界，这种是虚构的和缺席的，然而，物物交换就像储备活动，看到的是能被先在感知的预期和信念模式，触及的是具体的“即将到来”。

如果说科学和工业思想为了占有未来而依赖于建立在自然法则的知识和决定论原则基础上的理性归纳，那么，传统主义思想则以自己的方式在过去的影像中制造出“即将到来”，并且把具有未知世界全部危险的无数个可能性简化成过去的经验，因为过去是已经完结的和经历过的，从而向其自身确保了“即将到来”。例如，农民的预想包括解读征兆，传统为此提供了线索：“如果一月份打雷，就要拿起笛子和手鼓；如果二月份打雷，就不要用完你的饲料。”“只要周五种树就不会活。”除非未来附属于过去，被简化为过去，直到它成为过去的简单延续和精确的拷贝，不然，就无法去除其危险性。“走你父亲和祖父的路”；“如果你仿效父亲（的做法），你就不能因错受责”。这些都是有教益的智慧之言。

如果未来没有被视作是一个无限可能的领域，那是因为，由传统建构和维护的秩序只有在被认为是唯一可能而不是最大可能时，也就是说，只有在排除其他所有的、挑战其支配地位的可能性时，才能存在。对传统主义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就是它不能承认排斥了各种未知的可能性。

乌托邦，就像对发展和变革的欲望一样，其基础是采纳了可能性的视角，悬置并质疑对现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被动默从和自发顺从。对可能性的投射是每一种进步信念的基础，无论是作为可能性、变革的态度还是道德良知，都拒绝承认事实。坚持一种进步信念就是把不可能当作可能来对待，以至于不可能会变成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变成不能容忍的。

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并不企图把握未来和可能性，只是尝试最低限度的追求，不选择改变世界而选择改变自己对世界的态度。事实上，预测，就像是一个人把握自己未来的自觉努力，预示着对自己的现在，也就是这个世界，只有最低限度的把握。超越这个最低点，改善自己状

况的渴望会通向未知之境。卡比尔人说："物产丰富才有可能节省。"一无所有的人不会想扩大一无所有。丝毫都不劳心去预测和把握未来可能是对未来完全不信任的表现，可能是感觉无法控制它的表现。阿尔及利亚农民是否有过作为进行预测的条件的关于未来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他是否具有最低限度的掌控现在的力量？实际上，如果要改变世界，把握未来，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力量。开始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殖民境况影响的阿尔及利亚的文化解体现象提供了对这一分析的证明。传统平衡受到了破坏，未雨绸缪的努力也随着那些基础性信念消失了。农民知道，他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达成目的，于是听任日子一天天度过。他的物资用尽后，就不得不进城或者去法国找活干。那么，这一天早来一年和晚来一年会有什么不同吗？他卖掉牲口，或者驴，甚至还会以过分的利息率抵押他的土地。旧式前瞻和消费规则受到了这一无法逆转的、破坏性的倾向的削弱、瓦解。于是，奥利斯山地区的集体谷仓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功能和意义。在某些地区，甚至10年前还保留着gelaas（集体谷仓），还总是把它作为春节节庆的地点，但是，它们已经不再收纳群体的谷物储备了。（传统）惯例意指的集体管制成为了一个负担，人们开始用旧有公共谷仓的材料建造个人谷仓。

如果一个人想通过组织资源，通过在资产与负债之间建立平衡，节省，对投资或信用的资本管理，或者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对他的现在和环境有最低限度的控制。1954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家工厂里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工厂决定把工资提高20%；工人们按照传统主义精神的逻辑，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缩短了1/5。然后，工资变成了两倍，达到初始工资的240%。第二次提高工资的结果与第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似乎一个门槛被打破了，工人们显示出劳动的欲望，想要赚更多钱，渴望加班，要通过节俭预期未来。就好像因为一个单独的属性的改变造成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重构，好像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的人，突然发现他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

这一变化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生育控制，它和理性经济计算遵循同样的逻辑，而且包含了同样的"预测"态度。正是对现在最低限度的把握，才使得关于未来的理性计算成为可能，当个人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这种对现在最低限度的把握（就像1880年以来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时，不可避免地要顺从于自然生育率，这是确保未来的唯一方

法。同样，从传统主义的劳动到（理性）计算的和预测的态度的转变，需要个体把自己感知为与自然相对，似乎和它相对抗；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就预示着以服从“既有”为目的，以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为目标，但是，这个世界只有通过改变现状才能实现。换句话说，人要穿越强调维持而不是变革的自然的、传统的“既有”，就必须设想出一个未来，而且这个未来还是评判现在的参照。通过劳动改变世界的意志和一个能够被规划的未来的假设是同时出现的。只有通过转变意志以及变革对世界和时间的态度，这种试图改变世界的意志才能产生。

这样，一切都被贯穿起来了。按照传统主义的态度，服从于现在的社会和自然“资料”，其目标是根据过去展现的模式来预期内在于现在的“即将到来”，不相信抽象的未来和可能性；而按照预测的态度，拒绝接受事物的现在状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自然的，希望用投射出的未来的图景塑造现在，克服所预测的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关于世界和时间的态度，每个都是行为模式暗含的基础，即使是最简单的行为模式也同样如此，而且它们所具有的不同形式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从传统主义态度到预测态度的过渡，不可能是零零星星的，而必定是一种突然的、总体性的转变。

参考文献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len, V. (1975) *Social Analysis*, London: Longmans.

Anderson, N. (1923) *The Hob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gwell, P. (1960) *The Transport Revolution From* 1770, London: Batsford.

Bakke, E. W. (1933) *The Unemployed Man*, London: Nisbet.

Barr, J. (1969) *Biblical Words for Time*, London: SCM Press, 2nd edn.

Bedarick, K. (1957) *The Young Worker of Toda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Bell, W. and Mau, J. A. (eds) (1971) *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 New York: Russell Sage.

Bellah, R. (1968)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D. A.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3, New York: Macmillan.

Berger, P. (1967) *The Secret Canopy*, New York: Doubleday.

Berger, P., Berger, B. and Kellner, H. (1973)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Bergson, H. (1910) *Time and Free Will*, New York: Harper & Raw.

Bergson, H. (1919) *Matter and Mem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ernard, J. (1972) *The Future of Marri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Bertaux, O. (1977) *Destins Personals et Structure de Class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ertraux, D. (1977) *Destins Personals et Structure de Class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ernstein, B. (1970) *Class, Order and Control*, vol 3,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st, E. (1922) The Moari Division of Labour, *Dominion Museum Monograph*, No. 4.

Bettelheim, B. (1943) "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ur in Extreme Condi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pp. 417—452 (also abbreviated version in T. M. Newcomb and 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1947).

Bienefeld, M. A. (1972) *Working Hours in British Histo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Bienefeld, R. (1948) 'The Limitations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pp. 22—30.

Blaug, M. (1958)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A Reexamin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p. 212.

Blyton, P. (1985) *Changes in Working Tim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London: Croom Helm.

Blyton, P. (1978) "The Working Time Debate in Western Europe", *Industrial Relations*, 26, pp. 201—207.

Blyton, P., Hassard, J., Hill, S., and Starkey, K. (1989) *Time, Work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Bock, P. (1964) 'Social Structure and Language Structure',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5, pp. 96—102.

Booth, H. (1847) *Pamphlet published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House, 1980).

Bourdieu, P. (1963)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 Paris: Mouton.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idgman, P. (1932) 'The Concept of Time', *Scientific Monthly*, 35, p. 97.

Briggs, A. (ed.) (1969) How they lived: Vol. 3, 1700—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ull, C. N. (1978) 'Chronology: The Field of Social Tim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0, pp. 288—297.

Burnett, J. (ed.) (1974) *Useful Toil*, London: Allen Lane.

Burney, C. (1952) *Solitary Confinement*, New York: Coward.

Byrd, R. (1938) *Alone*, London: Pitman.

Calkins, K. (1970) 'Time: Perspectives, Making and Styles of Usage', *Social Problems*, 17, pp. 210—225.

Cassirer, E. (1944) *An Essay on Man*, New York: Bantam Books.

Cavendish, R. (1982) *Women on the Lin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hamboredon, J. C. and Prevot, J. (1975) 'Changes in the Definition of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New Forms of Symbolic Violence', *Theory and Society*, 2, pp. 331—350.

Chase, S. (1939) *Men and Machine*, New York: Free Press.

Checkland, S. G. (1951) 'Economic Opinion in the England as Jevons Found It',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 p. 147.

Chapman, S. J. (1909) 'Hours and Work', *Economic Journal*, 19, p. 355.

Cicourel, A. V. (1974) *Cognitive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ipolla, C. M. (1967)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London: Collins.

Clanchy, M. T. (1970)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the Good Law',

History, 55, pp. 165—176.

Clanchy, M. T. (1979)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Edward Arnold.

Clark, P. (1977) *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voluti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Kent*, 1500—1646, Hassocks: Harvester.

Clark, P. A. (1978) 'Temporal Innovations and Time Structuring in Large Organizations', in *J. T. Fraser et al.*, *The Study of Time*, Vol. 3,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Clark, P. A. (1982) A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f Time and Structure for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Aston.

Clark, P. A. (1989) 'Chronological Code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in Hassard, J. and Pym, D., *The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Clark, P., Hantrais, L., Linhart, D. and Starkey, K. (1984) 'The Porous Day and *Temps Chois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annual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Cleaver, H. (1979)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ondon: Harvester Press.

Coats. A. W. (1958—59) 'Changing Attitudes to Labou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1, pp. 35—51.

Cockman, F. G. (1973) 'The Railway Age in Bedfordshire', *Publications of the Bedfordshire Historical Record Society*, 53. pp. 1—143.

Codrington, R. H. (1891) *The Melanesians*, Oxford.

Cohen, E. A. *Human Behaviour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New York: Norton.

Cohen, S. and Taylor, L. (1972) *Psychological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Imprison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Cohen, S. and Taylor, L. (1978) *Escape Attempt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Colson, F. H. (1926) *The Week*, Cambridge.

Coolidge, D. and Coolidge, M. R. (1930) *The Navajo Indians*. Boston and New York: Harper.

Coser, L. and Coser, R. (1963) 'Time Perspectiv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 W. Gouldner and H. P. Goutdner (eds), *Modern Soc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Coser, L. and Coser, R. (1974) *Greedy Institu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Coser, L. and Jacoby, H. (1951) 'Utopia Revisited', *Common Cause*, 4, pp. 370—378.

Cottle, T. J. (1976) *Perceiving Time*, New York: Wiley.

Cottle, T. J. and Klineberg, S. L. (1974) *The Present of Things Fu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Cotterell, W. F. (1939) 'Of Time and the Railroa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pp. 190—198.

Cromwell, R. E., Keeney, B. P. and Adams, B. N. (1976) 'Temporal Patterning in the Family', *Family Process*, 15, pp. 343—348.

Csikszentmihalyi, M. (1975)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Cullman, O. (1964) *Christ and Time, trans. by Floyd V. Fils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Davidoff, L. (1973) *The Best Circles: Society, Etiquette and the Season*, London: Croom Helm.

Davies, A. C. (1978) 'Greenwich and Standard Time', *History Today*, 28, pp. 194—199.

Davis, A. (1946) 'The Motivation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rker', in W. F. Whyte (ed.), *industry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Davis, A. et al. (1941) *Deep S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De Groot, J. J. M. (1912) *Religion in China*, New York: Harper.

De Man, H. (1927)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 New York: Holt.

Delaney, T. (1963) *A Century of Soccer*, London: Heinemann.

Dewey, J. (1925) *Exper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Open Court.

Diamant, A. (1970) 'The Temporal Dimension in Models of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D. Waldo (e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itton, J. (1979) 'Baking Time', *Sociological Review*, 27, pp. 157—167.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New York: Pantheon.

Driesch, H. (1933) *Philosophische Gegenwartsfragen*. Leipzig.

Durkheim, E. (I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Durkheim, E. and Mauss, M. (1910—1912) 'de quetques form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L'Annee sociolagique*, 6, pp. 1—71.

Einstein, A. (1949) 'Autobiographical Notes', in P. Schlipp (ed.),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 Scientist*, La Salle, Ⅲ: Open Court, 1970.

Elder, G. H.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liade, M. (1959) *Cosmos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Eliot, T. S. (1944) 'Burnt Norton', in *Four Quartets*, London: Faber & Faber.

Eliste, and Merrill, (1973) *Social Disorganisation*, New York: Open Press.

Erikson. E. H. (1959)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Psychological Issues*, 1 (monograph), pp. 1—171.

Evans-Pritchard, E. E. (1939) 'Nuer-Time Reckoning', *Africa*, 12, pp. 189—216.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20, pp. 153—227.

Filipcova, B. and Filipee, J. (1986) 'Society and Concepts of Tim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7, pp. 19—32.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Foucault, M. (1979) 'On Governmentality',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5. pp. 5—21.

Foucart, G. (1911) 'Calendar (Egyptian)',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3, p. 92.

Fowler, W. W. (1911) 'Calendar',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3, p. 133.

Frank, L. K. (1948) *Society and the Patient*,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rankenberg, R. (ed.) (1989) *Time and Health*, London: Routledge.

Fraser, J. T. and Lawrence, N. (eds) (1976)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Fraser, J. T., Lawrence, N. and Park, D. (eds) (1978) *The Study of Time*, Vol. 3,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Fraser, R. (ed.) (1968) *Work*, Harmondsworth: Penguin.

Furniss, E. S. (1920)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Gerth, H. and Mills, C. W. (1963)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Ginzberg, E. (1948) 'Sex and Class Behaviour', in D. P. Geddis and E Curie (eds), *About the Kinsey Report*, New York: Signet.

Ginzel, F. K. (1906) *Handbuch der matematischenund technischen Chronologie*, Leipzig.

Gioscia, V. (1974) *Time Forms*, New York: Gordon & Breach.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L. (1971) *Status Passage*, Chicago: Aldine.

Glasser. R. (1972) *Time in French Life and Though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odwin, J. (1963) *Aleatraz*: 1938—1963, New York: Doubleday.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Goffman, E. (1961a) *Asylu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Goffman, E. (1961b)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Goode. W. J. (1960) 'A Theory of Role Str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pp. 483—496.

Gordon, D. M.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 Lexington Mass. : Heath.

Graham, R. J. (1981) '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pp. 335—342.

Great Western Railway, (1841) *Timetable*. York: National Railway Museum.

Gregory, D. (1978)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 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Griswold, H. J. et al. (1971) *An Eye for an Eye*, New York: Pocket Books.

Grossman, P. (1970) 'Hours and Output: The Reduction in the Soviet Work-week, 1956 — 1961', PhD thesi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Grunbaum, A. (1964) 'Carnap's Views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in P. Schli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dolph Carnap*, La Salle, Ill. : Open Court.

Gurdon, P. R. T. (1914) *The Khasis*, London.

Gurvitch, G.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drecht: D. Reidel.

Halbwachs, M. (193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Alcan.

Hall, E. T. (1959)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Fawcett.

Hallowell, I. (1937) 'Time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9, pp. 669—735.

Hardy, T. (1886)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London: Pan edn (1978).

Harre, R. (1978) 'Architechtonic Man'. in J. H. Brown and S. M. Lyman (eds), *Structure,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J. (1972)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ssard, J. (1985) 'Multiple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n Analysis of Work Behaviour in the Fire Servic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ston.

Hassard, J. (1988a) 'Time and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Dragon: *the SCOS Journal*, 6, pp. 31—51.

Hassard, J. (1988b) 'Time: A Neglected Symbol in the Labour Process Deb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Annual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Hassard, J. (1988c) 'Overcoming Hermeticism in Organization Theory', *Human Relations*, 41, pp. 247—259.

Hassard, J. (1989) 'Toward a Qualitative Paradigm for Working Tim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19, 93—104.

Hassard, J. and Hutchinson, R. (1990) 'Time and Organization', Dragon: *the SCOS Journal* (forthcoming).

Hassard, J. and Pym, D. (eds) (1990) *The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Hearn, F. (1978) *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anc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Heidegger, M. (1972) *On Time and Be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p. 386—397.

Hendricks, C. D. and Hendricks, J. (1976) 'Concepts of Time and Temporal Construction Among the Aged, with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C. F. Gumbrium (ed.), *Time, Roles and Self in Old Age*, New York: Human Science Press.

Hesiod, (1858) *Book of Days*. London.

Hicks, J. R. (1963)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Hodson, T. C. (1908) *The Meitheis*, London.

Homans, G. C. (1941) *English Villag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bert, H. (1905) 'Etude Sommaire de la Representation du Temps dans la Religion et la Magie', *Annuair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Studies*, pp. 1—39.

Hubert, H. and Mauss, M. (1909) *Me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Alcan.

Hughes, E. C. (1971) *The Sociological Eye*, New York: Aldine.

Hymam. H. H. (1953) 'The Value System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Ⅲ: Free Press.

Hyman, R. (1980) 'Theor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Toward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in Paul Boreham and Geoff Dow *Work and Inequality*, Melbourne: Macmillan.

Isambert, F. A. (1979) 'Henri Hubert et la Sociologie du Temps', *Revue Francais de Sociologie*, 20, pp. 183—204.

Iutcovich, M., Babbitt, C. E. and Iutovitch, J. (1979) 'Time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a Developing Nation', *Sociological Focus*, 12, pp. 71—85.

Jahoda, M. and Zeisel, H. (1933) *Die Arbeiter von Marienthal, Psychologische Monographien*, Leipzig.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first published in 1890).

Jaques, E. (1982) *The Form of Time*, London: Heinemann.

Jevons, W. S. (1965)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

M. Kelly.

Johnson, E. A. J. (1937)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London: P. S. King.

Jones, K. and Williamson, K. (1979) 'The Birth of the School Ro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5, pp. 59—110.

Julkunnen, R. A. (1977) 'A Contribu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Social Time and the Economics of Time', *Acta Sociologica*, 20, pp. 5—24.

Kantor, D. and Lehr, W. (1975) *Inside the Famil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Karabel. J. and Halsey, A. H. (eds) (1977)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eton, G. W. (1972) The Football Revolution,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Kellett. J. R. (1969) *The Impact of Railways on Victorial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ermode, F. (1967) *The Sense of an En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rton, R. M. (1971) 'Hours at Work: Jevons' Labour Theory after 100 years' *Industrial Relations*, 10, 2, p. 230.

Kluckholm, F. R. (1949—1950) 'Dominant and Substitute Profiles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Social Forces*, 17, pp. 383—409.

Kluckholm, F. R. and Spiegel, J. P. (1954)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Family Behaviour', *Committee on the Family Group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 Report no. 27.

Knemeyer, F. (1980) 'Polizei', *Economy and Society*, 9, pp. 173—96.

Knickerbocker, B. (1978) 'More Workers Balking at Compulsory Overtim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2 March, p. 7.

Knupfer, G. (1947) Portrait of the Underdo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pp. 103—114.

Kroeber, A. L. (1923),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Laing, R. D. (1965) *The Divided Self*, Harmondsworth: Penguin.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atimer, J. (1887)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Le Goff, J. (1960) 'Au Moyen Age', *Annales, Economic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15.

Le Goff, J. (1963) 'Le Temps du Travail Dans le "crise" du XII Siecle', *Le Moyen Age*, 69.

Le Goff, J. (1977) *Pour Un Autre Moyen Age*, Paris: Gallimard.

Le Roy Ladurie, E. (1978) *Montaillou: Cathars and Cathol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294—1324, London: Scolar Press.

Leach, E. R. (1961)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London: Athlone Press.

Leake, C. D. (ed.) (1927) *Percival's Medical Ethics*,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Leary, T. (1970) *Jail Notes*, New York: Douglas.

Leopold, N. (1958) *Life + 99 Years*, London: Gollancz.

Leshan, L. L. (1952) 'Time Orientation and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47, pp. 589—592.

Lewis, J, D. and Weigart, A. J. (1981)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 60, pp. 432—462.

Linder, S. B. (1970)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ittler, C.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ur Proces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London: Heinemann.

Lyman, S. M. (1970) *The Seven Deadly Sins*,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Lyman, S. M. and Scott, M. B, (1970) *A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Crofts.

McCann, P. (ed.) (1977) *Popul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McCrea, W. H. (1975) The Royal Greenwich Observatory, London: HMSO.

McKinney, J. C. (1966) *Constructive Ty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Magoun, F. P. Jr (1938) History of Football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871, Bochum Verlag Heinrich Popinghaus O. H. G.

Malcolmson, R. W. (1973)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linowski. B. (1926—1927) 'Lunar and Seasonal Calendar in the Trobriand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6—57, pp. 203—215.

Malinowski, B. (1939)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in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Mannheim, K. (1931) 'Utopia',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5, p. 201.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Mannheim, K. (1952)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rks, S. R (1977) 'Multiple Roles and Role Str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pp. 921—936.

Marsh, J. (1952) *The Fullness of Time*, London: Nisbet & Co.

Marshall, R. (1925)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rvell, P. (1977) 'Factory Regul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Engl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 (2), pp. 379—402.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Mauss, M. (1966)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axwell, J. C. (1978) *Matter and Motion*, New York: Harper.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G. H. (1964)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 J. R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Meek, R. (1956)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eek, R. (1977) *Smith, Marx and After*, London: Chapman & Hall.

Melbin, M. (1969) 'Behaviour Rhythms in Mental Hospita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pp. 650—665.

Meller, H. (1976) *Leisure and the Changing City*, 1870—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erton, R.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Michelson, W. (1971) 'Some Like it Ho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se as Functions of Seas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pp. 1072—1083.

Mills, C. W. (1948) *The New Men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Mills, C. W. (1951)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P. (1911) *The Ao Noyas*, New York: Hiet.

Mingay, G. E. (1976)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London: Longmans.

Minkowski, E. (1908) Address delivered at 80th Assembly of German Natural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Cologne, 21 September 1908, in A. Einstein et al.,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trans by W. Perrett and G. B. Jeffrey, with notes by A. Sommerfiel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23).

Mommsen, T. (1885) History of Rome, New York.

Moore, W. E. (1960)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pp. 810—818.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Mukerjee, R. (1943) 'Time, Technics and Socie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7, pp. 255—266.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Nardinelli, C. (1980) 'Child Labour and the Factory 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4), pp. 739—755.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und.

Nowotny, H. (1976)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Nyland, C.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pp. 513—534.

O'Neil, C. W. (1976) *Dreams, Culture and Society*, San Francisco: Chandler & Sharp.

O'Rand, A. and Ellis, R. A. (1974)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Time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53, pp. 53—61.

Oberndorf, P. (1941) 'Time, Its Relation to Reality and Purpose', *Psychodynamic Review*, 28, p. 144.

Opie, R. (1931) 'Marshall's Time 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61, pp. 198—199.

Ortega, y, G. J. (1962) *Man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Orwell, G. (1954) *Down and Out in London and Paris*, New York: Permabooks.

Osgood, C. E. (1974) 'Probing Subjective Cul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pp. 82—100.

Palloix, C. (1976) 'The Labor Process: From Fordism to Neo-Fordism', in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Brighton: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Parkes, D. N. and Thrift, N. J. (1979) 'Time, Spacemakers and Entrainment',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 pp. 353—372.

Parkes, D. N. and Thrift, N. J. (1980) *Times, Spaces,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Chichester: John Wiley.

Pasquino, P. (1978) 'Theatrum Politicu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4, pp. 41—54.

Patrides, C. A. (ed.) *Aspects of Tim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hilip, A. (1921) *The Calendar*, Cambridge.

Phythian-Adams, C. (1972) 'Ceremony and the Citizen: The Communal Year at Coventry 1450—1550', in P. Clark and P. Slack (eds),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iaget. J. (1926) *La Representation du Monde*, Paris: Alcan.

Pimlott, J. A. R. (1947) *The Englishman's Holiday: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reprinted 1976, Hassocks: Harvester).

Polak, F. (1973) *The Image of the Future*, New York: Elsevier.

Pollard, S. (1963) '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6, pp. 260—269.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Ponsford, C. N. (I 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oulet, G. (1959) *Studies in Human Time*, New York: Harper.

Poullion, G. (1966) 'Time and Destiny in Faulkner', reprinted in R. Penn Warren (ed.), *Faulkn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Pred, A. (1981a) '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Pred, A. (1981b)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ska Analer*, 63, pp. 5—22.

Presthus, R. (1978)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ronovost, G. (1986) 'Time in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7, pp. 5—18.

Rabkin, S. W. (1980) 'Chronobiology of Cardiac Sudden Death in M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44, pp. 1357—1358.

Redlich, F. (1965) 'Leisure Time Activities: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3, pp. 3—24.

Reid, D. A. (1976)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71, pp. 76—101.

Reynolds, L. G. (1974) *Labour Economics and Labour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Ricciardi, J. (1981) 'Class Struggle,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 Towards a Reformulat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4, pp. 91—92.

Robbins, L. (1929)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Variations of Hours of Labour', *Economic Journal*, 39, p. 25.

Robbinson, J. (1964) *Economic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Robbinson, J. A. T. (1950) *In the End, God...* London: James Clark.

Robbinson, J. P. et al. (1972) '*Everyday Life in Twelve Countries*', *in A. Szalai (ed), The Use of Time*, Paris: Mouton.

Rocher, G. (1974) *Talcott Parson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London: Nelson.

Rosevear, J. (1970) 'The Fourth Mad Wall', in R. Firestone (ed.), *Getting Busted*, New York Douglas Books.

Roth, J. A. (1963) Timetabl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Roy, D. F. (1953) 'Work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Reward in Quota Achievement: An Analysis of Piecework Incen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pp. 507—514.

Roy, D. F. (1960)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 pp. 156—168.

Ruesch, J. and Bateson, G (1951)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orton.

Saint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trans. by R. S. Pine-Coff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Samual, R. (1977)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l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3, pp. 6—72.

SanGiovanni, L. (1978) *Ex-Nuns: A Study of Emergent Role Passage*, Norwood: Ablex.

Sartre, J. -P. (1966)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in R. Penn Warren (ed.), *Faulkner*,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Schegloff, E. (1968) 'Sequencing in Conversational Opening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0, pp. 1075—1095.

Schlipp, P. (ed.) (1964) *The Philosophy of Rudolph Carnap*,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Schlipp, P. (ed.) (1970)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 Scientist*,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Schneider. L. and Lysgaard. S. (1953) 'The Deferred Gratification Patter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pp. 142—149.

Schonberger, R. (1982)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New York: Free Press.

Schrank, R. (1978) *Ten Thousand Working Day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chutz, A. (1962)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Nijihoff.

Schwartz, B. (1968) 'The Social Pychology of Priva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pp. 741—752.

Schwartz, B. (1975) *Queueing and Waiting*,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B. (1978a) 'Queues, Priorities and Social Process', *Social Forces*, 56, pp. 1203—1220.

Scott, M. and Lyman, S. (1968) '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pp. 46—62.

Senior, N. (1837)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s*, London: B. Fellows.

Sennett, R. and Cobb, J. (1973)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Vintage.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Shcrover, C. M. (ed.) (1975)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immel, G. (1964)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immel, G. (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mmons, J. (ed.) (1971) *The Railway Traveller's Handy Book of Hints, Suggestions and Advice before the Journey, On the Journey, and After the Journey*, Bath: Adams & Dart (1862 edn).

Slater, P. (1963) 'On Social Regres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pp. 339—364.

Smith, A. (196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

Smith, H. M. (1976) 'Greenwich Time and Prime Meridian', Vistas in Astronomy, 20.

Smith, M. W. (1952) 'Different Cultural Concept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sychiatry*, 15, pp. 395—400.

Solzhenistyn, A. (1968)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Sorokin, P. A.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Sorokin, P. A. (1943) *Sociocultural Causality, Space, Tim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p. 615—629.

Soule, G. (1956) *What Automation Does to Human Beings*,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Spengler, O. (1926)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Knopf.

Spinden, H. J. (1928) 'Maya Inscriptions Dealing with Venus and the Moon', *Bulletin of the Buffalo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s*, 14, p. 7.

Starkey, K. (1985) 'Time and the Labour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annual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Labour Process Confer-

ence', University of Aston.

Starkey, K. (1986) 'Time and Professional Work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ston.

Stedman Jones, G. (1971) *Outcast Lond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iner, G. (1978) *On Difficulty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phen, G. E. (1979) 'Derivation and Some Social-Demographic Regularities from the Theory of Time-Minimization', *Social Forces*. 57, pp. 812—823.

Stone, L. (1969) *Schooling and Socie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Stouffer, S. A.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Combat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eller, R. (1926) *Statik und Dynamik in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okonomie*, Leipzig.

Sturt, M. (1925) *Psychology of Time*, London: Kegan Paul.

Szalai, A. (ed.) (1972) *The Use of Time*, Paris: Mouton.

Taylor, F. W. (1911)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Thomas, K. (1964) 'Work and Leisure in Pre-Industrial Society', *Past and Present*, 29, pp. 50—62.

Thomas, K.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Thrift, N. J. (1977a) 'The Diffusion of Greenwich Mean Time in Great Britain', University of Leeds, School of Geography. Working paper, 188. Leeds.

Thrift, N. J. (1977b) '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Part

On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 pp. 65—101.

Thrift, N. (1980) 'Owner's Time and Our Time: 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1300—1880',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illman, M. K. (1972) 'Temporality and Role-Taking in G. H. Mead', *Social Research*, 37, pp. 533—546.

Tocqueville, A. (1945)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Toffler, A. (1971) *Future Shock*, New York: Bantam Books.

Udy, S. (1968) 'Social Structural Analysis',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Voegelin, E. (1924) 'Die Zeit in der Wirtschaft', *Archiv fur Sozialwissenshaft und Sozialpolitik*, 53.

Walker, C. R. and Guest, R. H. (1952) *The Man of the Assembly Lin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vin, J. (1978) *Leisure and Society*: 1830—1950, London: Longman.

Ward, F. A. B. (1966) *Science Museum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Illustrating Time Measurement*, London: HMSO.

Ward, R. R. (1971) *The Living Clocks*, New York: Mentor.

Warner, W. L. and Lunt, P. S. (1941)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ebster, H. (1916) *Rest Days*, New York: Harper.

Weigart, A. J. (1980) *A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Longmans.

Weyl, H. (1949)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Sci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itrow, G. J. (1975) *The Nature of Time*, New York: Wiley.

Wiles, R. C. (1968) '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pp. 113—136.

Woods, F. H. (1911) 'Calendar (Hebrew)',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3, p. 108.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Young, M. (1988)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Zerubavel, E. (1976) 'Time in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Philadelphia.

Zerubavel, E. (1977) 'The French Republican Calendar: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T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pp. 868—877.

Zerubavel, E. (1979a)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Zerubavel, E. (1979b) 'Private-Time and Public-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58, pp. 38—58.

Zerubavel, E.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Zweig, F. (1952) *The British Worker*,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译后记

关于时间社会学的学术和社会文化意义，在“时空社会学译丛·总序”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也许还有必要给中文版读者提示的是本书的特点和独特的意义。本书也许是英语和中文世界中第一本时间社会学文集，其特点和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表现在它特别关注时间社会学的形成，收录了可能是这个领域最早的专题论文，也就是1937年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合作发表的论文《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以及社会学家乔治斯·古尔维奇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版的专题著作《时间的频谱》中的部分内容；其次，体现在辑录者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对时间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和领域所作的细心而睿智的把握和界定。这种界定尽管是以文集的形式出现的，却也难能可贵，独具匠心。从本书的具体内容来看，涉及时间和社会时间概念的哲学分析、社会时间的结构和社会意义、近现代社会时间意识、社会时间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社会时间与社会活动如工作和组织的关系，以及特定种族和文化中的社会时间视界等等。的确，如辑录者所言，本书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这一单一的学科和视角，而是精心辑录了社会哲学、社会史、工业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关于时间研究的贡献，展现出时间社会学研究与众多学术领域的密切联系，也由此展现出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开阔视野和广泛意义。

本书的翻译主要是由我与李捷合作完成的，我翻译前言、导论和第一至第六章，由李捷完成自第七章开始的后面部分。我的博士生吴芳提供了第七至第九章的初译稿。这里，要特别说说的是，本书翻译过程中李捷还是我的一位在读硕士生，年龄不大，却有这样好的译笔和语言能力，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里对她提出一份表扬和感谢，并不是说本书的翻译，包括她所翻译的部分毫无瑕疵。毫无疑问，翻译是一件并不实惠但又困难的事情，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实际上，我主要是想诉说内心的一份无奈。这些年遇上和指导一位有学术潜质的学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坚持让李捷继续在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而是支持她首先找一份安定、待遇优厚的工作。个中的情由，我想与我同处一个社会场域中的读者朋友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记上一笔，不只是给我这个做老师的做一次自我心理治疗，或许还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

朱红文

2008 年 12 月 10 日 北京师范大学